

目 录

写在卷首 /1

时代一角

戳穿伪善面具 揭露间谍罪恶 /1
“幸亏有了婚姻法” /3
亭子间的灯光 /6
施老太杀鸡 /8
“飞龙”腾空记 /9
访四鳃鲈鱼的故乡 /11
听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12
看毛主席与人民代表一起投票 /13
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15
海关大楼的荣誉 /17
黄漱华的四个夜晚 /18
根深枝叶茂 /21
革新状元出在豆腐店 /23
瘟神送出青浦县 /25
警民友谊桥 /27
花地访蜂居 /29
看牛蛙 /31
荠菜的故事 /33

飞越云贵高原 /35
师徒制灯 /37
耕牛休养所 /41
豫园探宝记 /44
朵朵红花献烈士 /45
途经止园 /47
木石姻缘 /49
“龙宫”取宝 /50
槟榔芋的故事 /52
春江春暖访鸭乡 /54
宜兴玫瑰 /55
铁路之女 /56
大海上的姑娘们 /58
王孝和在学运中 /60
青草·鲜花·苍松 /61
灵丘路考与备考 /67
古猗园里巧遇苏绣大师 /68
“慈溪杨梅甲天下” /70

目

录

1

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英雄 /71
沐新千年阳光 探神仙居幽深 /83

延安散记

从“八办”到延安 /85
来到了南泥湾 /86
宾馆与窑洞 /87
延安——上海 /89
杜甫和延安 /90
嘉岭山与范仲淹 /91
洛川塬上行 /92
花原头访牡丹 /94
桥陵祭祖 /95
将军画竹 /97
铜川遇险 /98

旅美散记

色彩的故事 /101
列席众院会议 /102
小游仙人洞 /104
飞车曼哈顿 /105

好莱坞历险 /106
洋大饼洋油条 /108
访世外桃源 /109
救火会餐厅 /111
大西洋赌城 /112
在纽瓦克机场 /114
美国大学生 /115
旧都费城一瞥 /117
棒球场上看美国性格 /118
逛美国“跳蚤”市场 /120
见识美国家庭式旧货铺 /122

旅法散记

凭吊巴黎公社墙 /124
在巴黎登高 /125
“机器楼” /126
巴黎乞讨者 /127
密特朗与卢浮宫 /129
“玛米达”们 /130
小住比利牛斯山 /131
花都玫瑰园 /134

言为心声

新闻评论

人定胜天 /137

清明看风俗 /138
“五卅”的种子 /139
“更加众志成城” /139

好读 苦读 乐读/140
多写点孩子/141
致公民某/142
压不倒！/143
“红楼”冤/144
欢送/145
从“一”出发/146
打篮球的比喻/146
韩山河的启发/147
听孩子的歌声想到/148
一杯清茶见深情/149
华佗再生/150
火车进站的学问/150
赞为科技人员当后勤/151
明镜高悬/152
盖得广厦千万间/153
年夜饭和金饭碗/153
争当巧媳妇/154
发扬“人梯”精神/155
赞赞居民的贴心人/157
历史的镜子/158
请“冤家”们三思/159
“随遇而乐”好/160
伟大的社会调查/161
同心同德/162
国庆——家庆/162
靠海吃海/163
“金钥匙”妙法无穷/164
从女排想到中华妇女/165

“吃产品”析/165
愿吴越春光长驻/166
心心相印/167
余热生辉/167
踢足球的启示/168
文明人有新事/169
小事情 大潮流/169
杨怀远借海风/170
吴佩芳风格/171
荣福村的联想/171
三十三年前后/172
名中医董庭瑶治病/173
“红牌牌”的名与实/173
姑妄言之/174
爱你的母亲/175
“眼睛盯着他们”/175
“闯世界去，好！”/176
赞美杨浦绿/177
江那边呀好地方/177
唱《团结就是力量》/178
赞大学生献血/179
“平平安安回家”/179
在“护绿队”面前/180
喜看上海人食有鱼/181
“不老松”与“支柱”/182
“高抛”——请住手/182
“承诺”之后/183
手莫伸/184
国兴旺 家小康/184

社会小言论

台风来时/186
 树倒大家扶/186
 爱护人民币/187
 撒茄子的汽车/187
 别忘了西瓜皮/188
 农民要看电影/188
 无独有偶/189
 说“客”/189
 指责得好/190
 马路仓库/190
 收信人诉苦/191
 傻哉 赌吃/191
 看看什么风俗/192
 别杜造怪词/192
 嫩嫩烧烧须小心/193
 冒险不是勇敢/193
 $40 = 76 = 26$ /194
 请“舍鸡为人”/194
 别让死老鼠害人/195
 “雾”迷报栏/195
 “小袖珍”提意见/196
 “大而化之”先生/196
 看戏请脱帽！/197
 忙春节/197
 倡议节日卫生/198
 从扫雪想起/198
 勿做吸烟接班人/199

要求不被烟熏的自由/200
 为孕妇“呼吁”的由来/200
 再谈让座/201
 药渣和旧俗/201
 褪去“雅”衣/202
 雨天的矛盾/202
 要走“正路”/203
 贴邮票的讲究/203
 推桥头不如灭蝇/204
 要多管“闲事”！/204
 收到“疑难”信后/205
 不许老鼠上台/206
 关于“救火龙头”/206
 我们的愿望/207
 可敬的新娘/207
 不冷静的一铲/208
 请给宝宝挑生日/208
 罚款要当真/209
 代母鸡看病/209
 新春写春联/209
 吉庆有余/210
 礼品交换站/210
 三早抵一工/211
 毛脚女婿上门/211
 老校长的楼房/212
 路边的“臭虫”/212
 学雷锋插曲/212
 橡皮鱼公案/213
 现代“世外桃源”/213
 可笑的是谁/214

抢桌子的喜剧/214
蚕豆风波/215
小孙孙含烟斗/215
哗哗水与滴滴水/216
春节——文明节/216
婆媳让房/217
秋光照眼明/217
“橡皮筋蛋糕”/218
晚娘与佳话/218
姑娘,请加餐!/219
尊老与文明/219
“补偿”与损失/220
在废品中闪光/221
苹果和蜜梨/221
余师傅应该说/222
老蒋升了“三级”/222
幸福不忘毛主席/223
冬雪宝/223
八旬翁表衷情/224
笑送猪年/225
可怜的新娘/225
青年的心/226

保姆也是产业军/226
会说话的破烂/227
把公字写得浓一点/227
“大老粗”请摘帽/228
新祝愿 新礼物/228
真聪明/229
七巧节乞巧/229
“比爷爷”/230
敬老插曲/230
孩子的兴趣/231
老李“挖邪”/231
路边“芳草”/232
阿孔打电话/232

蔷薇花下

看“鸡爪队”表演/233
钻洞失足记/233
银蛇狂舞/234
孙悟空的尾巴/235
怪鸡与怪经理/235
天女散“X”/236

目

录

5

实践—认识

广播要有自己的评论/237
和青年朋友谈谈广播/241

正面为主 丰富多彩/247
什么是晚报?/254

建立社会主义晚报学 /256
新中国晚报的两个字理论 /265

新中国晚报八大特点解剖 /273

人生回眸

我的家乡慈城镇 /275
追祭父母亲 /276
铁蹄下的萌动 /278
黎明前的战斗 /282
难忘的新闻馆 /291
我的第一篇统发新闻 /295
采访陈毅市长做报告 /296
地方报记者首次踏进怀仁堂 /297
我的广播缘 /300
新民晚报复刊前后话中兴 /304
痛悼亲人 追忆战友 /308

林放与广播 /317
陈仲信烈士和他妈妈 /319
半个世纪的思念 /320
四明公所杂忆 /322
奶奶学电脑 /323
我躺上汤院士的手术台 /324
想起了校歌 /326
百岁苏老——邻家爷爷 /327
公今度和老教授们 /329
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 /3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 周珂著.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76-625-1

I. 一... II. 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509 号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作 者 / 周 珂

责任编辑 / 车明玉

封面装帧 / 卓东东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320 000

印 张 / 10.875

ISBN 7-80676-625-1/G · 349

定价 : 25.00 元

写在卷首

为自己编一本新闻作品选,这个念头萌生在《中国晚报学》的“大纲”和“理论篇”完成之后。

上个世纪末,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决定出版一本《中国晚报学》。我承担了上述两个课题。在这之前,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社会主义晚报学理论,没有现成资料可借鉴。一切要从头做起: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闻观点;采纳新闻界前辈对晚报的真知卓见;通过解剖典型,研究新中国晚报从发生、发展、曲折到成功的历程,从几代人摸索、创新的办晚报经验中,寻找出规律,概括出理论。而研究经验,必须分析广大晚报人采、写、编的实践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自思做为从事新闻工作半个世纪、办晚报数十年的一个报人,深知其中艰苦,也深得个中乐处。何不选若干多年来刊出的稿件,收拢成册,算做探索晚报理论的一点注解,一点参考,也是个人敝帚自珍的一点纪念。

我是新中国正规培养的第一代新闻记者。194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新闻处当记者,1956年调到新民晚报,以后一度到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1年回晚报参加筹备复刊,继续办晚报,直到离休。在这些新闻单位中,采发新闻报道,编审新闻稿件,撰写言论,以及长时期做采访指导和业务管理工作,经历行当不少,却始终没有脱离采访和写作。这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也是自己的爱好和愿望所致。然而,早年我接受名家“报纸文章乃短命文章”之说,记者在媒体上发表的稿件,只要在当时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影响之后,便完成了历史任务。因此,我从在新闻处跑新闻开

始,漫长的岁月里竟没有留下一份底稿,一张剪报,包括被收进有关选集或被改编为文艺作品的稿件,都没有资料保存。

这种一无所有的状况,当我想选这个本子时遇到了不小的难度。开头只能凭记忆,往茫茫报海中去搜索,整天坐在资料室里翻报纸合订本,弄得头昏脑胀,便想打退堂鼓。幸好有老同事和新闻系师生给我一批打印稿,几份目录和一些选辑、剪报,使我得以顺利继续。及至进入 21 世纪,有了网络、光盘,只要输入姓名、笔名,便可迅速检索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这才让我在近几年疾病缠身之际,收集到一批署了名的新闻作品和纪实文章,大致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我视野所及的某些景象和思考。最后筛选成这本粗糙的册子。

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时代一角。选有通讯、特写、散记等。记叙半个世纪中,在本市和国内外采访、见闻的一些人和事,发表在新民晚报和其他一些报刊上。

言为心声。选收为晚报和广播撰写的新闻评论、社会小言论。用笔名石雨、俞晴、奚丰淑等,先后发表在集体和个人专栏《随笔》、《未晚谈》、《广播杂谈》、《今日论语》、《读信随感》、《谈家常》、《生活琐谈》。

实践—认识。选收学术论文若干篇章。总结新闻业务实践,研究办晚报、办广播经验,从感性认识提炼为理性认识。

人生回眸。实录作者学习、工作,与时俱进的历程,回顾生活的甘苦,忆念亲情、友情。

收罗旧作,选成书稿,如释重负。但愿让读者对作者有所立体了解,不吝批评指教。有生之年,希望尚能努力耕耘,为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建设小康社会献一份余热。

衷心感谢鼓励、督促、帮助我出版此选集的党组织、同事、友人,以及儿孙们!

周珂

2004 年 5 月

戳穿伪善面具 揭露间谍罪恶

今年1月间,上海市淮海中路泰山公寓搬进了两个神秘的人。这两个人在一号八室住定后,立刻从门口直到卧室床头装起了警铃、警灯,还在大门上配了三道牢固的大锁,这两人一个叫田望霖,一个叫林仁,都以天主教神甫为职业,但是,他们做的却完全不是神甫的事情。

田望霖原来是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心腹:黎培里在中国控制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反动活动时,派田望霖为组长;黎培里被逐出中国国境时,留给他两千元美金作活动经费;去年,黎培里还给他秘密传来“指示”。田望霖又为帝国主义间谍才尔孟所赏识:才尔孟被逐出中国国境前,密令田望霖继承他的间谍任务。田望霖接受命令后,就勾结林仁,从1951年起,有计划地广泛地进行情报特务活动。田望霖是个狡猾的家伙,在他干罪恶的间谍勾当时,他已经研究好了三种密码,两种密写和许多代号作为传送情报的办法。他的密码之一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分两行,以A和N对换使用编成。另一种密码是以圣母像为封面作掩护的小册子,用时以五个字母一组代表一句句子。还有一种密码田望霖认为是“精心杰作”,它由一本经过编排的法文拼音字典和一支特制的小尺做成,可以翻译任何一个字成为密码,在这种密码的一张“常用字表”上,他集中了几十个逮捕、监狱、特务等政治性单字。田望霖说:“这种密码本不多,其中有一本我要巴黎的伊丽果依扬寄到香港去,她把它寄到了香港美国领事馆。”

密码专门用来向国外、海外传送情报。田望霖和林仁两个比利时人先

后用它们向国外的特务机构发出了三十份编成情报,取名“MEMEZTO”,详细报告我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的情况。

这些情报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种特别阴险毒辣的办法是:收买和欺骗年轻幼稚的天主教徒进行罪恶活动。林仁常用一副伪善的面孔勾引青年教徒去刺探情报,并为他们排定汇报时间,从清晨到深夜,不让有两人相互碰面。多禄和嘉禄兄弟俩,都被林仁利用,但由于每次汇报情况后林仁嘱咐“严守秘密”,因此这两兄弟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各不了解,处在相互隐瞒、相互猜疑的生活中。林仁勾引青年犯罪的恶毒情况可从向明中学学生青年教徒吴宝昌的遭遇中看出。吴宝昌说:“……林仁先后给我二十四万元钱,叫我刺探情报,我汇报有重要消息时,他就满面笑容极力捧我:请我吃大菜,送我金十字架和袜子,还称我为‘红衣教友’,但我汇报不出时,他就立刻冷冰冰地对待我了……林仁和田望霖还要我拣‘人多的地方’散布反动谣言,并叫我‘准备坐牢为主殉教’……”在间谍活动中,田、林两人不仅布置了广泛的情报网,而且还布置了好几个“继承人”,准备长期和中国人民为敌。

师保禄是他们最看重的爪牙之一。1952年4月,田望霖亲自教会了师用密写、代号的方法,并派遣他到保定去联系、刺探情报,临行一再叮嘱“要谨慎”,“把情况用唾液密写报告”,还详细指导师要用“家长负责,子弟做工”的办法开厂,以防泄露秘密。师到保定后立刻勾结了帝国主义分子平静修(已被逐出境外)和圣母军分子多人,并照田的意见开了一个裕华洋钉厂。师保禄说:“开厂目的是‘团结他们’,并可钻政府号召生产的空子,又可以以公开业务会议为名,集会讨论问题。”厂的经费完全由田犯从上海寄去,重要问题也由他们密写指示。1952年年底,师计划打入河北省第五劳动改造所刺探在押反革命分子情况,后田望霖命他来上海先详细报告监狱情况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在保定休养的情况。田望霖和林仁对师的活动很满意,就决定把师列为“继承人”之一。田望霖把国外情报站的地址告诉师,要师在他们“离境后继续报告”,并嘱师要“坚持下去,等到美蒋反攻”。

田望霖物色的另外一个“继承人”叫林鸣奎,是他在比利时的同学,懂得法文。林鸣奎在利诱和伪善欺骗下,对田的指使也唯命是从。他打入土

山湾孤儿院的工会基层组织刺探情况,并经常给田翻译情报。田望霖曾把巴黎寄来的两千元美金装在一本挖成空心的西装书里交给林鸣奎保管,并答应把其中一部分留给林鸣奎日后做经费。田又把密码本、传递情报地址、关系人名单交给林鸣奎,嘱他如有意外,即用密码报告国外,并继续收集情报,向国外间谍机关递送。

但是,尽管田、林两犯行动如何隐蔽、诡秘,人民公安机关却早就洞悉了他们的阴谋。知道他们底细的爱国人民包括爱国教徒也从外埠和本埠寄出了检举信。1953年3月25日那天,罪恶的帷幕被揭开了。田犯所布置的警铃、警灯、重重门锁都失了效用,公安人员顺利地到现场找到了这批间谍特务分子的罪证:第三十号情报底稿、大量美钞、密码本、化学药水、国内外情报网地址和来往信件等等。接着,密码、密写也由公安机关一一识破了。受骗的教徒们在爱国爱教的正义感支配下,纷纷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在铁的证据面前,田望霖和林仁不得不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低下了头,他们在法庭上一一供认了犯罪的事实。

一切事实确凿地证明:田望霖和林仁正是两个不折不扣躲在黑长衫下面冒充神甫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他们过去长期利用宗教作掩护,进行着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罪恶活动。现在,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已被戳穿,应该是受到正义审判的时候了。

(原载《解放日报》 1953年6月16日)

“幸亏有了婚姻法”

——女工唐桂英控诉封建婚姻

我是上海国棉七厂的落纱女工,苏北兴化人,今年三十九岁。毛主席共产党的婚姻法把我从苦井里救了出来!

我十六岁就进工厂,隔了两年知道了当我才九岁的时候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了一个豆腐店的小开。这个小开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从七岁开始读书,读到十八岁连一封信还看不来。他母亲是村里跳神的巫婆,尖刻有名。我那时还不懂这是什么“包办婚姻”,但想到自己靠双手吃饭,去嫁这样一

个不正派的人心里非常不愿,就回家要求解除这头亲事。谁知我父亲没等我说完就打我一顿嘴巴,虎起脸说:“你这丫头好胆大,好人家的女儿不许讲这种丢脸的话。”我妈虽然也知道我婆家不好,但她自己也常挨父亲打骂,没法子保护我。我自己一人没人撑腰更没法子,二十一岁时就被父亲强迫着嫁到朱家去了。出嫁那天,我一路哭了三十里地,只怨自己命苦,但还不知道跌进了火坑。

一过门,他们就不让我做厂了。十八年来我没有过一天人的日子。记得结婚后第十一天,婆婆叫我磨豆腐,我一人力小磨不动,他们母子两人就开始下毒手给我一顿打,说是做规矩。婆婆捧着我的头往墙上碰,右额角撞了个窟窿,鲜血直冒,流了一身,他们毫不动心。以后我每天要磨豆腐,还种地,一切重活都要做,起早摸黑当牛马。婆婆跳神的佛堂我不能当中走,说我人污秽要冲犯老佛爷。她常故意说佛降了身,要罚我“不孝”,叫我一跪几个钟头,跪得我两眼发黑站不起来。平常他们吃鸡鸭鱼肉,我只能吃剩菜冷饭,还常挨饿。有一次,婆婆的女婿来了,叫我杀鸡,我不会,偷偷请邻居帮了忙,他们就说我在邻居前面骂他们,丈夫一把拉住我头发,姑丈用脚踢,婆婆狠狠的用拳敲,还咬着牙用劲扭我。我被他们打倒在地上,喊也喊不出了。不管我几天躺着不能动,他们一口水也不给喝。堂房的妯娌同情我暗中送来一碗米汤,又给婆婆撞到了。恶婆婆一巴掌把碗打翻在地上,毒辣地说:“饿死她还不是死条狗,她死了,我家儿子再娶一个。”这种折磨甚至在我养孩子时也不能幸免。我大肚皮时,婆婆还尽拣重活叫我做,仍旧得不到一餐好吃。我养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实在看不过丈夫的浪当相,说了他一声“懒”,他们母子俩又扑了过来,大冷天把我衣服剥光丢到地上,一个揪住头,一个用木棍在上下身狠狠打,用脚乱踢。我立刻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想想实在伤心,心一横就冲出门去跳了河!后来,乡亲们把我救起送回娘家,我已经半死了。妈妈只会守着我哭。我三哥在上海做工回家,看我浑身青肿发紫,就和姊姊两人支持我,叫我伤好了出走,劝我不要死,孩子还小。但大哥二哥封建思想,怕我走了遭人笑话,就不管我死活,逼着我回婆家。我为了孩子只好回到这个活地狱,每天吞着眼泪挨下去。

后来,乡下荒年,丈夫要跟着我让我养活,就叫我带了孩子到上海来做工。我满以为离开恶婆婆,总可少受些虐待了,谁知二流子成性的丈夫更勾

结了反动派照样压迫我！那时候，我一天十多个钟头做工，累得腰都直不起，回到家里还要服侍他，发了工资自己一个钱也不许用，交迟了又要被毒打。有一次我三哥实在看不过，跑去和他评理，他就立刻勾结伪甲长把我兄妹俩抓进伪警察局，无缘无故判了三年徒刑。关了三天，我三哥想法借了二担米，我们才被放出来。他对孩子也是恶声恶气，毫不爱护。有一次他抢了孩子一个馒头，孩子哭起来了，我说：“你要吃我给你去买好了，为啥要夺孩子的？”他老羞成怒，骂了声“妈的皮”，就一拳把我打倒地上，对准我胸口狠狠踢了六七脚，还不肯歇手，竟去找了一根削尖的竹竿，猛地朝我头上插下来。我吓得惨叫一声，赶紧把头一歪，竹竿戳进了左额角，我痛得又昏死过去，血流一地，头发都浸透了。以后，他待孩子更不好了。我的大孩子，在六岁时出痧子，他不让我停工照顾，自己又整天出外赌钱，把孩子锁在屋里。可怜的孩子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死了！

上海解放后，姊妹们生产高高兴兴，我可常一个人躲在马桶间里哭，做什么也没劲。去年厂内推广速成识字法，我被推上了。我想识了字有办法了，满心欢喜，识字非常用功。但是第一天他就因为我回家晚了，扑过来一把抓破了我的脸，又拳打脚踢，打得我全身青肿，我儿子在旁帮我说话，也被他打得脸上发青。我在班上努力记住的生字回家就被他打忘了。厂里姊妹见我三天两日脸上被打坏，很关心我，这时女工委员也来详细了解我的情况了。有了大家的撑腰，我顿时勇气百倍，我不顾自己快要生孩子了，坚决要求工会做主，和他打离婚！起先我丈夫还威胁我不准离婚，在法庭上很强横。但后来连我十二岁的儿子也当庭说：“他不劳动，是二流子，欺侮母亲。”邻居也都指责他。去年9月，在工会和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去掉了这根套了十八年的铁锁链；人民法院终于判准我和他离婚了！

离婚以后我浑身轻松，好几次从梦里笑醒来。十八年黑暗恐怖的日子像蒋匪帮一样永不再来了！毛主席真比我的亲娘还亲呀！虽然我脸上五处大疤还在，天气一不好时全身仍要酸痛，我也想毛主席共产党早来二十年就好了，我不会吃这么多苦了。但是我又想如果共产党迟来二十年，我早白骨化灰了，很多受压迫的妇女也要死了。现在我终于脱离苦井见了天了，所以我想到，如果不努力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过去我上工老脱班，现在我早上

每天等着开厂门 ,常常当我收拾了三部车子才接班 ,过去我揩车没精打采 ,现在我揩得又快又清洁 ,因为清洁做得快可以多结头 ,走路脚头也轻了 ,学习、工作都有劲了 !过去我身边不能留一个钱 ,现在我自己支配工资了 ,过去姊妹们只见我愁眉苦脸 ,现在我从心里笑出来了 !过去十八年抵不了现在的三个月 ,我深深感到我所以能翻身是全靠共产党毛主席 ,幸亏有了婚姻法 !

(原载《文汇报》 1953 年 4 月 1 日)

亭子间的灯光

陆大姐实在古怪 ,住在上海市区 ,放着又明亮又方便的电灯不用 ,却长年累月的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每到晚上 ,她那亭子间窗子里透出来的昏黄灯光 ,和周围强烈的电灯光对照 ,实在太不相称。

陆大姐点不起电灯吗 ?显然不是。她丈夫老吴 ,是帆布厂的工人 ,每月工资供养妻子、女儿 ,连自己三个人 ,足足有余。而且 ,电灯也并不比煤油灯贵多少。那么 ,陆大姐是偏爱煤油灯吗 ?也不是。前几年 ,每当煤油缺货的时候 ,她就要唠叨 :这个“老式灯” ,真教人心烦哪 !不过 ,邻居劝她装盏电灯时 ,她总是一口就回绝。

陆大姐的煤油灯 ,长期来 ,在附近居民中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十三年前的一个春天午后 ,在邑庙区一幢沿街二层楼的屋子里 ,两位妇女吵得正凶 :陆大姐气忿忿地说 :“我们家的电灯又坏啦 ,你们每天在露台顶上打风箱生熨斗 ,乒乒乓乓的震坏我的电灯泡不知有几个啦 !”住在三层楼的周大嫂也有理由 ,“阿大他爸做裁缝 ,不生熨斗还行 ?”陆大姐反驳 :“生熨斗 ,不可以轻一点吗 ?你明明知道露台下面是我的屋子 ,你不是欺我老实 ,故意为难吗 ?”周大嫂冷笑一声 :“这年头三个铜钱租间屋 ,我爱怎样便怎样。”……这场架吵得个没休没完。从此陆大姐就下定决心 ,拼口气 ,把好好的电灯给拆掉啦。

说也凑巧 ,这一年夏天 ,天气特别热 ,陆大姐在亭子间里烧煤炉 ,闷得吃不消 ,便到楼梯口上去烧饭。这楼梯口原是周家下楼必经之路 ,周大嫂见炉子放在这里 ,心里已有三分气。有一天上午 ,周大嫂的小儿子一个不

小心,从三层楼的楼梯上滚了下去,跌在正烧的煤炉旁,一锅豆瓣汤全倒在脚上。周大嫂一见儿子烫伤,又疼又急,便骂开了。陆大姐虽然知道伤了孩子自己理亏,但积怨在心,怎肯忍气,也回骂起来。这一次以后,两家的仇就深了。三天两日,碰到一点鸡毛蒜皮,两人就吵将起来,妻子影响丈夫,连周师傅和老吴见了面也相互不理了。近在咫尺的贴隔壁竟比陌生人还不如了。

1949年上海解放初,陆大姐曾参加里弄工作,认识有了些提高,但是人家一劝她要改善和周大嫂的关系时,她便作色说:“解放后不吵架可以做到,要我和她去和好,万万不能。”后来,周大嫂当了居民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兼居民小组长,陆大姐就推说身体不好,不再搞里弄工作。周大嫂想,自己是里弄积极分子,该去团结陆大姐,然而一想到多年来的种种不愉快,也觉得难以消除,于是每逢开小组会,只好辗转请人去通知陆大姐,陆大姐呢,去是去了,就是不和组长开口。同组居民和居委会为她们两人的事花了不少气力,也感到没办法。

今年3月,里弄整风之火熊熊地烧了起来,学习会呀,鸣放会呀,大整大改呀,一个接一个的热潮。里弄要前进,每个人要前进,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中心的“六好”口号到处传……这一切在周大嫂和陆大姐的脑子里整天翻滚:说“六好”,离不了邻里团结,这可怎么办呢?周大嫂每天清早起来,就对自己说:“今天一定要去喊她!”可是一见了面,真难啊!她尽拿眼睛去望陆大姐面色,机会就一个一个地滑过去了。陆大姐每次下楼碰到周大嫂从下面上来时,心就噔噔地跳,暗自说:“叫她吧,叫她,叫她!”话到了嘴边,又咽下了肚,“为什么要我先叫呢?”她往楼梯这边让一让,眼睛望着别处。就这样,两人捉迷藏似地闹了好几天。

终于有一天,陆大姐正要下楼,忽听周大嫂在楼梯脚边叫儿子。陆大姐见她一手拎了一桶水,一手拿了淘米箩、小菜篮,知道她叫儿子帮忙,可是儿子不在。陆大姐脸上刷地红了起来,心想千万不能错过这机会,急急忙忙地跑了下去,鼓起全部勇气:“我帮你拿吧!”“啊……谢谢你!”周大嫂望着陆大姐笑了笑,陆大姐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下午,周大嫂跑到亭子间去:“陆大姐,今天讨论六好规划,我们一起去吧?”“好的!”周大嫂又说:“我们这回重新和好了,一起订个姊妹合同好不好?”“好呀,我也这么想呢!”陆大

姐也笑了。

故事还没有最后结束。当居民大会上表扬陆大姐和周大嫂的第二天，周大嫂乡下老家有急事，匆匆地走了。陆大姐回来知道这事，连忙跑到三层楼上对周师傅说：“你不要急，这几天我帮你烧饭，照料孩子，收拾地方。”不等他回答，就忙忙地给他准备晚饭去了。周师傅却想起很早之前曾听说陆大姐的缝纫机有些毛病，就一声不响地拿了工具，到亭子间里把机子收拾了一番。晚上，还写封信告诉妻子，家里有陆大姐照顾，叫她在乡下不必记挂。……

昨天晚上，邻居们十三年来第一次看见，亭子间的玻璃窗上射出了通明的电灯光。
(原载《人民日报》 1958年6月5日)

施老太杀鸡

“施家老太把芦花鸡杀掉啦！”这消息立即哄动了五十六号附近居民。

杀个鸡有什么稀奇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沉香阁前面有口八角井。这条路上的不少家庭主妇还保留着古老的习惯，喜欢上井边淘米洗菜。井旁边经常有好几只鸡在巡逻，趁人冷不防的时候，它们就伸过嘴来，“啄、啄啄……”地偷米吃。

于是，很自然的，街道里弄一声鸣放，居委会里就出现了好几张这样的大字报：

“市区养鸡不合理，浪费粮食多多少？把鸡放在马路上，妨碍交通，又不卫生。”署名俞荣富。

“每只鸡每月吃米五斤，算一算，一年要浪费多少粮食？”署名张素娥。

……………

再说喜欢养鸡的居民中有位施老太，六十多岁年纪，爱鸡的程度不下于小孩子爱猫。每年，她总得花一笔钱，买上好几只小鸡抚养。去年买的鸡，不幸都死掉了，只剩下一只芦花母鸡，施老太把它当宝贝似的看待，用兔子笼改做了一个舒适的鸡房，还给它取个名字叫“阿憨”。施老太逢人就夸说：“我家阿憨很听话，不偷小菜吃。”邻居劝她：“粮食计划供应，养鸡要浪

费大米……”施老太马上回说：“我宁愿自己少吃点粮！”

这施家两老、儿媳合住一起，生活原很美满，可是为了那位“阿憨”，却常起争执。施老爹劝老伴：“年纪这么大了，扫鸡粪不累么？”在上海电机厂工作的儿子也劝她，城市里养鸡坏处多，还告诉她：“厂里的家属委员会也号召不要养鸡呢！”逐渐地，施老太的心也活动起来了。

里弄整风开始了，施老太心想，自己就这么一件事做得不太对头，邻居一定有意见，下决心杀掉吧！几时杀呢？可还有些犹豫。可巧3月8日这天，那位“阿憨”忽然又显原形：趁施老太一个转身，它就不客气地把老太的二毛钱猪肉丝给吃掉了。这一来，施老太才最后下了决心：“杀吧，明天儿子媳妇星期休假，请他们吃鸡！”
(1958年3月11日)

“飞龙”腾空记 ——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的诞生

清晨，水上飞机宁静地停在黄浦江边宽广的水泥坪上，散发着银色光辉。人们闪着灼热的目光，一次、二次、三次，无数次地端详这位美丽而威武的新生儿。色泽柔和的蒙布裹着她健美的钢筋骨架，头部的发动机整流罩漆成大红颜色，喜气洋洋。最引人注目和发生兴趣的，要算那一对圆胖的大浮筒了。浮筒的形状和作用都像鱼膘，它代替普通飞机的轮子，是水上飞机的显明标志。

这就是上海飞龙一号水上飞机！今天是她举行飞行典礼的日子。你要知道这架飞机是怎样诞生的吗？

……那是八月初的一天，飞龙机器厂里传开了一则不平常的消息：党委决定试造一架水上飞机！这多么激动人心哪！但是造得起来吗？造得起来！工人们肯定地回答，都想接受这项光荣任务。六十二岁老木工范清河，已经退休在家，听到厂长说起要造飞机，就兴奋地要求回厂工作，理由是：“我老头修理过飞机，可能有点用处！”真的，老师傅在旧社会里干过多年飞机修理工作，可是几十年来就没有看见过自己国家制造的飞机，他激动地说：“现在我们厂自己要造飞机了，这是打击帝国主义的好机会。我怎肯不

来使一把劲？”

8月7日,造飞机的计划实现了。这天起,全厂就浸到热潮里,诗呀歌呀到处传,劳动和智慧的故事说不完。几乎每天晚上可以看见党的各级负责同志们在苦苦劝说一些工人休息。工人呢,笑笑说:“搞不好睡不着觉哩!”一个叫汪如洋的老工人竟说:“业余时间让我自己支配吧。”

动工以后,困难不少,但他们认定有困难有办法。图纸资料不齐,党委提出:边设计、边制造、边改进。工人一听,好呀,常规打破了,便干脆不用图纸,径直做起模具来。工人们还普遍开动脑筋。老工人许阿法、周钱官、时宝树等觉得做发动机包皮用木头挖模具,花时间太多,暗地里一合议,便在晚上偷偷地试验,用水泥捏了代替,结果效果很好。有的工人索性连模具也不要了,白手就做。一对大浮筒各有五个密封室,是飞机的很主要部分,质量要求很高,不用大的模具就做是难以想像的,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一结合,想出办法,用吊水平线的办法创造性地做出来了。

这样土搞、猛搞,也引起了某些人的担忧:造飞机不是玩的,这种干法会不会影响质量和规格呢?但是,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工人们“多快”不忘“好省”,你看,在严格的检验下,浮筒不仅耐住了强力的高压,当它在浪涛滚滚的海面上,驮着飞机下水时,轻轻盈盈地,飞机和水面的角度恰好是二度——完全合乎标准,而且,第一次滑水就飞起来了。

就在工人、技术人员们的这种忘我、认真的劳动下,造飞机的速度空前迅速,而当美国帝国主义在台湾地区的无耻军事挑衅激怒了工人们时,速度更快了,终于,这架水上飞机仅花四十八天的时间造成了,还赶上向国庆节献礼。……

马达吼叫了。庆祝典礼完毕,水上飞机正式起飞啦!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只见她蜻蜓点水似地,在黄浦江面上平稳地滑行了一个圆圈,信号枪一响,一刹间昂首一跃,兴奋的人们还来不及看个究竟,她已矫捷地窜到了空中,真不愧飞龙的称号!微微的江风伴送着飞龙一号,飞行员该是满意地操纵着机件吧,飞机顺利地、轻快地在江面上作低飞,机身上那面鲜红的五星国旗,在阳光下分外灿烂,象征着祖国辽阔无边的天空,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58年9月28日)

访四鳃鲈鱼的故乡

老金手掌里托着一条美丽的小鱼,笑着说:“看,这就是花姑鱼!”花姑鱼,多美的名字!那是一条形状像塘鲤鱼似的小鱼,不过二两多重,身上有好看的花纹,颜色青里带黄,最特别的则是她的两鳃——不,四鳃,鲜红鲜红,就像姑娘们脸上搽的胭脂。啊,这就是名震远近、传作千古美谈的四鳃鲈鱼呀!

四鳃鲈不仅美如花姑,而且滋味奇好。渔民的吃法是先把火腿或咸肉和白菜熬汤,然后把四鳃鱼趁沸汤余下,用锅盖一闷就好。这样烧的鱼汤,鲜美极了,鱼肉又细又嫩,大概没有什么鱼可以比美了。怪不得晋朝的张翰一想到吃故乡的四鳃鲈,连官也不要做呢。

提起四鳃鲈,人们便会说这是松江的名产。松江县秀野桥卖的四鳃鲈确实出名,但是鱼的重要产地却在青浦的金泽、西岑、练塘的三角水带。

我们面前的这位老金,是一个诚朴能干的渔民。他名叫金财良,在捕鱼生产上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同时,他又是一位捕捉四鳃鲈的专家。他家三代捕鱼,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水上生活,二十多年来,打他手里过的花姑鱼,真不知道有几多斤了。

小机轮推开光滑如绿缎的水面,我们随老金来到了西岑荡附近的河面上。老金遥指一带拦河的竹篱,告诉我说:“这就是簖,用来捉蟹、捉鱼。花姑鱼也是在这种簖上捉的。”接着他屈指算了一下,又笑说:“目前冬至将到,正是捕四鳃鲈最好的季节呢。”老金对四鳃鲈的了解,真像了解他自己的手指一样。他告诉我们,花姑鱼喜欢冷,平常住在水草里,天一冷她就游出来玩了,据传说还爱在夜里游到水面吃霜。所以渔民看见早上有浓霜,晚来又很冷,就可知道今天捉的花姑鱼一定多。花姑鱼冬至以后就开始放卵,到春天孵成一寸光景长的幼鱼,经过一个夏天也长的不多,到秋末冬初,它就长的快了,也肥了,故而目前正是这种名鱼当令的时候。

船驶近了鱼簖,我们隐隐可见簖窠——簖头处围成圆圈的一个“小房间”,各种鱼经过曲折的簖房,最后都进了簖窠被捕——近水面处挂着一个

喇叭形的竹篓,老金讲解说:“这叫花姑篓,专门捉花姑鱼的,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可捕到十多斤。另外还有边篮、蟹篮、鳗桥三种工具,在捕捉河蟹、鳗鱼的同时,也可捕到四鳃鱼。”

我们终于问了他一个问题:“花姑鱼这样出名,是否可以多产一点呢?”不料,这回老金却沉思起来了,半晌,他感叹似地说:“渔民总是爱鱼的。解放前,花姑鱼卖到一担米一斤,可是吃的都是些阔佬、官僚,卖来的钱呢,大多交给占有渔簰的簰户。这样,渔民还有什么积极性?解放后,渔民为自己生产,劲头高了,但是花姑鱼却逐渐少了。什么缘故呢?因为生产方法改进了,大多用网捕鱼,簰就渐渐地少了。——不过,”老金忽然又转为兴奋的语气说:“现在青浦划归了上海,计划要大搞养殖水产,听说准备把花姑鱼也养起来,如果这样,那么花姑鱼的增产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十分满意地告别了老金。临别,我们心里说:希望下次来时就能看到养殖的花姑鱼!

(1958年12月21日)

听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了。这宏伟的声音像一股能发光发热的电流,传到了每个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上,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亿万人民的身上,使人们增加巨大的动力,人人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为1959年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怀仁堂,这座人民的宫殿,由于人民领袖和人民代表的莅临,而显出了她的全部美丽。以翠绿色为基色、绘有精致花鸟的画栋上,都平添十分生气。六角式的玻璃宫灯、橘红色的纱宫灯,和着强烈的水银灯光,发出绚丽的光辉。在春雷齐发般的掌声中,人们全体站起来,两千多双眼睛一齐注视着主席台。代表和委员们代表六亿多人民的心意,向最亲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总理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了。这是一个全面跃进成就的汇报,也是一篇动员继续前进的鼓动词。他报告的每一个字句都紧扣着听众的心

弦,在听众的心底里奏起无限振奋、无限美好的乐曲。

周总理说:1958年,出现了一个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经济大发展。这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总路线指引下出现的。我们应当在1958年的巨大胜利基础上,沿着1958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争取1959年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人们的眼前立刻重现了一幅又一幅亲身经历过的、看到过的瑰丽画面。人们热烈拥护总理的报告总结全国人民去年的伟大成就和指出今年的努力方向。

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西藏反动派的失败,西藏人民将在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帮助下,逐步地把西藏高原建成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周总理的话声未落,会场西北角上的兄弟民族同胞中首先鼓起掌来,一霎时,整个怀仁堂又充满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穿袈裟的喇嘛笑得合不了嘴,穿民族服装的姑娘高举起双手。

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周总理说:帝国主义总是忙着干涉一切外国的内政,忙着要把整个地球甚至要把月球放在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但是他们却不能管好自己的家务。蔑视敌人的笑容出现在各个听众的嘴角上,立刻汇成一片笑声,会场情绪更加活跃了……

历时二小时半多的报告,始终紧紧地吸引着人们。老先生们戴上老花眼镜,专心看着文件。兄弟民族同胞头上套着“译意风”,凝神细听。很多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拿出笔来仔细在报告上划线做记号。外国记者在笔记本上嗖嗖地写着,电影摄影师们忙着拍下各个镜头。掌声不断淹没总理的报告。当时钟指向正六点,报告结束时,全场听众共为这个报告鼓了七十多次掌。毛主席面带笑容和大家一起鼓掌,然后在热烈不断的掌声中宣布休会。

今天的会议预示着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将是一个团结和跃进的会议。
(1959年4月19日)

看毛主席与人民代表一起投票

中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含着微笑,投下了神圣的选

票 ,为全国人民挑选国家机构领导人。

一千一百五十六位人民代表 和毛主席一起投票 ,选举和表决了刘少奇为主席 ,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 ,朱德为委员长和周恩来为总理。

今天下午 ,怀仁堂始终浸沉在欢乐的海洋里。主席台的银色帷幕上 ,五星国徽闪耀着金光 ,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重大喜庆。

人民代表们个个笑逐颜开 ,喜气洋洋。不少代表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出席会议 ,有的代表克服健康上的困难 ,专诚前来投票……绝大多数代表都比往常提前到达会场。他们怀着兴奋和庄重的心情参加这个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的盛典。

三点十分 ,庄严的盛典开始了。毛主席登上主席台 ,全体人民代表和列席的政协委员们一齐站了起来 ,暴风雨般的掌声久久不息。毛主席 ,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 ! 每个人的心里多么愿意继续选举他老人家当国家主席啊 ! 然而 ,为了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 ,为了使他能够腾出较多时间来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人们才抑制了感情上的热切希望 ,而听党的话 ,听毛主席的话 ,不再选他当国家主席 ,让他专做党中央主席 !

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是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他们无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或是社会主义建设中 ,都和人民同甘共苦 ,他们都是卓越的马列主义革命家 ,他们多少年来都是毛主席的亲密助手和战友。他们也是中国人民深深爱戴的领导同志。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 ,分担毛主席的工作 ,热烈拥护朱德同志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热烈拥护周恩来同志连任国务院总理 ! 人民代表秉承人民的意志 ,选举了他们 ,并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表示对他们的敬爱 !

与人们热烈爱戴领袖的同时 ,其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在进行着。代表们关切地听着执行主席的分批宣布选举结果。每个领导人的得票数都很高。使人们看到了全体人民代表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

选举盛典胜利地完成了。表达人们兴奋愉快的掌声又一次响彻怀仁堂。

(1959年4月28日)

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访人民代表札喜旺徐

久住在上海的人,对于祖国边远地区兄弟民族的生活,常常不最清楚。连日来在全国人大上不断听到少数民族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歌颂党的民族政策,记者就带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走访了青海副省长札喜旺徐(藏族)代表。他热情地给了我们满意的答复。

记者:首先请札喜旺徐代表谈谈近年来青海兄弟民族的生活状况。

札喜旺徐:青海是个多民族地区,住有汉、藏、回、蒙、土、哈萨克、撒拉七个民族。除汉族外,以藏族人口最多,计有五十二万多人,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以上。

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在解放前非常落后,人民在地主、牧主的剥削和蒋马匪帮的统治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尤其是三十万牧民,有百分之三十赤贫,什么也没有,只是供牧主奴役。由于历来反动派的阴谋挑拨,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很不团结,经常相互妒忌残杀。

1949年青海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共培养了六千多个民族干部,建立了六个自治州,五个自治县。少数民族享受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家作主权利。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按照各少数民族的意愿,逐步地进行了社会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游牧部落已经全部定居下来,贯彻了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开展多种经济的方针,消灭了赤贫,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景象。农业生产也很快提高,如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灯塔人民公社,去年来办了十三个工厂,开了四千亩荒地,解决了向来困难的自己的吃粮问题。人民政府的合理价格政策,使少数民族人民收入大大增加。过去卖一百斤羊毛只能买两块砖茶,现在可买到十四、五块了。随着生产发展,农牧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家家吃糖、用热水瓶、洗脸盆等(要知这些东西过去他们连见都没有见过呢),还吃上了大米。过去,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人没有衬衣穿,现在大家都穿起了花花绿绿的新衣服。

国家兴建的交通、文化等事业那就更多了。公路由解放初的三百公里发展到现在的九千公里,增加到三十倍,县县都通汽车。学校,过去一所也没有,现在到处都有小学校,各自治州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省里还办了拥有二千多个学生的民族学院,有一千多个学生的民族师范学校,以及卫生等专门学校。……

反动派、牧主、地主被推翻了,各民族间不团结的老根被挖掉了,随着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各族人民在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共同劳动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出现了空前大团结的现象。

几年来,青海少数民族的生活真有天大变化!

记者:那末,兄弟民族同胞怎样看待这些变化呢?

札喜旺徐:少数民族积极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他们说:“我们现在过到了真正幸福的生活,这是和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分不开的。”他们比喻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说生活好了是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他们家家户户都挂了毛主席的像。少数民族体会到各族人民团结的好处,常说:“过去闹不团结,损失人力物资,也是贫苦的原因。”他们还深深感谢汉族人民对祖国建设事业所起的主要作用和对少数民族的帮助。

记者:希望了解青海藏族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关系。

札喜旺徐:青海和西藏地形相连,青海藏族人民和西藏人民同族、同语言,历史上和解放后关系都很密切。青海藏族人民特别痛恨西藏反动集团的叛乱。我们热烈拥护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西藏叛乱的措施,愿意尽一切力量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西藏叛乱。我们关心西藏人民生活,希望他们早日实现社会改革,早日摆脱残酷的农奴制度枷锁。希望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早日建成民主、自治、幸福的新西藏,使西藏巩固地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面!

记者:青海的建设前途如何?上海人在青海好么?

札喜旺徐:青海幅员广阔,面积有八十二万多平方公里,可耕地三千万亩,可利用的草原八亿亩,可以放牧一亿头牛羊马匹。矿藏资源也极为丰富,食盐、石油、金、银、铜、铁、铅、煤等等到处都是,可以说是祖国的一个“聚宝盆”。一九五九年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青海人民继续前进,建设前途肯定是十分美丽的。

从上海支援青海去的人(札喜旺徐同志伸出右手大拇指)极大多数都是很好的。他们受到青海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很多已经在青海安家扎根了。上海人去的很多,对青海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商业各方面建设帮助很大。我们感谢上海党政人民对青海的人力和物资支援!

(1959年4月23日)

海关大楼的荣誉

海关大钟特别记住他自己在十年前获得的荣誉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那是5月25日上海市区开始解放的那天。一早,天才蒙蒙亮,海关大楼上首先挂出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巨型横幅。这横幅第一个给外滩一带市民鼓起了胜利的狂欢心情;也给顽守在外滩(黄浦)公园里的反动军残余宣布了最后失败的命运。

中午时分,上海人民保安队总部——中共上海地市委进驻到海关大楼来了。海关职工组成的全副武装的人民保安队英勇地担负起了警戒和保卫的责任。

总部设在三楼朝南的几间屋子里以后,立即和解放大军取得了联系。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臂章、符号发出来了。协助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的具体指示传达到了各区指挥部,还发出了安民布告。

党的领导机关设在海关办公,这是上海海关职工的莫大光荣!十年来,他们没有辜负这个在上海解放的伟大日子里所获得的光荣。

海关,是祖国的大门。解放前的近百年中,这座大门的钥匙始终藏在帝国主义的口袋里。他们设立了总税务司,作为海关最高行政管理,由英帝国主义传给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又传给了美帝国主义,世代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脂膏。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者被我们永远地赶出去了。人民自己管理了海关,夺回了祖国大门的钥匙。现在,海关已成了防止和打击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对帝国主义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胜利和对外贸易的发展,1958年经过上海海关的货运量比1951年增加

了三十倍。

帝国主义为了欺蒙给他们工作的海关职工，曾分了一些充满中国人民血腥味的残羹冷饭给某些中高级职员，美其名曰“金饭碗”；并安慰他们说，“海关是超政治的国际机关”。十年来，这些职工们不断提高觉悟，纷纷摆脱了“超政治”的思想毒素，认识到管好海关这个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意义，他们说：我们收回了祖国主权，这才是真正的“金饭碗”了。

现在，每当海关大钟看见职工们积极热情地跟班劳动在码头上，便禁不住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为他们奏出更为动听的音乐。（1959年5月28日）

黄漱华四个夜晚

第一晚：上海解放初期的一个秋夜。

夜，静静的。洪师母准备好点心，拿起活计坐在电灯光下做着，照例等候做职员的丈夫听完书或打完牌回家。

她想起白天老一辈的话来：现在解放了，妇女不挨打挨骂，真是前世修来呢。真的，自己从解放那年结的婚，虽然丈夫待自己冷淡，手上经常一个钱也没有，连回娘家也十有九次不答应，但毕竟没有挨过打。

洪师母经常这样无声地安慰自己，只是今天晚上她似乎格外兴奋。她打了一个呵欠，侧耳听外面秋风掠过屋角，别无其他声音，不禁又堕入了幸福的憧憬：丈夫笑着感谢她的守门，称赞她的点心，还答应她星期天去看戏……

突然，洪师母从蒙眬中惊醒过来，似乎刚才前门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她慌忙放下活计，拉一拉衣服，急急去开门。咦，没有。心想一定绕到后门去了，三脚两步赶到后门，笑脸相迎。门一开，丈夫那张四方方的脸，复盖着平顶头发，和平日一样半点笑意也无，冲着妻子，劈头劈脸就是一顿抱怨。洪师母惶惑地跟丈夫进到房里，连忙送茶、递鞋，又端出准备好的点心。丈夫却连看都不看一眼，管自睡了。

洪师母呆望着那碗冒着热气精心做成的点心，闷闷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晚：1958年“三八”节过后几天的晚上。

张家宅里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正是轰轰烈烈的里弄整风运动展开的日子。

黄大姐今天晚上却硬抑制着外出活动的热情，留在家里。她耐着性子，想尽办法总算引得丈夫洪振观开了口，便立刻话入正题。

“昨天晚上为什么把我关在门外？”她平心静气地说。

“你是里弄积极分子，你去开会，我以为总要搞通宵了。”丈夫的四方脸毫无表情地说。

“那么，我回来敲门，你为什么不开呢？”

“没有听见，睡着了。”

黄大姐心想，你会狡辩，可是今天非要谈出个道理来。她仍耐着性子说：“敲门就算你没有听见。可是我整晚在厨房里洗衣服、打扫，你起来叫孩子小便时明明都听到了，为什么不出来看看？”

“……”

黄大姐见丈夫语塞，便打开了话匣子，从整风大道理，谈到家庭和睦的好处，从丈夫过去对待自己的错误态度，谈到她希望的幸福家庭生活。

“好吧，这次我不对，你比我进步。睡觉吧！”丈夫避开她的眼光，轻轻地说。

啊，他竟承认错误了！这还是结婚九年来的第一次呢。黄大姐反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第三晚：1958年8月某日晚。

上弦月弯弯地挂在空中，夜色很好。洪振观眼望着窗外，考虑着自己的思想小结。

论工作，他是负责的，论同志关系，也不算差。就是……忽然，印染织布公司领导在某次整风会上谈到过的一句话在他耳边重又响起来：机关干部对里弄工作也要关心。

对了，不关心里弄工作也反映一个人某种思想呢。他想起那个把妻子关在门外的晚上，不觉脸红起来。“早几年的事不说，近年来对她的不满，不

是主要为了她爱搞里弄工作 ,家务搞得不那么顶真吗 ?”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在想什么心事呀 ,嘴里念念有词的 ?”妻子收拾好了屋子 ,走过来问他。

“没有什么 ,我在做思想小结呢。你也给我提提意见吧 !”洪振观冲口说。

“提提意见”这句话可又使妻子惊奇了 ,但随即 ,她一本正经地说 :“你最大毛病就是主观 ,一切以你为主 ,什么事情都是你对 ,比如……”“不错” ,丈夫觉得被打中了要害 ,连忙接下去说 :“我工作上有这么毛病。还有过去对你也是……”“对我 ,干脆说就是封建夫权思想 !”黄漱华心里想 ,但她嘴上说 :“过去的事还提它做啥 ,你知道了就好。就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发老毛病。”

第四晚 :1959 年的一个夏夜。

黄漱华处理好小学里繁杂的校务 ,独自急匆匆地往 85 弄 10 号家里走。一路心里想。解放十年来真是天翻地覆。解放前自己一个人敢在这条流氓成群的张家宅路上走吗 ?而解放初期 ,自己还是个想学三从四德封建道德的家庭妇女。

她想回家料理点家务 ,走得特别快。一脚踏进门 ,只见丈夫笑嘻嘻地迎着她开玩笑说 :“黄老师 ,辛苦了 !”

黄漱华望了望已经睡熟的孩子 ,一面和丈夫聊天 ,一面去找早上自己换下来不及洗的衣服。

“怎么 ,你又把衣服洗了 ?”黄老师又似感谢又似责备地说。

“我今天回家早 ,洗洗又有什么关系。你们平时不老宣传家务是夫妻共同的事么 ?”洪振观笑着 ,四方脸拉扁了。接着又兴致勃勃地拿出两张电影票来说 :“明天星期天 ,请你看戏有空吗 ?”

说到星期天 ,他们又讨论起明天不上食堂 ,买些什么菜来。丈夫还关切地问她 :“这个月预定的储蓄计划完得成么 ?”

像今天这样的夜晚 ,这一年来是经常有的。整风以后丈夫确实确实的变了 ,特别自从张家宅里弄大搞集体化以后 ,黄漱华参加了里弄民办小学工作 ,丈夫还经常从工作上帮助她呢 !

“这才是家庭幸福！”黄漱华心里秘密地说。她带着批判意味地回想起了几年前那个守候丈夫夜晚的梦境，又怀着一种满足的心情回想了里弄整风那个夜晚的希望。

(1959年7月27日)

根深枝叶茂

——记国棉六厂一个党小组

国棉六厂前纺清花间甲班共有三十八个工人，你任意找几个来聊聊，他们几乎都会向你讲几段有关党小组的动人故事。

这个党小组的成员并不多，总共只有三个党员，都是1954年以后才入党的。

先说党小组长杨玉兰。几年前，她从别班调来做清花机挡车女工。起先，工人们认为，清花间天生是男工们的天下，年轻妇女怎么吃得消呢？可是过了不久，大家的看法变了。因为杨玉兰不但把自己的车子管得有条有理，清清爽爽，而且经常去帮助其他工人。渐渐的，工人中还传开说，杨玉兰的眼睛特别尖，她会看出你的各种心事。车间里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一工人隔夜和妻子吵了一架，心里不痛快，某个工人身体不舒服，精神不大好；别人还没有发觉，杨玉兰就关心地向他问长问短了，直到解除了别人的不开心，或者劝说别人去休息了才罢。

有个临时工刘定国，本来工作很好，有一时期忽然变得工作劲头不大，闷闷不乐起来，谁也问不出他出了什么事。杨玉兰看透了他的心事，就诚恳地和他个别谈话，说：“临时工和正式工都是一样为国家生产，党对临时工也一样关心。你如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商量商量。”刘定国正是觉得自己做临时工，似乎矮了一截，又生怕一有生病什么的，工厂就不要他。这心思被党小组长一句话就说中了，不觉心里一舒松，他也想起党组织平日对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关心，想起年终时领导和群众给自己评上了一等奖……他感到自己闹情绪毫无道理。当下就把前前后后的想法都告诉了杨玉兰，表示以后一定安心生产。杨玉兰又鼓励了他，从此刘定国的工作果然比原来做得更好了。

第二个党员叫张春宝,年纪五十岁左右,是个热心的老工人,工人们给他提个绰号叫大炮。他不但生产搞得好,肯帮助人,还担任劳保委员工作,对工人的关心真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处处不漏。星期天家里找不到他的影子;下夜班后,在家睡了一觉,又去工人家串门子了。三十八个工人,除了最近新调来的几个还来不及访问、单身工人无处访问外,他家家都跑熟了。

有一个秋天的早上,忽然发现扫地工张满山没有来上班,也没有请假。老张是个勤恳人,不会平白旷工的,出了什么事呢?才一下班,张春宝拉了工会小组长史济元就往老张家里跑。张满山的爱人听说丈夫没有上班,不由慌了手脚;大家正要往外去找,却见老张无精打采地回来了。原来这对老夫妻昨晚吵了一架。妻子说五个孩子花费多,天又快冷了,钱不够用。老张呢,解放前吃足苦头,解放后才结的婚,觉得生活蛮好了,怎么也不肯向厂里要求补助。话不投机,两人打起架来了。第二天一早,老张心里烦闷,竟去逛马路了。张春宝弄清情况,就和史济元商量,帮他们安排生活;发现经济确实紧了些,就建议工会给以定期补助;又讲说了家庭和睦和遵守劳动纪律的道理。以后,张春宝又经常去访问他们。张满山夫妇感动极了,老张说:“党待我这么好,我没什么可报答,只有生产上可以出力就出力,可以节约就节约!”现在老张成了车间里对生产第一个勤俭节约的人了。

再说值班长许沛浜,也是个由老工人入党的党员。工人们讲起他的故事来时,就像讲述一个严格而可亲的老师一样。他自己的工作很少出错,谁的花卷做错了,他也不轻易放过。纺织工人有句行话说“清花间是老虎口”,特别容易出工伤事故,许沛浜也就特别注意安全操作。新工人来了,他不厌其烦地一遍二遍介绍操作规程,平日一星期检查一次安全措施,风雨无阻。大热天,谁把汗马夹脱掉了,他不依;上了班,谁没把鞋后跟拔上,他也要干涉。

许沛浜还有他自己一套说服人的本领。有个姓仇的青年是车间里个性很强的工人,谁也难说服他。这一天,他又准备光着脚板上工了,恰好被许沛浜顶头撞着,不由心里一跳。值班长笑嘻嘻地问他:“小仇,为什么不穿鞋?是少钱买吗?”小仇一听非但没有被批评,而且还担心自己没钱用呢,可是嘴上偏说:“是没有钱买鞋!”值班长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搪塞,马上答应借三元钱给他,还关心地问他够不够。小仇难为情得脸都涨红了,低下头结结

巴巴地说：“钱，不够……我，我不要……我有鞋子呢……”值班长见他窘得厉害，才知他根本不是没有钱，就扯开话题，轻松地给他讲了一则故事：前几年有一位姓彭的工人，由于不听劝告，光脚做生活，后来被洋钉戳伤脚跟，好久不能上工，影响了生产。小仇眼睛盯住值班长，认真地听着，听完后二话不说，就到换衣间去穿鞋子啦。

三个党员都受群众欢迎，但更大的力量还在三个人组成的党小组。它在生产上、学习上和思想上发挥了促进和核心的作用。

三个党员的党小组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们经常虚心听取群众对党员和工作的意见，发现哪位同志工作中有毛病了，马上相互提出批评，热诚督促改进。比如张春宝这个“大炮”明明诚心诚意为工人办事，有时就因为太急躁，反而使工人有意见。其他二位同志就及时告诉他，提醒他改进。张春宝听了也抱怨自己作风有毛病，把群众的批评牢牢记住，慢慢的也改进了。

解放十年来，国棉六厂清花间甲班在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解放初期的混乱、散漫状态，不断的前进。工人们体会到，自从党小组建立后，有了好的当家人，班的进步就更快了。

(1959年10月1日)

革新状元出在豆腐店

“豆腐店里出了个状元郎！”青莲街合顺豆腐店工人陶永林上北京参加群英会的消息传开以后，左近居民纷纷传说着这位“新科状元”最近一年来的故事。

今年4月里，接连几个晚上，豆腐店的烟囱里冒出熊熊火光，可把居民们吓坏了。他们一打听，说是陶永林他们要革新灶头，加快烧豆浆速度，提高豆腐产量，正用鼓风机往灶肚里灌风哩。一些年老谨慎的居民就劝阻了：“革新很好，安全也要紧呀。不要试了吧，当心火烧！”店里烧火工人也说：“鼓风机往灶肚吹风，灶肚却往外喷火，把我热都热死了。老陶，还是老样子算了吧！”老陶接受了要注意安全的意见，心里却思忖：党支部要求提高烧浆效率，居民对豆腐的需要也越来越大，不动脑筋改进，照老样子干可不

行啊！

这一晚他回到家里照例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角角落落搜索办法，怎样使火不喷出来。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工人文化宫的展览会里，看见建筑工人一付用鼓风机的灶头，灶肚很大。“对了！”老陶越想越兴奋，天没亮就起身，到店里和大家一商量：决定把灶头拆掉重建。店里一共七个工人，那六个工人听老陶讲得头头是道，也增加了劲头。可是，大家又不会做泥水工，灶拆掉后万一晚上来不及砌好，岂不影响了生产？老陶也有点心跳，但他说：“支部书记说过，技术革新要细心大胆，听党的话没错！”大家一听，都说对。说干就干，八点钟一起动手，忙到日头偏西，三点多钟，一个按照工人们自己想像的大肚子土灶头砌好了。烧火工急急生火，拿鼓风机来一吹。哈！那火既不往上冒，也不往外喷，乖乖的在灶里旺烧着呢！老陶要大家且慢高兴，急把准备好的豆浆放上去煮，十分、十五分，刚到十八分钟，浆开了！原来一锅浆要烧七十分钟，现在提高速度近三倍。工人们连忙去向中心店报喜，居民们见了不由向他们啧啧称赞。

那事以后，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忽听得豆腐店里轰的一声。居民们关心地跑去一看，啊，只见老陶被沸腾的蒸气烫伤了。大家帮着急急忙忙把他送进了医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陶永林并没有因提高了产量而满足，从灶头改造成功以后，他就动起了提高质量的脑筋。合顺做的是宁式豆腐，宁式豆腐向来以鲜嫩无苦味受市民欢迎。过去为招徕顾客，说宁波豆腐用豆考究，又用盐卤而不用石膏点浆，所以不苦。其实，没有苦味的秘密完全在操作上：烧浆时勤洗锅，慢烧火，不让豆浆烧焦。可是这样做的质量并不稳定。老陶想：党和人民要求的是高产优质，质量一定要稳定。又想，用锅子烧饭易出饭糍，而蒸饭就不会。那么，是不是可以隔水蒸浆呢？

他拿定主意后，拣个星期天，在家里拉妻子帮忙，用钢精锅子把水烧开，然后把盖子上的电木顶子拿掉，插入一根橡皮管，皮管的另一头放到一杯冷水里。不一会，杯里的水也开了。老陶一见，满心欢喜，也顾不得妻子嘀咕，掉头就往店里跑。工人们谁都关心提高豆腐质量，听了老陶隔水蒸浆的道理，又立即一起行动起来。接连试蒸了几次，效果极好，不但根本杜绝了豆腐发苦的毛病，而且蒸浆的速度又比改良灶烧的提高了近一倍。可是，试到第四次的时候，老陶怕锅里的水烧干，去往锅里添冷水时，却不料冷热一碰，

生铁锅子耐不住压力爆炸了。他受了伤。

老陶睡在医院里,支部书记、中心店经理三两天去看他、慰问他。他不由回想起解放前从小做豆腐的那些苦日子来。苦做一月,只够自己勉强吃饱。有几次累得病了,不但得不到治疗,还几次被老板一脚踢开失了业……泪水在老陶的眼眶里滚动,别人问他是不是伤痛难当,他摇摇头说:“身体虽然受了些伤,但隔水蒸浆已经成功,再大痛苦也受得了。我是焦急躺在医院里影响了生产。”由于老陶平日关心人,群众关系很好,同店同业的职工也不断来看他,这就更使他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陶永林同志出院后不久,被吸收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他的干劲、巧劲更足了。后来他又被大家推选为行业的、市的和全国的先进生产者。当他充满信心地从北京回来,正好碰上店里扩建完成,正式系统地试用他革新的改良炉灶、隔水蒸浆、自动括浆、自动加水、自动流浆、石膏粉碎机、石膏研磨机等整套设备。晚上,清洁、明亮的豆腐坊里挤满了豆腐工人和附近来参观的居民,大家纷纷称赞这位年才三十岁的“新科状元”的成绩才情。可是陶永林同志却一再谦虚地说:“这是党的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功劳!”有人问他今后打算,他充满激情地说:“要不断技术革新,使豆腐生产进一步机械化,还要帮助兄弟行业——筋粉业也逐步实现机械化!”

(1959年12月3日)

瘟神送出青浦县

青浦县境内河港沟渠遍布,碧波清涟,十分动人。但是在这秀丽的水乡里,解放前十多年来,深深受着血吸虫病的毒害。十万多人民染了病,挣扎在死亡边缘上,不少乡村呈现“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群众回忆起那凄凉景况:

提起当年泪汪汪,多少人家遭灾殃,
反动统治赛虎狼,血吸虫病象魔王,
多少人家绝了代,无数田园抛了荒!

任屯荡边有个任屯村,受害最烈,歌谣传唱:

血吸虫 ,害人精 ,
任屯村中传祸根。
只见死 ,不见生 ,
有女不嫁任屯村。

绿水青山枉自多 ,大好清流 ,减不掉居民的悲伤 ,人们在江边哀哀痛泣 :

清溪水 ,长又长 ,
两岸田地一片荒 ,
鳏寡孤独数不尽 ,
清溪江上哭断肠 !

解放大军横渡长江 ,共产党领导人民翻了身 ,反动政府地主恶霸全被推翻了 ,人民政府迅速抢救病人 ,努力消灭钉螺 ,几年来治愈病人一万七千多 ,取得不少成绩。但是这样下去 ,彻底消灭得花二十年。速度太慢了 ,这么严重的病害 ,不能等这么久啊 !今年随着各条战线奋进 ,党发动群众和血吸虫病大战 ,群众在战斗中士气高涨 ,他们兴奋地唱道 :

灭螺战鼓咚咚响 ,乡社社多紧张。
男女老少齐动手 ,全县人民上战场。
两岸草皮铲干净 ,条条龙沟三面光。
塘底朝天积河泥 ,螺子螺孙消灭光。

他们还表达了自己灭敌的决心 :

干河灭螺是战争 ,万恶钉螺是敌人 ,
大河大塘是战场 ,铁铲铁镢是刀枪。

群众性的灭螺运动 ,声势浩大 ,鼓足干劲 ,一举歼敌 ,到 8 月底 ,这个江苏省受血吸虫害最烈的县 ,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为害二十多年的恶病。群众抑不住心头欢乐 ,喜悦的歌声伴着着滔滔绿水 ,流遍了整个青浦。他们歌唱胜利 :

血防得到胜利 ,生产乘上飞机 ,
个个生龙活虎 ,处处黄金铺地。

胜利不忘共产党 ,农民们用朴实的言语衷心感谢道 :

人人都健康 ,鱼肥稻又壮 ,大家庆丰收 ,感谢共产党。

胜利不满足 ,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让明年更多地增产吧 !人们

齐唱：

幸福全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像太阳，
生产治病双丰收，五谷丰登人兴旺，
今年亩产一千斤，明年更收万担粮。

(1958年12月17日)

警民友谊桥

“新桥打桩了！”消息像长上翅膀，大清早就传遍了江湾国权路和圩塘湾一带。居民们、农民们扶老携幼，赶忙跑到走马塘旁边来瞧热闹。忽然，人丛里挤出两个须发皆白的老农民来，手里各捧着一个大炮仗，引火一点：“砰——碰！”放开了。欢笑声中，人民警察、居民、公社社员和工务所的技术人员们，在邯郸、国权路地区支部书记老刘率领下，合力打下了第一根桥桩。

“阿弟，你一年多来的愿望实现啦！”“阿哥，这全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办的好事啊！”两个放炮仗的老人又说又笑，欢喜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们是一对老兄弟，哥哥张文忠七十七岁，弟弟陆庆宝七十五岁，都是宝山县五角场地区的农民。

就在离新桥基不远的地方，横隔着十五米宽的走马塘，躺着一顶又旧又破才二尺来宽的小木桥。居民走到桥边提心吊胆，一步一挨地小心走过去。那旧木桥在居民脚底下幌荡着，发出吱吱唧唧的声响。

附近的居民们一谈起这桥话就没完没了。十月里有一次，住在圩塘湾的铁路工人家属张雪兰走娘家回来，一个儿子抱在手里，一个儿子跟在后面。走到桥上，加倍留心，嘴里叫着：“建国走好！”才到半桥，只听“扑通”一声，回头一看不好了，小建国掉到河里去了！张雪兰哭喊着救人，幸好河里有船，总算把孩子救了起来。一年多来，白天晚上吃这顶桥的亏、跌跤掉水的老人、妇女、小孩竟有十多个。平日里，有的居民尽量少走这顶桥，有些非要往河东工作、下田或者买用品的人，就常常相约为伴，像唱戏似的手牵着手过桥。

很小的一顶木桥,却给居民们带来这许多的不便。这些情形,国权路派出所户籍任荣德也早就知道了。无奈这顶桥年代久了已不能再修,——前几年人民解放军开河时,曾修过一次,可不到两年又坏得不行了——要解决问题除非另造一顶。而造顶新桥,少说也得上千元钱,派出所又哪里来这笔经费呢?因此每当听到居民意见时,他只好回答:“我向上级反映!”

今年一月,公安机关开展爱民月活动,派出所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居民们踊跃的写了不少大字报。那天晚上,民警任荣德跑到居民食堂看大字报,一下子呆住了:有二十多张大字报,全要求修桥!怎么好呢?不办吧,毛主席常教育要关心群众生活,办吧,资金、材料、技术、劳力,困难重重。任荣德正在发愁,旁边有人对他说:“任同志,这桩事情可一定要办啊!有困难我们支持!”他回头一看,是在食堂里义务劳动的退休工人孙洪康,因想起去年发动居民义务劳动大修小菜场路面的情景来,不觉心里一亮:对,党就是教我们有事依靠群众呢。他立刻回答:“一定要克服困难造顶新桥!”

下定了决心,任荣德第二天就找地区支部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商量。所长说:“群众的迫切要求一定要解决,我们全所都要参加义务劳动。经费问题再研究一下。”支部书记老刘说:“这事我也捉摸过了,一定要办。复旦大学正在扩建,赵江巷那边原来有顶木桥没有用处了,我去商量商量看。你且先去发动群众准备劳动力吧!”任荣德一听领导支持,满心欢喜,忙又到居民中开会商量。他把造新桥的计划一讲,居民们热烈响应,争着报名参加劳动,一下子就有几十人。又有了群众支持,任荣德情绪更高了。他估计造桥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情,就把劳动力分批分班组织起来,保证上下午都有十多个人。这样,大家兴高采烈地忙着借工具单等动工。

再说老刘和复旦大学商量要那顶旧桥。复旦大学同志一口答应,还送了六根另一顶桥的桥桩。这一来,材料全不缺了。五角场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听说地区支部要造桥,对老刘说:“你们为群众兴办好事,经费不要担心,公社可以帮助!”老刘听了高兴,又去找五角场工务所商量技术指导。工务所也立刻同意,派了两个技术工人参加。

造桥准备舒齐了,支部决定春节一过就动工,先修路基。那几天人民警察和公社社员、妇女大姐们一起,挑的挑,填的填,又说又笑,把走马塘两旁闹得热火朝天。退休老工人孙洪康和白须老农民陆庆宝更是喜得合不拢

嘴,他们常常大清早不约而同地最先到工地,晚上又是最后离开,东看西看,不得个停。老孙照看工具,注意安全,陆老公公不等路修好就计划种树哩。

这两天,桥桩已经打好了。一顶党、政、民合力兴办的、七尺来宽的新桥已具雏形。附近居民像看新造大工厂似的,一天都要去看好几次,称道几次。有的说:“以后闭上眼睛也可以过桥啦!”有的说:“共产党就是知道我们的心事。我们想什么,他就做什么。”有的却在议论给新桥起个什么名字。有居民建议,这桥在爱民月里诞生就叫“爱民桥”。支部书记和民警们却认为,这桥融合着民警和人民群众的友谊和共同劳动,还是命名为“警民友谊桥”吧!(1960年2月23日)

花地访蜂居

养蜂场的一位同志,引导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前进,左面的油菜花一望无垠,好似一大片天鹅绒毯;右面的绿肥田里,紫云英小花含笑迎人。跨过一道石条小桥,在充满豆花香味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种奇妙的声音,又像风吹电线,又像纸鸢颤动。“啊,蜜蜂!”大家连忙加速脚步,绕过一片茂密的蚕豆地,只见紧靠着一弯碧清的河水,密集金色雨点正在一片晒谷场上狂舞!

这是一块普通晒谷场,场上放着几十只像魔术箱那样的黑色木箱子,有两个戴着面罩的工人在箱旁忙碌。这就是嘉定养蜂场第三十二支场。就在这些木箱里,驻扎了五十几个蜜蜂家族,蕴藏着相当于好几千个农业辅助劳动力的巨大力量。

蜂场主人——就是那两位养蜂工人,先叫我们戴上防护罩,然后热情地为我们揭开这些“魔术箱”的奥秘。

箱子打开了,蜜蜂们万头攒动。有十几年养蜂经验的史财坤同志,一面翻弄着箱子里的那些做满蜂巢的框框,一面指点给我们看三种不同的蜜蜂。这个大腹便便的就是母蜂,一家之主。有人说她是专制君王,其实她却是为了整个家族繁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妈妈。不管春天如何美丽,花香如何诱人,母蜂除了交尾那一次以外,终生不飞到箱外去玩,老是埋头为下

一代操劳。

大家正在议论母蜂,另一位工人计文奎同志笑着捉出一个肥胖的蜜蜂来说:“这是二流子,雄蜂!”原来蜂群里雄蜂数量很少,由于他整年到头不爱劳动,光是吃吃喝喝,很不受欢迎。天冷蜜少时,工蜂见了他们这副无赖样就生气,常常把他们驱逐出境,甚至刺死;现在她们忙着采蜜,无暇顾及,因此养蜂工人们便帮着捉除。

蜜蜂家族的主要成员是工蜂。她们都是母蜂的女儿,只是她们幼年发育不全,因此终身不嫁,一心劳动。这些来回飞忙的强壮工蜂,正在完成生产任务。主人告诉我们:她们一般早晨九时上工,先派出侦察员,探得花源,然后蜂拥而去。她们在花间把蜜汁吸到肚内的蜜囊里,把花粉装在两脚的特制小花篮里,然后像架小飞机似的运送回家,小心往贮藏室——蜂巢里吐出蜜汁,抖出花粉。看,这个工蜂两腿上的两个金黄色小球!这就是她满载而归了。

壮蜂担当了外勤采蜜这一强体力劳动,家里的内勤任务便由老弱工蜂来负责,而她们又各有分工。比如年轻力小的新蜂便负责打扫清洁,哺育弟妹,晚上还做生产蜂蜜的辅助工,张开两只小翅膀,不断煽动,使贮藏的蜜汁蒸发水分,增加浓度。年老有经验的工蜂则负责造房子或日夜担任警戒、保卫工作,抵抗前来窥探蜜库的敌人。

养蜜蜂真是一种有趣的劳动!怪不得工人们一讲起蜂来便眉飞色舞。不过,有趣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养蜂的好处太大了。据说一群(箱)受过训练的蜜蜂,可以代替一百多个劳动力传播花粉,可以帮助农作物增产百分之十到六十。像这个沈家舍生产队的油菜,由于借给养蜂场采蜜,去年就增产了百分之二十五哩。

还有,蜜蜂全身是宝。蜂蜜、蜂王浆已是众所周知的好东西了,蜂蜡、蜂毒也有工业和医药价值。说到蜂毒可以治风湿病,史财坤同志马上伸出左腿来作证。他的腿多年害关节炎,医来医去不见好,后来膝关节连弯屈都困难了。1959年他听人说起蜂毒的妙用,于是一天三次,让蜜蜂在膝部刺毒。说也奇怪,总共一个多月工夫,关节炎就治好了,这三四年来,再也没有发作过。蜂毒也是好东西,只可惜每只蜜蜂只有一枚毒刺,放掉刺,蜜蜂就死了。现在,嘉定养蜂场已经研究成功一种土洋结合的方法,使蜜蜂放毒而不掉

刺,正式生产蜂毒。

蜂箱看完后,主人谦逊地说:“我们是游牧生活,没有什么好看了。”原来,他们为了赶花期,常常几个箱子,几件工具,四处寄居,没有固定场所。最近他们刚从江西过冬回来,过了当前紫云英、油菜流蜜期,又要往苏北赶苕花期去了。不过,他说的“游牧”两字还是吸引了我们的兴趣。真的,养蜂场是属于畜牧业的。蜜蜂,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牲畜”了。

养蜂,恐怕是最经济、实惠的畜牧业了。(1962年4月22日)

看 牛 蛙

在上海市西郊,青浦城东,佘山北麓,有个密布水网的地带。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就设在这个山明水秀、景色优美的地方。养殖场东部,有一个水草丰美、桃柳掩映的去处,最近又接待了一批友谊之蛙——来自英雄古巴的牛蛙。这些牛蛙在故乡古巴时,也许长年与拉丁美洲的甘蔗林为邻,现在却开始在中国江南的新居与“老来青”终日作伴了。目前,古巴牛蛙被放养在一个三角形的清水池塘里,和场里原来饲养的牛蛙隔篱为邻。它们安静和睦地生活在一起,鸣声时相呼应。

牛蛙原产北美洲,现在很多国家都引去进行饲养。牛蛙之名就是从“Bullfrog”直译过来的;也有一说是由于它的鸣声很像水牛之故。昨天,我们和场里的工作人员来到塘畔时,刚巧见到一只牛蛙静静地伏在水边,像只癞蛤蟆一样,可是它要比普通的癞蛤蟆大六七倍,睁着豆粒大的圆眼盯住水面。我们怕惊动它,轻轻地走到跟前去观看,只见蛙的背部呈黑褐色,带有很多黑色的斑纹,乍看和岸边的泥土颜色相似。陪我们参观的同志说,这是牛蛙天生的保护色。这种保护色还可跟随周围的环境而变化,有时黄绿色,有时翠绿色或黑褐色,尽量和周围的水草、地皮颜色相适应,以保护自己。工作同志告诉我们,它的腹部是灰白色的。说时,这只牛蛙可能发现了我们人多,“扑通”一声,跳进水底去了。

原来牛蛙生性非常机警,特别是刚到陌生的地方,往往隐藏在草丛之中,偶有风吹草动,便迅速跳入水中。牛蛙喜欢在晚间活动,每当暮色来临,

它们便成对地在岸边水草间觅食。牛蛙野生时多吃活的虫类,饲养后,起初在塘里放些小鱼、小虾,但见它们吃得很少,饲养员唯恐饿着它们,便根据它爱在晚上活动的特点,想出用鱼块的喂的办法。一只牛蛙,多的能吃三四两鱼呢。

这个场从去年开始试养牛蛙。牛蛙初来“落户”时,场里的技术员、饲养员怕它们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条件,就从多方面关心和保护。冬天牛蛙要冬眠,能二三个月不吃东西。从去年秋天起,就多喂些脂肪质的东西,让它们长得肥胖。冬天,一面把岸边泥土刨松,以便牛蛙打洞冬眠,又在塘面盖上稻草,这样天冷的时候,它就安静地在底下睡觉。平常,像鼯鼠、野猫、水蛇等都是牛蛙的“敌人”。现在塘的四周都插起二三尺高的竹篱和围起渔网,防止敌害侵入,也避免它跳走。饲养员还在塘面拉起电灯,晚间利用灯光引诱昆虫给它们当饵料。

当大家站在养蛙塘旁边时,从远处连续传来“吭……吭……吭”的吼声,我们以为是牛叫。陪我们参观的同志马上说:“听,这就是牛蛙的叫声!”原来他们在去年初养时,有几只牛蛙逃走在附近的稻田里,去过它们原来的野生生活了。牛蛙也有“共鸣”的特点,只要雄蛙一叫,雌蛙也会叫着寻到一起来。所以每到夜间,“野生”和“家养”的牛蛙,常常此呼彼应地吼叫起来。由此可见,将来大量繁殖时,可以成批地放养在稻田里,像本地青蛙那样,不必专靠人工饲养了。这次由古巴赠来归上海饲养的七十只牛蛙,有大有小,也都是从古巴的沼泽、池塘、小溪里捕捉到的野生牛蛙。

现在,捞起塘里最大的牛蛙称称,也有二斤重了。据说最重能养到三斤多呢。看看牛蛙的臀部和后肢,特别发达,一双腿的重量相当于牛蛙体重的一半,怪不得它是跳远“健将”。蛙腿肉质细嫩,味鲜美,含蛋白质较丰富,可以用来做各种菜肴。曾有人比喻说,一只牛蛙几乎能抵上一只老母鸡。牛蛙的内脏含有较多的脂肪,可以熬炼油脂作动物的饲料。牛蛙皮可以炼胶做重要工业原料,也可以制皮鞋、手提包等用品。

牛蛙的经济价值很高,上海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人想试养牛蛙了。1935年时,有个姓沈的人在江湾纪念路开了个“上海养蛙场”,场里的蛙是从美国购来的,号称“珍宝巨蛙”,每对售价二十四元。这样的高价,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的一个月薪金。

现在,青浦养殖场里早先饲养的牛蛙,已在上月产下新一代,约有四五万粒卵子,孵化出成批的小蝌蚪。这些蝌蚪除由实验生物研究所、上海水产学院、梅林罐头食品厂等单位接去试养外,其余都养在室内外的水缸和玻璃水箱里。这一批蝌蚪估计到今冬明春脱掉尾巴,那时候,上海就有自己繁殖的第一代牛蛙了。

(1962年7月1日)

荠菜的故事

碧绿肥嫩、鲜美可口的荠菜,多惹人爱呀!

荠菜,上海人又叫它野菜,顾名思义,那是一种野生的珍肴。怪不得多年来上市量总是很少!但是,人们是否也知道,市郊的菜农们,正在年复一年地为驯服荠菜、推广种植荠菜而进行不倦的斗争呢?

这几天,获得华东和上海农业先进集体称号的虹桥公社虹三大队的菜农们,经过抗阴雨、抢太阳,刚刚收藏完毕娇嫩的荠菜籽,中老年的农民们,不禁又摸着胡髭,架着泥腿,欣然讲起荠菜的故事来了:——

说起来该有几十个年头啦。童家宅那地方,地少人多,又靠近市区,随着上海的繁荣,世代种稻棉的农民们,逐渐改种起各式蔬菜来了。慢慢地,野生野长的荠菜也在这里定居下来。日久,菜农们体会到种荠菜的好处真多:产量高,用肥少,耐寒,还有一条,卖得起价钱!特别是早荠菜,翠生生的篮子出去,白秃秃的米袋回来,可叫人眼热呢!——可就是难侍候。今年收得好好地,明年却什么也不给你。摸不准它的性儿!全宅各户人家一起下的菜籽,究竟出不出、过多少天出?都要看各人“运气”。

然而,姚朗亭家却是例外。眼看他和大家一样,把黄灿灿的荠菜种子均匀地撒下土去,过了三天,别家地里还毫无动静,他家就出苗了!只要三天,准出,年年如此!真是一个谜!日久,大家悟到了秘密在于种子。于是就有人去向姚朗亭打听了。他呢,碰到至亲好友,才用酒盅量那么一杯籽给你。问他什么秘诀么?他总是眯着眼笑笑:“讲得出啥?还不和大家一样弄!”也难怪,那时候老皇历,日子过得好点的农民谁保证没份私心?再说老法子种田,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又是总结呀,又是科学呀,讲得出一大套。这样,

人们免不了又生气又不服气。背地里有的说姚老伯的种芥菜秘诀是一辈子“传子不传女”的了；有的则认为姚家也没有什么，不过运气好罢了。因此大家还是晒呀，晾呀，埋呀，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种子，去找寻“运气”，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头几年。

1954年，童家宅成立了初级社，大家种芥菜的热情更高了。这时，种子商店闻名前来要求留二百斤芥菜籽。社主任童银福决心接受下来了。头年芥菜种得很不错，可是到了来春，快要收籽时，老童心里不由急了：收籽正是个难关！刚办了社总不能给国家送去拿不准的种子呀！他捉摸了一阵，想到姚朗亭新近也入社了，总要动员他公开经验才好！

吃罢晚饭，童银福来到姚朗亭家。“爷叔，社里的芥菜籽该收了，这是国家要的，责任很重，你看，能不能出来弄弄？”“不去，不去！”姚朗亭一听要叫他负责收芥菜籽，便双手连摇，一口回绝。他妻子也帮着说：“大家弄不是一样，侬哐啥花样的！”老童没法，只好搭讪着回来。第二天，他又想，或许昨天道理没有讲清楚，为了收好菜籽，说不得今天再去一次。老童第二次上姚家，看见他们正在吃晚饭，便向老夫妇俩聊起天来。说现在大家入了社，只要社里好，都有自己一份，不像单干时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老怕吃亏了。接着又说：“国家待侬农民有多好，这次交给社里这样一个留芥菜籽的任务，真是光荣！”看看两老不作声，但也不拒绝了，老童便请他们再商量商量，明天再说。

第三天晚上，老童又来找姚朗亭了。这时其他干部也已到姚家去串过门子，两老思想已经有点活动，禁不得社主任又讲多种芥菜对社对社员都有好处，又讲完成国家任务的重要性，最后，姚朗亭终于说：“以前每年不过收十斤、八斤，这么多菜籽，几时见过？要我去弄是不去的，挑不了这么大的担子！你们照着我的话，自己去收吧！”

谜揭开了！一整套收留芥菜种子的先进经验，便迅速地为初级社所掌握了，而且推广开去。以后，虹三大队善种芥菜的名声越传越远，要买芥菜籽的，前来学习经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去年队里又扩大了种植面积。于是就有人说起话来。有的农民说：“为什么经验、种子都传给人家？独家经营不好么？”有的社员说：“卖了种子卖不了菜，不要弄得自己反吃亏！”也有人嫌多留种麻烦，花工大，工具、保管都有困难。

童银福这时已经被选为虹三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和大队长吴震亭以及其他支委们,对社员的这些反映很重视。他们先在支委会上统一思想,首先要共产党员们认识到推广先进经验对发展生产,为城市服务的重要意义;也讲明社与社之间相互支援、共同富裕的道理;公社应有全局观点,本位主义是错误的。以后,又开了队干部会,思想一致后分头向社员群众说服。有一次,一个姓刘的女社员碰到吴震亭,便嚷起来说:“大队长,少留点荠菜种吧,不要卖菜籽了!”老吴对她笑笑,问她:“前几天浦东客人的话记得吗?他说他们那里没有荠菜吃!”刘妈妈说,“吃不到荠菜的地方,那应该弄点籽去——可是大家都种了,将来菜卖不掉,我们队收入会不会减少呢?”这话也有根据。

原来菜农们旧社会带来的痛苦经验就是怕菜多了被杀价。解放前有一年,村子里的姚芹舟老伯伯去卖荠菜,不知怎的一来,平时几毛钱一斤的菜,忽然跌到只值三四个铜板。他又气又伤心,想挑到别处去卖,直走到浙江嘉善还是把菜减价卖掉。老吴懂得社员们的心理,就说,“哪会呀?现在劳动人民都吃荠菜,我们推广了,这些年还不是年年畅销,供不应求吗?而且人民政府有价格政策,不像从前反动派时候任意杀价。”接着老吴又跟她讲了上海有多大,全国有多大,生产要想到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一说,刘妈妈懂了道理,才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去上工了。

经过党员、干部们细致耐心的教育,社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眼界更宽阔了,生产劲头也就更足了。在今年连续阴雨天里,他们几乎家家动手,想了各种办法,终于保证了两千多斤荠菜籽安然进仓……

故事讲完了!同是这个地方,同是这些人,十四年前和十四年后,少量摸索和大片生产,从一株小小的荠菜里,反映出各种变化有多大啊!

(本文发表时同署朱家生名 1963年5月26日)

飞越云贵高原

4月2日午后,民航沪昆线首次班机六七四号,正满载上海支援边疆的重要物资和前往云贵的旅客,在长沙休息完毕,重又双桨呼哨,平稳起飞,向

贵阳进发。

从清晨开始,已度过了近四小时空中生活的旅客们,仍在兴致勃勃地交流着平原飞行的观感。有的称赞驾驶员本领高,起落时极少颠簸;有的说平原飞行比坐长途汽车还舒服;有的回忆云下飞行,九百米高度,地面像一幅特大立体地图,上了一堂活的地理课。

这时,南京航空学院毕业、在上海工作的技术员宣槐森,把旅客意见簿放在桌上,掏出钢笔端端正正地写道:“……过去坐车到昆明要八天时间,而现在乘飞机当天就到,减少了旅途劳顿。”原来宣槐森家在昆明,4月1日他接到家里电报,说是父亲病重住医院,要他即刻回去省视。他曾看到报纸报道国家开辟沪昆直达航线,立刻去买了票,第二天坐上飞机,傍晚便可到家了。他说:“当爸爸妈妈这么快就看到我时,真不知要怎样欢喜呢!”

六七四号客机继续前进,机舱里热闹过一阵以后,渐渐静下来了,有的旅客开始靠在沙发上午睡。一切显得安适宁静。

可是就在这同一时刻,驾驶舱里的气氛却完全两样。不管是平时朴实的、常常张开大嘴笑呵呵的大个子机长杨友才,或是到处活跃俏皮的青年副驾驶王咸班,还是说话幽默的机械员朱正荣,老大哥风度、好开玩笑的报务员张束晦,在空中却个个神情严肃,专心一致,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现在就要进入云贵高原了,而前方天气不理想,层积云迎机而来,使机身微微颠簸。

“请求高度!”机长像指挥员一样当机立断。报务员马上用无线电联系。取得地面同意后,飞机就从二千七百米的高度,上升到了三千米,把层积云摔到了机下;飞机就像在云海上飞驰一般。“这叫贴云飞行,”杨友才同志解释说:“为的是避免颠簸,让旅客舒适!”杨友才同志原是人民空军飞行员,积有四千多个小时的飞行经验。他团结全空勤组同志,时时考虑保证安全第一,提高服务质量,争取飞行正常。

“浓积云!”一云才去,一云又来,驾驶舱里立刻紧张起来。要知道这种云里带雷电,飞机可不能飞进去。人们还来不及思索,副驾驶小王就灵敏地把飞机向左面平稳拉开。一眨眼,那团灰白色的浓积云已迅速向右面退去。这叫绕云飞行。早在长沙时,他们已知道今天高原天气复杂,其中包括要碰到小块浓积云,所以机长早已向小王面授机宜。不过,小王的熟练技术仍使

人钦佩。王咸班从航校出来后已飞行了一千多小时,他虽然是副驾驶,但在这位具有较高驾驶水平的机长悉心培养下,已能基本上独立驾驶了。

像今天,机长就大部分时间坐在右面椅子上,戴着太阳眼镜观察云层,核对地标,用圆形计算尺计算航程,不时作些简要指示;而由王咸班直接驾驶。

报务员随时和地面联系,主动配合,定时起草飞行报告;机械员不断巡视着各种仪表,维护飞机,还不时给驾驶员做助手。飞行一切正常。可是,山区上空的事有点奥妙无穷,飞机忽然有点摇晃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遇到了无形的波浪。今天风大,山区气流不稳定,随着高原山峰起伏,这就像波浪似地影响了飞行。这时,贵阳快到了,情况比较复杂,机长亲自驾驶飞机安然降落。

飞越云贵高原,的确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虽然空勤组采取了各种办法,把颠簸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有几位旅客不适应。女乘务员徐凤臣见这几位旅客不如在平原舒服,就加倍细心护理,因而也加倍忙碌了。但是这位在陆地少言寡语的乘务员,在飞机上却始终面带笑容,不怕累,不怕脏,不怕烦,一片热诚,为旅客服务。这就难怪旅客中的那位五十八岁的许妈妈,要一再邀请她到昆明翠湖玩玩了。从贵阳上机往昆明终点站的大批旅客中,还有一位妇女带着才四个月的婴儿刘鞞。小徐对她们母子特别照顾周到。看到小家伙在妈妈怀里的那副活泼舒适模样,人们真会不相信这是在海拔三千多米的云贵高原上空飞行哩。

傍晚六时,沪昆直达通航胜利成功。在昆明机场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下,银色的六七四号客机经过南昌、长沙、贵阳,平安到达昆明。

(1964年4月7日)

师徒制灯

——记工人专家蔡祖泉攀高峰育新人

大学是著名教授专家集中的地方,然而复旦大学里却有一位全校闻名的蔡师傅。新近,还传开了他收大学毕业生为徒的佳话。

蔡师傅就是全国文教群英会代表蔡祖泉同志，四十光景年纪，不高的个儿，态度诚恳，言谈谦和，衣着俭朴。十五年前，他是个小学文化水平的玻璃工人，现在，在党的培养下，成了在高真空仪器与电光源方面能独立展开研究、试制工作的红色专家——一般人则称赞他是心灵手巧的制灯巨匠。光从1961年开始，短短三年工夫，他奋发图强，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几个徒弟，从无到有为国家填补了电光源方面一个又一个的空白，受到了国家几次奖励。他研究试制成功的碘钨灯、氢弧灯、超高压氙灯等，标志了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他研究试制成功的氦灯，经国家计量局鉴定，性能与国外同类产品一样，而外形更美观，他研究试制成功的高压汞灯，已推广到照明和仪器光源上面去用。……

蔡师傅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一系列贡献的同时，使自己日益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为学校和兄弟单位培训了一批优秀科技人员。这一年来，他又出色地培养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徒弟。

去年9月，国家分配了一名本校物理系毕业生朱绍龙给电光源实验室，蔡师傅心里十分高兴，不仅仅因为他领导的这个实验室空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更主要的是，他为国家多做些事的设想可以实现了。他决心要让小朱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可是，共青团员朱绍龙这时却正在发愁：这个三、四个人赤手空拳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设备只有几个土家伙，和学校里哪一个实验室都比不上，而且规矩和其他地方也不一样，什么平凡劳动都得自己干——这可叫自己怎么进修出论文哇？蔡师傅看透了小朱的心思，第一天上班就坦率地对他说：“党和国家极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设备差，但完全有信心创造条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希望你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和我们一起，边劳动边干边学，好好为生产服务。”他叫小朱半天劳动，半天搜集文献资料，又笑着说：“你别看这些劳动平凡，广大劳动人民就是整年这样干的。这劳动可改造人呢，而且也是科研工作所不能少的。”

小朱上完了蔡师傅的第一课，开始了劳动。这时，实验室里正在试制碘钨灯。碘钨灯体积小，亮度高，寿命长，人称“太阳枪”，国际上也是1960年才问世，所以试制困难特多，设计、材料、工艺都成问题。可是蔡师傅什么也不怕。老同志们告诉小朱一个蔡师傅打钼棒的故事。那是在实验室刚建

立,开始试制高压汞灯的时候,需要一种极薄的钼片,而市上一时买不到。是否等弄到钼片后再试制呢?蔡师傅说:“如果等到了有了现成的材料才干,人家又前进了,如何能赶上国际水平?”他主张通过艰苦的劳动,用手工把钼棒打成钼片。钼是很坚硬的金属,火柴梗般粗的钼棒,打成0.02毫米厚(约如一张极薄的纸)的钼片,这得有多大的劳动毅力呀?但在蔡师傅亲自动手、热情带领下,他们终于打出了几百片钼片,经过严格挑选,解决了试制的材料问题。

小朱听了这段“钼棒打成片”的故事,心里怎么也不能平静。以后,他又看到蔡师傅不管工作怎么忙,一早起来总是扫地、收拾屋子,材料没有了,亲自去领了搬运回来。制灯需要烧很多玻璃管,实验室里的人都是他的徒弟,按理说,这种准备劳动根本不必他动手了,可是他只要有时间,总是自己烧。一点也没有专家架子。这些事例,小朱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越来越安不下心来了,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学习蔡师傅这种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品质!一定要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和工人同志打成一片!以后,他什么劳动都自觉参加,不管是搬氧气、运材料,不管下雨落雪,只要工作需要,总是跟着蔡师傅和其他同志全心全意地干。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蔡师傅看到小朱劳动主动、积极,搜集文献资料认真负责,已经热烈地投身到实验室的生活中来了,心里很满意。但是他也知道,“个人进修”可还是小朱的一个心病。他就经常和小朱谈谈党提出的科研为生产服务的道理,告诉他首先要有东西,才能改变面貌,集中精力完成任务,才能有成果。否则,光有纸上论文一大堆,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在日常工作中,一项新产品试制成功了,蔡师傅总是还要花很多劳动,来研究简化工艺程序。起先小朱还不顶明白:照例新产品试制成功,实验室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工艺程序,对科学论文毫无影响,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的劳动呢?这时,他更体会到了蔡师傅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的可贵热情。

说也凑巧,正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组织老教授们参观电光源实验室。老先生们看到蔡师傅的巨大成果,不由连连感叹,称他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心为社会主义增光。

可是有一位教授却说:“蔡师傅如果在美国,可成为百万富翁了!”原来,蔡祖泉同志在高真空和电光源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大部分移交国家生

产,很多技术秘密也无保留地教给了兄弟单位。按照西方科研为赚钱的观点看,他的“专利权”确实可使他发财了。但是蔡师傅朴质地回答说:“如果在美国,我们工人阶级连生活也成问题,哪里谈得上搞科研?”

小朱知道了这段故事,感动极了。蔡师傅的立场多么坚定,蔡师傅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多么光彩夺目!和这样一位同志一起工作,有多么幸福!从此,小朱坚定了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他再也不去记挂那种脱离实际的所谓个人进修了。

蔡师傅把小朱引上了科学实验的正确道路以后,又带他投入火热的战斗,教会他正确战斗方法。

他说,搞试验要干劲冲天,要有革命精神,要打歼灭战,冷冷清清是干不出来的,但同时又要有科学态度,踏踏实实。在歼灭战中,蔡师傅分配他负责前哨战——广泛研究各国文献资料,要他担任学习小组长,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武装大家思想;同时,要他独立担负高压汞灯一部分研究试制任务。让他从理论上、科研实践中和社会工作中全面锻炼提高。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搞科学研究工作,这使小朱大大扩大了眼界。他愉快地接受这些任务,紧紧跟着蔡师傅,积极地干,认真地干,顽强地干。就这样,他们以少胜多,漂亮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新产品研究试制任务。今年春节后,他们并以十天工夫,漂亮地完成了学校里举办的元宵灯会展品。

元宵节是我国民间的灯节。复旦大学今年元宵举办的灯会,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科研成果展览会。蔡师傅和他徒弟们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研究试制成功的几十盏“玻璃电灯”——特种光源,轰动了整个大学城。它们姿态优美,闪耀着五彩光芒,吸引了川流不息的观众。到处是赞美,到处是祝贺。小朱不禁心花怒放了。蔡师傅真行呀,实验室多有成绩呀,要知道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呀!“蔡师傅讲话了!”广播器传来声音,小朱连忙凝神细听,蔡师傅仿佛是对着他说:我们这些成绩完全是党培养的结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一定要不断革命,要一个接一个地攀上科学高峰!小朱深深感到惭愧了。胜不骄,败不馁,这是党的一再教导,做出一点成绩有什么好得意的呢?蔡师傅有那么大的贡献,仍然这样谦虚,这才是对待荣誉的正确态度!

说起来,名利两关可真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分界线。

这两关突破了,才有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可能。蔡师傅早就注意到这问题了。有一次,蔡师傅就实验室成果写了一篇科学论文,发表后杂志社寄来四十元钱稿费。他就请小朱和组里同志一起来讨论:如何处理这笔钱?会上蔡师傅启发大家认识到,为党的科学事业应该多写点论文,但不应考虑钱,老想钱就有被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溶化的危险。再说党花了很多钱培养大家,并提供实验条件,自己写了论文怎能作为个人额外收入胡花呢?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蔡师傅的意见:稿费要作正当用。当时大家就决定全部稿费无记名送给正遭了火灾的第四师范。就这样,蔡师傅以他自己的先进思想和行为,不断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年青的一代。

在蔡师傅一年来的有效培养下,身教结合言教,帮助小朱在又红又专的大道上迈开了大步。通过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他政治上迅速成长,和工人同志们建立起了阶级感情,明确了自己的责任,认真提出入党申请,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业务上也迅速提高,了解了国内外有关电光源研究情况,深入了电光源领域;他立志要做一个党所要求的:又红又专,能上能下,能文能武,既能革命又能上天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期间,他和蔡师傅的感情,更是日益增加。今年3月,他们俩出差去北京,一路上小朱各种事情抢在前面,热情照顾蔡师傅,尽量让他多休息。到了北京,不巧小朱的祖母去世了,家里电报叫他急回,但他为了工作,忍住悲痛不回家。这时,蔡师傅有事转道赴长春,请人代小朱买好车票要他立即回沪。小朱左思右想,再过几天就能把工作办完,公事要紧,就退去车票,直到把事情办完才回上海。蔡师傅在长春收到了小朱报告这一做法的来信时,不由赞许地笑了。他看到信末署名“你的徒弟朱绍龙”这七个字,知道小朱的思想深处已经开始起了变化,他心里又安慰,又高兴。安慰的是小朱不负党的期望;高兴的是又一次看到了党的知识分子劳动化方针的伟大力量。

(本文发表时同署罗炳光名 1964年9月26日)

耕牛休养所

东海之滨,海水淼淼,丝草青青,风和日暖,秋高气清。成群结队的灰色

大耕牛，漫步在海滩边，悠然自在地吃草、戏水、晒太阳。头戴草帽，身穿老包袱，手举牛鞭，足登蒲鞋的养牛人员们，骑在牛背上四处照顾。这就是崇明岛东端裕安公社年年开办的“耕牛休养所”——代附近各公社耕牛养膘的海滨牧牛场。

牧牛场分南北两部，今年共接收了900多头耕牛。它们从5月1日入场以来，经过五个多月的休整调养，全都消除了疲劳，头头力健膘足，昂头蹄蹄，精神抖擞，准备不日回社投入秋耕高潮。

我们来到北牛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牛群尚未出栏，牛栏圈在海堤内几十米的地方，矮矮的土山墙围成一个圆形露天广场，面向大堤处开一个三米宽光景的缺口，横挡几根粗毛竹，象征性地算作栏门。五百多头大小水牛，不分晴雨，安安静静地站在、躺在这个“集体宿舍”里过夜。现在，它们引颈翘首，正在等待“起身”。不一会，场里五位养牛人员全出动了。只听他们吆喝一声，拉开栏口粗毛竹，水牛们便吼声连连，你推他挤，呼儿觅娘地从栏内直窜出来。这时，有两个人翻身骑上牛背，奔驰到牛群最前端，引牛越堤，晨曦中向海滩丝草地带跑去。只见牛蹄过处土地翻起，宛似有千百把铁锄刚刚刨过一般。有一只小牛掉了队，呜呜叫着到处乱钻，养牛的人便在后面唤道：“小南郎，哪去？”小牛一听，连忙乖乖站住，随即跳跳蹦蹦地追赶大队去了。

群牛出栏的壮观和小牛听话的动人景象，深深吸引住了我们，也使我们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各公社的牛混在一起怎么分得清呢？牛怎么会逃散呢？牛怎么会听话呢？小牛怎么叫小南郎呢？……于是我们便邀了一位姓张的养牛老手，来到他们住的独家村茅舍里，请他畅谈养牛经。老张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自己到灶下点上火，边烧早饭边快活地聊开了。公社畜牧部长不时给我们当技术翻译。

原来，“休养所”里的牛都有名字。每当耕牛“入所”登记完毕，他们便开始了“伴熟”工作：教会它们各种生活习惯，记住每头牛的特征、个性、籍贯，取上各种各样的牛名，比如毛色金黄的就名黄毛，周身发黑的取名黑牛，双角环抱的就叫圈郎等等。小南郎则因它妈妈得名，它妈妈从长江南岸买来，取名南郎。这样经过二十几天的伴熟，场里几位老人就能够从数百条牛中精确地识别每头牛的名字、脾气、所属公社，因而每晚收牛时不必逐一点

数,一眼望去就知道谁在谁不在,万无一失。

普通人往往认为牛是很笨的,叫它笨牛。养牛的人们大不以为然。他们说:“牛是很聪明的动物!”不但经过调教能懂得人们的命令、意图: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叫躺就躺,能习惯集体生活,能在宿舍里不随地大小便等等,而且还能记熟几十里路径,自行觅草、回家。就在国庆期间,他们发现向化公社第十六大队的一条母牛黑毛不见了,养牛人在附近各牛场找了几天没有找到,便断定它已回家,跑到向化公社饲养员处一问,果然,黑毛在路上走了两天,回队了。

老张风趣地说:“秋耕季节到了,老牛急着回社耕地了。”他说,在刚入所时老牛因尚未习惯,容易跑回家,而秋天因气候开始转凉,丝草也少了,它们便想家了。所以“休养所”在10月下旬便要收场,及时把养壮的耕牛送往秋耕前线。平日场里老牛在海滩上误入迷途,或生病、怀孕掉队,或晚上发脾气逃走的也有,故而他们时时都关心着它们的安全和健康,每天晚上不论风雨都要起来三次,观察牛群,发现生病的牛立即隔离、诊治。

养牛人员熟悉牛的一切,对牛关怀备至,这是因为他们对耕牛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些人如老张他们,解放前人称牛郎,为地主开场放牛,自己过着人不如牛的生活,对牛就谈不上热爱。现在,耕牛是人民公社的财产,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牛护养得越好,增产越有保证,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重要责任,就百般爱牛,拿老张朴实的话来说,就是:“一见了牛就开心!”他说他在收场后还是要到公社里去养牛。这几天,眼看耕牛入所以来普遍增长了二成膘,达到八、九成膘水,很多还长到十成全同膘,头头牛滚壮结实,神健力足,可以在秋耕战斗中大显身手了,养牛人更是心花怒放。

我们尝了他们那金黄色的喷香的滩稻玉米饭,站在大堤上极目远眺,只见水天交界处牛群点点,再看养牛人迎着朝阳,跨牛奔驰在平坦无际的海滩上的豪迈快活劲儿,不禁向他们的创造性辛勤劳动深深致敬。

(本文发表时同署朱家生名 1964年10月25日)

*

*

*

豫园探宝记

上海没有游过豫园的人,恐怕不多,而游客中识得豫园珍贵宝藏的,恐怕也不多。日前,豫园刚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趁这春暖花开的天气,让我们一起去豫园探宝吧!

玉华堂前,游人如织,一老一少母女俩站在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峰前,愉快地照相。原来这就是名闻中外的“玉玲珑”。它高约丈许,重达上万斤,光润如玉,相传为北宋徽宗花石纲的遗物。行家誉它有“皱、瘦、漏、透”四大特征。看它的左右各有一座陪衬湖石,与左边那方平滑的普通湖石相比,它皱纹叠起,令人疑为天外来飞的陨石;与右边那块圆矮的湖石对照,它又显得清瘦挺拔,神态俊逸。石上还有大小通透的洞穴数以千计,号称七十二孔。如果从石顶将水徐徐灌下,洞洞都会漏出涓涓细水;燃香于座下,则孔孔冒出袅袅轻烟。真是玲珑剔透,秀媚无比。

“玉玲珑”发现于隋唐年间,距今已千年。它有多大年纪了?还没有人专门研究。前几年,一位美国物理学家站在石前流连忘返,据他推测,“玉玲珑”生成约三百万年前。它比人类还老,真可以算得上是“老寿星”了!

像“玉玲珑”这样颇有来历的古董宝贝,在豫园里可不少呢!豫园创建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园内布局以大假山为主,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山高四丈,用四百万斤武康黄石堆叠而成,出于当时名匠张南阳之手。从仰山堂望去,山势峥嵘峭拔,望江亭翼然山顶,从前豫园四周并无高楼,站在亭上可以看到黄浦江上帆影。

“东校场,西校场,兵强马又壮,要投小刀会,去到点春堂!”从这首民谣中,我们可以窥见小刀会起义军的声势,人民对点春堂的向往。这里正是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指挥所。现在,壮丽轩昂的点春堂,是小刀会珍贵文物的陈列室。室内宫灯长明,人们静悄悄地瞻仰着刘丽川、周秀英这些英雄的光辉业绩。人们仿佛听到彼此的心声:学习英雄,我们要多多做出贡献,来装点社会主义灿烂的春天!

点春堂是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遗址之一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当之无愧 !

在假山旁的长廊前 ,有一对威武的铁狮子 ,斑驳的底座上还能依稀认出“大元”的铭文 ,算来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了。右侧的雄狮脚踩绣球 ,左侧的母狮和调皮的小狮嬉耍 ,神态都很生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 ,这对铁狮四十多年前曾被侵略者劫走 ,流落异乡他国 ,抗战胜利后又受到不公平的冷遇。解放后 ,它们才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 ,雄视屹立 ,镇守豫园了。

内园占地只有二亩许 ,可是亭台楼阁 ,山石花木 ,小桥流水一应俱全 ,是豫园的具体而微 ,因此有“园中之园”的雅号。

在内园有一棵引人注目的白皮松 ,枝叶茂盛 ,长年苍翠 ,有二百多岁了。说起豫园的古树 ,上海人编有几句顺口溜 ,叫做 :“百岁多来西 ,二百不希奇 ,三百只好算老二”。原来豫园的近千株树木中 ,老大哥是万花楼前的那棵雄银杏。它有八层楼那么高 ,已经经历了四百多个春秋 ;附近还有一丛老紫藤 ,最粗的一株周围有二尺 ,也有三百多岁了。它们老当益壮 ,每年春天抽芽展叶 ,繁花满枝 ,煞是好看。这个古树家庭 ,在豫园职工的精心护理下 ,正过着幸福的生活 ,并为绿化上海出力呢。

内园的前景是美好的。就在白皮松附近的观涛楼南面 ,越过围墙 ,可以看到一角飞檐 ,那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古代大戏台 ,是上海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好一座。前几年 ,人民政府从别地调拨给了豫园。豫园管理处准备用它来丰富内园的景色。随着扩展工程的落实 ,若干时日以后 ,人们来到豫园将可看到这一新增加的文物宝贝了。

(本文发表时同署徐克仁名 1982 年 3 月 14 日)

朵朵红花献烈士

——雨花台访“卢志英中队”

“雨花宝石红又红 ,雨花青松青又青 ,卢爷爷呀卢爷爷 ,我们手捧四美红花向您表决心……”孩子们清脆的歌声 ,从层林叠翠的雨花台深处传来 ,我们循声寻往 ,眼前出现一幕动人的景象。

细雨濛濛的空中,好似刚下过一阵花雨,只见滋润闪光的松柏枝叶间,缀上了千百朵红花,有的还做成花球、花环,万绿丛中红点点,显得分外鲜艳。卢志英烈士的水泥圆墓前,簇拥着一群少先队员、老师和来宾。

原来4月26日这天,南京中山门小学四(1)班由上级团委命名为“第八个卢志英中队”,他们又来到烈士墓前,汇报各自的进步。每一朵红花,是孩子们在五讲四美中评比得到的,是他们进步的象征,记录着他们学烈士见行动的每一个生动故事。

卢志英同志生前长期在上海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是上海人民熟悉的革命烈士。他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毕生从事军事和情报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1947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在敌人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1948年底被反动派活埋,壮烈牺牲在雨花台。烈士的儿子卢大容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纪念他。

五十年代在雨花台中心小学当教员的丁芝秀,从1955年起开展学习卢志英烈士活动,连续十一年,在党组织和其他教师支持下,先后把七个班级教育成了优秀少先队集体,分别由团市委和上级团委命名为“卢志英中队”。丁老师也因此获得全国优秀辅导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可是在十年内乱中,这一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被迫中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才重新走上正轨。那时丁芝秀老师虽然已调动了工作,但她又以中山门小学为点,和学校领导一起,帮助四(1)班的班主任、第三个卢志英中队队员陈秀英,开展了创第八个卢志英中队活动。

在这次墓前汇报活动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七位老卢志英中队队员。卢志英烈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的精神,像一颗革命种子,从小埋进他们的心里,长大后走南闯北,革命的种子生根开花,结出了累累硕果。

看过《步兵打坦克》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记得那位勇猛过人、机智灵活的尖子战士王金保。他曾在天安门前,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表演过精彩的高难度军事动作,他曾在沙漠地区比武打坦克,手摸到像烧开油锅般的坦克上,立刻烫脱了一层皮。这位大比武年代的英雄,曾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他所在的尖子分队,获得了大比武全国第一。现在,他作为第二个卢志英中队的代表,站在烈士墓前,却是那么文静。他是怎样锻炼吃大苦耐

大劳的呢？王金保深情地说：“心里想着卢志英烈士的光辉业绩，浑身就有了劲，再大困难也能克服！”有人说他现在在造荣获全国一等奖的熊猫牌电视机，他忙谦虚地更正：“我是车间设备员，为熊猫牌当后勤！”

第六个卢志英中队的代表是一位身材高大、壮实的青年，名叫王雁宇，是一位交通民警。小王的岗位正好在敌宪兵司令部原址附近，他曾去那里看过卢志英烈士度过最后斗争生活的黑牢，脑海里烈士的形象更鲜明了。他七年如一日地维持着复杂的交通秩序，经常扶老携幼过马路，像烈士那样保卫着人民的利益。一次，小王处理一个可疑的违章骑车人，冷不防那人骑上车逃了，小王马上骑车追去，见那人慌慌张张朝南乱窜，便使出平日练就的本领，在繁忙的马路上，穿过车流人缝，紧紧盯住逃车，终于在拐角处追上他了。原来这是一个作案累累的逃犯……

前来祝贺第八个卢志英中队命名的其他老队员，有干部，有科技人员，医生，也有普通工人、农民，虽然他们的经历、学历各不相同，可是他们学烈士见行动的心是相通的，都做出了各自的成绩。看他们和孩子们交流体会，谈得多欢！难怪他们年过半百的老师丁芝秀越看越高兴，她激动地说：“我教育孩子学习卢志英烈士二十七年，虽然十年内乱中遭受诬害，但我认定这条传统教育的路走对了！我要一辈子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卢志英永远活在我心里，我为四化勤学习，誓将青春献人民……”天气放晴了，孩子们的歌声又荡漾在春风里。（1982年5月3日）

途 经 止 园

——偶访杨虎城将军故居

今年夏天，我去延安时路过西安，在城西北隅一家招待所里小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矗立着一幢又一幢现代化建筑，然而引起我兴趣的却是一座半中半西式的二层楼房，它居于迎门大道的左侧。面对那道很别致的青砖白框围墙，那花木扶疏的小花园一角，那浅浅的台阶，那带飞檐的小门楼……这一切多么眼熟，似曾相识！可我是生平第一次到西安，当然没有来过这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由迷惘了。

“这就是止园,杨虎城将军的故居。”当地同志的一句话,使我恍然省悟,原来,人们在电影《西安事变》里都看到过它!

我沿着电影镜头的路线,进入面南的小门楼,推开镶玻璃的朱红木门,里面是条窄窄的走廊,地板也是朱红漆的,两厢是对称的两个大套间。穿过走廊,往左有架小小的红楼梯,盘旋而上,经过北面开窗的小起坐间,往南也是一条和楼下一样的小走廊,两厢套间。再往前来到朝南阳台上,俯瞰那小花园,只见苍翠的古柏,高大的柿树,茂盛的龙爪槐,都成对地分布在楼前两旁。环顾阳台四周,朱红柱上饰有绿叶,朱红门窗上嵌着绿纱,屋角飞檐重叠,屋顶滚瓦密排,加上白石栏杆,花瓷地坪,这一切给人留下一个奇特的印象:土洋结合,新旧交织,又调和又不调和,不由人联想起当年屋主人的矛盾心情。

相传,这块地方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是召见外国使节、君臣共商国家大事的太极殿,明代成为朱元璋孙子的王府,清代又充作巡抚官邸。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却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杨虎城将军请陕西省建筑师和意大利工程师合作,建成花园住宅,外带占地十八亩的大花园。那时,杨虎城与蒋介石合作,在东路打败了唐生智、冯玉祥,他得意之余,认为这象征“紫气东来”,便命名新宅为“紫园”,牌子挂在大门口。过了几年,杨虎城在和共产党接触中思想起了变化,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取“止戈为武”之意,在1936年4月毅然改“紫”为“止”,请人在二门上题了“止园”二字,直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

从“紫园”到“止园”,反映了这位爱国军人的思想进步,也说明“西安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西安事变”前后,止园还曾是不少共产党人的落脚处,党中央派人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联系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南汉宸同志,他却安然住在止园里。1935年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派人给杨虎城等送信,1936年党中央派人与杨虎城会谈合作,那些同志前后都住在止园。特别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赶赴西安促进和平解决,也到过止园,为止园平增光彩。所以,止园的名字和“西安事变”是联在一起的,实际上,它对推动全面抗战、对中国革命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

后来杨虎城将军被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地逮捕了,止园也被糟蹋得

面目全非,不成样子。西安一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个地方,几次大规模修建,不仅恢复了止园原貌,而且在原来大花园的遗址上兴建起许多新楼,总面积扩大了近两倍。自从开办了招待所,曾接待过党和国家的很多领导同志。前不久听说,有关部门已经建议把杨虎城将军的止园故居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很有意义的,希望不久后止园能和广大游客见面。

(1982年12月12日)

木石姻缘

——福建“山海经”见闻之一

早听说福建人民会念“山海经”,最近有机会亲眼看了一下,果然名不虚传。

号称“八山一水一分地”的福建省,濒临祖国东海,山多海多。近年来,省委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大念山海经”,从南到北,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说到山区“真经”,人们会列举出山中珍品:木材、竹子、香菇、银耳、橘子、龙眼,还有茶叶、寿山石……。归结起来,一个是木头,一个是石头。因而人们戏称“木石姻缘”。

我们对“木石姻缘”留下了两个鲜明的印象:北有杉木王国,南有石头古都。

从福州乘汽车西北行,钻云拨雾,翻过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筹岭,便进入建瓯县境。只见山山翠树,坡坡绿荫,还可看到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材待运。

县的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杉木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广泛用途,然后自豪地说:“世界上适宜种杉树的地方是亚洲,亚洲适宜杉树生长的环境数中国,中国最适宜长杉木的省份为福建,福建最适宜杉木生长的山区就是建瓯!”原来,这里的农民善于运用五百万亩山岭的有利条件,积累了种、育杉树的传统经验,一般十五年就能成材,最快的只有八年。去年县委采用成林集体管理、荒山分散包种的办法,为国家提供了三十万立方米木材,而植树护林,绿化覆盖面积早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主要的树种仍为杉木。

建瓯,建瓯,果然是福建聚财之瓯,也可算一只“聚宝盆”。不仅林木茂盛,大米、果品、山货也有好收成;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崇山峻岭,水库、梯地里却一年四季都有淡水鱼上市。农民每人平均集体和个体年收入均在二百元左右,合计达四百元光景。

像建瓯这样的县,当不是个别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大念山海经”效益的一个侧面。

和这个杉木王国遥相辉映的是闽南石头古都。

由福州到厦门,越往南走,越看到石头的被广泛使用:石头大桥、石头海堤、石塔、石墙、石屋;在泉州开元古寺里,还有整整一百根巨大石柱,历经数百年,牢固地支撑着高耸的大雄宝殿;在集美,巍峨的大石碑矗立海边,世世代代纪念革命烈士。

这些巨大石头建筑的原料是不用愁的,到处可见石山,取之不竭。可是,哪来这么多石雕艺术家呢?当我们来到惠安县的时候,顿时真相大白。这个九十万人口的县里,就有十万石匠,不但承担了本地的石头活计,而且北到黑龙江,南到深圳,活跃在全国二十四个省市的建筑工地上。全国著名的石头建筑,像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南京中山陵、南昌八一纪念堂、泉州洛阳古桥等等,都是他们的杰作,从古到今,闻名中外。

这里还有一家全国最大的花岗石雕刻厂——惠安石雕厂,产品却以出口为主,石灯笼、石碑、石钵,行销于东南亚,独创的精美影雕还参加艺术展览会,到国内外展出。

福建人民的“山海经”内容丰富,仅从这段“木石姻缘”中,人们也可窥见当地党和群众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祖国的宏图 and 劲头了。

(1983年4月17日)

“龙宫”取宝 ——福建“山海经”见闻之二

福建省不仅“开门见山”,是个多山之省,而且得“海”独厚,海岸线长达三千三百多公里,还是个多海之省。

“海龙王”对福建人民很友好。在侨乡泉州一带传说着“龙王献计”的故事。宋朝时候,泉州人民为了国内外贸易的需要,决定在洛阳江万安渡地方建造一座大石桥。可是这里临近东海,“水阔五里”,深不及底,造桥墩有巨大困难。当时的泉州知府、大书法家蔡襄,便给“海龙王”写了一封求援信。“海龙王”很快回信,信上写了个“醋”字。蔡襄把“醋”字拆开,得到启发,决定在当月廿一日酉时动工。到时果然海潮退落,各路工匠抓紧时机,在洛阳江里奋力抛下大量石块,筑起一道横跨江底的矮石堤,这就是世界桥梁史上有名的“筏型基础”,然后在这基础上造起桥墩。于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洛阳桥建成了!至今,来到泉州的人,都能看到它的雄姿。

这段传说反映了千百年来福建人民对大海的深厚感情,和向“龙宫索宝”的愿望。确实,和群山一样,大海又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库。

有人说海港是大海的触角。从上海动身,登上轮船,可以直抵面貌日新月异的马尾港,乘坐火车,则可直达风光旖旎的厦门港,那里还正在新建一个现代化的东港。这些东海的触角,和上海港一样,闻名中外。近年来,福建又发现了一个特大、特深、特好的港湾——湄州湾,去年经八十多位专家勘察,赞为:“世界不多,亚洲少有。”一位地理学家兴奋地告诉我们:“利用湄州湾的独特条件,如能开辟为船转船的中转港,外通世界商港,内连兄弟口岸,对上海港也将给予有效的帮助。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前景无限!”我们深为福建人民的自豪感所打动,希望他们的愿望早日实现!

海港多,海岛更多。好像“海龙王”在东海绿波上撒了一把珍珠,变成了一千一百多个大小岛屿,使福建获得“千岛之省”的美名。

那些岛屿,不仅农林牧副渔工商,各有各的出产、特色,有的还是名扬天下的旅游胜地。号称“海上花园”的鼓浪屿,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个大不过一点七一平方公里的美丽小岛,四周碧海环绕,有山有岩,有树有花,有桥有亭,有楼房,有商店,有柏油路,有小街深巷,却独独没有一辆汽车,连自行车也看不见影子。小岛上空气特别新鲜,环境特别幽静,音乐特别悦耳,居民特别令人羡慕。一位久住上海的老教授兴致勃勃地说:“我离休后来这里住多好!”

地灵还得靠人杰。福建人民勤劳智慧,从东海龙宫那里取得的海产丰富多彩。一类是从大海里捕捞上来的;一类是在海涂上养殖出来的,而以海

水为原料的晒盐,更是要多少有多少。省负责同志告诉我们:现成的晒盐就可以拿出上百万吨,欢迎各兄弟地区合作使用。

一天,我们参观了厦门的一个农副产品市场,其中有一段街面竟如同水族馆。金光灿烂的黄花鱼,足有一尺半长;活的梭子蟹,在沙盆里爬动;圆滚滚的乌贼,饱鼓鼓的蛏子,肥壮的鳗鲤,洁白的大虾,黑白分明的鲜蚝等等,看得人目不暇接,啧啧赞叹。

海港、海岛、海涂、海产,真是“财源茂盛通四海”啊!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福建人民一靠山二靠海,这本“山海经”果然大有念头!它必将开创出福建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将为祖国大家庭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3年4月24日)

槟榔芋的故事

——听林则徐斗洋官的传说

槟榔是南方的一种乔木,果椭圆形,可以吃,并能入药治病。槟榔芋则是福建的一种芋头,以槟榔命名,除了形似之外,传说还和民族英雄林则徐用它治病的逸事有关。

今年初春时节,有机会在福建逗留。朋友们盛情请尝福建菜。在清淡鲜美、富有特色的各种“山珍”“海味”以后,上来了一道陌生的菜。

“这就是福建名菜槟榔芋泥!”一位朋友郑重介绍。

听说是名菜,我忙仔细端详。那是一盆藕色细羹,表面平滑无光,不冒一丝热气,不透一缕香味,安安静静,朴朴素素。

它是甜是咸?是冷是热?名在哪里?妙在何处?我心中正在嘀咕,主人像猜透了我的心思,笑着说:“先听我讲一段林则徐和槟榔芋的民间故事吧!”

那是林则徐查禁鸦片的年代。他主张对外商分别对待,孤立烟贩。并亲自与洋人接触,进行调查察访,晓以政策。一次,他接受洋官员们的宴请,讨论鸦片烟贩问题。洋官儿们表面上对他热情招待,骨子里支持不法烟贩子。席间话不投机,主人慢慢露出傲慢神态。林则徐心里生气,正在思索如

何戳穿他们的虚伪,宴会已经告终,上来了最后的甜食冰淇淋。他心无二用,见冰淇淋冒着气,以为很烫,用嘴吹了吹。却不料这一吹招来了洋官儿们一阵哄笑,他们再也不讲什么绅士风度、外交礼貌了,尤其是一个细长脖子的,更是肆意讥讽。林则徐受了这一番羞辱,下定反击的决心。当下却做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说:“你们这东西,外表冒气像是热的,骨子里却是冷冰冰的。我可上当只有一回啰!”

第二天,林则徐设宴回请,原班人马,继续讨论禁烟问题,自然仍是谈不拢。可是那些洋官儿们几曾吃到过真正色香味三绝的中国名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不由一个个狼吞虎咽起来,嘴里还不住地赞叹。酒足菜饱之后,他们意犹未尽,那个细长脖子咂着嘴评论说:“中国菜太好了,只可惜没有甜食!”

“怎么会没有呢?”林则徐笑嘻嘻地说,一面吩咐手下人:“上槟榔芋泥!”

瞬时端上来一大盆藕色的、平滑无光的细羹,细长脖子大喜,忙不迭舀了一满匙,送进嘴巴,滑溜溜吞下肚去;其他洋人也个个踊跃。眼见一匙匙芋泥倒进嘴里,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啊!”“啊—啊!”一片惊呼声;而那位细长脖子却左手按着喉咙,叫不出声,眼泪直淌,右手还紧紧捏着个汤匙乱指划。大家再朝那盆槟榔芋泥一看,呀,只见舀过的地方沸气直冒,如果用温度计测量一下,少说也有摄氏一百度吧!随着沸烫的热气,香味四溢。真是一道妙不可言的特色菜呀!

林则徐装做没有看到洋官儿们烫得嘴里起泡的狼狈相,举起匙来每人敬他们一份,慢悠悠地说:“请各位尝尝我家乡福建的名菜。吃这道甜食可性急不得,我们有句俗话,叫做性急烫猴(喉)呀!”他环顾一下愁眉苦脸的客人,又微笑着说:“中国菜槟榔芋泥外貌冷静,内心却是火热的。这性格正好和你们的冰淇淋似热实冷相反,请!”

洋官儿们听出了话里的话,只好看着槟榔芋泥规规矩矩地连声致谢,再也不敢放肆了。这就是林则徐用槟榔芋入药治洋人傲慢病的故事。……

风趣的主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举起公用匙伸向槟榔芋泥,一匙舀过,平静的羹面上果然热气直冒,清香四溢。我小心翼翼地把主人敬我的藕色芋泥送到嘴里:又滑又糯,又热又香,甜而不腻,油而不肥,真是色香味

俱佳的美味 ,名不虚传。

(1983 年 5 月 26 日)

春江水暖访鸭乡

——昆山燠鸭香飘周市

来到昆山的人 ,都想尝尝肥嫩甘美的卤鸭。然而最近 ,老昆山们却纷纷介绍一种具有特殊风味的“燠(音奥)鸭”。

自从去年底燠鸭在苏州食品展销会上一炮打响以后 ,苏昆一带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燠鸭热” ,人们互相传告 :“多年没吃到的燠味酱鸭又有买哉 !”春节前后 ,燠鸭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佳肴 ,走亲访友和探望病员的好礼品。

为了探寻燠鸭的奥秘 ,在一个春雨稍歇的上午 ,我们访问了燠鸭的故乡周市镇。

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 ,周围是水网地带 ,农民有养禽类的传统。去年十月 ,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因地制宜 ,在街上开了家燠味酱鸭店。这种鸭的特异风味在于爽口不腻 ,香嫩开胃 ,它配汤料独特 ,烹调入味 ,已有上百年历史 ,品种不一。

这次服务公司专门请了吴凤芝老妈妈掌勺 ,恢复和推广吴家秘传的烹调方法。吴凤芝九岁时就从父亲吴金福学艺。吴金福早年在苏州老三珍掌厨 ,后来自己开过太和饭馆 ,以烧“太和燠味酱鸭”著称。

十年动乱中 ,吴家受到冲击 ,烧燠鸭的手艺也遭非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吴凤芝才重操旧业 ,个体经营 ;去年她带了用家传秘方配制的鸭汤 ,高兴地参加了燠鸭店 ,使家传手艺得到了充分发挥。今年春节期间 ,光周市镇就销了二千多只燠鸭 ,和邻乡陆杨镇燠鸭展开了竞赛 ,也使昆山燠鸭的名声传远了。

燠鸭生产活跃了当地的经济 ,促进了大麻鸭生产。大麻鸭是昆山大麻鸭原种场在六七十年代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他们取苏州娄门鸭觅食能力强 ,能放牧的长处 ,和北京鸭个头大生长快的优点 ,杂交而成。1977 年经鉴定定名为“昆山大麻鸭”。放牧养殖 ,成本低 ,生长快 ,肉质好。过去 ,周市

乡的农民虽有养鸭传统,却有两难:买鸭苗不易,卖鸭子困难。烤鸭店一开,解决了农民卖鸭难的矛盾。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很快就有七十八家养鸭专业户前来签订合同。

烤鸭销得多了,还可以开展综合经营。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准备专门筹建孵坊,为周市农民提供优良苗鸭。鸭多蛋多,可以开办禽蛋加工场,鸭多羽毛也多,再建一个羽绒厂提供工业原料。还有鸭肫肝、鸭掌可以上市、出口……到那时整个地区经济可以带动起来。目前,苏州市主管部门已投资一百万元,发展昆山烤鸭。

离开周市后,我们来到绿水滔滔的吴淞江畔,只见一群群大麻鸭迎面游来。“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农村的明天。同时,上海人民尝到昆山烤鸭独特风味的日子也不会很远了!

(本文发表时同署姚冬梅名 1984年2月24日)

宜兴玫瑰 ——访白云山大理石矿区

大理岩,人们平常叫做大理石,是地球岩石中的珍品。古希腊人以闪闪发光的含义命名它,在我国则以盛产于云南大理而得名。可是,当人们仰望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那些红霞般的雄伟柱子,观赏首都机场七十二根大柱,或者步入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休息厅、上海游泳馆,看到那些华美的地坪和四壁的时候,恐怕很少人知道那些色彩绚丽、淡雅不一的大理石制品都有我们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内开采、精制的大理石。白云山大理石矿工们对自己的产品各有爱称。那鲜艳如朝霞的名为红奶油,那白润如凝脂的叫做白奶油,而青淡似秋云飘忽的,就是灰奶油(或称青奶油)了。这些光泽各异的奶油石,在国际市场上初露头角,获得了“宜兴玫瑰”的美名。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星期天,我们来到“宜兴玫瑰”的老家——张渚镇所属的白云山。迎着扑面寒风,登上海拔一百二十多米高的白云山巅,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大理岩“广场”上热火朝天钻机隆隆震响,钢索蜿蜒绕山,矿工们“全副武装”,钻孔的钻孔,锯条的锯条,割块的割块,从台阶式的矿床上

切割下一块又一块五、六吨重的大理石荒料(即坯料)等待装运。

白云山大理石矿区正是上海大理石工业的重要原料供应地,每年大约有一千立方米奶油石在上海大理石厂加工成材,宜兴玫瑰的荒料也从上海港运往海外。

上海大理石厂与宜兴白云山大理石矿的渊源,还可以上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时候,老厂长老刘在白云山一带抗战打游击,发现了大理岩的踪迹;如今,白云山矿区早已走上了机械化的道路,和附近十一条矿体同属宜兴县大理石公司,已探明的大理岩储藏量达一千万立方米,并将进一步建设改造成为我国现代化的大理石矿区之一。

来自天津的矿区工程师老于,已在白云山地区度过了十几个春秋,他自豪地向我们介绍:“有我国大理石装饰的日本东京都大饭店,引起了国际建筑界人士的瞩目,美国 RUO 公司要采用宜兴玫瑰装饰洛杉矶新建的大厦!”是啊,我国大理石从进口到出口的年代已经到来了,这是和采摘这朵朵宜兴玫瑰的人的艰苦劳动分不开的。那些山坳里经月尚未消溶的积雪就是一个见证人。矿工们不分三伏、三九,不顾雨雪交加,长年坚持在露天掌子面上。看,他们在寒风中战斗的高大形象,就像是一座座用“宜兴玫瑰”雕成的群像!

(本文发表时同署周异安名 1984年3月3日)

铁路之女

——记京沪列车女队长仲惠芳

前不久,我乘了一回 161/162 次京沪直快车。在北站上车的时候,一位身穿白地镶绿条铁路夏装的中年女同志,微笑着随手提起我的一个旅行包,麻利地一直送进车厢。我连道谢也来不及。这矫健熟练的身手,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她是谁?

“她?就是我们的车队长仲惠芳呀!她又来跟车了!”六车班的女列车员们自豪地向我介绍。

哦,掌管有六个车班的整个车队,带领十二位列车长闯铁路的是位女队长,这可不多见。

打从 13/14 次改为京沪直达特快列车以后 ,161/162 次车勇挑重担 ,以革新的姿态出现在京沪沿线大小三十六个站的旅客面前。国内外自费旅行者仍为能买到便宜舒适的“站站停”硬座票而高兴 ;老弱病残旅客为受到列车员、列车长的重点服务而感动 ;许多旅客欢迎他们改革客饭供应办法——取消多年来的预付款登记 ,实行看菜买盒饭 ;更多中外旅客赞美列车员、茶水员源源送开水到座前……

这列总共才只有两年半历史的“娃娃车” ,怎么能在短时期内异军突起呢 ?关键是人。他们有一支老中青结合 ,朝气蓬勃的队伍。其中 ,女队长仲惠芳便是这支队伍的排头兵。

女队长的故事还真不少哩 :——

她当过十几年列车广播员 ,一面宣传人民铁路为人民 ,一面学习医务技术。她曾在列车上为好几个临产妈妈接下了小宝宝。

她当车长时 ,思想工作一直做到乘客身上。有一次 ,一位东北妇女打算到上海去寻短见。但一趟车乘下来 ,女车长用火样的热情和切实的道理把她劝回了头……

别看她文文静静的模样 ,打起乒乓来可狠啦 ,曾经打了个分局冠军……

我终于在餐车服务员中间找到了这位带有点传奇色彩的女队长。

“ 喂 ,我在铁路集体里长大 ,老师傅们一项一项教会我工作。161/162 次号称改革列车 ,一切试着办全靠老韦教导员和小张副队长我们三人团结一心 ,加上车队长们的努力 ,今年创建文明列车是有信心的 !” 仲惠芳很健谈 ,她决心献身于铁路事业不是偶然的。

三十三年前妈妈死了 ,九岁的小惠芳住到姐姐家 ,就在铁路边。她白天黑夜听到火车叫 ,她想望长大当个列车员。十五岁那年初中刚要毕业 ,机会来了 ,铁路局招工。她缠着当铁路扳道工的姐夫 ,想法子介绍她去报名。终于 ,老师傅们帮她多报了一岁 ,她当上了学徒。

进了铁路 ,仲惠芳心里乐开了花。学不完的新鲜事 ,使不完的劲 ,一晃二十几年的列车生活 ,她觉得是很充实的。

“ 当然 ,烦恼也会有 ,这便是结婚后为了车子 ,委屈了儿子 ,对孩子照顾很少。再有 ,自己进步不快 ,领导上指出我有骄气 ,入党报告打了整十年。直到 1983 年才由韦金林同志介绍 ,参加到自己党的队伍里来 ! 韦教导员干

了四十年铁路,他看着我长大,是培养我成长的许多老同志之一……”仲惠芳说着激动起来。这也难怪,她本是老铁路工人和党组织抚养、教育出来的“铁路之女”呀!

(1986年7月22日)

大海上的姑娘们

——记长自号上的女海员

上海海运局所属的长自号,是一艘来往于上海青岛的大客轮,每次载客八九百人。在全船职工努力下,它已安全行驶五十三万多哩,去年分别由中央交通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精神文明船。但人们可能还不知道,船上的服务员都是合同工,而且几乎全部是女青年。

由客运组长董昌来直接带教的这批合同工,都是在八四年上海轮的。开头,姑娘们看到了浩瀚无际的蓝色大海,可高兴啦,但风浪一来,她们跌跌撞撞,晕的晕,吐的吐,又懊丧了。加上服务员的工作,离不开扫地送水,船开出去,再返回,四天中只能住在家里一个晚上,而在海上生活久了,也不再觉得那么新鲜有趣,于是,姑娘们的思想复杂起来。但是,两年来,她们在轮船的党组织和老师傅们关心帮助下,在风浪中坚持前进。

“这些姑娘真不容易啦,成长得真快”!乐呵呵的客运组长董昌来,是位老海运,既有北方人的豪爽,又像老妈妈那么细心,姑娘们爱不带姓名地称呼他“组长”。在“组长”的介绍下,我们结识了这些海上合同工姑娘。留给我们很深印象的是纪学妹。

四号服务员纪学妹,一头短烫发,圆圆的脸上总是笑嘻嘻。在学习全国劳动模范杨怀远的实际行动中,她出色地做到了客运部提出的迎、送、访、亲、勤、和六个字服务要求,一刻不停地帮助旅客解决各种问题。为老人送饭,为孩子送“护儿板”,为妇女送针线为青年当参谋,服务项目可真多。而对旅客的特殊困难,她格外注意。有一次,三等舱的一位旅客,上船后就不舒服,不吃不玩,只是躺着,小纪关心他,可他船上饭菜不想吃,甜点心也不吃。原来是患糖尿病的。小纪知道他要控制饮食,但饿着也不行,想起自己上船时恰好带了些咸饼干,便急忙跑到海员舱房去取来,还给他送了开水,

那位旅客感动地边吃边说“姑娘,你比护士还细心周到!”

小纪对“分内服务”周到细微,对“分外服务”也尽心尽力。今年七月,有几位体育界的乘客,怀着迫切的希望向小纪提出:为了工作需要,能否设法看看长城杯足球赛的电视转播。这可使小纪为难了,轮船上哪里去给他们专门弄电视机呢?但她没有一口回掉,思索了一下,便向客运部报告,请示船政委,破例让他们到船员休息室,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服务员的工作是实际的,也是琐碎的。一次让旅客满意并不难,难的是天天让各式各样的旅客满意。小纪服务过的旅客,男女老少,中外人士,都异口同声夸奖四号服务员。一年来,小纪每个航次收到五十到一百份表扬,竟没有一份批评。这倒并不是她从未与人发生过矛盾。去年有一次,三等舱一男旅客不断吃瓜子,往地上吐壳,小纪耐心地扫了一遍又一遍。其他旅客实在看不过去,劝那男客自觉点,他反而气势汹汹地嚷起来:“服务员不就该扫地嘛!”小纪气得脸都涨红了,忍无可忍,回说:“没你这个大垃圾就好了!”说完便走。转而一想,虽然个别旅客蛮不讲理,自己要态度也是不对的。她便又回到那个舱房,诚恳地批评自己不该讽刺旅客,拿起扫帚又扫了起来。这一来,那个男旅客自觉惭愧,连忙下地帮助小纪打扫,表示向她学习。

由于小纪热爱海运事业,服务出色,在全市十大窗口竞赛中,光荣地被评为优秀服务员。除了市里评选外,船上也常评选优秀服务员。小卖部营业员唐秀若,便是其中一个。

小唐是个文静的姑娘。父亲也是海员,她从小爱跟爸爸上油船玩,妈妈笑着说:“你长大了也上船吧!”现在,她庆幸儿时的愿望果真实现了。小唐原来也是客舱服务员,经常受到旅客表扬。后来调到小卖部,虽然奖金少了,她仍是积极主动地干。她捉摸旅客的需要进货,光罐头食品,便从二种增加到八种,生意很好。一次,一位中年女旅客想买两个午餐肉罐头,带到青岛游崂山时野餐。可她没带开罐刀,不由犹豫。谁知小唐早已为旅客想到了,小玻璃柜里显眼地陈列着开罐刀。那位妇女高兴地买好罐头和开罐刀,夸奖小唐待客和气服务到了家!

小唐爱小卖部,爱大海,更爱船。前不久,汽车五场招工,她的几个同学代她报了名,劝她说她去,既可摆脱枯燥的海员生活,又靠家里近。可小唐坚

决放弃了。她认为虽然现在合同工还受到某些不公平的对待,但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她爽朗地笑着说:“我现在对海员生活习惯了,蛮有劲的!”

爱大海,爱海运工作,同样是电影放映员刘玲琴的志愿。小刘中学毕业后就报考海运局,可惜只差二分,落选了。她很懊丧,幸亏后来有机会当合同工,才如愿以偿。现在她勤勤恳恳,每天白天售饭菜票,晚上为旅客放映电影。每当旅客们看完电影,感到旅途愉快时,便是小刘的欢乐。小刘已经到了安排个人生活的年龄,对于他支持她的海上工作,也是小刘的很大安慰。

大海是广阔的。年轻的海上女合同工们正在大海的怀抱里成长,正在成为大海的主人翁!

(1986年)

王孝和在学运中

王孝和几乎是上海人民家喻户晓的烈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孝和就是上海电力公司发电厂的工人。他带领伙伴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后来由工人群众拥戴为上电工会常务理事。1948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用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同年9月30日被反动派特刑庭杀害,壮烈牺牲。

最近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记载了王孝和烈士不仅是工人运动中的英雄,也是学生运动中的优秀战士。据《同学情,革命谊》一文介绍,王孝和同志于1941年5月4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他牢记这个日子,称为自己的“生日”,曾秘密写过一首小诗,藏在香烟盒底,去找他的入党介绍人一起诵读修改。全文是:

守纪律,组织利益第一。

D(注)的秘密不得疏忽轻泄。

负责任,规定任务要完成。

多计划,养成独立的能力。

同志间,勤勉批评相爱惜。

诗言志,这不是吟风弄月的诗句,这是王孝和怀着共产主义理想,为之

奋斗终身的誓词和行动准则。王孝和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原是浙江舟山的渔民,后到上海当海员,在英商轮船上当轮机火夫,1940年秋因昏倒在船舱里而被辞退。念英语的王孝和气愤地对同学说:“我永远不会做洋奴,去为帝国主义服务!”他们一家五口挤在云南路一幢弄堂房子二楼的一个小间。房子很矮,他的木板床搭在父母的床上面,白天翻起来,才能坐在父母的床上做功课,可他学习非常努力,因此英语的阅读、会话和写作水平都比较高。他平时不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文进步书刊,还专门找英文原著的进步作品阅读。《西行漫记》这本书,他就是找斯诺的原著《红星照耀着中国》来读的。还到当时工部局图书馆和外国书店去找外文书,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英文小说《石炭王》和英文本苏联小说《虹》,都是这样读的。

王孝和与励志英专的同学亲密“交朋友”。1942年春天,低年级同学陈彭麟,因父亲失业,随家回无锡乡下,生活艰难,思想苦闷,就写信给王孝和,并请他用英文回信。第二天,王孝和写了一封感情真挚,很有思想深度的英文信给陈,分析社会现状,指出他忧伤和痛苦的原因,提醒他记住,乡下的穷伙伴,是世界上真正的好人。信的最后王孝和热情洋溢地写道:“莫悲伤!振奋起来!陈!光明在等待着你!你的忠实的王孝和”

王孝和烈士在学生时代写的这封英文原信,陈彭麟一直珍藏到上海解放之后。现在信的照片也刊登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和其他许多珍贵照片一起,永远激励我们!

注:“D”地下年代对“党”的隐称。

(1991年8月13日)

青草·鲜花·苍松

——记革命老人、中共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

散居在海内外的“宁波帮”,许多人知道张承宗,有的称先生,有的呼官衔,而同为宁波镇海人的包玉刚,却亲热地称之为“乡长”,尊奉他为乡里之长。至于上海人,倒并不在乎他的出生地,认为他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当上海副市长,当然是老上海,近年来不约而同尊称他张老。论

年纪 ,论声望 ,当得 !

目击“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 ,今年已是七十周年。目睹惨案的人已极少了。找到一位 ,就是当年的宁波少年张履斋。

1925 年 5 月 30 日正逢星期六。十五岁的华童公学学生张履斋下午没有课 ,便和他弟弟张困斋一起逛南京路。他们从“新世界”往东 ,快到老闸捕房的时候 ,忽然听到阵阵口号声 :“打倒帝国主义 !”“取消不平等条约 !”……迎面过来了学生、工人的游行队伍 ,有人举着小纸旗 ,有人在发传单。这对兄弟内心感应 ,赶紧钻到捕房西首一家银楼的大门边 ,只见捕房门口已有英国巡官和印度巡捕 ,持枪排列 ,对着游行群众。三点多钟光景 ,前来抗议杀害工人顾正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爱国市民 ,越聚越多 ,约摸有了一万多人 ,口号更响了。突然 ,捕房门口一阵枪响。履斋兄弟俩踮起脚跟朝人群里张望 ,啊 ,英帝国主义巡捕向中国人开枪了 !抗议的群众队伍里有人倒下了 !巡捕在乱抓人 !更多的学生被捕了。履斋觉得血往头上冲 ,心里被一团激愤塞得难受 ,帝国主义为什么敢这样强凶霸道 ?!

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 ,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打死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爱国人民十三人 ,重伤十五人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鲜血也使这对宁波少年受到了革命的启蒙 ,照亮了他们一生的征程。

张履斋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经受了革命洗礼 ,同年转入光华中学高三 ,改名张人俊。第二年考入光华大学经济系。他努力学习功课 ,课外阅读更广 ,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到古典名著 ,到普罗文学 ,直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父亲的早亡 ,迫使张人俊辍学进入上海银行界当小职员。旧上海 ,银行号称“金饭碗”。而国难当头 ,捧着金饭碗的他却与弟弟和好友相约共同抗日 ,共同找寻共产党。出版抗日的《石榴》月刊 ,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 ,组织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 ,直到 1936 年张人俊担任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第四大队大队长。第四大队成员主要是金融界的职员 ,约七八十人。这与抗日的形势太不相称了。于是 1936 年五月来临之际 ,在党的指引下 ,张人俊他们酝酿组织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大团体“银钱业业余联谊会” ,提出以联络感

情,交流学识,丰富业余生活,提倡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务为宗旨。这符合了当时中下层职员的要求,“银联”应运而生,一炮打响,刚建立就吸收了五百多名会员。

从此,张人俊辛勤耕耘在“银联”这块沃土上。他们完全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那一套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而是通过读书会、座谈会、歌咏会、联欢会、交朋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结合宣传抗日救国。这套大团体的经验,使“银联”迅速发展,到1939年时,会员已达上万人,并在上层人士中开展了统一战线。同时,坚持公开合法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张人俊自己已在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逐步在银行、钱庄、保险公司等基层建立起党支部,金融业总支,并发展为金融业党委,张人俊担任了第一任党委书记,这时在会员中已发展了上百名共产党员,还输送了一批干部、积极分子到解放区,并为解放后的上海储备了一批骨干。张人俊创造性地开辟“银联”工作,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华中三年重返上海

张人俊在“银联”生根开花,谱写了自己一段灿烂的历史。但他的崭露头角,也面临了危险。到日军侵占上海向共产党伸出魔爪时,党组织便及时决定张人俊等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1942年的一天早上,张人俊的夫人俞雪莲在枕头下发现丈夫留给她的的一封信:“我离沪到向往的地方去了,五个孩子请你好好教育,生活托困斋弟照顾。我一定会回来的!”俞雪莲是位抗日妇女,也同情共产党,她心中明白丈夫向往的是什么地方,便勇敢地担起这副后勤重任。从此,张人俊改名张承宗,在华中局城工部一干三年。学习、总结、锻炼,他成熟了,老练了,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三年后,他果然回到上海来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中共中央华中局紧急开会,传达中央指示,明确指出:日本将很快投降,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城工部立即派干部回沪,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五人组成,刘长胜任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等为委员。会议结束,张承宗和张执一当天分头出发回上海。张承宗通过秘密交通线,于11日回沪后并未回家,他立即找到地下党各方负责同志,分

头传达中央指示,各委也迅速逐级传达动员,顿时全党斗志昂扬,不分日夜工作,群情振奋,上海城处处可闻“天快亮了!”“大家起来杀日本鬼子!”

人民武装起义的准备紧张而有秩序,可是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市委根据中央新指示精神,立即决定地下党组织转入深入隐蔽,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

市委书记传奇

1947年9月,在刘晓、刘长胜两同志为正副书记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下,再次成立中共上海市委,任命张承宗为书记。市委下设工委、学委、职委、教委、警委、妇委、科技党委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等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央关于白区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以“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稳扎稳打,开辟了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

这时候的张承宗和刘长胜同住在愚园路一幢小洋楼里,生活俭朴,外出则穿一套西装,带一副白金边眼镜,俨然一位绅士。他还在福煦路亚尔培路转角开了一家丰记米号,由弟弟困斋当经理,两位地下党员当伙计。有趣的是,这个共产党地下市委的联络机关,长期与亚尔培路二号国民党的中统办事处对邻而居。丰记米号除严密注意安全外,还利用伙计送米的机会,侦察对面敌人机关的动静。

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的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等人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浦江风云,最后终于汇成了迎接上海解放的大潮。1949年5月,上海除去输送到解放区大批干部外,还留有地下党员九千多人,建立起了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等共计十万大军,做好思想、组织、武器、工具、技术、联络等各种准备,只等市委一声令下,立即配合人民解放军行动。

5月24日,张承宗按照上海局留沪的刘长胜同志指示,到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攻城部队驻地取得了联系;又和市委委员们检查了各条战线情况;下午又分析了国民党军在南京路上装模作样“胜利大游行”的动向,便判断敌人马上要逃跑。他和市委同志立即决定:当晚全市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坚守岗位,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顿时,各路交通员分

头把命令传达到各级党组织。接到通知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立即摩拳擦掌,枕戈待旦。

傍晚,市委书记刚忙完这些,便接到刘长胜的电话:“晚上到你家来祝贺你的生日!”

解放前,市中心五原路上有一幢精致的花园洋房,周围市民知道,这是国民党陆军原总司令张发奎的寓所。1949年春上,由于时局紧张,张发奎跑到广州去了,请他的秘书莫振球代为管家。3月19日,张承宗亲爱的弟弟因斋因上海局秦鸿钧电台遭破坏而一起被捕(后两烈士一起牺牲)。张承宗离开家里,无处安身,地下党员莫振球就请他住进了敌方司令的公馆。24日晚上,刘长胜等同志果然来了,一时洋楼里喜气洋洋,笑语盈盈,一起预祝上海的解放。多少年的艰苦斗争,多少人的英勇献身,黑暗终于过去,上海人民马上要解放了!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到,二十二年前,张太雷等同志在广州,曾把张发奎家作为“广州暴动”指挥部;而现在,迎接上海解放,张发奎的家又一次成了共产党人的指挥部,历史真是会开玩笑!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而上海必定解放,全国必定解放!莫振球同志见大家高兴,便拿出洋酒,请大家干杯,在长期斗争中,头发过早花白的刘长胜,体重不足一百斤的张承宗,兴奋地举起胜利的酒,一饮而尽。

第二天一大早,张承宗和莫振球从张发奎的保险箱里取出左轮手枪,各自别了一支,带领几位同志,驱车进驻江海关大楼,由我人民保安队员和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海关警察担任警卫,迅速建立起上海人民保安队总部。

“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第一面人民自己的旗帜,在江海关大楼上高高挂起。

《晓珠天上》《红艳千般》

解放后的岁月,转眼便是四十几年。人们已经尊称张承宗同志为张老了。满头白发,记录了这位革命老人辛劳的一生。除去“文革”中被“四人帮”非法关押了五年之外,他都忙碌在建设上海的岗位上。其实,即便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他也没有让脑子闲着。他以地下年代养成的过人的记忆力,回想着“银联”年代的,“华中局”年代的,“地下市委”年代的许多战友,并偷偷地把名字记在《毛选》的字行间,一直保存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这就是我们在他的回忆录《红艳千般》中,看到常常有一串串几十个名字的秘密。

记名字的本领,和张老当年广交朋友的经历密切有关。比如《红艳千般》这个独特的书名,不但由他老友赵朴初先生题写,而且源于赵老的词作《河满子》。在地下斗争紧张的1948年夏天,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抓共产党员。赵老设法让处境危险的刘晓、刘长胜、张承宗等同志住进杭州净慈寺“避暑”。这般的友谊,岂能轻易忘却!

又比如卢绪章同志,是张老办“银联”时期的好朋友。卢老也是宁波人,长期搞经贸工作。八十年代有一次,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仑港,对卢绪章谈起:要把海内外的宁波帮团结起来,帮助宁波建设。卢老记在心里,并很快找张老商量,成立“宁波建设促进协会”,由卢绪章任会长(后改为名誉会长);第二年建立上海的协会,由张承宗为名誉会长,张老推荐李储文为会长(现由庄晓天接任会长)。张老不仅自己热心关注故乡建设,提出上海和宁波“对口帮”的建议,先后促成一批中小企业的建立,而且让他的曾任华东电管局副局长的大儿子张亚圣,出任上海协会理事,帮助解决镇海建设用电,并合资兴办了宾馆等。

“银联”时期,张老还结交过许多银钱业上层人士,熟悉其中的“宁波帮”,他们不少人现在港台海外经营。这些老宁波的友谊,往往绵延至今。张老还是“沪港经济协会”的名誉会长,在和香港朋友交往时,但凡对方有涉及宁波、余姚等意向的,他都热心促成。从1983年起,他就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故乡之间,问他这么高龄不太累吗?他意味深长地笑笑说:“因为我是宁波人呀!”

说到高龄,张老今年八十有五,鹤发却是童颜,很有精神。他耳聪目明,写字不颤,行路轻松。每天早上锻炼自编体育动作,上午一般在书房里写革命回忆和经济方面的文章,下午会见来客,还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又一个五月来临,他正在整理九十年代所写文章,和新找到的三十年代发表的文章,以及从英文翻译的文艺作品等,已集有三十多万字,打算再自费出一本书,题为《晓珠天上》。这书名也是采于赵朴初先生那首小令。原词写于1967年8月:“悄悄非关多病,三年不见东山。花事绸缪风又雨,更兼蜂妒莺馋。终信晓珠天上,照他红艳千般!”张老介绍说,赵老这阕《河满子》原

是写给陈毅同志的,表达了诗人的思念挚情,和在风雨如磐日子里对光明的坚定信心。1978年老友俩劫后重逢。赵老欣然写成屏幅送给张老。张老如获至宝,尤其欣赏最后一联,所以要一而再地用作书名。由此也可窥见革命老人的内心。

(1995年4月30日)

灵丘路考与备考

自从公今度同志逝去以后,我不得不告别住了近三十年的复旦九舍,被通知搬往大有令人谈虎色变的灵丘路237弄。经过一阵议论、一番折腾以后,我想可以闭门读书,过上清闲的退休生涯了。然而还有这样那样的“社会舆论”来敲门。读者称我“总是晚报的人”,想想也对,便义不容辞地要反映一二,说三道四。

先是灵丘这个路名。新来乍到,热心的邻居分别告诉我种种传说:这里原来是坟山,这里过去是刑场……

哦,灵丘,是因此而定名的吗?真是的,即便传闻如此,何必还在路名上作出暗示,令人心里发毛!可我学历史的儿子力排众议,说灵丘早在汉朝就是一个县名,属于《三国演义》中提到的那个中山国……我女儿拿出全国地图来查,果然在山西省的东北角找到了这个县。原来,用作这条路名的地名,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然而,我的心里还有点不踏实。大凡用一个地名或人名来作新路名,总有它的道理。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开了窍。原来,灵丘这个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山区小县,还真的由坟墓得名呢。不过,“灵”并非灵魂、灵牌,而是源于战国时赵雍的谥——“武灵”。那位主张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就葬在那里,如今灵丘县的主要古迹便是他的陵墓。然而,这个县的现代著名度远远超过那位古代改革者。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的一个主要革命根据地。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奔赴抗日前线灵丘,在附近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打了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仗。

我想,这就是我新居路名的由来吧。灵丘路的居民们大可引以为荣,而不必再心存疑虑了。

不过话虽如此,人们对这条光荣之路的现状还是有不如意处,相传有灵丘路“三怪”:

一怪曰:“烦恼真烦恼,路号紊乱太难找。”怪在“π”形一横二竖都是灵丘路,不合常规。直路上有路牌少门号,横路上有弄号无路牌。更怪的是151弄在南横路,215弄却在北横路上,隔壁又是237弄,也不知中间这几十个门号到哪里去了。邻家一次来客,在三条短路上竟找了一个多钟头。

二怪曰:“惹气真惹气,外出乘车太不便。”灵丘路上一共两路公交车,一路来车少,一路停车早。晚上八点钟便是末班车。稍晚一点回家,只好转乘97路,从水电路桥两脚跑。

三怪曰:“讨厌真讨厌,集市垃圾堆路边。”脏乱现象不必细说,连每天路过的小学生都写了调查报告,可见居民要求加强管理之心切。

当然,居民还是很公正的,认为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认为虹口区注重商业,买东西比旧居方便。对于灵丘路上及周近在一年之内雨后春笋般开业的大小超市,人们热情很高。以上“三怪”之类也许正是迅猛发展地区的一个缩影,是故谨录以备考。(1995年11月26日)

附注:此文发表后不久,灵丘路名取消,延伸为水电路,237弄改为“1324弄9支弄”。现“三怪”尽去,一片繁荣,建设文明,居民称善。

古猗园里巧遇苏绣大师

我辈离退休老人,既无别墅山庄度假村可小住,也没有自费遨游名山大川的条件,最现实的还是和家人,或约二三友好去逛公园。

然而,上海有一百多家公园,有名的几乎家人比花木多,喧喧闹闹,熙熙攘攘。套一句时髦的唱词:“说静就静,静也不静。”要找一个够得上清静安宁、适合老人们优哉游哉的去处,可不容易。“五一”节前,偶然的机,与友人重游古猗园,不禁喜出望外。

古猗园地处千年名镇南翔,离上海市中心约摸一个小时车程,不近也不远。她原是明代留下的著名园林,解放后不断整修扩大,加上管理得法,现

在已建成全市屈指可数的“双优”(优美环境、优良服务)公园了。

两位南翔朋友张君、蔡君,陪我们游园。沿幽深小径信步前行,满园林木草地新绿照眼,一路小岗、名亭、清池、曲桥,空气清新,环境宁静。游人三三两两,爬山,划船,散步,赏花,拍照,聊天,悠闲自在。春寒过后,桃花逐渐盛开,艳红、粉色,复瓣,单株,细细观赏,也不亚于桃花节兴味。来到风吹竹叶簌簌响的竹园边,看到新竹出土,这使吃畅了今年春笋的上海人大感新奇。古猗园曾以“方竹”驰名,多年失传,听老园林蔡君介绍,几经栽培,现在有的圆竿上已能触摸到“楞角”。很有希望能重见珍稀方竹的风采了。

古猗园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惊险游乐,没有刺耳的流行歌曲,却经常有独特的小型展览,在那些精美的仿古建筑里举行。不必另行买票,不愁前拥后挤,正合吾辈老人意。除常年陈列由热心人赠与的鸡血、田黄等珍藏奇石外,还有颇可一看的个人文物藏品展:古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小到只有六十三克重的端泥参锅。而正在开放的苏绣精品展,特别吸引人,堪称雅俗共赏。

真巧,这天从苏州来的当代苏绣大家、全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娥瑛女士,在现场介绍苏绣特色。这位精神很好的老太,十岁从母学艺,一心扑在苏绣上已六十年,精通刺绣针法、用线、调色等技艺,主编《刺绣技艺》。五十年代初,她研刺“双面绣”,并进而发展成“双面异色绣”、“双面三异绣”,蜚声海内外。李大师的个人苏绣作品多次得奖,由故宫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及苏州、杭州博物馆和研究所等收藏,这里展出的三十多幅苏绣精品,大都由李大师设计、导绣,由她经心培养的新秀们精绣而成。从形态逼真的双面绣绣大小动物,到工艺独特的发绣(用人的头发当线绣成)佛像,特别是师生们花了三千多个工作日绣成的大型《群仙祝寿图》(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代表作),使游客大饱眼福,啧啧赞叹。

老人游园,又不能太累,好在这园面积不算很大,且有茶室、餐厅歇息,还可品尝正宗南翔小笼馒头。当人们游园尽兴,准备返回时,可看到男清洁工正驾小舟打捞水面上漂浮的杂物,而女清洁工正沿小径打扫地面。这时你会从心里感到,正是园林工人们的长年辛劳,保持了名园的整齐清洁,为我们创造了优游的好去处。

(1996年5月31日)

“慈溪杨梅甲天下”

夏至杨梅满山红。正当夏至季节,我以“老慈溪”身份回家乡小住,兴致勃勃地上了杨梅山。

慈溪杨梅主要产地在横河、匡堰、鸣鹤一带。黄梅天时阴时雨,我们来到匡堰镇东岙村的时候,正当绵绵细雨。游子们冒雨登山,进入一个不怎么大的杨梅林,只见烟雨迷蒙中杨梅树高高矮矮,树顶都在两米以上,翠绿色的叶丛枝头,深紫浅赭,弹果圆圆,含笑相迎。

“大家随意挑拣采摘,尝尝新!”这片杨梅林的主人,是位农民出身的村办工厂厂长,大名汪国员。他介绍自己种杨梅的历史:“八年前,村里分给我家六株杨梅树,由我妻子董桂凤陆续增栽,现在共有六十多株,全是荸荠种。”

荸荠种是慈溪杨梅的名种,以果大核小、肉质丰厚、汁鲜味甜著称。我虽然自幼饱餐荸荠种杨梅,但是在上海几十年,罕见真品。此时,这位高个儿主人,踮起脚跟,给我采了一颗乌亮透紫的大杨梅说:“这是上品!”我接过那颗带绿色小柄、宝石般的佳品,放到嘴里,一股鲜美的蜜甜,一股浓醇的乡情,使我陶醉了。

“你家这些杨梅树,可以有多少经济收入呢?”

“八年龄的杨梅树,一株年收入约二百元——我这里的不能这样算。我是拿杨梅招待到村里来的客人!”果农兼厂长笑嘻嘻地说。我们一计算,这笔招待费可数目不小。便又问他:“那不影响你家里收入?”他笑而不言。旁边一位年轻人抢答:“他们厂做打气筒,很赚钱,家里主要靠工业收入。几株杨梅在他家算什么!”

在一个“村办企业家”看来,万把元钱杨梅收入不算什么,可对普通农民来说,杨梅却是全年收入的重要部分。匡堰镇负责同志介绍:今年杨梅大年,全镇二十四个村,估计产量一千万斤,占农民年收入三分之一。

杨梅是浙东慈溪、余姚等地的著名特产,也是一项效益很好的经济作物。近年来,善于经营的慈溪人,除努力改进品种,提高产量,推广“克服大

小年”科技成果之外,还不断开发杨梅的食用加工和销售:杨梅酒、杨梅酱、杨梅汁、杨梅罐头、杨梅蜜饯……正在不断提高质量,远渡重洋,还空运鲜杨梅到海外。其中有一家食品公司,自今年杨梅上市以来,每天下乡收购五十吨,加工成鲜杨梅汁,清晨运往日本,当天傍晚在大阪、神户等地应市,深受欢迎。现在,当地传媒上已记载一条消费者赠与的美誉,叫做“慈溪杨梅甲天下”。我想,在果农和各个环节人们的努力下,慈溪杨梅广泛打入世界市场,做到名实相符是有可能的。

(1997年7月3日)

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英雄

——卢志英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祭

1930年元宵节刚过,从上海北火车站走出一位穿旧学生装,背着行李的山东青年。

他身子壮实灵活,双目明亮机警,英武中透露出几分书卷气。这便是中共地下党员卢志英。

别看他才二十四五岁年纪,已经有了五年党龄,率甘肃旧军骑兵团起过义,从陕西反动派牢里越过狱,又在北京受过高等教育。

此番他受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特委调派,到上海特科做情报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深入工农群众,结识三教九流,打入敌人内部,几次出生入死,建立默默无闻而又惊天地泣鬼神的功勋。

这里讲述几段故事。

到国民党心脏里发展中共党员

1932年,蒋介石加紧反共,加强控制老窝南京。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中央特派员王世英也被追捕,不得不撤回上海。卢志英被派往接替。他只身来到白色恐怖严重的南京,不避艰险,日夜工作,恢复地下党组织和情报网,又深入敌人内部,物色、培养、发展新党员。

卢志英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为人正直、爱国,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痛恨蒋介石叛变革命,思想苦闷。卢志英

便和他交上了朋友。

一次,两人相约在无锡会馆谈心。王昆仑一见面就说:“蒋介石倒行逆施,很快就要完蛋了。我实在不愿再在他手下受罪,请你想法让我到苏区去,痛痛快快干革命!”卢志英让他坐下,笑着分析:“你说他要垮台,这是肯定的,但是不会很快。还得各方面爱国力量团结起来,长期跟他斗。南京正需要我们!再说,你到苏区去只是普通一兵,而在这里当国民党中央委员,可以发挥在苏区发挥不了的作用!共产党多少年也培养不出一个立法委员呀!”

王昆仑边听边思索,不由连连点头,表示要照卢志英的指点,广交朋友,积极组织读书会,下决心长期斗争。

后来,他又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卢志英对他经过一年多的教育、考察,亲自回上海向中央请示后,发展王昆仑为中共秘密党员。

王昆仑在南京坚持战斗,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贡献。

卢志英还在南京外交部发展了秘密党员胡济邦,她也坚持始终,努力为革命工作。

南京的地下党稳定发展了,活动也正常了。蒋介石反共、围剿苏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共中央特派员卢志英手中。怎样把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绝密情报,万无一失地送到上海?卢志英和打入铁甲车部队的地下党员商量:能否掌握一辆铁甲车?“能!”同志们肯定地回答。

于是,蒋介石的精锐装备,为共产党义务运送国民党的绝密军事情报,从南京到上海,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卢志英在南京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1933年底他又被捕了。这使他回想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自己在陕西蒲城第一次被捕又越狱的往事:

保安总队长卢涛(卢志英)原来是共产党的消息,传到蒲城小学教师张育民耳朵里。张育民是反动派在西安进行的集体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女共产党员,正为失去了党的关系而日夜苦恼。她抱着“救出同志找到党”的决心,深入虎穴,请学生家长往牢里送去五双长统女纱袜和一张小字条。她又想方设法弄到钥匙,深夜打开牢门。卢志英和战友就是用五双纱袜结成的绳子,越狱成功的。后来,他和张育民在北京重逢,一起做学运工作,并肩战

斗,感情日深,在1928年秋冬经组织批准,喜结良缘。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托人送给他们一对大红枕头套表示祝贺……

卢志英边回想,边打量南京的现代化监狱,思忖再度越狱是不可能了。但是自己两年来的工作,隐蔽得很好,并无破绽;再从特务的提问分析,牛头不对马嘴,可以肯定这是一次误捕。他坚定地抱着出狱信心,和敌人斗争,忍受酷刑,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等待组织营救。

1934年初,党组织设法营救卢志英出狱,把他接回上海养伤。

这时候,张育民已从北京调到上海“住机关”。夫妻俩久别重逢,悲喜交加。张育民见丈夫面目浮肿,遍体刑伤,拐着左腿,不由掉下泪来。卢志英拍拍她的肩膀安慰说:“不要这样,革命人嘛,哪能没灾没难?”又微笑地说:“你应该高兴才是,养好伤,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获取蒋介石的“铁桶计划”

这时候,蒋介石正按照他的德国顾问赛特克炮制的“铁桶计划”,调动百万现代化部队,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妄想彻底消灭红军。

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已遭到很多损失,军委急需获得敌人的“铁桶计划”情报。但蒋介石控制极严,我各路情报人员未能得手。

一天,卢志英过去结识的原北伐军一个旅的司令莫雄,到上海托人找他。原来莫雄被国民政府新任命为江西第四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司令部就设在蒋介石的指挥中心庐山脚下德安县。莫雄既想当官,又怕处在围剿前线得罪共产党,心里十分矛盾,便带了两张委任状,寻找卢志英这些“进步朋友”帮忙。

刑伤初愈的卢志英觉得这是个靠近庐山获取“铁桶计划”的极好机会,便向组织上请战。此时的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也有兴趣。经请示中央后决定派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张育民等前往,以莫雄司令部作掩护建立情报站。又由学医的张育民在南昌开设“张育民诊疗所”,作为党的联络站,与苏区中央联系。

1934年春天,卢志英穿上国民党军官服,率领一批秘密共产党员,随莫雄上任去了。他的公开身份是第四专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主任。他们的

策略是先帮助莫雄站住脚跟,以取得蒋介石信任;同时争取与他合作,派人打入庐山特务训练班,想法获取“铁桶计划”情报。

卢志英派交通员项与年到苏区联系,送去保安队行动路线、日程,请红军配合制造莫雄“剿共胜利”的假情报。一时间,哪里的红军转移后,保安队便到那里去“围剿”,拿回一些红军有意丢下的破枪支烂草鞋作为战利品,得胜而归。接着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刘哑佛起草“捷报”,让莫雄签发,送往省政府和南昌行营。胜利一个接一个,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心花怒放,嘉奖莫雄剿共得力,评为全省考绩第一。

蒋介石也对这个非嫡系下属另眼相看了,常让他上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莫雄带回各种文件,交给参谋主任处理。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让卢志英物色可靠人选,由他介绍参加在庐山上办的特务训练班,再分配到特务机关工作。几方面得来的军事情报,通过“张育民诊疗所”送往苏区。但是,“铁桶计划”的全貌还是音讯全无。卢志英心里着急。

转眼到了秋天,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左”倾领导错误指挥,接连失败,形势危急。获取“铁桶计划”更迫切了。

十月初,莫雄从庐山开完绝密会议,带回一大包文件,却一反常态,密藏起来。卢志英他们分析,认定这文件跟“铁桶计划”有关。几个人商量后连夜准备软硬两手做莫雄工作。

卢志英诚恳地开言:“司令,我们兄弟几个跟大哥结成至交,全是出于钦佩大哥当年爱国仗义,辅佐孙中山先生。如今大哥却与我们生分了,把有关身家性命的大事,放在心里不愿和我们商量……”

莫雄忙辩解:“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半年来帮了我多少忙!这次……唉,老蒋他……”

卢志英几个针对他的害怕心理和摇摆态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从共产党对朋友的政策,谈到他的前途:“人民决不会忘记有功之人!”

整整谈了半夜,莫雄终于思想斗争胜利,站起来说:“罢了,罢了,好事要做到底!我带回了‘铁桶计划’全套文件,还是卢老弟拿去处理吧!”

卢志英他们看到了“铁桶计划”全套文件,震惊不小。他们立即把情报记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由交通员项与年星夜送往苏区中央军委周恩来处。这份重大情报发挥了重大作用。十月中旬,中央红军突围,开始长征。后

来,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看到了这份情报,赞扬说:“搞到这份‘铁桶计划’情报的同志有功!”

全国解放后,李克农、王世英推荐莫雄对革命有功。人民不忘他的功劳,选举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副主席。莫雄撰文追念卢志英。

唱现代空城计迎接红军

红军长征以后,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军权,中途改变计划,要进入贵州。

先是1934年底,中央军委周恩来赞同取道贵州,电委卢志英为中央特派员,急赴贵州搜集情报,保证红军通过。卢志英离别正怀着双胞胎的妻子,带两个战友,火速赶往。

他们伪装“卖布客人”,联系、发展地下党组织,为中央红军及时提供情报。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奔袭云南,渡过了金沙江。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如梦初醒,他被毛主席的用兵如神弄得手忙脚乱,赶紧调得力干将莫雄到毕节,镇守云贵川三省咽喉。

于是,送走了中央红军的卢志英,便留在贵州,回到莫雄司令部,迎接红军二、六军团贺龙大军。莫雄见卢志英回来大喜,加任他为参谋长,又忧心重重地说:“卢老弟,这回老蒋暴跳如雷,命我堵截追击红军,可不比在江西了。我把部队的指挥大权交给你,也是把身家性命交给你。望你好好安排!”卢志英哈哈大笑回答:“司令尽管放心,我保证你和部队平安无事!”

1936年春节前,卢志英接到红军二、六军团密电,贺龙大军从湘西连续艰苦作战,进入贵州后要到毕节地区休整。

卢志英兴奋地和刘哑佛他们商量:“我们来唱一出现代空城计!”刘哑佛会意地说:“我作为秘书主任全力支持,你这参谋长可以大显身手啦!”

卢志英先让莫雄全家带足供养,到毕节城外风景区去“养病”。莫雄行前委托参谋长代理全部军务。卢志英利用守城正规军63师师长陈光中畏惧红军的心理,卖个交情,把他调到红军不到的地方去防守。又把顽固反共的一支保安大队撤离城郊防线,说是调他们去堵截红军。然后让我地下武装掌握的彝民保安大队接替城郊防务。最后,他派亲自训练起来的直属连

维持城内治安 , 看管反动特务分子 , 全力保护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等。

一切准备舒齐 , 卢志英坐镇没有国民党军队的空城。

1936 年 2 月 9 日 , 贺龙、任弼时、王震率领红军 , 在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 , 唱歌跳舞呼口号的热烈欢迎中顺利进入毕节城。随即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 , 打土豪分田地 , 成立苏维埃政权 , 扩军五千多人。卢志英向贺龙推荐周素园 , 说他是一个读过许多马列著作的老军人。贺龙请王震去拜访 , 请周素园为司令 , 建立了贵州救国军。后来周素园随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陕北 , 成为毛主席的朋友。

二、六军团在毕节休整了两个多星期 , 人强马壮地退出毕节 , 继续长征。同志们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 当年国民党派的专员是莫雄 , 共产党的专员是卢志英 !

厂长——司令——苦力

红军全部北上抗日后 , 卢志英和先期赶赴长征的夫人张育民 , 一起到江西接回寄养在老乡家的双胞胎小儿子容儿 , 回到上海。

张育民看着容儿 , 想起了失落在贵州的大儿子。那次 , 卢志英化妆成商人 , 带着孩子和一小支队伍给地下武装送枪支 , 遭遇国民党搜索队。危急中为救战友 , 卢志英把在张育民怀中啼哭不止的婴儿挂到远处树上。

夫妻俩面对容儿 , 内心伤感。好一会儿 , 丈夫坚强地安慰妻子 : “在长征路上 , 失去孩子的何止你我 ! 革命胜利以后 , 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们的了 ! 我们把容儿好好教育成人吧 !”

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 , 卢志英搜集情报的重点转向日本侵略军。

卢志英设法在日军禁区提篮桥监狱对马路 , 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他当厂长 , 化名周育生 , 和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打起了交道。其间 , 卢志英受组织调派曾两次直接去抗日战场。

他先是到苏南青浦、阳澄湖地区组织游击队 , 和日寇作战。1940 年 , 他化名周至堃 , 到苏北担任新四军的外围武装“联合抗日部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 指挥作战 , 取得不少胜利。

一次 , 日伪 17 000 多人在苏北大扫荡 , 侵占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后 ,

分二路追击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形势危急。卢志英奉命率领“联抗”主力,配合新四军三师主力,在硕家集东西两侧阻击敌军,经激烈战斗后掩护了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事后,陈毅军长称赞说:“周副司令不但是情报专家,而且很会打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部占领上海。

1942年1月,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找卢志英谈话,派他重回上海,以中共秘密党员为核心,独立发展沪京杭情报系统,并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军用物资。组织关系由刘少奇直接掌握。

卢志英接受了新任务,回到上海即通知妻子送“厂长行头”。这几年张育民在上海仍开设诊所,借以采购医药用品交组织送往抗日根据地。容儿成了她的小交通员。

这天下雨,张育民带着丈夫的衣物和容儿一起,按约定来到八仙桥一家小旅馆的房门口。容儿看见一个蓬头的农民伯伯,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老棉袄,坐在床边,正弯腰擦布裤腿上的泥巴。一双湿漉漉的破棉鞋丢在一边,几只老母鸡在竹篮里呱呱叫。容儿和妈妈正发愣,那农民伯伯直起腰,笑呵呵地说:“怎么?育民,不认识我了?容儿长高了,快过来让爸爸仔细瞧瞧!”容儿认出原来是几年没见的父亲!嘴里大声喊着“爸爸!爸爸!”直扑过去。卢志英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一会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卢厂长,神气地走出小旅馆。

卢志英重又活跃在大上海十里洋场。张育民成为掩护卢志英情报系统的“家庭妇女”、厂长太太。

卢志英在原来面包厂的基础上,很快开展新工作。情报系统发展了,军用物资也开始运往苏北。

不久,刘少奇回了延安,卢志英的组织关系改由陈毅、粟裕联系,经常是粟裕。那时粟裕考虑两件大事,一是反清乡斗争,一是加强部队装备。他要制造小口径的迫击炮,卢志英冒着极大风险在上海采购无缝钢管。一天,张育民带容儿经过外白渡桥,只见几个苦力汗流满面,“杭唷、杭唷”地推一辆板车上桥。车上大包大包麻袋,用绳子扎着。苦力们在桥顶歇脚,容儿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个竟是他当厂长的爸爸。他忙拉拉妈妈的衣服,用手指给她看。育民也看到了,就装作很随便地走过去问:“什么东西?怎么要你自己

拉车？”卢志英看她一眼，说一口苏北话，若无其事地：“糖呀，太太，配给的糖，做面包的。”

这天夜里，卢志英开了一辆黑色轿车回家，容儿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卢志英穿上新西装，系了漂亮的领带。他催妻子也打扮起来，戴上首饰，像个阔太太。然后说：“今天一起去郊外玩，你放松，一切由我安排！”

车子开到市区边沿的日军关卡，卢志英拿出证件，又用日语跟哨兵说：“和太太去郊游，下午就回城。”日本哨兵见车子里一位漂亮的阔太太朝他点头微笑，便拉开铁丝网架子，让轿车通过。出了市区，车子加快速度，直朝青浦方向开去。张育民耐不住了：“从昨天到今天，你演的什么戏？怎不告诉我？让我怎么配合？”卢志英哈哈大笑：“暂不告诉你，你才配合得好哇！我们去给栗司令员送礼！”“送礼？什么礼？在哪？”“哈哈，送‘糖’呀！就在你座位底下！无缝钢管，还有最新式的长枪、短枪，怎么样？”

育民如梦方醒，叫起来：“我的妈呀！”

智伏日酋保岛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卢志英回上海后，和日本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慢慢“热络”起来。

保岛算是半个中国通，原是文职官员，主张对中国多搞经济侵略。他十分贪财，又很迷信，但表面上文绉绉，还写毛笔字，供佛烧香。

卢志英在1938年开面包厂时，由原东北军里的同事带着，去求保岛批准。那同事和保岛在东京同过学，知道保岛正为供应犹太难民的口粮伤脑筋，就极力促成此事。他向保岛推荐说，周育生厂长年轻有为，博学多才，毛笔字写得极好，又懂佛法，会看相、卜卦。保岛边听边打量卢志英，见他一表人才，不像那些肥头胖耳、弯腰曲背的商人；又听他日语讲得好，便有了好印象。卢志英送上一方名贵的端砚，保岛不由地高兴起来：“周君，我一直想请人写个斗方，未知你肯否赐给一个？”卢志英也不推辞，当场墨酣笔畅地写了个颜体大“佛”字斗方。保岛喜欢不尽，又提出请卢志英看相。卢志英随口编排，说他武将文相，正值官运亨通之时，大大有福。面包厂就这样顺利批准了。以后，卢志英又见过保岛数次。此番卢志英为要获得日军“清乡”情报，想来还要从保岛那里着手。

卢志英专门去原法租界愉园保岛家拜访。保岛说：“育生老弟，好久没来看我了。听说你回山东老家办厂去了，可发财？”卢志英用日语回答：“司令，真是一言难尽！乡下到处闹游击队，现在越发厉害了，吓得我赶紧收场逃了回来。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还是回来靠司令撑腰！”

“嘿嘿，你也太狠心了些。要赚钱嘛，还是中日提携。你说闹游击队，看到啦？”

“哪里能看得到？让游击队知道我跟司令合作，还不把我宰了？我是茶馆里听来的。呵，司令，对别人我也不敢说，对你么，我说真话。游击队虽然武器差，打起仗来可厉害呢，下乡扫荡的皇军，常给包了饺子。”

“唉！你我难得知己，就该讲真话。我早说过，收服人心还得靠经济，中国这么多人，哪里扫荡得光？”

“呵，司令果然与众不同，你见识高！”

“你以后多来看看我，听到什么尽管来告诉我！你做生意的事，我介绍几个属下给你。”

1943年4月的一天，报载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卢志英想了想，又到保岛家。

保岛正在听广播，一脸沮丧。见到卢志英，他劈头就问街上有什么动静？卢志英说没什么，在讲斯大林格勒。保岛说：“是啊，希特勒打败了……唉，太平洋那边也不妙……”卢志英已明白他的内心，忽然发现了什么似地：“咦，司令，你脸上红痣旁什么时候又长出了一颗黑痣？”保岛惶惑地说：“是呀，我也是上星期才发现，不知主何吉凶！育生，你上次的卜算很准，我这几年一直应验。今天再给我卜算一回吧。”卢志英点头，站起来认真端详，又凝神思索，诚恳地说：“司令，我们结交多年，我若随便敷衍，便不够朋友；若是摆弄江湖术士一套哄你，那更可恶……”保岛忙说：“对呀，你要和我讲真话，别顾虑，你我都是佛门有缘之人，岂能责怪你直言论相！”卢志英坐下说：“既如此，我实话实说。这颗黑痣不是好兆头，它破了福禄之相，好运已尽，要走下坡路了，怕还要累及家人……不过，司令有文人异相，如能及时修行，也能免除血光之灾……”保岛佩服：“育生相术果然神妙！实不相瞒，犬子在太平洋空战中，飞机被击落，他跳伞后生死不明。……唉，我自己近来也神思恍惚，似感大祸将临。……你说及时修行能消灾弭祸，请明以教我！”卢

志英也“唉”了一声说：“当今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尤其中国老百姓，对皇军积恨已深。司令执掌生杀大权，如能及时歇手，不再得罪中国人，也许能给自己留条后路，如能像佛说积些大功德，说不定还能保佑公子生还。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司令以为然否！”保岛感激地连连点头：“你对我推诚相告，不愧至友！最近 61 师团和宪兵大队，会合和平军要在苏中军、政清乡，又是一场生灵大灾难。我当天焚香，祈求菩萨慈悲！”

卢志英回到家里，立即把保岛透露的这一重大情报，送交粟裕，让根据地早作反清乡准备。

1945 年 8 月 12 日，刚刚赶回上海的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张承宗，向卢志英传达华中局指示：苏联对日宣战后，日军即将投降，决定新四军进攻上海等大中城市。要卢志英情报系统抓紧部署，配合接管。卢志英向本系统党组织布置好任务后，立即去找保岛。保岛如热锅上蚂蚁，正在家里团团转，一见卢志英马上说：“育生，你来得正好，帝国崩溃了！外面怎么样？”

“今天是‘八一三’，上海人民快要火山爆发了！到处都在庆祝抗战胜利，很多地方已经贴出‘欢迎新四军’的标语。保岛，我看你留条后路的时机到了！”卢志英这番激昂慷慨的话把保岛惊呆了。他看着卢志英，半晌才吞吞吐吐地问：“你，你，你是谁呀？……”卢志英说：“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奉劝你的话，你如果真的接受，便立即决定向新四军投降，放下武器，交出一切军事设施、武器和物资，听候处理。否则呢？那就准备上军事法庭，谁也帮不了你！”保岛惶惑地站定：“你，你是爱国者！我的朋友？周育生先生，全部投降我没有权，但我愿意交出海军司令部范围内的全部武器、弹药、军用物资，请新四军马上来搬取！周先生，请你美言一句，留我一条生路！”他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手枪，双手交给卢志英，对他深深一鞠躬。卢志英收下枪说：“你能识时务，还有留后路希望。投降的事你得做好准备。新四军明天即派人来你的司令部收缴武器、物资。新四军的俘虏政策是缴枪不杀，你好自为之吧！”

第二天，卢志英让市郊游击队、各个地下交通站同志到吴淞日本海军司令部搬运一切可以搬运的武器、军事物资，从水陆两路运往根据地。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改变新四军攻击大中城市的计划，停止

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此时,保岛交出的最后一批物资,也已经起运了。保岛目送满载军用物资的机帆船远去,独自在码头上反省:我如能有有生之年,将一辈子钦佩周育生这样的爱国者。

据说,八十年代,头发全白了的保岛,曾到雨花台卢志英烈士墓前致敬。

“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抗日战争胜利了。卢志英忙过好一阵子。

一天,容儿要求去玩一次法国公园。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事情。虽然离家很近,却从来没有进去过。爸爸妈妈答应了。他们先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家欢,又买了一包烤红薯准备野餐。容儿失望地说:“怎么今天还吃烤红薯?”爸爸笑着说:“容儿可不能瞧不起红薯呀,它是你爸爸妈妈在北京时候的好朋友!”妈妈接着给他讲了一段故事:“有一个北京冬夜,大风大雪。你爸爸还没回家。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了,妈妈一天没吃东西,又冷又饿又担心你爸爸的安全。忽然一阵尖厉的寒风,房门打开,你爸只穿一件旧夹袍(他把棉袍送给刚出狱有病的朋友了),怀里揣着一包烤红薯回来了,嘴里说:‘育民,你饿坏了吧?快来共进晚餐!’我们那顿难忘的晚餐,又香又甜又暖和……”容儿眨巴着眼睛说:“你们那时候穷,可现在,爸爸当了厂长,鬼子又赶出去了。”卢志英拍拍儿子的头:“厂里的钱也不是爸爸的,哪能随便花?小孩子从小要学会过苦日子。抗战虽然胜利了,很多老百姓还没有翻身。等全国解放后,孩子们就幸福了!”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解放军急需反动派的情报。1947年春,卢志英的情报系统已发展到沪、京、杭、武汉、台湾等城市,共有八个情报小组。在白色恐怖下,战斗更尖锐紧张了。就在这个时候,党内出了叛徒。张莲舫从生活上腐化堕落发展到政治上叛变,被中统特务收买,出卖了卢志英和上海的情报组。3月1日和2日,卢志英在马路上,张育民和容儿在家里,以及地下党员、情报员多人先后被捕。

卢志英在八仙桥被前后七个特务挟持,推进“出租汽车”,关到亚尔培路二号中统办事处。特务头子先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劝卢志英“合作”,许他上海市警察局长的位子,一大堆黄灿灿的金子,随他挑拣的房子,最新式的美国车子,还有随便要的女子。只要他交出全部情报组织和上级

领导，“五子登科”马上实现。卢志英义正词严，痛斥国民党发动内战，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人民，决没有好下场，他说：“想用利诱办法收买我，你们看错了人！”这时候，蒋介石得知他的老对手卢志英被捉住，大喜，立即重奖中统上海办事处四百两黄金，又责成彻底肃清卢系情报网。于是中统特务露出狰狞面目，立即对卢志英连续刑讯。他们动用了古今中外各种酷刑，鞭子抽，脚头敲，钳子夹，烙铁烙……卢志英浑身创伤，灌辣椒水呛出鲜血；上老虎凳加到七块砖头；强光下“疲劳轰炸”二十四小时；上电椅几次昏死……整整一个星期，强壮的卢志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顽强忍受，不哼一声，坚贞不屈。

敌人要的口供一个字也没得到，他们又自作聪明，把卢志英挂上手铐脚镣，押到苏州，同张育民、容儿关在一起。

卢志英立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当安排他和张育民见面时，他拖着受伤骨折的腿，振作精神，双足一并，向张育民行个军礼说：“张育民同志，你来看我了，敌人面前不能掉泪呀！你还记得当年蒲城之事吧？蒲城之事是个开端，今日之事也许就是个结尾！敌人在我拒绝了利诱，顶住了酷刑以后，又想利用我们夫妻、父子之情来软化我。但是你知道，我卢志英绝不会为儿女之情而爱惜自己一颗头颅！反动派不会懂得，人类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这种感情建筑在崇高的理想之上，这种感情促使人们为了理想，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张育民满眶热泪被制止了。她扶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伤痕，坚决而又深情地说：“志英，我理解你！我牢记你写给我的‘坚强’两字！孩子我带好，你放心！为保护孩子，我要争取无罪释放，再想法救你！”

张育民一身农妇打扮，一开始就咬定自己不识字，只会做家务，什么也不懂。敌人关了她一年，只好把她和容儿放了。容儿和爸爸一起坐牢半年，学了许多文化知识和做人道理，终身不忘。上海解放后，他用本名卢大容写了一本《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

敌人的“软化”策略也失败后，便把卢志英押赴南京，再进行一轮残酷刑讯。又由特务头子找他谈话。卢志英冷笑说：“告诉你们的蒋委员长，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点什么，休想！”

最后，卢志英被关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听候蒋介石发落。

这个牢房的墙上,前人留下一个茶杯口大的小洞,可以和隔壁牢房相通。1948年11月下旬,反动派内战失利,又大肆逮捕革命人民。隔墙女牢房关进一批女大学生,也有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卢志英从墙洞里鼓励她们坚定信心,迎接解放。还教她们唱革命歌曲,弄到什么报刊也传给她们。浦熙修通宵咳嗽,卢志英把张育民设法送进监狱的鱼肝油从墙洞里送给她吃,要她尽可能养好身体,继续革命。全国解放后,浦熙修和一位姓孙的女大学生都写了文章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政治犯”。

淮海战役打响后,我军节节胜利,卢志英知道新中国快要诞生了。深知蒋介石为人的卢志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1948年12月18日,张育民从上海赶到南京探望丈夫,管监狱的不让见,只传出一件张育民在苏州留给丈夫的皮大衣。她回到住处检查大衣,在领子里找到卢志英在狱里写的四首诗,和“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张育民哭倒在地。张育民把卢志英的遗书珍藏到全国解放后,交给组织。

1948年12月27日,蒋介石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悍然下命令杀害卢志英和上海《文萃》杂志的陈子涛、骆何民。当夜,刽子手任宗炳灭绝人性地把三位烈士先后麻醉,装进木匣,活埋在雨花台一座小山上。

中国革命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英雄卢志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犹如一座血色丰碑,矗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成为人们永远学习的榜样!(1999年发表于《上海英烈故事》)

沐新千年阳光 探神仙居幽深

2000年我国大陆受到第一道阳光照耀的地方,是浙江台州市温岭石塘镇。众多新闻记者和旅游者赶在元旦之晨,到石塘镇沐浴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迎罢曙光,顺道看台州水山风物,自是合乎天理人情之举。近年来开发的有被誉为江南八达岭的临海古城墙,有可与温州楠溪江比美的仙居永安溪竹筏漂流,号称中华一绝的椒江吴子熊玻璃雕刻,有广泛收集古今算盘、中外奇石的民间博物馆,更有誉满江南、香飘四海的黄岩蜜桔林等等。走马看花,一星期也不算多。若是利用三两天假日前往,有两个地方不可不

到。一处是新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最佳项目奖的温岭长屿硐天。这是一座历经一千五百多年开采的石矿遗址,形成硐套硐、硐叠硐、硐硐串联的石硐群。现在硐中已经架起石桥,筑起石栏,便于攀登,硐内还可驾舟游溪,井底观天,草地赏花,沿廊参观古老石器……

另一个绝妙去处,是个原始景区,叫神仙居。神仙居在浙江省东南括苍山脉中段,属台州市仙居县。历史上并不出名,也因此,这块处女地才得以保留完好至今。清代翰林院编修潘耒探山后写书说:“天台幽深,雁荡奇崛,仙居兼而有之。”此话很是中肯,“比较学”到家。天台山主要名胜,曲径通幽,石梁飞瀑,蔚为奇观;雁荡山奇峰罗立,移步换形,白天游山不爬山,夜晚看山朦胧美。两名山的优势特点,神仙居里应有尽有。

在神仙居也可以游山不爬山,走路看景也不累。去年开发时,新铺鹅卵石山径数千米,平坦整齐,逶迤前进,引导游客沿溪渐入幽深。路径一片奇特的天然杉树林,一式连理杉树,同根同株,长到一米光景,分为两叉,再往上长形成双杆,相依相傍,枝叶苍翠,并肩挺立伸向半空。当地山民说:一杆稍粗是雄的,一杆细些是雌的。怪不得得名“情侣林”。年轻旅游者特别喜欢这片杉树林,它使人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过了情侣林,继续往前,山势突然收缩,缘溪行,浓荫遍地,人们欣喜地看到,左边丛山中一崖顶挂下一条白练。往左拐,跨过山涧“石礅桥”,山路上升,谷底溪水淙淙。从小径下到岩底清水潭边,抬头仰望,却不见了瀑布,三面弧形丹霞岩壁湿漉漉,冷雾袭人,原来已置身于一个上窄下宽的半圆锥体底部。这是个火山口?对!不过,这只是个不典型的火山口。到此,人们只走进神仙居的1/4光景,远未登堂入室呢,完整的火山口还藏在重峦叠嶂的深处。年轻人往深处游还可以看到大小数十处瀑布,其中终年不断的飞天瀑从西罨山主峰悬崖间凌空下泻,高达百余米,气势非凡。

神仙居深处,山更美,瀑更伟,洞更奇,境更幽,那才是神仙居住的“仙境”,可惜初探者没福享受了。且待春暖花开的他日再深探拜访神仙们吧!

(2000年1月25日)

从“八办”到延安

最近有机会参加全国新闻记协会组织的延安西安学习采访活动,见闻不少,随手写下一些。

就从西安出发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当天上午,我们专程参观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旧址。这是因为,人们亲热地称作“八办”的这个地方,当年被公认是“延安的桥头堡”,从这里架设通往延安的金桥。人们愿意重温这段历史,唤醒这段激情。果然,一进旧址纪念馆,大家很快围住了一位头顶上有玻璃球那么大圆形凹痕的老同志,问长问短,就像当年青年们见到他时那样。这位老同志名叫谭冰,是老红军,长征中敌人给他留下这个触目惊心的伤疤。他原是老“八办”工作人员,现任纪念馆馆长。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西安七贤庄一号,从1937年9月。到1946年9月,整整屹立了九年。它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象征,又是千万人通往延安的大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从这里出入延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史沫特莱、柯棣华、巴苏等也从这里去延安。而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他们像无数条小溪,从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汇集到西安“八办”,然后流向日夜向往的延河。

在旧址的陈列室里,有两件展品今天特别受人注意。一件是一份统计表,记录着从1938年5月到8月,经“八办”去延安的青年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其中十分之三是女青年。也就是说,大致上平均每月有五六百人。这真是振奋人心的数字!在那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团结在自己周围。另一件展品是当年去延安的路线图。由于国民党政府十分害怕从“八办”到延安的这条八百里通道,竟在洛川以南的国统区设立了草滩、高庄、永乐店、咸阳、跃县、铜川、龙首、洛川等十五道关卡。奔赴延安的爱国革命志士们,从西安开

始,先要经受住重重磨难,才能进入边区第一站,然后克服山区崎岖地形的困难,最后到达革命圣地。据纪念馆当时去延安的同志说,最顺利到达目的地的人,也得花十几天工夫!

参观“八办”,使我们对延安有了初步的了解,更多的渴望。

17日下午三时许,我们登上了614加班机飞往延安。当班机在广阔的祖国天空里翱翔的时候,我俯瞰关中平原,深深庆幸着那里再也不会重重关卡和桎梏。而当我远眺陕北高原时,不由心潮翻腾,在那光秃秃的黄土山沟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为把这笔巨大的财富拿到手,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还需要作出多么艰苦的奋斗呵!(1982年7月31日)

来到了南泥湾

“没到南泥湾,延安来一半。”这话不假。

当年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保卫延安的同时,到南泥湾开荒垦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陕北江南”的奇迹。南泥湾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活标本,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后南泥湾几经变迁,现在怎么样了?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华里。“过了盘龙山,就到南泥湾。”果然,汽车在山上盘旋了足有二十多公里,下山后不久,就看到一望无际的香紫苏地。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好似彩霞铺地。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国营南泥湾农场。

在阳湾场部,农场的主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且请来了当年三五九旅九团三营九连的副连长罗宝斋。老人家今年八十六岁,身穿一件白布对襟衫,精神矍铄,头发胡子都不怎么白。老人记忆力强,清楚地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经历。他在1937年从河南家乡来到陕北投身抗日部队,1938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跟着王震旅长打了无数胜仗,1940年又到南泥湾屯垦。他们九团就驻在九龙泉。抗战胜利后,三五九旅南下,他由于年龄比较大,留守在地方上,解放后一直是土改、合作化的骨干,先后担任过南泥湾合作社社长、南泥湾大队支部书记。可是十年内乱中,他这位老八路竟被“罢了权”。现在,他年事已高,成了南泥湾公社南泥湾大队南泥湾小队受尊敬的社员,

和老伴一起生活 ,安度晚年。

“老人家 ,你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我听说有关部门给他二十五元一月生活费 ,担心他不够花。却不料他捻着胡子 ,呵呵地笑了起来 ,诙谐地对我说 :“困难嘛 ,我不怕它 ! 我不怕困难 ,克服它 ,还有什么困难呢 ? 没有了 !”

老人家的话博得了大家热烈鼓掌。从他对待困难的乐观态度中 ,人们感受到南泥湾精神的分量 !

罗宝斋老连长当年的驻地九龙泉 ,有毛主席爱喝的清泉吸引着我们。这里没有黄土沟 ,一路上只见树木葱茏 ,啄木鸟对对飞过。青翠如画的群山分列两旁 ,中间是一片绵延十余里的川地。茁壮的水稻 ,绿油油的 ,生气勃勃 ,竟像长在上海郊区一般。不时看到一群群黄牛在山脚边悠闲地吃草 ;黑白相间的山羊常在汽车旁跑过。更令人惊奇的是 ,还有鸭群在水塘里嬉游。这些 ,不正是当年南泥湾景色的重现吗 ? “陕北江南”名不虚传 !

谁是南泥湾奇迹的继承人呢 ? 呀 ,请看那红帽徽、红领章 ,那窑洞、那营房 ! 当地同志告诉我们 :三五九旅回来了 ! 是三五九旅的第三代回到南泥湾接班来了 !

离开九龙泉的时候 ,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就在九龙泉不远处 ,出现一座当年九团烈士纪念碑。牺牲者的姓名从政委开始长长一大串 ,使人看了就心里难过 ! 毛主席、贺老总都给他们题了词。毛主席赞扬他们 :“热爱人民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为人民服务这正是南泥湾精神的核心。先指引着老一辈三五九旅战士冲锋陷阵 ,创造奇迹 ,也指引着新一代人民战士继承光荣革命传统 ,为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

(1982 年 8 月 1 日)

宾馆与窑洞

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们到延安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忙着住新房。热情的主人——《延安报》的同志把我们接到崭新的延安宾馆 ,并且快活地宣布 :“宾馆新建主楼今天开张 ,你们是第一批客人 !”

这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层楼现代化建筑 ,坐落在凤凰山麓 ,面对清凉山。闻名

世界的宝塔山屹立在它的右前方。宾馆主楼和对称的南北两楼并肩相连，一字排开，相当有气派。南楼原是凤凰饭店，因和毛主席旧居近邻而著称。延安宾馆正是在它的旁边扩建起来的，拥有四百五十个床位和其他设施。

由于我是同行中唯一的女同志，受到优待，分配给我单独一组套间，就在三楼的尽头。服务员给我打开房门，我进去一看，几乎怀疑自己回到了上海，置身在某大饭店的套间里，而眼前那幽静的环境，悦目的山景，却又是上海所没有的。从这一套现代化住房，我看到了延安的一角，她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她的文化和人才。延安呀延安，你这革命的圣地，现在又迈开了四化的坚定步伐，我为你由衷高兴！不过，我是来学习、采访的，怎能安心住进这么富丽的房间呢？就在昨天，我还在想象住窑洞的特殊滋味呐！于是，在征得主人的同意下，我搬到了三人一间的新客房里。说实在，那也够美的啦：明亮安静，设备齐全！

当然，延安宾馆代表的是今日延安居住条件的高水平，象征着延安人民对中外来宾的友谊。延安的人民，大多数仍住在那种穹形窑洞里。连日来，我们游南走北，翻山越沟，到处见到成排的职工宿舍，而更多的却是窑洞。山上山下正在兴建的窑洞，一般三孔到五孔相连，有不少是成排双层窑。建窑材料，采用石头、砖头，也有全部用黄泥的。不管哪一种窑洞，门窗上总是色彩鲜艳，装饰着各式各样镂空花格，窑顶墙檐上也常常用青砖叠出非常美观的图案，有菱形，有灯形，有镂空，有凹凸。真像工艺美术品一般，使人看了流连忘返。

我们还到好几户老乡家看过窑洞。多数是“单间”，也有双孔相通的“套间”。在清凉山，还趣地看到一孔“半腰洞”套在正洞旁，好像上海楼梯边的亭子间。多数窑洞内刷得雪白，洁净凉爽；有炕，利用烧灶余热一年四季烘着，也有砌了火墙的。

总之，古老的窑洞如今也有了新发展。而这，大都是近年来的事。延安地委一位同志介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延安地区新建了二十多万孔居民住宅，大多数是窑洞，延安人民普遍认为窑洞冬暖夏凉，坚固耐用，造价低廉，是个宝贝。市郊柳林大队同志讲他们全队一千多名社员，新箍了九百多孔窑，平均每人生活用屋十八平方米。那些窑三分之一是队里建造的，其余都是社员自己箍的，每孔窑花七百元左右足够。

在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下,延安人民的居住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延安居民的普通用房还不算宽裕,还有待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加以提高。
(1982年8月2日)

延安——上海

上海地处东南沿海,延安居于陕北高原,相距数千公里,看起来两地关系不大。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使这两座英雄的城市亲如姊妹,我深知上海人民热爱延安,也体会到了延安人民对上海的深厚友情。

来到延安的人,都急着瞻仰许多革命旧址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居住过的地方。我也不例外。我们住的地方和凤凰山革命旧址是近邻。一天傍午,我一个人走进院子去,想先睹为快。走到毛主席旧居前,看见大门已锁上,从通告上才知道开放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我正要退回,从左边门里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看见我就迎上来问:“想参观吗?哪里来的?”

“上海来的。开放时间过了,我下午再来!”我不无遗憾地说。

“喔,是上海来的。不要紧,我陪你看!”她热情地说。我出乎意外,连忙推辞,可她已经拿出钥匙,重新打开门,竟饿着肚子,陪着我一个人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交谈中,知道她姓钱,是个地道的延安娃。这次参观,我不仅受到革命传统教育,也为延安青年对上海人民的诚挚情意所深深打动。

又有一次,傍晚我路过延安市百货第七商店,看看快要打烊,顾客已散去,便走进店堂了解一下有哪些上海货,顾客意见怎样。商店领导和营业员们听说我是上海人,立刻让我逐个柜台观看,一个个热情地告诉我:日用皂、牙膏、洗发膏、口琴、三角尺、英雄两用笔、电子计算器、自行车、煤油炉子等等都受欢迎,但对好些商品如电池、洗衣粉等经常脱销,英雄蓝黑墨水太淡,有意见……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讲得多了,我已记不清,觉得应该写下来。偏巧随身没带本子,急中生智,拿出一个分币,买张普通信纸。谁知营业员认为记者应该写好一点的稿纸,两个人又找又挑选,定要给我好几张最好的稿纸,大家不顾打烊,又从头给我说了一遍。在他们的热情反映下,我竟记了满满三

大张,已请报社同志转给商业部门。延安人民喜爱上海货,是对上海工人阶级的鼓励,但我认为也是鞭策我们精益求精,改进缺点,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轻纺产品,来满足广大人民需要。

我们在延安逗留时间很短,可是像上面这样的例子决不是个别的。《延安报》同志无微不至的照料、协助不用说了。一次在桥儿沟和一位延安婆姨陌路相逢,她听说我从上海来,立刻让进窑洞,请坐送茶,谈开了家常。有一回我偶然走到一位延安女工的窑洞里,她马上给上海客人调了浓浓的糖开水,又拿出珍藏的北京糖果,说是定要尝尝。糖果甜在嘴里,延安人民对上海人民的感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1982年8月6日)

杜甫和延安

在延安的日子里,我们饶有兴趣地找到了“少陵川”和“少陵祠”,听到了杜甫到延安的动人传说。

唐玄宗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杜甫移全家避难,从离长安比较近的白水县,北迁到鄜州三川县羌村,也就是现在延安地区富县三川泽地方。他们住在窑洞里,与淳朴的陕北老乡为邻。诗人在《北征》《羌村三首》以及《述怀》《月夜》《彭衙行》等名篇中,记述和描绘了自己经历的艰险穷困生活和亲眼所见人民的深重苦难,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意见。杜甫认为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只要自己的军队调度适宜利用有利地形,就有充分的力量收复中原,而肃宗一味向外族求援,会惹出无穷后患。他有一首特别受到白居易推崇的五言乐府,叫《塞芦子》,其中写到“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明确地反映了杜甫的策略思想和他对延州的希望。他主张乘叛乱者重兵远去太原,崤函空虚,急调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子关而入,出奇兵直捣长安,收复中原和都城。

唐朝时,延安叫延州,下有五城,其一即为芦子关。据延安同志告诉我们,芦子关就在延安市北面,当年张思德同志烧炭的安塞县。传说杜甫为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曾亲自到延州,北上芦子关考察;另一说他要出芦子关,

是为了到灵武去找李亨。杜甫从羌村出发,带了个小僮,骑了匹毛驴一路往北,翻山越岭,经现在延安地区的富县、甘泉县、大劳山区,沿着一条小川,来到延安市南郊七里铺。由于天色已晚,便在一处山崖下露宿。第二天才到延安,再北上芦子关。后人就把那条长达几十里的引路小川以杜甫命名。据说原来有范仲淹书写的“杜甫川”大字石刻,年久湮没了。我们这次在七里铺居民住宅间的山壁上,找到了西粤陈炳琳写的“少陵川”三个斗大的石刻字。可惜年代与宫衔已模糊不可辨认。少陵川,就是在宝塔山下与延河会合的南川河上游。

在“少陵川”石刻南面不远,我们在当地同志指引下,终于找到了传闻已久的“少陵祠”——唐左拾遗杜公祠。祠前已搭建起一家公社小工场,在工场里仔细察看,才发现祠门是座不高的石拱门,两旁有副石刻对联,上联“清辉近接鄜州月”;下联“壮策长雄芦子关”。也是那位西粤人的手笔。走进祠门,经过一个小院子,便是傍崖建成的杜公祠正殿,殿顶天花板上雕刻了太极图,石柱上也刻了几副对联,有的已经残缺。相传这里正是当年杜甫露宿的地方,可惜由于这里也做了车间,看不到浪漫主义的“崖下醉卧”遗迹了。出殿时,我才看到殿前檐下还有个石刻横匾“北征遗范”:同时清晰可见“道光丁未春月”字样。这匾不知是清朝人后来刻的,还是这祠本身就是道光年间修建的,我们无暇考证,只能留待有志者了。

(1982年9月2日)

嘉岭山与范仲淹

来到延安的人,总爱登攀宝塔山。宝塔山居于延安市东南,和清凉山隔延河对峙,与凤凰山越南川河相望。两河正好在它的山脚下会合,山上的九层砖塔,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它与延河大桥组合的典型画面,成了延安的象征,人们已经十分熟悉了。可你是否知道这座以延安宝塔闻名世界的山,却另有大名?登山的人来到南川河宝塔桥畔,老远就可以看到范仲淹气势雄伟、笔力遒劲的“嘉岭山”三个大字,凿刻在山脚巨岩上,掩隐在苍翠的树木间。

“是范仲淹的真迹吗?”我有点将信将疑,逢到内行便问。

“肯定是的,没错!”

“是范仲淹真迹,查过。”

回答的同志异口同声。谈话中我发现,他们对范仲淹这位北宋军事家、政治家兼文学家相当熟悉。有的人还热情给我介绍:“嘉岭山上有嘉岭书院旧址。”“清凉山上刻有范仲淹写延安的诗。”这使我懂得:延安人民喜爱范仲淹,不仅因为他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合乎延安精神,而且还由于他爱延安。

范仲淹曾于公元1040年五十一岁时,担任过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安知府,掌管军政大权达四年之久,牢固地守卫了西北边防,民歌赞颂他的威名使敌军“闻之惊破胆”。他的对手西夏军也称他“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留下的词作并不多,而那首人们传诵近千年的《渔家傲》正是在西北军中写的,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古延安地区独特的慷慨悲壮的战时秋色图,也使我们感受到他先国后家和同情战士的胸怀。

在清凉山我们果然找到几首范仲淹吟咏延安的诗。在一首赞美柳湖的诗中,他写道:“种柳穿湖石,延安胜可游。远怀忘泽国,真赏即瀛洲。”范仲淹是江苏苏州人,看惯了太湖烟波,西湖亭榭。当年延安的柳湖,竟使他觉得可与江南家乡湖光水色比美。如果没有对延安的一片深情,怎么写得出来呢?在另一首登临清凉山诗中,诗人更自豪地颂扬延安“延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

原来,延安在1937年1月我们党中央进驻设市之前,是由两个城组成的,所以又称双城。历史上延河左岸清凉山一带属肤施县,右岸凤凰山一带为延安县(府、州、郡)。我们在凤凰山上还看到一道旧城墙的遗迹,北关延安宾馆前面也有一堵残存的城墙根。而今双城虽已不存在,但是延河两岸生气勃勃,延安革命精神正在继承和发扬,“英雄城”的美名比之范仲淹时代更有了崭新的内容了。

(1982年9月6日)

洛川塬上行

旅行车吃力地绕着一个又一个S,爬上海拔一千几百米的高山之巅。坐在车子右边第一个位置的我,顿时觉得视野宽广,崇山峻岭转眼消失,蓝

天白云下,四周出现一片平原景色:电线杆纵横,黄泥路交错,楼房与农舍掩隐在绿树间,平坦的柏油公路一直伸向远方,两旁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里玉米和谷子长势喜人……

“这里还是山顶上吗?”没有到过陕北的南方人不由心里疑惑。仿佛是回答这一疑问,公路旁的平地忽然露出一个“大缺口”,眼见万丈深壑就在脚下,令人目眩心颤。

“我们到了洛川塬上,属延安地区的。”车上一位老延安向大家介绍。

塬,我想起来了,它是黄土高原的一种特殊地貌。流水长期侵蚀厚厚的黄土堆积层,像小孩子手抓奶油大蛋糕那样,把它分割成塬、梁、峁、沟、壑。塬,就是流水切割剩下的最大一块“奶油蛋糕”了。

那么,这洛川塬究竟有多大呢?我留心了一下汽车计程表,嗨,二十多公里过去了,它还远没有到头的迹象。

“前面有洛川会议旧址,停车看看吧!”谁在建议。著名的洛川会议原来是在“高山顶”上举行的!大家高兴地响应。下了车,走到公路旁一条黄泥路上,经过居民们正在挑水、洗东西的水塘,一直往东,进入一个清洁、安静的院子。

两位管理员热心地领我们来到左面另一个小院子里。迎面朝南两孔窑洞,洞前向日葵已结了花盘。右面窑洞作寝室,左面就是会议室了。1937年8月22到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正确地估计了“七七”事变后的形势,确定了党的任务,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两孔窑和窑内家具都是当年留下的实物。”管理员特别提醒我们。确实,我们在延安市瞻仰的革命遗址,大多是被胡宗南毁掉后重新复制起来的。可这里怎么能保留住实物呢?管理员解释说:“这里原名冯家村,属洛川县,当时是国民党占领区。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党中央在这里开过会!”

原来如此。我们细看那会场,除了窑中间用各种木桌拼成一个大会议桌模样,桌四周摆着各式椅子、凳子以外,别无长物。面对这一简陋的会议室,我们不由又一次深深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身居陋室,心怀真理,出生入死,矢志不移。他们用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指引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而今,党中央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也必将

指引我们胜利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离开洛川会议旧址，汽车继续在塬上行驶，不久，经过洛川县城。我怀着新奇感觉，飞快地观察那个塬上之城。看见有家春宵饭店，街上人来人往，跟平原地区城厢一样热闹；另一边路旁，老人们带着孩子正悠然自得地在水果摊上买西瓜……

(1982年9月10日)

花原头访牡丹

牡丹花是我国的特产。最早的牡丹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就记载有“延安红”品种。延安有牡丹，她在哪里？

一次有同志谈到，延安地区宜川、安塞都产牡丹。延安市本身东有牡丹川，南有牡丹山。特别是花原头的牡丹山，春末夏初漫山牡丹盛开，锦绣遍地，好看极了！这一意外的发现吸引了我们。7月27日一早，我们驱车到三十里外的花原头，去寻访“延安红”。

出市区沿少陵川南行，山路崎岖，约莫一个小时，来到了花原头植物管理处。那是一排色彩鲜艳的窑洞，坐落在传说中花木兰墓葬的花家陵山麓，少陵川西岸。昨天刚下过雨，少陵川流水潺潺。热情的主人老杨，陪我们跨过川上带栏杆的便桥，来到一座苍翠欲滴的半圆形小山前。穿过黄金盏花地，绕过六角牡丹亭，便拾级登山。蜿蜒的山路两旁，只见无数翠柏和色彩缤纷的不知名花草。

“这金红颜色的就是山丹丹，又叫野百合花，这黄的叫剪子花，结的果实小而甜，有柚子味，这绿的是独梢草，山区人拿它做扫帚……”六十四岁的老花工张伯伯，随时给我们介绍看到的花草。

“牡丹山上怎么尽是其他花草呢？”我问。

“呵呵，这里也叫百花山、万花山嘛！别急，上了山，牡丹独多，有三万多株哩！每年五月一开就是几千株，满山红的、白的、紫的、黄的大花朵开在绿树、绿叶间，可热闹啦！”

一路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累。不一会我们来到一个山坡上，停在一道围墙前。

“看，这就是牡丹。可惜你们来晚了，她已经结籽罗。”管理处老杨指着一米多高的花丛，给大家介绍。我们一面想象着前些日子满山牡丹怒放的繁华景象，一面仔细观察那绿色小灌木，只见一个个栗色饱满的硬壳，有五个尖角，活像五角星！这时，张伯伯从衣兜里摸出一粒玉米那样的东西递给我，解释说：“这就是壳里的牡丹花籽，现在还没有长老，颜色还嫩。”我高兴地珍藏起来。

“山上这么多牡丹，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我曾听说万花山的牡丹是野生的，可牡丹很娇贵，不比南方杜鹃花。她真能野生吗？

“我们进去看看，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主人像卖关子似的，微笑着指指围墙里面。

呀，原来墙内是个小院子，对着大门有两孔新窑洞，朱红门、绿窗棂，土得可爱，洞前还有走廊石阶、披檐画栋。院子里有块明代延安府知府李延寿刻的牡丹诗碑。据他记载，当年这里有个崔府君庙，祀奉前人传说里的唐朝县令崔子玉，庙前后盛产牡丹，“娜娜盈盈，芳馨袭人”。

是那位崔府君种的牡丹吗？不！花原头人民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原来，那两孔窑洞里各有一组彩色壁画。右洞里记述杜甫沿少陵川北上去延安时，曾在这里赏牡丹。左洞里描绘四姐种牡丹的故事。王母娘娘四女儿偷偷下凡，嫁给勤劳正直的樵夫崔子玉，她带来天上牡丹良种，夫妇俩精心培育，以此为生。不料恶霸王半城看到牡丹好花便要抢四姐，叫爪牙抓了崔子玉，还打翻崔母。四姐十分气愤，忙上天请来天兵天将，在延安城外激战，打垮了王半城。从此一家三口团圆，年年种牡丹，种出了一座牡丹山……

我们带着万花山的美好印象，记着四姐种牡丹的美丽神话，愉快地下山。这时候，又听说当年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曾连续两个春天，从延安骑马到花原头观赏牡丹。这段战争年代“走马看花”的佳话使我们的情绪更高了。

（1982年9月12日）

桥陵祭祖

我站在桥山之巅，向着黄帝陵墓，恭恭敬敬地按下照相机快门。这座古

墓高丈余,直径四丈多,草木葱茏,四周砌有镂空矮砖墙,呈八角形;正面碑刻“桥山龙驭”,出自明人唐铎手笔。陵前红柱祭亭正中,赭质驮着黑色鱼龙石碑,碑上刻“黄帝陵”三个金色大字,是郭沫若同志在1958年写的。祭亭对面还有一座三四丈高的土丘,传说当年汉武帝祭桥陵曾筑有祭台,故称“汉武仙台”。登上“仙台”,只见桥山高峻,沮水环绕,白云朵朵,翠柏森森,令人不由不萌发思古之情。

虽然,对于这位受尊敬的轩辕黄帝,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凿的科学证明,但是古籍的描绘,民间的传说,使他千百年来活在了人们的心里。

传说中的黄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领。他生在四千多年前的山东寿丘,复姓公孙后改姓姬,名轩辕,号有熊。黄帝是后人对他的尊称。黄帝不畏强暴,先后打败了扰乱各部落安宁的烈山和蚩尤,他团结人民,被拥戴为部落联盟的领袖,他辛勤劳动在黄河流域种地养蚕,发展农副业生产,他还富有创造精神,在他领导下发明了舟车,文字、算数、音律、医学,又制订了住房、服装的制度等等,倡导古文明生活。这位古代人民理想的英雄,伟大的人物,传说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他在位一百年,死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桥山(在现今延安地区黄陵县城北一里处)。汉代立庙,世称桥陵。

不过,我们现在在桥山顶上看到的桥陵,据记载为公元972年时宋太祖赵匡胤所建,是个衣冠冢,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曾多次修葺,并植树造林。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拨款大力整修,专门管理。1961年,国务院公布这座庄严古朴的千年桥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作古墓葬第一号。多少年来,它吸引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从天山南北,大江两岸,域内海外,不远千万里,前来瞻仰。

来到黄陵的人,在老远的路上,就会先看到郁郁苍苍的桥山;及至进入山里,面对上万株青翠古柏——据说最多时有三万多株,人们怎能不叹为观止呢!这些古柏的树龄从数百年到上千年都有。桥山东麓有个轩辕庙,庙里保存了四十七块古碑,最早的一块是宋仁宗的护林碑。这块近千年的石碑,反映了一点桥山自古就植树的情景。还有一块元代张三丰的诗碑,记述他在至正庚子仲夏拜谒黄帝陵的感受。那首七律一开头就写:“披云履水谒桥陵,翠柏烟寒玉露轻。”这位张三丰自称“樵溪幕左道人”,是元末明初一位饱学多才、云游四方的奇人,他的诗句也印证桥山翠柏早在六百多年前已

经成林出名了。

说到古柏 ,还有个插曲。轩辕庙里有一株传说为黄帝手植的“轩辕柏” ,六层楼那么高 ,枝叶繁茂 ,生机勃勃。民谚形容它树干粗壮“七搂八拃半” ,七个人合抱还多了“八拃半”。1965 年曾测得它下围三丈一尺 ,中围一丈九尺。正好我们同行中有人带了卷尺 ,大家兴致勃勃地一量 ,嗨 ,接近地面处树围十一点六米 ,一人高处有八米。大伙顿时议论纷纷 :“十七年长了这么多?”“量的部位不一样!”“千年古柏返老还童 ,成了绿化先进!”……

“绿化先进” ,这美称桥陵当得起。绿化与精神文明关系密切 ,我不由联想到庙里“文明之祖”的碑刻。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古代文明之祖 ,那么中华民族的现代子孙 ,就应当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创造者了。

(1982 年 9 月 15 日)

将军画竹

离开革命圣地延安已经好几个星期 ,我的“散记”也到了应该打住的时候了。然而还有一段老延安的情谊 ,忍不住要报告一下。

老延安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同志的一片热忱。我常常从收到的珍贵礼物中体会他们的深情厚谊。那些礼物真是花色繁多 :有老红军念念不忘的一份“烈士英名录” ,有老鲁艺故地重游的两张留影 ,有老八路专门采给的几朵大红花 ,还有延安市长一再叮咛带回上海的一个“干烙”——因为它是延安人民喜爱的传统食品……

一件礼物一番心意。这里单讲一幅国画的故事。那是回上海后不久的一天 ,我收到一个特大的信封 ,拆开来一看 ,里面有幅墨竹 ,画上盖着两方朱印 :白文是“七十后学”四字 ,朱文为“贺晋年”。原来这幅上下款齐全 ,题为《雪竹图》的新作 ,是贺老将军送给我的。我欣赏着那大雪纷飞中节劲叶茂 ,新老相傍 ,挺然而立的竹子 ,不由回想起七月中旬的那个周末。

我们刚到延安的当天晚上 ,听说有位老红军正在延安 ,年逾古稀 ,天天练画。于是 ,大家相约去看老红军画画。来到宾馆一套客房里 ,只见灯火通明 ,墙上钉的 ,桌上摊的 ,都是墨竹 ,有趣的是竹叶都特别肥壮。一位脸色红

润、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挥舞画笔专心作画,画的还是竹子。原来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贺晋年。不一会,老将军画完最后一笔,题上“幽幽清风”。

“贺老,好些画家爱画瘦竹,您的竹子与众不同,可有什么讲究?”我忍不住问。“对了!我与郑板桥相反。他是古代文人,文人竹清瘦,我可是解放军战士,丘八画竹……”贺老风趣地回答,和我们一起坐了下来。

“您画的是茁壮的将军竹!”有人补充说。大家无拘束地和他聊开了。

贺晋年同志是延安地区子长县人,早年担任过红军团长,以后南征北战,随着人民军队的壮大,从指挥步兵,到指挥炮兵,一直到率领装甲兵,立下很多功劳。1980年,老将军年满七十,决心响应党中央号召,申请退出第一线,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他曾对人说:“作为一个即将离职的老战士老来学画,为的是借这支画笔把自己的意念和能量释放出来。这也是晚年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给青年的遗产。”

从这段话里,我们窥见了老将军的宽广胸怀,也领悟到了他那“新竹青青,老干扶持”的深刻画意。“我画了几年竹子,现在正学画梅花,以后还想画松树。这样,离职后就能画松、竹、梅来寄情写意了!”贺老兴致很浓,谈得欢畅。可惜时间不早了,我们准备告辞,可他还意犹未尽。

“这样吧,今晚到此为止。您有兴致,以后给大家每人画一张好了!”贺老的家属说服了他。

那是个难得的夜晚。可说实在,对于送画的事我却并没有当真。想不到,不满一个月,贺老将军果然寄画来了!“言必信,行必果”,从这件小事上体现出来的延安作风,使我格外感动。

最近,当我在党的十二大选出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名单上,看到贺晋年这个名字时,不禁为老将军实现了“老干扶持”的愿望而高兴,并祝他早日画出松竹梅那高洁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风格,而这种松竹梅风格,正是千万个老延安精神面貌的体现!

(1982年9月19日)

铜川遇险

7月28日早晨,我们结束了在延安难忘的十天访问,带着丰富的采访笔记本和对革命圣地的深刻印象,愉快地乘上汽车返西安。当天下午拜谒了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的陵墓——衣冠冢,在延安专区所属黄陵县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7月29日一早五点零三分,汽车继续出发。这是一辆日本制造的丰田牌旅行车,有二十多个座位。记者团中除个别同志已先期离开外,其余十五人全在车上,车子基本上坐满了。

我坐在右边第一个位置,也就是和司机同志并排,中间隔着大家的一些旅行包。我一路上思考着除了已发回报社者外,一共该写几篇稿子,构思着下一篇《延安散记》的内容;同时不时看着窗外的天色。因为,车子离开黄陵不久,天就下雨了。到宜君塬(山顶平原)上时,雨下得很大,我这个从未乘车跑过山路的人,不免担心。幸好进入铜川境内时,雨渐渐收了。可柏油公路上仍是湿漉漉的,天空阴云密布,看来还得下。

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广播电台的间奏乐声,汽车沿着山脚下坡。间奏乐完了,六点半钟,接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开始曲,大家准备听新闻,汽车继续在柏油路上行驶,一切正常。开始曲放完,正当播音员报台号时,我猛觉不好,只见前面是段左转弯路,可我们的车子不知怎的却照直向黑越越的山壁冲去了!

“啊!”我不由惊呼起来。司机也“啊呀”了一声。车子紧急左转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见“哗啦啦——轰”的一阵响,我顿时眼前一片黑,只觉车前面的大玻璃砸破了后像冰雹似的落到我身上手上,嘴里满是泥沙,脑子里最后闪过一个思想:呀,难道出事了?我有好些东西还没有写呢!……

右臂钻心似的疼痛,又使我清醒过来,这才知道车子已朝左歪倒不动了,自己也歪倒在行李上,车里有人在呻吟,看见自己手上的血,我想准是右臂断了!“自己能走的快下来,车子可能还要翻!”谁在车外叫,我动自己的腿,慢慢挪着下了车,一阵头眩,躺在了草地上。同志们够困难的了,我一定

不能大呼小叫的,我咬牙忍着剧疼。《延安报》的老冯同志把我背上一辆在公路上拦住的卡车,《新华日报》的老郑同志想尽办法把我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铜川市人民医院。这时才知道没有受伤的同志已经想法送来了两位重伤员,其中《南方日报》的蓝爱宽同志在当天上午就没有抢救过来而不幸殉职了!他是一位开朗风趣、热爱新闻工作的人,在延安他为广东读者着想,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在延安工作的广东人认真采访。我在第二天才得知他的噩耗,很是难过。在铜川医院,先后查出了有十几位同志不同程度地负伤,最重的一位后来也没有救活,真是不幸。我的右臂没有大骨折,是脱了臼、小骨头骨折和软组织受伤,经铜川和西安医务人员的治疗已经复位并上石膏固定,有点脑震荡也正在治疗中。右腿虽然也受了伤(回沪后查出是半月板碎了),却无生命之忧,同志们好意安慰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幸事件发生后,从中央全国记协到陕西、延安、铜川各级党委和政府,铜川和西安有关医疗卫生单位,还有我们的许多同行,都非常重视,连日来为我们安排治疗,对我们慰问,我深感觉和同志们的关怀,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为此,我一定要克服困难,瞒着大夫(请他们原谅!)尽早给读者写这篇报道,同时,请允许我在稍后的时候再把《延安散记》写下去!

(“八一”写于陕西省人民医院)

注:此稿当时编辑部未发表

色彩的故事

人们的第一感觉器官是眼睛,眼睛接收的第一信息数色彩。对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我最初的印象便是白和绿两色。

被华盛顿人誉为第一色彩的白色,从许多重要建筑物上显示出来。作为首都象征的华盛顿纪念碑高达五百五十英尺,矗立着,老远看去像一支巨大的石笋。中国馒头似的杰斐逊纪念堂,方形柱的林肯纪念堂,圆顶的国会大厦,还有五角形的国防部大厦,圆形的肯尼迪体育场……几乎全是白色的,奶白色的,灰白色的。所有白色建筑中,最出名的当然要推白宫。美国老百姓喜欢向外国人讲述白宫的故事:“白宫是烧出来的!”据说,这座掌握合众国权力的宫殿原来并不是白颜色的。它在1814年8月25日,被英国远征军一把火烧了,幸亏一场暴风雨扑灭了大火,可是大厦处处露出难看的火焦迹。当时人们暂用白漆刷上。后来,大家觉得白色很美,便索性用白色大理石重建总统府,才有了白宫的外号。

我们从纽约专程去华盛顿特区那天,正值日本首相中曾根与美国总统会见,白宫给了世界各地游客以闭门羹。扫兴之余,大伙胡乱在铁栅栏外面拍了些照片,决心改为去享受第二色彩——绿色美了。其实,从人们的实际感受来说,华盛顿开阔、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草地——使人想起“芳草碧连天”的诗句——加上蓝天下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葱茏绿树,却能给人以宁静的舒适。特区人民辛勤创造的绿化环境堪称第一流。

除了绿白两种基色以外,华盛顿还有一种重要的颜色:黑。据说在特区人口中,黑人约占一半。真是的,街头,商店,工地上,车站里,我们看到的黑人比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要多得多。热心人又讲了一段黑的故事给我们听。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林肯废除奴隶制的年代。黑人奴隶们获得人身自由后,马上遭到奴隶主的经济报复。他们找不到工作,生活受到威胁。于

是各州黑人推派代表,去到首都请愿。据说林肯当年接见代表们时说:你们就留在这里生产劳动吧!从此,这批黑人代表便脱离了各个州,在这里就业、结婚成家。以后儿子生孙子,一代又一代繁衍,发展到现在成了华盛顿特区的“半爿天”。看到黑人们一百多年来流血流汗建设首都的业绩,人们相信,他们定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万绿丛中一点红”、“绿色的波涛”和“白色的风帆”之间,现在特区又多了一道闪闪红光,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这便是横跨唐人街口的大红牌坊。于是,我们又听到了红的故事:这个红牌坊人们叫它中美友谊牌楼,是中美建交后由中国华侨们捐款数百万美元建成的。我们很高兴在异国他乡看到自己民族的传统艺术精品,忙趋前仔细端详。高耸的牌楼以大红为底色,满绘七彩云龙,金碧辉煌,造型结构完全是中国式的。仰面望去,顶部正中赫然有“中国城”三个金色大汉字。牌坊底部则有刻文注明:1986年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建造。签名的是双方市长。关于建造牌坊的事实虽然和传说有差别,但它象征中美友谊,反映广大侨胞爱祖国之情是真诚的。毋怪华盛顿特区中国城中的居民们,以这座大红牌坊为骄傲了。

华盛顿特区是一座色彩鲜明的城市。它记录的一个个色彩的故事,使我们得到启发。
(1987年6月30日)

列席众院会议

春光明媚的一天下午,在华盛顿特区参观国会大厦的时候,听说众议院正在开会,它和参议院不一样,可以请公众列席旁听,同行的伙伴中有人提议去会场看看。经过带队人员联系,答复是欢迎中国客人旁听,请交看护照。这可引起议论纷纷。来的虽然都是炎黄子孙,但所持的护照还不一样,加上有的人不愿在这种场合出示,有的人没有带在身边。于是又经过一番联系,美方执事人员友好地表示:中国贵宾访问,不必出示护照了。

护照不必查看,安全门却不能免去。“安全门”其实并没有门,只是一个够人高的“门框”。这里的安全门,想来是世界第一流的,它比许多机场

的安全门要灵敏得多,过门手续也严格得多。除了把照相机和刀、剪、枪等“违禁品”交付寄存外,凡沾有电子的东西,包括手表、计算器、刮须器等,都不能带入会场。

很想看看合众民主现场的我,在好奇心驱使下,跟着大伙,——遵照规定办理。我把照相机、石英电子手表存放在安全门外储物橱的第102号小格内,然后挎了一个提包顺利地通过了那神秘的“门框”。想不到的是同伴中的G君却遇到了麻烦。他空手经过安全门时,报警器“吱—吱—”地响了:报告有“不安全因素”。大伙不由一怔,美方保安人员微笑着指指G君的皮带,请他按住金属扣子,重过一次“门框”。谁知那警铃并不改正错误,仍旧固执地鸣叫起来。微笑者的脸上显出疑难神色,同胞们也有点不安。而G君,他的皮带扣子已经在不少机场经过多次考验,都“平安无事”,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如此作怪。为了释除对方疑虑,也让大伙放心,更为维护中国贵宾的尊严,他毅然解下皮带,再次跨过安全门,灵敏的报警器果然沉默了,同胞们中间却响起了笑声和掌声。那位保安人员的微笑也施展开来,变成了笑容可掬。“谢谢!”他连声说,并做了个手势向G君致敬,请他朝前进入会场。事后,G君幽默地对大家说:“提了裤子列席众院会议,未免有点不敬哩!”

美国国会众议院会场是一个长方形的厅堂,分上下两层。高高的白色天花板上有个圆形大图案,中间是国鸟白头鹰,周围缀着五十个五角星,想来是标志五十个州。会场四壁有不少名人塑像。蓝色地毯上分左中右排列着三百多个橘黄色席位,此刻稀稀落落地坐着二十几位众议员,正在开会。一位议员站着热烈发言,阐述他对自由贸易的见解。主席台正面墙上,竖挂着星条旗。主席,也许就是议长,独自坐在一张长台后面。一位老头和一位妇女在另外一张桌子的速记机上做记录。气氛是严肃的,许多工作人员悄然无声地在会场四处站立着,发不完的文件,一大叠一大叠静静地躺在他们的脚边地毯上。

我们仔细观察着。会议继续进行,又有两位众议员发言,发生一番小小的争议……

对于体现合众国神圣民主的国会众议院开会,会场“上座率”还不满十分之一,这未免使我这个当过多年政治记者的人,也少见多怪起来。环顾我

所坐的楼厅,五百多个旁听席上,约有二百来人规规矩矩地坐着,他们的脸上也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也许他们也都是四面八方来的贵客们吧!

(1987年7月1日)

小游仙人洞

“欢迎您到弗吉尼亚来!”一条醒目的横幅挂在公路旁的一家小旅游店门口,使经过长途快速行车的人们感到一种慰藉。这里是丘陵地带,来路两旁时见绿色小山包。但是,眼前却是个“小平原”。“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的目的地美国仙人洞在哪儿呢?

进得旅游商店低矮的蓝房子,店堂不大,一览无余。右边食品部,突出介绍当地特产猪火腿和香烟,质量好,价格比纽约便宜得多。左边各个柜台上小商品不少,多半是旅游纪念品。

“请大家先游七彩仙人洞,游完了再买东西!”导游举起小旗招呼大家,然后率先走向店堂最里面的一个小红门。一个弗吉尼亚小伙子一按电钮,小红门打开了,原来是电梯。矮房子还用电梯,大家带着几分好奇,分批进入小红门。这是一架极平常的封闭式电梯,小伙子关上门,又按了一下电钮,电梯缓缓下降。

“到了。我们已离地面二十英尺。大家向后转,从这边出去。”小伙子打开后门,大家鱼贯而出。原来,美国仙人洞在地底下。

灯光照亮了奶白色细砂地,小路曲折向前,玩偶“小矮人”们举着欢迎牌子迎接来客。

“这个仙人洞和我们汉语同音。洞深二百米,终年华氏54度,恒温;有八个自然通风口,所以一点儿也不气闷。”导游边介绍,边向大家指点:“快看,美国著名的尼加拉大瀑布搬到仙人洞里来了!”“喏,这不是裸彩色树吗?”“你蹲下来朝水潭这边瞧,有湖面微波美景!”……

人们一会儿欣赏色彩各异、姿态万千的钟乳石,一会儿和“小矮人”们拍照,兴致勃勃。游客中有一位香港阿婆,她见多识广,游览过许多祖国名胜。一边看,一边作对比,善卷洞呀,张公洞呀,黔灵洞呀,滔滔不绝。忽然她连声问我:

“你是上海人吧？杭州的瑶琳仙境去玩过吗？你觉得比这个洞怎么样？”

“还没有去过！”我老老实实回答。

“啊呀，你怎么连这么好的地方也不去？仙境比这仙人洞大得多，好看得多，好玩得多咧！”她深深为我惋惜，并且竭力怂恿我最近去，好“比较比较”。直到我答应有机会一定去，她才满意地朝“观音菩萨”——一块竖立的岩石酷似南海观音侧身像——走回去，虔诚地补拜了几拜。

尽管游客们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此时此地，对于一个深埋在地下的大洞，大伙还是兴趣很大，并且纷纷探究这个地下仙人洞的来历。

传说若干年前，这一带居住着印第安人。有一次两个印第安孩子在村外玩球，忽然球掉进一个窟窿里去了。小孩子跟着钻进去。谁知里面越爬越宽，隐隐有山有水，有树木，有成块云彩。“这是神仙住的地方！”孩子们顾不得找球，忙退出洞外，飞奔回家去报告父母。经过父母的再次探索，按照美国法规，这个洞便是他们家的财产了。后来州政府派人和他们谈判，由政府投资开发为旅游区，取名仙人洞，所有权和收益各自一半。从此，弗吉尼亚仙人洞便成了一个独特的旅游点，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尤其是中国人和到过中国的人，在往华盛顿的途中，常常弯到这里来探寻同名仙人洞。

（1987年7月2日）

飞车曼哈顿

曼哈顿区不愧为纽约市第一区。外国人通常到的纽约，往往就是曼哈顿区。这个区的最大特点是摩天大楼林立。102层的帝国大厦在这里，110层的双子星座世界贸易中心也在这里。区内街道整齐，东起东河，西到哈德逊河，南北向的按序称大道，东西向的多数编号为街，还有一条斜插其间的长长百老汇路。陌生人到纽约曼哈顿区，寻路并不困难，加上地面和地下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招手即来的出租汽车，出门很是方便。早听说许多纽约人不愿再自己开车上街。

我们到纽约的当天午后，热情的H君驾车相邀，说是边办事边兜兜曼哈顿区，心中好有个概貌。这真是一次出色的游览市区节目。熟悉情况的

H 边开车 边介绍 边指点：繁华的第五大道 洛克斐勒中心 著名的第一大道 42 街到 48 街的联合国大厦 哈德逊河畔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唐人街 有便宜货买的 14 街 还有“红灯区”42 街中段……

车子已经兜了一个多小时 我心里正奇怪：H 为什么不挑几个地方让我们下车来看看？H 像知道我心思似的说：“我们办事的第三大道 450 号到了 英领馆在九楼 我们先去签证 办完事再玩。现在去找停车的地方。”开了二十多分钟 车还停不下来 无处停靠。

“你们听说过在纽约出门有两难吗？这停车难便是一个。”H 幽默地加一句：“今天可以让你们体验生活了！”车子又转了五分钟。“总算有地方了！”H 指指一个招牌：“这儿有个地下室停车处 就是贵。”“停车难”果然名不虚传 只见墙上价目表大字张贴：停车一小时六元。比路旁公共停车场贵了五倍。

真是无巧不成书 在英领馆等签证的时候 又撞上了纽约另外一难。患有糖尿病的 X 君 只能在 H 陪伴下出大楼 一路跑到第二大道 才在一家熟悉的菜馆里借用到洗手间。“在纽约找厕所 可比在上海难得多了！”H 又介绍经验说：“纽约人上街前总是相互提醒：上一次洗手间！”

否极泰来。两难过去 我们继续飞车曼哈顿比较顺利了。在登世界贸易中心摩天楼前 碰巧看见一辆汽车离开 留下一个路旁停车空位。而我们的车子开到一条有教堂的小街时 天已薄暮 H 环顾左右 急急对我们说：“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华尔街 趁周围没有警察 我们停车二分钟。你们快下去 我给你们拍张照 马上上车开走 二分钟之内 警察再快也赶不到这儿！”

我们照 H 的计划迅速行动 待车子重新开动时 我再也忍不住大笑：华尔街这么小 大出我意外 而今天游华尔街的方式却令人终身难忘！这可全是停车难带来的意外收获啦。

(1987 年 7 月 3 日)

好莱坞历险

外号大桔子的洛杉矶市 地处阳光地带 水果丰富 蔬菜鲜嫩 但每年下雨不超过十天。

这个少雨的大城市,最适宜室外活动。因而独具生意眼的人纷纷看中了这个地方。迪斯耐在几十年前选中这里兴建乐园,奥运会曾两次在此举行,而好莱坞拍摄电影已有一百年之久。

C君和Y君一家就住在好莱坞山脚下不远,他们邀我们去作客的时候,先送我们到好莱坞山上。

进入半山腰的环球影城正门,首先看到一个青灰色脸皮,面无表情,颈部创口还在殷殷出血的巨人,身穿灰色衣服,到处逗弄小朋友。孩子们吓得躲到妈妈的身后。“卡洛夫 科学怪人卡洛夫!”Z君脱口惊呼起来。卡洛夫闻声便径直朝我们走来。幼年时最害怕卡洛夫,至今尚有余悸的Z君,这时鼓起勇气迎了上去。卡洛夫友好地伸出长臂,几乎把高大的Z挟在他的腋下,一起照了张相。卡洛夫把我们送上敞厢列车。这种车四节组成一列,最前面一节有司机和讲解员,每节车有近十排座位,每排四人,无门无车厢壁,可以自由上下。我正好坐在右边第一座,远眺山脚下有座黄色琉璃瓦的中国城,想来是拍电影用的。天空晴好,在欢乐的电影乐曲伴奏下,一列又一列车出发了,大家愉快地上山去。

刚接近一个山嘴,突然山石间窜出一群匪徒来,罩着面具,举枪就朝我们开火。一时子弹横飞,手雷在车旁爆炸。我们的列车急急逃离现场,这才看见山嘴那边一个村庄已被烧剩残垣颓壁。

一会儿列车进入一个巨大的铁门,原来这里是一个大山谷。大家正等着介绍,突然一阵狂风,天昏地暗,刹时右边深谷中烈焰冲天,接着一声怪吼,就在我的座位右边山谷中,拔地站起来一头硕大无朋的黑猩猩。我抬头见它张开血盆大口,尖利的牙齿白得怕人,吼声连连震撼山谷,前爪乱舞。偏偏这时候我们的列车“失控”了,又横着向它靠去。我感觉到它的一只巨指正在我头边晃动。我心惊胆战,下意识地极力向左挪。出了另一头的大铁门,看到满山仍然阳光普照,这才明白刚才的大山谷也只是个摄影棚。

渐渐地列车开上了比较险峻的山路,又钻进一个长长的隧道。周围黑沉沉一片,只有前方隧道口射进来一丝光亮。列车慢慢地前进,突然,全车剧烈震动起来,车外穹形隧道壁劈劈啪啪地掉下去了,什么地方刮起怪风,伴着轰隆隆的巨响,刹时天旋地转。车子再也开不动,车身只是强烈地左右摇晃,人要甩出敞厢了!

“啊，碰上加州大地震啦！山崩了！”黑暗中孩子哭喊，妇女尖叫，各节车慌乱成一团。司机和讲解员也吓昏了，音乐和喇叭都哑了。我镇定了一下，用手紧握前座位把，双脚使劲踩住车厢。咦，这才发现，脚下稳如泰山，哪有车身乱晃？“完全是制造出来的错觉，真见鬼！”我一方面腹诽，一方面钦佩设计者的构思：在这种场合拍出来的镜头，是真实可信的！这时前后车厢还在惊慌一片，继续了好几分钟，忽然灯光复明，音乐又响起，隧道完好如初，列车平稳地开出隧道。人们面面相觑，好一阵才从极度惊恐中回复过来。

让人们从惊险、恐怖等强烈刺激中找乐趣。我悟出了西方娱乐观的一点秘密。环球影城如此，迪斯耐乐园的鬼屋之类也如此。

(1987年7月4日)

洋大饼洋油条

“吃在纽约！”我们碰到的纽约人，异口同声热情介绍：“各式西菜应有尽有，中国菜馆号称五千家，吃海鲜最时髦，快餐花色众多！”

我们确也尝了不少美国风味，鲜嫩的烤牛肉，鲜美的大龙虾，新鲜干贝，奇形怪状的大西洋鱼，还有各种蛤蜊……一天，听说有一处叫富尔顿的去处，犹如上海的城隍庙，可以遍尝美国和外国的小吃。我很感兴趣，Y君便带我们去。

富尔顿在曼哈顿区南端，紧靠东河，是一个大型室内食品市场，分上下两层。楼下可买到一二十种花色冰淇淋，各色面包糕点，水果，乳酪，以及干果、水产、蔬菜等等，果然琳琅满目。楼上则多为各种各样小吃摊档。

我早听说美国也有大饼，叫“匹扎”，原来是意大利的大众食品，经过加工，价格成倍翻，变成了美味的美国大饼。平常在街上看到五光十色卖“匹扎”的招牌，就很想尝一尝，今天可是个机会。于是决定先吃美国大饼。我们来到一个小柜台前，看见价目表上写明每份二元七角五分，三个人每人一份，外加饮料。摊主迅速收好钱，让我们坐到一张靠墙小方桌上，先送来冰水和刀叉。不一会儿，黑人服务员送来饮料和三个盘子。我一看那“匹

扎”，原来像一角羌饼，只是里面有馅，表面有“浇头”：蘑菇片，乳酪，肉末，还有不知什么作料，颜色很诱人。我兴致勃勃地用刀切下一小块送进嘴里。哎呀，什么怪味儿！我都不敢细嚼，忙喝口橘子水，胡乱吞下去。因为是我竭力主张吃这洋大饼的，不好意思声张，只能硬着头皮，一小块一小块艰难地吞下去。可是虽经努力加餐，老半天还消灭不了一半，心里暗暗叫苦，只好不顾礼貌，弃之不惜了……

说也好笑，自从这次美国大饼吃倒了胃口以后，我经常想念起中国的大饼油条来：香喷喷，黄澄澄的大饼，夹上热油条，多好吃！中国油条在中国快餐店里也有买，一元钱一条，但我当然不会特地跑去吃，何况又没有中国大饼配套。而唐人街超级市场里的袋装大饼油条，冷冰冰软搭搭的，也早已失去了特色。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却意外地吃到了美国油条。

那是在洛杉矶的迪斯耐乐园里。那儿从早到晚满街小吃：汉堡包，热狗，冷饮，炸土豆片，爆珍珠米花……其中便有美国油条。一个小伙子守着一个带轮的小车。抽屉里放着油炸好的咖啡色面棍子，钳出来在铁盘上烘热后，再在一个白色粉末（估计是白糖）盘里滚一下，便一一用纸巾裹着送到排队的顾客手中，每根一元二角。我接过飘着奶油香味的美国油条，先端详一下，它笔直的像根木棒，约有一尺长，半寸直径粗细，表面有一道道灯芯条，看来是机械模子留下的痕迹。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嗨！又松又脆，香甜可口，要比我们的脆麻花好吃。但离中国油条，则无论从外形和味道，都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987年7月5日）

访世外桃源

我们刚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不久，C教授就建议去看看世外桃源——现代化美国里的一个中世纪村落。那儿的居民不用电灯，不看电视，不喝自来水，不坐汽车。

东道主D博士是位热情好客的学者。她亲自开车，陪我们去探访这个一百英里外的偏僻村庄。

行行重行行。两个小时后，当汽车深入山区，翻过数不清的山包，拐上

一条乡村公路时,我们看到右前方有一辆黑色马车,正在蹄声得得地缓缓行进。“这便是阿米苏人!我们快到目的地了。”C教授是车上唯一到过这里的人。当汽车超过马车时,我看到里面坐着一个黑色服装的妇女和一个女孩,她们都戴着白花边的帽子。

汽车停在乡村小店门前,大家下车休息,买乳酪。这些乳酪是附近一家工厂生产的,原料便是阿克苏人出售的牛奶。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

买完乳酪我们看见有个戴阔边草帽的中年男子,正在公路边一条小路口打公用电话,据说这一带村子就只有这么一架电话。打完电话,他驾起一辆简陋的土马车,从小路里回村了。我们的汽车跟在他后面,慢慢地开进村去。

有很长一段狭窄的乡村小路,路上阒无一人。左边是深深的杂树林,右边沿山坡山花烂漫。狭窄的小路走完,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一片碧绿的坡地,一带白色的农家屋,远处绿树丛丛。我不由想起了“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的诗句,可惜这个“洋桃源”并没有“近入千家散花竹”的盛况。这里总共只有几十户人家。

新修的沙石路尽头,男子汉们还在打地基,汽车不能开了,我们便往回走。一位正在白色农舍前草地上看书的老爷爷注意到了我们。我们上前向他问好。他说的也是英语,今年六十七岁,祖上是从荷兰来的。这时,在阳台上干杂活的老奶奶也下楼来参加谈话了。原来他们是麦司脱一家,除两老,有儿子、媳妇和六个孙儿女。全家种一百十五英亩地,养了十二头牛,挤奶,六匹马,又耕地又做交通工具。他们屋前放着一部旧的手扶割草机,一铁桶点灯用的火油。做饭则用天然气,喝的是井水。说话间,年轻的媳妇穿着粗布衣服、胶鞋,带着两个孩子从地里回来了。听说我们从上海来,她茫然地问:“上海在哪儿?”告诉她在中国,她恍然大悟,忙问这问那。老奶奶还专门进屋去捧出一个厚本子,要求我们在上面题词留念。我们建议拍张照片,却遭到老麦司脱的断然拒绝:“我们不喜欢!”

是的,老人们不喜欢外界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与世无争,不参加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只要求全村聚在教会周围,恪守祖传下来的规矩。但是,使他们伤脑筋的是青年们抵挡不住现代物质文明的吸引,常常偷偷离村而去。因此,人口日减也使老人们担忧。在自生自灭中,听说这个少数民族只

剩四千多人了……

归途中 ,车上热烈议论一个话题 :这样的世外桃源还能存在多久 ?

(1987 年 7 月 6 日)

救火会餐厅

小个儿的传播学博士 D ,性格开朗 ,充满活力。她接待我们的方针是 :尽力让中国客人高兴。因而在紧张的讲学、交流之外 ,安排了不少兴趣活动 ,到救火会饭店进晚餐就是其中一项。

宾主们一起来到哥伦布南面的 T 路 ,车子停在一个小广场上。街道并不繁华 ,附近也没有什么大酒店。D 带领我们来到一幢带塔楼的两层砖房前 ,我才看到一块题名 Engine 的招牌。主人介绍 ,这儿原来是个老式救火会 ,正准备拆掉的时候 ,一个老板看中了它 ,毅然买了下来 ,开成这家别致的饭馆。

我们进入并不宽敞的店门 ,走道也很狭窄。柜台后面墙上有一幅显眼的绿色标语 :好食物 ,好饮料、好场所。凉棚似的二楼梁柱上 ,挂着不少水龙带、救火帽 ,许多顾客已经兴致勃勃地坐在那些救火器具下面的席面上。底层餐厅分内外两间 ,一大一小 ,排满圆桌和火车座。我们随着女服务员穿过大餐厅 ,来到正面矮窗台上 ,那里刚好摆下一张圆桌 ,和全餐厅又相连 ,又有区别 ,便是全店最好的“雅座”了。我看到长窗两旁的板壁上挂着好几张救火员奋勇救火的版画。

大家坐定后 ,服务员送上冰水 ,随即请大家点菜 ,选饮料 ,一切程序和其他美国饭店没有什么两样。宾主友好 ,频频举杯 ,叙谈家常。

正当大家谈得起劲 ,忽然听到“叮令令”一阵铃响 ,像救火车铃 ,但没那么紧张 ,也柔和得多。“快看 !”坐在我旁边的 D ,用手指着大餐厅中间一根发亮的柱子 ,让我朝上看。原来那铜柱穿过天花板上一个大圆洞 ,直通二楼。这时随着第二遍铃响 ,一个全身白色服装的姑娘 ,像天女似的 ,从铜柱上滑了下来 ,她的头上还顶了一盘发出火光的食物。“好 !”里里外外餐桌上 ,一片欢呼 ,夹着掌声 ,有些顾客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平安滑到地上的女

服务员微笑着向大家鞠躬 ,随即把食物送到顾客桌上。

这以后 ,餐厅里更活跃了。差不多各张桌子上都在谈论这一出色表演。过了约摸十分钟 ,铃声又响了 ,大家不约而同翘首望洞口。这一次表演的是个男服务员 ,他一手托菜盘 ,另一手臂勾柱子 ,滑到半空还向大家做了一个致敬的动作。那武艺果然高了一筹。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表演 ,餐厅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 ,又滑下来一位顶着生日蛋糕的女服务员 ,小烛火在她头上摇摇晃晃。几位男女服务员立即跟着她走到一张餐桌前 ,于是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

当我们这次欢乐的晚餐快结束的时候 ,小伙子和姑娘们也顶了奶油蛋糕来向我们唱歌。这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 ,但我也感受到了过生日那样的快活。

(1987年7月7日)

大西洋赌城

大西洋城 ,是新泽西州里一座紧靠大西洋的城市 ,美国居民们习惯于称它为东部赌城。我们在勃克莱高地 C 教授家作客的时候 ,他和夫人 G 教授给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日程 ,并且建议说 :“要了解美国万花筒 ,不可不看大西洋城 !”

出发那天早上 ,G 教授亲自开车 ,先到附近一个小镇 ,放好车便陪我们来到乡村公路边 ,C 教授已经买好十六元一张的车票。不一会 ,一辆蓝灰色大型豪华旅游车靠站 ,车上已有几个美国人。我们上车后 ,驾驶员一路在各小镇边停靠 ,不断有旅客上车。不多久 ,车子差不多坐满了 ,才开进高速公路 ,直向大西洋城奔驰。约摸开了两个小时 ,中途上来一个 S 赌场的职员 ,向每个旅客发一张当天可兑换十七元钱的票券(即除可收回车资外还多余一元) ,还有一张五元券 ,不过须在指定的另外日子才能兑现。我们会心地齐声笑起来 :这里面有微妙的心理学 !为了吸引顾客 ,赌场老板的生意经盖了帽了。

旅游车停在 S 赌场附近 ,一拐弯便是大西洋海滨大道。这是一条木头马路 ,没有公共车辆 ,也不开小汽车 ,只有几辆敞厢旅游车 ,从南到北 ,来回

缓驶 给人代步。更多不同肤色、不同服装的游客 ,则漫步街头观赏大西洋风光 ,或者坐在路边长椅上 ,用面包屑逗引成群海鸥和野鸽子。

大道另一边便是一家接一家的赌场 ,大旅馆 ,也间隔有一些快餐店、杂货铺……

我们来到 S 赌场。它的豪华气派使人误以为进入了王宫。建筑是富丽的 ,陈设是精致的 ,环境是整洁的。自动电梯不停地上上下下 ,玻璃窗明晃晃 ,金属柱亮堂堂 ,人们急匆匆地来来去去 ,也分不清是游客还是赌客。

上楼推开标有“赌场”大字的黑框红门 ,看到一个巨大的赌厅 ,气氛顿时不同。眼前一片暗红色 ,灯光不很明亮 ,空气不很新鲜。耳边只听到“咣唧唧 ,咣唧唧”的声响 ,那是成排成排、几百架“角子老虎”上发出来的硬币落盘声。坐在每架赌具前的男男女女 ,专心地把二角五分币一个接一个、一把接一把塞进“老虎嘴巴” ,然后用手摇摇柄 ,或者揿按钮 ,等待“好运气” ,祈求赌博机能吐出成千上万元硬币来 ,至少出来十个八个 ,也不致空手而回。可惜据熟知内情的人说 :谁上了“老虎凳” ,就会不把口袋里硬币掏光不罢手。否则 ,赌场老板怎么发大财 ,又拿什么交税款呢 ?

看来“角子老虎”是最通俗最诱人的赌具。在赌厅的另一区域 ,则有轮盘赌、二十一点、骰子“开宝”等等 ,赌场男女职员们盛装艳抹招徕赌客 ,但赌客并不多。

G 教授告诉我 :白天的赌客中有不少是顺便玩玩“角子老虎”的游客 ,还比较文明。到晚上真正的赌徒来了 ,又是一番景象。深夜时 ,在这个区域输得眼睛都红了的人们会发生种种悲剧 ,有的人干脆跳进大西洋……

离开 S 赌场前 ,我们换回了车费。C 教授还专门给了我一个盛赌注的塑料杯 ,和那多出来的一元钱 ,开玩笑说 :“带回去留作纪念吧 !”

我们按原计划到大西洋海滨去野餐 ,享受 G 教授昨晚亲手准备的美味三明治、饮料和水果 ,大家情绪很高。扫兴的是正当我们走往海滨的时候 ,两个衣服破旧的男乞丐半躺在马路两头讨钱 ,其中一个嚎叫 :“给我几个钱吧 ,让我凑够买个三明治 !”也许 ,他们正是赌城的小小牺牲品吧 !

(1987 年 7 月 8 日)

在纽瓦克机场

5月初一个大雨滂沱的中午,G教授早早让我们吃好午饭,决定亲自开车送我们上纽瓦克机场。这些天来,她总是像老大姐那样关心我们,教给我许多美国生活知识。今天是C教授和我们一起去哥伦布的日子,他们夫妇即将小别,可她仍举止安详,满腔热情。

汽车开下勃克莱高地,转上高速公路,眼前一片雨帘,路面上雨水横流,车轮滑了一下。这是开车的坏天气,我坐在G旁边,不禁为她担心。C在后座也不时提醒减慢车速,显然他更为夫人不安。可G神色自若,把紧方向盘,专心驾驶。一路平安,我们顺利到达纽瓦克机场A区,这是预订机票时规定的登机地方。

谁知,意外事情发生了。大陆航空公司的职员说明,由于公司内部原因,这个航次飞机改在B区登机。哎呀,C的脸色骤然紧张起来,他顾不上询问详情,急急带我们回到车上,极力镇定地告诉夫人:“他们改到B区了!”然而,B区在哪儿呢?G打量着四周各种各样的指示牌,犹豫地驶离A区。大雨仍在下,机场这么大,连找个问询的人也难。车子转来转去,开进了一段顶头路。“呀,离起飞还有多少时间?”这下子安详的G教授也急起来了。C翻了一下机票,忙果断地安定她:“时间你不用管,仔细找路好了!”好不容易在一个机场工作人员指点下,我们退回来路,再找到去B区之路。

车子刚停到B区门口,我们急急下车,匆匆和G告辞,拉着行李便去找大陆公司柜台。柜台上职员看一下电子钟,连说:“快到57门!一切手续再说,我打电话进去通知!”

我粗心,压根儿没弄清飞机的确切起飞时间,但看到两位男同胞的面色,已知道事情的紧急程度。一时也不知哪儿来的劲,拖了行李箱,挎了背包,跟着一路小跑起来,连安全门边也没停留,直奔57号门。可是,等我赶到时,看到长窗外一架大陆公司的客机已经在雨地里滑动了。C正在向工作人员交涉:“还有二分钟,怎么不上客了?”

“上级正在抓准点飞行!”年轻女职员答。

“既然要准点 ,怎么又提早飞呢 ?”

“我们有权提前二分钟起飞 ,这是规定的 !”女职员振振有词。

“那你们的规定是错误的。晚点和提前同样是不准时。再说 ,改了登机的地方 ,为什么不通知预订机票的旅客 ? 误了旅客的大事 ,你们要赔偿损失 !”C 教授已完全改变了他老大哥的风度 ,和对方据理力争。

“……”女职员语塞了。这时飞机已经滑得老远 ,C 要求见她们的上级。没登上飞机 ,耽误行期不说 ,这三张机票作废 ,损失可不小啦。可我看 C 这时反而不着急了。女职员的上级也是一位女士 ,她听完 C 的侃侃而谈 ,承认了他指出的公司两点错误。请求我们原谅 ,改搭今天下一班机 ,并负责为我们电告哥伦布机场接机人员 ,以免他们空等。

一次没赶上飞机的意外事件终于圆满解决了 ,我们舒了一口气 ,赞扬 C 教授不仅英语好极 ,而且熟知美国社会。他笑笑说 :“在美国 ,我们有理就要力争。”

雨又下大了 ,我们一起想起了 G 教授。C 忙去打电话。我却再一次记起她昨天晚上的话 :“这几年来我的梦境从来不是在美国 ,真奇怪 ,总是梦见上海 !”

(1987 年 7 月 9 日)

美国大学生

了解大学生生活 ,是我们在美国的目的之一。

我们曾住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这是一所教授比学生多一倍的特殊学府 ,八百多位教授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有三十多位。它坐落在东河之滨 ,有很好的校舍和草地 ,校园安静 ,门禁森严。我们每天看见研究生们服装整齐 ,神态庄重 ,夹着书本来去匆匆 ,使人望而却步 ,感到这些未来的科学家、高级人才的时间有多宝贵 ! 然而青年毕竟是青年 ,一次 ,一位男学生主动上前 ,帮我们拍了一张照 ,然后含笑道声“再见” ,又去上他的“战场”了。

一个春雨绵绵的周末上午 ,M 趁假期陪我们参观以环境优美 ,人才辈出著称的普林斯顿大学。它在新泽西州。M 把车子开进一条深深的林荫道 ,便是进入校园了。迎面的彩色海报告诉我们 ,今天上午和哈佛大学赛棒球。

而林荫道左面一个学生俱乐部里,男女学生们正热火朝天地跳两拍子舞。三三两两的大学生撑着校色——橘红色和黑色相间的雨伞,冉冉而来,沉静中显着活泼。M对这所大学很熟悉,她喜欢这里的活跃气氛。M自己也是一个大学生。她现在是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以顽强的毅力,用几年业余时间念完了大学课程,再向硕士学位迈进。

我们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那些衣着随便的本科生们,非常勤奋,我们看到他们不仅在图书馆、教室里用功,而且常常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席地而坐,书本放在两膝间,边温习功课边喝饮料。上课的时候,他们专心听完老师讲课,便自由提问。我曾给这所大学的新闻学院三年级两个班讲课,讲题是中国晚报。当C教授帮助我翻译完了的时候,男女学生立刻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他们对晚报有兴趣,对新中国兴趣更大。这特别表现在一些博士研究生身上。受D教授委托,每天轮流给我们开车,陪同参观游览,直到照顾我们吃饭休息。男女博士生们,大都对新中国有相当了解。R是一位腼腆而细心的小伙子,他半工半读念大学时,曾在当地一家大超级市场里当“安全员”,老板规定他每天捉两个小偷。“能完成指标吗?”我们感到意外地问。“能!”他自豪地笑笑:“得花很多精神,但也捉错过两次。”目前,R正在很有兴趣地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A热情开朗,他笑着告诉我们:“我爸爸是个木工,他的收入比大学教授多得多!”A和他文静的夫人请我们到家中作客时,我们看到洁净的餐厅墙上挂着独特的艺术品:中国竹器米淘箩和蒸笼。他打开录音机,小家庭里响起优美的中国乐曲《春江花月夜》。另一位娇小玲珑的K小姐,开车大胆果断,虽然她不久前出过一次行车事故,被罚款五千元,但她一坐到方向盘前便又充满自信。K酷爱中国食物。一次我们请她吃中国菜,她很高兴。席间有一道炖得酥烂的猪蹄子,色香味很诱人。我们问她吃不吃?她不顾美国人不吃猪蹄的成规,用叉子叉起来,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当然,大学生也有各种各样。在大学的草坪上,我们看到过声嘶力竭地布道的教徒,也看到过三点式装束的女郎。听说在有的大学里,还有赌博、小偷、吸毒……

(1987年7月10日)

旧都费城一瞥

美利坚的历史从什么时候算起？

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有一组大型油画“诗史”，第一幅便记载着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而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在十五世纪哥伦布的“创举”之前，至少两万年，印第安人已由亚洲迁到西半球安居乐业。然而，作为独立的现代的美利坚合众国，人们总是想到费城的业绩：1776年7月4日，由十三个州代表团参加的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于7月9日在这里宣布。《宾夕法尼亚晚报》最先公布了这一伟大宣言。去费城，看看合众国的诞生地，看看当年的革命文物，这是我在美期间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实现得比较突然和匆忙。我们的车子几乎一直开到第一个国会会议室狭窄的门口。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朴素的小型会议室，长方形。主席台面向入口正门，一张长方桌，几把深颜色的椅子。代表席全是硬木椅，也是深颜色的，总共没有几排，但每一排约摸有几十个座位。这使人想起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里的会场，虽然豪华与朴实大不相同，而横宽纵浅的格局却是类似的。这是偶合呢，还是有意安排？费城的国会会议室虽然陈设简单，意义却是重大的，它记录着反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个会议室原来采光就很不充足，而现在让公众参观时也没有补救措施，以致我未能仔细看清各个角落，也无法在自然光线下拍出逼真的照片来。

摸自由钟，是游费城的人们不肯轻易放弃的节目。自由钟象征殖民地人民向往自由，唤醒独立的意愿，为革命年代留下的珍贵文物。原钟挂在专门的钟楼上，人们轻易不能看到。供大家触摸的是一个复制品，放在一个亭子里。有一人多高。据说当年敲钟很多，把大钟敲裂了，复制的自由钟也保留了那个经过修补的裂缝。我和大家一起，在亭外通道里排队，依次分批进入亭子，抚摸了一下黝黑坚硬的钟身。那钟的形状和我们中国的钟相似，可惜没听到它敲响的声音，是否也那么洪亮、悠远？我注意到，人们在摸钟时，

祝愿自己和家人幸福 ,然后在钟旁摄影留念。

一般的旅游团组织参观合众国第一个首都的活动就这么两项。我们不免感到意犹未尽 ,可带队人员已把大伙领去参观造币厂了。也许在这些组织者看来 ,金元帝国的硬币要比革命旧址吸引人。

在自行活动的时候 ,我们才看了一下费城的街景。城市还是美丽的 ,草地好 ,老式房子保存得比较多 ,环境也比较清静。大家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在老国会附近街旁 ,一排停着六七辆漂亮马车。那些棕色大马喷鼻蹄踏得很是威武 ,而驾车的小伙子们一身十八世纪骑马服 ,头上戴着白色骑士帽。人们涌过去和他们拍照 ,和马车拍照。而我 ,直到在费城走马看花完毕 ,还没弄清 ,那些马车是立国当年的交通工具呢 ,还是别出心裁摆在那里供旅客逗乐的生意眼 ?说真的 ,在美国逗留时间不长 ,头脑里类似的谜还装了不少。

(1987 年 7 月 11 日)

棒球场上看美国性格

俄亥俄州的工业居美国第四位 ,州首府哥伦布却相当安静。居民一般比较朴实 ,保持一种内地美国人的谦逊和好客风格。在哥伦布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 :“ 如果你们去棒球场 ,将会看到美国性格的全貌 !”

不错 ,在球场上人们总是真情流露。这是个更多了解当地人民的好去处。所以 ,当东道主 D 博士派她的研究生 R 送来三张棒球票 ,并准备接我们去科伯体育场时 ,我们便欣然随他而去。R 在车上告诉我们 ,今天是哥伦布队和纽约队友谊赛。我看看票价 ,每张六元 ,相当于一场电影。

五月的哥伦布 ,下午七时还有夕阳余晖 ,看台外停车场上五颜六色的车身还在闪闪发光。观众正源源而来。男士们在衬衫外套上运动衫 ,或者披上夹克 ;女士们在薄薄的连衣裙上罩一件羊毛衫 ,都是防备夜深露冷的装束。孩子很多 ,有的由妈妈携着 ,有的由爸爸抱着 ,奇怪的是几乎每双小手都捧着一个摇铃。我们随着快活的人群进入观众席 ,一位身穿白色制服、胖胖的中年服务员专门上前招呼我们就座。座椅是金属的 ,位置宽敞 ,迎面上空张着尼龙丝网。我打量一下全场 ,观众席在球场的一侧 ,有屋顶 ,除去左

右两端未卖票外,今天来的约五六千人。我们的席位在正中前方,后面站着几排少年鼓乐队。

这时候,球赛尚未开始,观众席上可热闹了:买冰淇淋的、剥巧克力的,咬“热狗”的,嚼土豆片的,更多的是吃爆米花的,加上相互打招呼问好的,换位子的,窃窃私语的,使我目不暇给。我顿时回忆起儿时在家乡看戏文的情景,竟有如此惊人的相像。不过我们家乡在这样盛况中少不了老人,而各种吃食(当然那时候冰淇淋是没有的)之中必定少不了瓜子、花生。R看我们有点奇怪,解释说:“这里确有不少是球迷、行家,但每场球赛总少不了一批全家出动,来吃东西、赶热闹的观众!”他的话又使我想起了张岱的短文《西湖七月半》来,名为看西湖。实则“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在人声如潮中鼓乐声起。我们后面的那个乐队奏出美国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当地习惯,每逢赛球都有开赛式,不一会仪式结束,掌声四起,球赛开始了。两阵对垒,双方运动员投球,击球,迅速跑垒。也许是球赛尚未进入高潮,观众席上仍是活跃得很,大人孩子进进出出,卖冷饮,零食的小贩在观众席旁游来游去,似乎人们并不专心看球。

突然,“铃铃……铃铃……”观众席上响起一片热烈的铃声,随风飘扬,十分悦耳。我知道铃是孩子们摇的,正感诧异,旁座G君指指球场上空,示意我看。喔,夜空中反复出现一串金色的字幕:“摇铃!使劲!”稍顷又转为“WOW”,于是全场响起“哗!”“喔!”的喝彩声,还伴随着掌声。原来,球场上出现了精采的场面,电子屏幕上及时鼓动、助阵。它像一位老练的乐队指挥,及时组织观众们动作,反映球迷们的感情。

“快看,在向你们致贺了!”R和几位青年不约而同地向我们呼喊。我从片刻的沉思中惊醒,忙又抬眼望夜空,果然,电子屏幕上正在反复显示:“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致敬!”“热烈欢迎中国客人观看我们的球赛!”还介绍了我们三位中国客人的姓名。这一份意外的盛情使我十分感动!随即,周围一些观众的目光向我们投来,我们忙含笑致意。直到此时,我才恍然省悟,我们坐的原来是全场最好的座位,贵宾席!

球赛渐渐进入高潮,“记分牌”上不断介绍双方成绩,观众的情绪明显集中了,高昂了,掌声,铃声,感叹声一阵高过一阵,合着那位不见面的电子

指挥大师的“口令”，在球场上空回荡。

夜并未很深，但夜风袭人肌肤，使人越来越感到春寒料峭的滋味。摇铃的孩子们最先偎在妈妈的怀里离席，接着是漂亮的姑娘们，冻得脸上发紫，掖紧衣裙出场。观众席渐渐松稀起来。我们坚持看到第六局，在金属椅子上实在坐不住了。轮流上洗手间，原想到室内去一会可以暖和些，谁知活动一下以后再回座位却更冷了。这时候 P 的夫人也叫冷得吃不消——也许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窘态，P 建议回去休息，我们忙积极响应。

当我们依次退席的时候，我再看一眼全场，只见有的男女还在吃宝塔样的冰淇淋，有的恋人相互偎依在一起。观众减少了许多，情绪却并未减弱，不时还出现“WOW”的场面。“这些才是真正的球迷！”我对自己说。

（原载《体育报》1987年7月）

逛美国“跳蚤”市场

有一次，我们乘车经过一个并不热闹的美国乡镇。同车有人介绍，公路右边是个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这名称挺新鲜。在新泽西州的一天下午，热情而细心的 M 姑娘陪我们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途中，顺道参观了一个当地著名的跳蚤市场。

那天预报阴有雨，天空灰沉沉地，像要下雨，我便问 M：“如果下雨，跳蚤市场也交易吗？”

“小雨不碍事。一个星期就这么半天，买卖双方都会老远赶去。如果雨下大了，那就早早收场。转眼跑得一精二光，比跳蚤还快！”她为自己最后讲了一句俏皮话而笑了。双手却握紧方向盘。

车子离开美丽的“花园大道”一直往西开，约莫走了一个小时，远远看到左前方一个停车场。大车小车，五光十色停满一大片。

进入停车场西面的一个大广场，只见无数个摊档，一排排、一行行，组成临时“街道”。中间形成纵横土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男女摊主们有的

高声叫卖,有的笑脸迎客。有几辆大货车,放着音乐,占领了一个有利的十字路口。几个年轻人站在车顶上起劲地推销旅游鞋。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这边是农产品集中地区。蔬菜新鲜,水果、干果堆满货架,红苹果、黄苹果用小木桶一桶桶出售。老太太们边议价边挑选。

那边整条“街”,全是百货。服装、手提包、鞋、伞、化妆品、袜子……摊主向妇女们热烈地讨价还价。我正想买手提包,一问价,五元到十元一个,觉得并不怎么便宜。后来才知道,同样的货色,比其他商店售价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一条“横街”上,出售各种当地的民间小吃零食。M买了一元钱一袋的炸香蕉片,建议我们尝尝。果然,又香又脆,不太甜,别有风味。

同去的一对老夫妇想买一把小锁。大家便一起走到“五金街”。这是由各种新旧小五金商品摊汇成的专门一角。商品从新型床头电话机、时新钟表,到各式小刀、多种多样的小工具、草锄,以及稀奇古怪的“古董”。许多男顾客在这里物色家用的杂物和修理工具。

我们转了几条“街”,天果真下起阵雨来了。刹时,摊档上纷纷撑起大雨伞,遮起了大雨布,顾客们披上随带的雨衣,M便带领我们到室内商场。那里也许是一些相对稳定的小店铺。有专门卖雨具的,专门卖饮料食物的,还有玩具,首饰等专柜。顾客反而不及广场上多。

我原想浏览一下跳蚤市场的全貌。但一看手表,已经逛了一个小时,却只看了半只“跳蚤”还不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另外半集也是各色小卖品。

回到了车上,我的脑海里还留着市场形形色色的印象。它使我想起我国农村的集市,小镇上的“庙会”,城市里的展销会。但从内容到规模、成交方式,又有显著的不同。

为什么叫跳蚤市场呢?看来是指小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中,灵活地成交后又迅速分散这一“人多又不稳定”的特点吧!但这样低档次的市场,为什么又能吸引这么多人远道而来呢?

我正在自问自答,M像猜到了我的心里:“这里是能买到最便宜东西的地方!因为跳蚤市场只是块空地,摊位租费比任何市场低,而当地政府对这里的交易免税,加上许多厂商常在此低价处理积压商品。”她解释道,“你们

知道,普通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对买便宜货总是很有兴趣的!当然,也有些人主要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来赶热闹,游玩一番。我们今天不就是这样吗?”她又俏皮地笑了。(原载《上海商报》1987年8月31日)

见识美国家庭式旧货铺

我们在美国新泽西州曾参观了一家家庭式的旧货铺。

它是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住宅区里,四周住宅全是带有绿茵草地和露天平台的两层楼。我朋友G大姊带我们来到其中一所住宅面前,走上台阶,推开玻璃门,要不是门旁有一块小小的不起眼的牌子表明这个住宅的性质,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家旧货铺子。G大姊笑着说:“没有本地人陪同,你们是见识不到美国市场的这一角的!”

进了玻璃门,是个小小的过道,完全和普通美国家庭一样。只是向左一转身,才看到平常做为客厅的屋子中央,陈列着六七排落地衣架,每排上面挂满了各式衣服。有半新不旧的男女大衣,有式样质地都不错的男西装,有五颜六色的羊毛衫,也有连衣裙,牛仔裤,宽松裤,儿童服装……在客厅的尽头,几只玻璃橱柜里摆着一些照相机、家庭小电器用品和妇女饰物。两个女店员在殷勤地接待顾客。

我们转了一圈,看见有五六个买主正在挑选衣服。一个中年人试穿着一套全毛浅灰色影格的单西装,七八成新,正合身,马上掏出十五元钱买了下来。另一个老人买了一套八元钱的棕色旧西装。一个老太太化了两元钱买一件大概是腈纶的编织衫。一个年轻妇女挑中一件花连衫裙……有趣的是,这里挑货物、试穿衣、付钱、包衣服、开发票,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听不到一般市场上的那种喧闹声。

女店员见我们几个外国人看来看去,以为是挑不到中意的东西,便主动上前介绍:“我们楼上还有高一档的货品,今天正巧不开放。如果你们想挑选,我可以请店主开锁,让你们上楼。”

我们原是怀着好奇心来观光,并不想买什么高档旧货。见女店员这样热心,生怕她真的要专门为我们去开锁,不禁心里有点着急。幸好G大姊已

在婉言谢绝：“谢谢你的好意！我的朋友另外还有事，不上楼了。”

离开这家别致的旧货铺，G大姊介绍说：“这些旧衣物大都是当地居民就近出售的，买的人却来自四面八方。店主虽然经营旧货，赚的钱可不少。”

让人们像走亲访友似地进行旧货交易，也正是旧货铺老板揣摸买卖双方心理的结果吧？我似乎悟出了一点美国式生意经。而买旧货，在金元帝国里竟还这样流行，也使我对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原载《上海商报》 1987 年 10 月 26 日）

凭吊巴黎公社墙

今年三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建立 125 周年。她是被马克思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的胜利结晶，同时也是第一个被国内外敌人相勾结，用武装摧毁的无产阶级政权。

中国人崇敬巴黎公社、缅怀巴黎公社战士。到巴黎去的中国人，几乎都想去看看巴黎公社社员墙。那里是最后一批公社战士退守坟场，殊死搏斗，集体牺牲的地方。我记着那次凭吊。

在一个阴而不雨的上午，年轻的朋友热情地驾车陪我到巴黎 20 区寻访公社社员墙。绕过长长的高大围墙，在一条小街旁找到公墓大门，这就是巴黎著名的拉雪兹(Lachaise)神父坟地了。进门一条长长的林阴道，两旁墓碑林立，划分许多区、排、号，阴沉的天气分不清东西南北，只好信步走去。一路看到很多我们熟知的法国名人——居里夫人、雨果、巴尔扎克、莫里哀等等，都在这里安息(其中居里夫人和雨果不久前已迁往“先贤祠”)。法国的坟墓，形态各异，简单的只是在地穴上盖一块石头墓碑，豪华的则门窗分列，像幢古老石屋，大理石巨碑，四周围以雕花铁栏栅。还有一处坟墓，平碑上躺着一个裸女浮雕，鲜花特多，朋友告诉我，那里埋着六十年代法国著名女歌星 P。

进入这寂静而复杂的世界，不知如何寻觅先烈的遗址。请教一位黑人花工，他指点我们折往西南角。经过一座又一座群墓，墓碑显示，有抵抗法西斯入侵的游击战士，有被德寇杀害的市民，还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死的犹太人墓。走完这条甬道，便是公墓围墙。“找到了！”朋友说，我忙随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段围墙的中间，约摸一人高的位置，嵌着一方醒目的大理石碑，一米宽光景，上面用法文分两行刻着：

“向巴黎公社死难者致敬

5.21—28.1871。”

这段由后人立碑纪念的围墙,就是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处身在肃穆的坟场,面对简易的石碑,我思潮滚滚。脚下的土地,流淌过烈士们的鲜血,他们是当年奋起抗击普鲁士入侵的法兰西爱国者,他们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革命先驱。我向纪念碑深深鞠躬。又仔细端详那堵水泥砌成的公社社员墙,墙极普通,历史的尘封已掩盖了当年的残暴与英勇悲壮,墙外已是居民的住房楼。在纪念碑的下方墙脚边,安放着一个比较新的花圈,挽带上用中文具名:××贸易代表团。四处还有好几束凭吊者不具名的鲜花。纪念碑左边墙上还有用刀刻写的“公社万岁”四个汉字,注明日期是1995.3.。我正在墙前沉思默想,忽见两位法国女青年举着照相机,立在路边,向我们示意。哦,她们要拍摄巴黎公社社员墙。我赶紧抱歉地让出位置,看着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快门,心里升起一缕慰藉:历史毕竟是人民的历史,真正爱国者永远受到人民崇敬,一代又一代……(1995年11月)

在巴黎登高

岁岁重阳,年年敬老。重阳登高,已悄悄纳入敬老节活动之中。今年单位里组织老人们登东方明珠塔,我不巧未能躬逢其盛,不由勾起前不久在巴黎登高的回味。

巴黎是座美妙的城市,山青水绿森林茂密,街道群楼间宫殿多,广场多,桥梁多,教堂也多。华丽多姿的欧洲古典建筑和新颖诡奇的现代化建筑交相映辉,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更处处点缀着绿阴丛丛。登高眺望,分外吸引人。

在巴黎登高,人们首选艾菲尔铁塔。诚然,这座高达三百二十米的镂空金属塔,是巴黎的象征。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每天从早到晚排队售票。你花三十八个法郎登上一百十五米高的“二层楼”(近三百米高的第三层常不开放)。绕空中游廊一周,俯视塞纳河在脚下缓缓流淌,对岸人权广场喷水池畔喧闹一片。右边跃入眼帘的那个金色大圆顶,是荣军院,拿破仑一世墓室就在它的下面。再远眺,依稀可见巴黎圣母院那两座从未装上塔尖的塔楼……一位朋友说:“不登上艾菲尔铁塔,不算到过巴黎。”可见这座

象征产业革命、象征科技征服年代的铁塔，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

然而，我在巴黎登高，别有兴味的却不在人工高建筑上。我喜爱西南 S 高地圣克鲁森林公园中的东山崖。崖边筑有一排铁栅护栏，背后林海茫茫，草场茵茵，崖边山风习习，头上白云悠悠，夕阳余晖下凭栏眺望巴黎城，仿佛面对一盘精美大盆景，处处翠碧闪光，雄伟的艾菲尔杰作，竟成了其中一个小摆设。令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我住在 S 高地上的女儿家，东山崖便成了我们散步的必到之地。

我也喜欢登临巴黎东北角蒙马特山巅上的白教堂。白教堂是巴黎老百姓的爱称，它的大名是圣心院。中央一个白色大圆顶，周围四座白色小圆顶，整座教堂全用白色石头建成，耸立在高大的鼓形底座上，很有东方情调。据说，设计师有意让罗马式和巴占庭式相结合，形成了这一别致风格，受到东西方游人喜爱。教堂后部还有一座近百米高的钟楼，里面有一口十九吨重的大钟，列为世界最大钟之一。如果你爬上钟楼，或者爬到大圆顶上，那就可以看尽巴黎全城了。不过，我更喜欢教堂前那顺山坡而砌的宽阔大石阶。人们从山下拾级而上，然后坐在高处，白天晒太阳，夜晚数星星，经常有上百名游客静静地在那里观赏花城景色。尤其是夏季夜晚，十点多钟天才黑下来，山顶上格外热闹。一天，我们看完夜场电影驱车夜游白教堂，啊，溶溶月色下，俯对流光溢彩般的夜巴黎，石阶上的男女老少，还是兴致盎然，指指点点，毫无倦意。

登高望远，可列为古今中外的共同兴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国古人为留此下了多少诗情画意！而法兰西人，自己捐建登高景点，自己尽情享受，这也是一种高卢族子孙的潇洒吧！？
(1995 年 11 月 3 日)

“机器楼”

——蓬皮杜中心见闻

管道，管道！钢铁管道，玻璃管道！这便是蓬皮杜中心给我的第一个强烈印象。稍为仔细观察一下，钢铁管线、钢铁支柱、钢铁栅栏，玻璃罩、玻璃

窗、玻璃门,还是钢铁加玻璃。色彩呢,基调灰色,也有白线条,略有点红色点缀。总之,是座露筋露骨的“机器楼”。说它是现代艺术作品,算是开了眼界,说它是在巴黎众多古典建筑间别树一帜,倒还说得过去。

这座坐落在巴黎第九区“美镇谷地”的文化中心,建造了整五年,在1977年揭幕,占地十万平方米,共有六层。钻进大蟒似的管道电梯,从玻璃罩上可仰望蓝天白云,直登楼顶,俯视市中心的各色居民住宅屋脊,也别有风味。

中心有许多文化娱乐设施,最吸引人的是那个图书馆:阅览厅特大,内容丰富,极具现代化。电脑成排成行,随你使用随你玩。许多法国人,许多不同肤色的留学生,在那里借书、查资料、写文章;一些家庭妇女挂着耳机在那里专心看电视节目;几个失业工人在那里玩电脑,消磨时光;更多的是游客,哪里新鲜便往哪里凑。难得的是偌大一个巨型阅览厅里,竟然鸦雀无声,人们彼此几乎都用气声讲话。

我的女儿、女婿在调两台单放着的电脑。我问他们查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是世界性联网的,他们想试试调北京、上海。小外孙女喜欢小动物,便拉我坐到一台小型电脑前,教我查找有关鸟的资料。随着她的小手操作,我看到一张张地球各个角落的鸟类彩色图片。接着我们又来到一台特别装置的大电脑前面。女婿一拨弄,屏幕上显映出一份贝克多大家庭的历史和现状资料,在法国地图上圈出从哪个省发源,后来迁居到什么什么地方,现在全法国有多少姓贝克多的,在巴黎住有多少人,再拨弄一下,又显示出这家族中有哪些名人学者,每个学者有什么著作……我看得新鲜有趣,建议女儿另外查一个姓氏。她便查了自己姓的法文拼音,好家伙,屏幕上扫描,扫来扫去,最后在巴黎地图上显示:只有一个XU。我们一看,忍俊不禁,这真是法国式的幽默:“我这里没有储存,你既然查找,那你便是第一个了!”机灵的电脑会开玩笑,逗得我们乐了好几天。(1995年11月17日)

巴黎乞讨者

法国人有一句自豪的话:“我们得天独厚!”不错,事实确是这样。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人口适中,加上反封建比较彻底,产业革命比较早,因此,法

国的富裕在世界上也算名列前茅了。可是现在,法国正在经济不景气。传媒报道失业人员近五百万,这对于一个总共不满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相当惊人的数字。尽管有失业补贴之类的措施,矛盾还是不断反映到社会上来,成为社会问题。最浅表层的便是形形色色的乞讨。

乞讨,似乎在东西方国家都还存在,程度不同,原因各异而已。富如美国,我在大西洋城亲眼看到马路边高喊“给我买个汉堡包”的乞丐。美国朋友给我解释说:“这是赌徒的下场。要么去跳大西洋,要么当乞丐。”

法国的乞讨者,可能也有大西洋城式的,但更多却令我又惊又怜,一种说不清的感受。

超市门口,一位老人把手伸到你面前:“请给一个法郎!”唉,他没有子女?福利部门没有照顾好他?

闹市街头,一位高大的壮年汉子站在路边,颈上挂块纸牌:“我肚子饿,找不到工作,请给我点钱买面包!”唉,一个大男人,弄到伸手讨钱地步,他一定觉得羞愧难当,丢尽了脸!

地铁站上,一位妈妈,抱着一个孩子,旁边放一瓶水,面前放个碟子,默默地企盼路人布施。唉,妇女儿童,谁来给他们一点保护?!

你如果天天上街,你准会天天看到这种情景。当然,富于同情心的巴黎人也不少,我目击一位中年男子从暂停的轿车窗口伸出手,给了那失业壮汉十法郎;也看到过两位老年妇女从钱包里各自挖出一个法郎,给一个乞讨的妇女。

有别于直接乞讨的,是变相求施舍。地下停车场出口处,经常站着男或女的“卖报人”,不叫卖,也不兜售,人们约定俗成似地给十法郎,拿一份薄薄的印刷品。回家一看,是失业工人自己印的简报,有时还有漫画。这也算一种义卖吧?有的广场上,聚集许多“卖艺人”,唱的、跳的、画的,有些“随缘乐助”,有些也在讨价还价,其中也有不少是电影上常见的欧洲式乞讨者。

乞讨的人多了,引起社会注意。传媒报道,政界发生争论:一派主张禁止在大城市乞讨;一派反对,说这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你这个省禁止,他又到那个省去乞讨了……

没有根本解决办法,有的乞讨者便沦为小偷。当然,小偷的性质更复

杂,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社会问题了。

(1995年12月1日)

密特朗与卢浮宫

密特朗病逝以后,巴黎居民悼念他,说明这位在法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为人们做过有意义的事情。振兴卢浮宫也是其中一件。到巴黎旅游的人们,差不多都会去参观卢浮宫,看看精美的宫殿建筑和设在那里的艺术博物馆。密特朗正是在这两方面做了让人们高兴的事。

卢浮宫是巴黎著名古典建筑群,由“大卢浮宫”、“柱廊”、“方形庭院和钟楼”等各具魅力的建筑组成。远看并不高大,地面上只有三到四层,可占地不小,光那个方形庭院,长和宽就都超过一百二十米。以致经过卢浮宫底下的地铁,从东往西设了两个车站。

卢浮宫的历史,可上溯到十三世纪。那时的原型只是塞纳河边的一座防御性城堡。以后有国王把它改作了王宫,还兴建了一个图书馆,但并不怎么出名。到了十六世纪,当时的国王委派著名建筑师莱斯柯设计改造王宫,拆去城堡,新建了一座宫殿,这才有了具有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的卢浮宫,并开始收藏艺术品。以后历代王朝不断扩建、装饰、收藏,直到拿破仑三世才完成总体设计。十八世纪末对外开放卢浮宫艺术博物馆。如今,据说收藏目录已达四十万件,主要是从公元前古埃及、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现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品,其中有不少世界闻名的艺术精品,如古希腊断臂的大理石雕像维纳斯,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又名焦贡妲);深受法国人民喜爱,被称为近代第一幅政治性绘画的大型油画《自由之神引导着人民》……

显然,随着艺术馆名扬四海,参观游览者越来越多,挤在卢浮宫部分建筑里的展出场所太局促了。1981年,法国首位左翼总统密特朗上任后,决定整修卢浮宫,并把它全部用作艺术博物馆。首先让占据卢浮宫“花神楼”的财政部迁出宫外。接着又亲自批准在卢浮宫前建造玻璃透明金字塔。这两件实事大得民心,使卢浮宫面目一新,巴黎人津津乐道了十几年。

玻璃金字塔由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创作。当时为了解决经过整

修的大卢浮宫进门大厅的采光采气等问题,难倒了许多建筑师,又要实用又不能影响古建筑风采。贝聿铭精思妙想,一鸣惊人,他把巨大的大厅设在地平线以下,顶上设计了一大二小三座玻璃透明金字塔式建筑,解决了难题,又和卢浮宫和谐连结,相得益彰。从此,卢浮宫有了二十世纪的东方艺术精品!过去,人们游览艺术馆,享受了“美不胜收”之后,会因其中没有伟大中华民族的青铜雕品、没有秦俑而遗憾;而现在,中华裔胄为卢浮宫增添了新的魅力。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一进正门,便看到通明透亮、玲珑精美的三座玻璃金字塔,无不高兴非常,啧啧称赞贝聿铭,连带谢谢密特朗。

(1996年1月28日)

“玛米达”们 ——巴黎老奶奶生活一角

巴黎的老年妇女们,日常是怎么生活的?我记叙几位“玛米达”们的一鳞半爪。

玛米达,原是祖母的意思,有些妇女年事已高,孙辈长大了,亲戚、朋友、邻居们便跟着对她尊称玛米达,好像上海人叫“阿婆”吧。

我结识的一位玛米达,是个知识妇女,又是道地的家庭主妇。长得高大肥胖,很能干,很会自得其乐。她出生于1909年,先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养育过三个孩子,现在和小儿子一家生活,日子过得很美满。

“我一辈子没有上过班,现在却拿两份养老金,儿子每月还给我生活费,晚年过得蛮不错吧!”玛米达向人介绍她自己,也常常在客人面前表露她的知足和快乐,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艰难:“丈夫原来是大学教授,为抵抗德国侵略,被伪政权关进了监牢,我带着两个孩子,可吃苦哩。秘密藏着最珍贵的一点点食品:两块巧克力,一磅白糖,自己瘦得只有七十八斤重,可哪怕要饿昏过去,也舍不得吃一丁点儿。”她是一位法国的贤妻良母。二战胜利后,她丈夫到政府里做事,一家开始享福。十年前丈夫去世,她继承了丈夫的两份养老金。每天在家早起早睡,喝点葡萄酒,吃点好东西,做做巧克力蛋糕,看看电视、书报杂志,其余时间就开着汽车外出游

玩,走亲访友。前不久,她邀集了十五位年纪相仿的玛米达,尽情玩了一天,各自述说在本世纪的经历。为此她兴奋了好几天。我事后听说此事,很遗憾未能参加这样的世纪老人聚会。

后来有一次,玛米达请另一个玛米达晚餐,我也应邀参加。只见两个玛米达全副盛装,主人穿着大红上衣,翠绿裙子,点了唇膏,指甲涂上大红蔻丹,戴上珍珠项链、钻石戒指,席间还使用银餐具。客人也是服装鲜艳,珠光宝气。俨然两个贵妇人。我奇怪一次家宴为什么这么隆重?后来才明白,原来来客曾是一位银行家。这位老太太也很健谈,席间大家议论起巴黎小偷,她法语夹英语,讲着讲着,竟当众从领口探手到胸罩里拿出一叠纸币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她说,前不久她的皮包被小偷抢去了,吓得她以后上街不敢再带钱袋,只好想出这个藏钱的办法来。

这位老太太的女儿女婿曾到中国工作,她得知我从上海到法国旅游,便表示出很友好,说有机会也要到中国看看,一再跟我拥抱亲脸。

另一次,玛米达到邻居家和其他老太太们聚会,也有好些人,相当热闹。我和女儿、女婿、外孙女正好去森林公园散步,路过那家院子,听到声音,孩子们便从篱笆缝往里张望,说好像气氛不大对头。果然,玛米达回家后便发表议论,认为那邻家女主人不像话,年纪没有请来的客人们大,却老要炫耀自己,对客人不尊重。

家庭邻里间有意见,有不同待人接物方法,这大概在什么国家都会有。不过,在我逗留法国的日子里,还没有看到或听说过婆媳吵架、邻里相骂这样的事。

(原载《上海老年报》1996年1月12日)

小住比利牛斯山

欧洲的比利牛斯山,是避暑滑雪胜地。绵亘四百多公里,海拔二千米以上。位于两国交界处,山北是法国,山南便是西班牙了。我从上海到巴黎探亲,女儿女婿说要陪我去山上小住一周。先由女儿自驾车,送我和小外孙女星星向比利牛斯山进发。

从巴黎到比利牛斯山,本来可以乘飞机到P城,再租车进山。由于女儿

要陪我一路玩几座大城堡,因此不辞辛苦,决定独自开她那辆小雷诺南行。第二天下午到P城,将车子整治了一番,做好进山的充分准备,下午六点即出发直奔山区。

行不多久,右前方黑云密布,雷声隐隐。遥望四周,重峦叠嶂,已笼罩在云雾雨幕之中,天色也明显阴暗下来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盘山公路,左一旋,右一旋,越旋越高,我非但没顾上欣赏“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壮丽景色,相反,每逢车子拐弯时,看到越来越深的山脚,便觉亲临万丈深渊,惊心动魄!我女儿上海生、上海长,想不到她却艺高胆大,“关山度若飞”。我的心尚未放下,车子已行驶在平坦的路上,L镇到了。

L镇在群山环抱之中。她是比利牛斯山区一个九百米高的山岬,以风景优美著称,被誉为高山名镇。

L镇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军事要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她都为抵抗入侵者奉献了自己的儿女。据说全镇鼎盛时期有二千多人,二十年前山区公路筑成,青年们纷纷下山进城,镇上便由老人们挑重担。只有到避暑、滑雪季节,游人们才回家度假。但是,外来旅游者却不分季节,常年络绎不绝。

这个镇子不大,小巷曲折,一片宁静。居民几乎都住两层小楼,灰色屋顶,盖的是用石头削成的“瓦片”,石头砌墙,石门框上刻有年份:1822年、1864年等,标志房屋的历史;也有新盖楼房,同样灰顶、木门、木窗,古朴和谐。不过,无论新老住宅,室内全现代化了。每家都有宅旁小院子,很少种蔬菜,大都是草坪、鲜花、树木。一些特别娇艳的高山花卉引人驻足。更有趣的是街头巷尾不时出现清泉池:山泉从石缝中汩汩流出,人们凿石成池积聚,清澈见底,不停流淌。处处泉水,户户鲜花,这是L镇留给我的美好印象。

小镇的宁静,还表现在许多住宅关门闭户。原来,这些住宅是城里人的别墅,门虽设而常关,只有到度假季节,主人来此度假,才热闹起来。

晚上是L镇最活跃的时候。游山的人前来投宿,农民们回镇休息,镇中心的广场和餐厅顿时热闹起来。特别是餐厅的主人C,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一位乡村画家,有趣的是他的画上都盖有一颗中国名章“佳峰”,用的是西泠印社的青色印泥。他爱中国,他的这个中国名字是我女儿取的,那颗上海刻的图章和制作的印泥,也是我女儿送的。“佳峰”个儿不高,瘦瘦的

脸颊长满胡子,能烧一手传统法国菜,那天他亲自当厨,招待我们。在L镇,“佳峰”称得上是名人了。

在L镇住下,女婿也从巴黎赶来了。他陪我去访问了一户法国农民。女儿女婿就认识这一家世代农民。拣了一个凉爽的下午,女婿开车到对山,路经一处政府指定的游人宿营地——全是五颜六色的帐篷。不远处就是我们要去的农场。车刚停下,一大二小三条狼狗便狺狺叫着迎出栅栏门,随着主人的吆喝,又安静下来摇头摆尾欢迎我们。说这个农场大吧,也真大,上下左右山坡全是牧场,说它小罢,也够小,一共两间小石头屋便是“场部”。小屋旁有一排猪舍、羊棚,还有一口自来水水池,屋前有几畦菜蔬,几棵果树。小屋北面场地上有几台农机具,一群色彩斑斓的法国鸡在寻食。最看不懂的是场地当中有一座高大的水泥建筑,平顶,两扇大铁门锁着,墙上只有高处开两排气窗。这是大仓库吗?又不像。

主人是一对约摸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女的穿一件短袖旧连衫裙,头上包一块花巾;男的穿一件长袖球衫,左手齐腕处断了,只剩一只手臂,是机器轧的。两位老人让我们进小屋。这小屋,泥地,朝南有玻璃窗,两面墙壁都熏黑了,松木天花板很低,也黑得要滴下松油似的。楼上是卧室。我们坐的这间屋子,做饭、就餐兼会客,隔壁有间暗室,放置杂物。整个小屋估计和主人年纪相仿。

这户农民除两老外,还有个儿子,是主要劳动力,到山坡上干活去了。两老帮儿子经营这个农场,不雇工,他们的农活主要是牧养,共养了二十五头牛,其中两条是牛犊,大牛每头价值一万五千法郎。除了养牛,还养了几十只羊,挤奶做奶酪,三头猪,十只鸡……割草、切草、储草、喂草都用机器,运输、送羊奶等有卡车,还有一辆进城的小车……

这户同中国普通农户生活差不多的主人,竟是一户百万富翁呢。他们现在最忧虑的是,独养儿子已四十出头了,还没娶到媳妇。村里的姑娘大多进了城,没有人肯嫁给山区的农民。他们说如果上海姑娘肯嫁到比利牛斯山,该有多好啊!说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原载《上海滩》 1996年1月)

花都玫瑰园

巴黎别号花都。大街小巷花店多,有庭院的居民家都栽花。而我却是在去过玫瑰园之后才领略到花都的魅力。

玫瑰园是巴黎市区布朗涅森林之中的一个大公园,因为培育种植玫瑰花出了名,老百姓便爱称她为玫瑰园。

盛夏中的一天,女儿和小外孙女星星陪我去看玫瑰。森林中并不炎热。我们穿过一带灌木丛,豁然开朗,三两古典建筑前面有大片大片绿茵茵的草地,远看小山旁花团锦簇,灿烂如霞。渐走渐近,在阵阵花香中,只见花畦、花丛、花架次第展开,绿叶间红的、紫的、粉的、妃的、黄的、白的、墨的,色彩缤纷,全是玫瑰!鲜花盛开的玫瑰之路,真使人目不暇接。特别吸引游人的是那座“玫瑰长廊”。进入廊内,两旁林立的是手臂般粗的“玫瑰树”,树枝沿着花棚柱子往上长,在棚顶与对面伸过来的树枝相接,形成廊盖。环顾四周,满眼老干嫩枝、绿叶鲜花,馨香醉人;仰望天空,仿佛成了一幅百花争艳长卷的蔚蓝色背景,阳光只在枝叶缝隙间洒下;低头观察花桩,发现每株玫瑰根部挂有一块小牌子,记述她的品种、历史、花龄。逐株看去:竟有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玫瑰花有这么长寿?我正暗暗称奇,女儿忽然兴奋地招呼我:“姆妈,来看世纪玫瑰!”我忙过去,就在长廊出口处,右面一株碗口粗的玫瑰,深褐色根部,紫色花朵,小牌上两行小字:1908, America;左面一株欧洲红玫瑰,赫然标明1900年!嗨,玫瑰奶奶高寿九十五了!

刚出玫瑰廊,小外孙女已在大花圃那边欢呼:“我找到同岁的玫瑰树啦!”果真,一丛茁壮的中国玫瑰,金红色,鲜艳欲滴,香味浓郁,正是小星星出生那年那月栽培的。她站在花旁边,让妈妈给她摄像留念。这个花圃里的玫瑰株大花繁。其中一株刚在欧洲评比中得金奖的新品种,粉色复瓣上点缀着红丝丝,开了约有上百朵。管理员滔滔不绝地介绍,十分自豪。

花与鸟是好朋友。玫瑰园也证实了这一点。

傍午时分,看花累了的人们正在草坪旁的长椅上休息、野餐,忽然听到“呱——呱”的鸟鸣声,回头看去,呀,一只蓝孔雀!正从树林里向草坪走

来 ,一路鸣叫。是在寻觅走散的伴侣吧 ? 星星和其他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 ,忙跑到草地边逗它。那孔雀睁着乌溜溜的小眼睛 ,对孩子们看了一会 ,忽然 “ 哗 ” 地张开彩尾 ,开屏了 ! 然后 ,在孩子们一片欢呼笑声中倏地结束表演。孔雀公子又抬起高傲的头 ,旁若无人地回到树林里去了。绿草地严禁游人进入 ,然而孔雀锦鸡、鸽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那里休闲。

玫瑰园 ,不愧为花都之花冠。快半年过去了 ,我还想念她。而她尊老爱幼 ,优待老人和孩子 ,免收六法郎一张的门票 ,也值得人赞赏。

(1996 年 2 月 4 日)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言为心声

新闻评论

人定胜天

现在,本市已经受到十级台风边缘的影响。市防汛总指挥部发出了紧急预防措施的通知。

正当我们工、农、商、学、兵热烈响应党中央和市委号召,齐心协力,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时,半路里杀出了一阵台风来,它可能影响生产,损坏农作物,当然是增加了我们一些困难。

目前,人们的科学水平还不可能消灭或控制台风那样的自然灾害,我们只能以人的干劲来跟它战斗。古语说,人定胜天,说明人还是有力量可以胜过天的。所以,要战胜台风,减少甚至避免台风造成的损失,就和我们每人对待台风的态度很有关系。

有种人一想起那呼啸怒吼的十级飓风,想起它那种拔木倒屋飞石翻船的破坏力,便不寒而慄,觉得天然灾害,人力难以挽回,防台防台,聊行人事罢了。另一种人天生乐观,心想:台风,每年照例有,又有哪几次真正经过上海呢?当然,防还是得防一下的。

很明显,这两种人都不可能算是已“定”的人。以这样的态度来做生产战线上的近卫军,就有失败的危险。真正担得起风险,经得起十级台风考验的人,应该是既不被自然灾害吓倒,又不抱一点点侥幸心理,抓紧时机,发动群众,迅速地沉着地做好各项防台措施,做好和台风作斗争的准备。

和台风斗争,是一场保卫人民财产,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对“天”战斗,希望我们大家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又经得起对“天”斗争的考验!

(1958年9月4日)

清明看风俗

清明,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

近年来,每当清明佳节,人民群众扫烈士墓、绿化环境、加紧春耕、组织春游已蔚然成风。我们看到,这些新风俗正是从旧风俗中转化而来,不同的是:新风俗处处表露了发奋向上、心情舒畅的气氛;而旧时代的那种掌握不住自己命运和“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悲愁境界,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对农民来说,他们自古以来就盼望清明有个好天气,据说清明是晴是雨对农耕很有关系。然而从前,他们说:“清明,心里定。”老天爷总算帮忙,不愁秋后饿肚子了,现在呢,农民说:“清明,更起劲!”自然条件好,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哩。

旧俗,人们在清明节爱把柳枝插在门上,柳条戴在身上,祈求可以“袪除不祥”,可以“红颜不老”。现在呢,人们畅快地发挥着爱好杨柳,爱好春天的天性,在清明前后大搞绿化,兴高采烈地美化环境,美化城市。

扫墓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从前,人们只祭自己的祖宗,在祖宗坟前不是凄凄凉凉地叨念“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立下继承祖业的狭小志愿,要终身为光宗耀祖而奋斗。现在呢!人们祭祖之外成群结队地去凭吊革命先烈,从先烈英勇牺牲、忠心为国的崇高品质中获得无限鼓舞,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至于劳动人民群众性的春游,在从前则是少数士女的“踏青”。

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清明,保存了浓郁的民族风俗,民族形式,而它的内容,却是推陈出新,灌注了崭新的时代思想。

帝国主义分子污蔑我们不要民族传统,固然是荒唐之至,而某些不分精华和糟粕,硬要全盘接受古代传统的先生们,也在人民群众前面碰到了钉子。

(1960年4月5日)

“五卅”的种子

“一颗种子会发芽！”这是解放前革命人民爱唱的一句歌词。它揭示着一个真理。

三十五年前，上海人民掀起的震动世界的“五卅”运动，就是这样一颗深埋进人民心底的种子。

“五卅”的种子，是颗什么种子？请听听七十二岁老工人陈家龙的回忆：“我们一队工人走到南京路上后，从袖子里刷的抽出旗子就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分子来了向我们开枪，我们还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这样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看，团结一致，不怕威胁，坚决反帝！这就是“五卅”的种子，“五卅”的精神，“五卅”的传统。这颗种子，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培育下，在全国人民中发芽、壮大，开放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丽鲜花，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果实。为保卫伟大的果实，为进一步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还在继承和发扬“五卅”的传统，誓与我们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如今，像三十五年前埋藏在中国人民心底的“五卅”种子那样，千百个反帝的种子在目前“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犹如经过一场春雨般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黄、黑、白各种种族的人民中迅速发芽、成长着。这些种子，正以自己日益粗壮、日益坚韧的藤蔓，为帝国主义准备下一个又一个的绞索。

“一颗种子会发芽！”“五卅”精神愈来愈发扬光大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坏事，让他们遭受千百个“五卅”种子的惩罚吧！
(1960年5月30日)

“更加众志成城”

送别了1961年，迎来了1962年。用什么吉祥的字眼，来向我们英雄的人民祝贺新年呢？想起了毛主席《西江月》中的名句：更加众志成城！

“众志成城”原是一句古语,说的乃是:众心所好,莫之能败,其固如城。春秋时候,越国勾践君臣,坚决依靠人民精神上的无形之城,毅然拆去砖土的有形之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打败了侵略者吴国。及至毛主席用这句话来吟诵当年革命圣地井冈山以后,它更具有了崭新的丰富含义。它启示我们:只要大家共怀革命大志,紧密团结,同心同德,有对待敌人或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努力干去,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必然坚强如钢,战无不胜,建无不成!

回顾1961这不简单的一年,我们不正是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众志成城地克服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从而获得新的成就吗?

瞻望1962年,我们看到,前进道路上摆着新的艰巨任务,也还有大大小小的暂时困难。同时,我们又看到,这新的一年也展开了新的大好形势:党的红旗更鲜艳了,八字方针更丰富有力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更多了,建设的经验更完整了。……面对这一切,“更加众志成城”——

只要我们进一步树立革命志气,齐心合力,鼓足干劲积极干,我们充分相信,一定会夺得一个又一个的光辉胜利!

人各有志。可贵的是首先建立革命壮志,重要的是化各自的小志于国家、集体的大志之中。我们用“更加众志成城”这句话来彼此祝贺新年,也用这句话来彼此共勉: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坚固城堡的共同志向下,我们各人竭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精心地砌上每一块砖头! (1962年1月1日)

好读 苦读 乐读

前些时候,偶然在一个文教单位里看到一条口号:“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由吃了一惊。这九个字不是过去讽刺“填鸭式”旧教育的名言吗?现在拿出来起什么作用呢?仔细一打听,却有理由:“读死书”,说的是要把书钉住不放,读精读透;“死读书”是拼命读书的意思;“读书死”则解为学到老,至死方休。原来是提倡发愤读书的,言之成理,不由衷心钦佩这种勇气和决心!不过,当时心里也留下了一个小疙瘩:缺了些什么!

近来,各方面的读书好学风气盛起来了、学理论、学业务、学知识,自学

的、听学习讲座的、上学习班的，到处书声朗朗，为上海之春增添了一股芳香的书卷气。透过书卷气，还不时飘来莘莘学子们的轻盈笑语：“学习是义务吗？这是多么愉快的义务啊！”

从这一片读书乐的气氛中，重又唤起我前些时候留下的那点疙瘩来了。是了，那九个字的口号，发愤苦学的精神可嘉，可惜就少了那么一点喜笑颜开的读书乐味道。

人们对读书此事，由于目的不同，很有不同看法：好学不倦，为读书而读书的人，歌唱四时读书乐，推崇人生惟有读书好，懒虫们则胡诌什么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子冬有雪，收拾书箱待来年。也有这么一种人，念念不忘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利禄读书，用是用功了，却是十载寒窗，愁眉苦脸。我们现在提倡学习，是为了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增进文化修养，丰富各种科学知识，一句话，目的在于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爱好学习，不仅向书本学，还向实践学。这两方面学习，确实都是义务，但真正懂得我们学习目的的人，都会说：“这是多么愉快的义务啊！”所以，就读书来说，除了“悬梁刺股”的苦学精神外，还需要加上一些“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乐学精神才好。

我们来提倡“好读书、苦读书、乐读书”怎么样？（1962年3月23日）

多写点孩子

作协上海分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在举办儿童文学讲座，以促使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着实有点欢喜。欢喜之余，还想提点儿建议。

近年来，给儿童读的、看的东西不算少了，常常听到孩子们在眉飞色舞地议论那些书本、电影、戏剧里的主人公：可爱的孙悟空呀，高大的伊凡呀，小布袋呀，熊妈妈呀，也有历久怀念不忘的志愿军叔叔黄继光，解放军伯伯杨子荣等等，确实不可谓不丰富了。然而，当你和孩子们讲故事时，他们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讲刘文学斗地主！”“编一个小林上月球！”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这说明孩子们不能“忘我”。他们要求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英雄”。

孩子们自己的英雄 ,是有各式各样的。抗日战争时期 ,老解放区盛传像西流水村的四喜子、拴拴那样的儿童团员们的英勇故事 ;在解放战争中 ,有革命到底的刘海泉 ,也有不向反动派的黑暗社会屈服的三毛。而现在 ,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孩子们过的是幸福生活 ,既无冻馁之苦 ,也不会小小年纪就去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 ,学习玩乐 ,德、智、体并进 ,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志愿和独特才能。解放以来 ,我们不是出了不少天才的少年儿童吗 ?请看 ,英勇渡珠江的四岁游泳健儿郑婉儿 ,获得国际声誉的五岁小画家黄黑妮 ,七岁小学生应兰芳写文章登报 ,胡荣华十四岁时打败三次全国象棋冠军杨官璘 ,十五岁的红领巾吴茂棋研究农业科学有成绩……这些出众的少年儿童 ,正是当前孩子们向往的“英雄” ,他们的成功史 ,不正是作家们写来教育和激励孩子们天天向上的好材料吗 ?

多为孩子们写点孩子自己的故事 ,多写点孩子们自己的“英雄” ,多写点孩子 :这是向儿童文学家们提的一点建议。当然 ,这里丝毫也没有认为可以少写点其他题材的意思。相反 ,衷心祝愿我们的儿童文学百花齐放 ,日新月异。

(1962 年 3 月 27 日)

致 公 民 某

听说公民某在津津有味地向人家介绍他不久前的一幕“试先进”的“趣剧” :有一天夜晚 ,公民某来到一家先进的饮食商店 ,找到一位先进的营业员 ,要吃一客当天已经售完的包子。那家先进商店的营业员们向他耐心解释 ,同时送上其他美点。可是公民某始终不满意 ,他满有理由地说 :“你们是先进商店 ,你们不是要千方百计地使顾客满意吗 ?”非要那家商店给他做起一客包子来不可。

我听了这一段转述的“趣剧” ,老实说可一点也“趣”不起来 ,相反 ,却是感到一阵脸红。

我为那位公民吃那几只包子脸红 ,更为他津津乐道此事脸红。

在我们的社会里 ,各行各业都有先进分子。他们觉悟高 ,思想好 ,不计较个人得失 ,处处为了我们共同的集体事业着想 ,他们走在我们大家的前面 ,为大家做出了出色的榜样 ,他们是时代的尖兵 ,是整个社会共有的瑰宝。

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总是抱着敬重和爱护的心情来对待先进者,祝愿他们红旗长树,尽可能帮助他们,唯恐他们受到什么挫折而影响前进步伐。

可是,像那位公民的行为,又算什么呢?对先进者心有不甘吗?嫉妒吗?故意为难吗?总不会是真的迫切想吃那几只包子吧?——就算不去追究他的什么思想动机,只是就事论事来说,用这种所谓“试先进”的行为来作为“趣剧”,以别人的谦虚忍让为可欺可笑,以强人所难来逞自己一时之乐,不未免也太无聊了么?而从那位公民事后还津津乐道这次便宜的神态看来,可能他还相当欣赏自己的聪明哩。人家在“我为人人”,而他只要“人人为我”,不以为耻犹以为荣,这种“聪明”不未免也太可怜了么?

据说在上海像这样的“趣剧”还不是绝无仅有的。让我们大家衷心奉劝公民某们:当你们兴致勃勃地制造“趣剧”时,当心你们自己变成剧中的丑角儿!

(1962年4月5日)

压 不 倒 !

4月12日,我们上海人民有资格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任什么力量也压不倒的。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叛变革命的血手,妄想用枪弹与刺刀压倒上海的革命人民。可是,尽管血流宝山路,尽管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上海人民并没有被压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

自此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上海人民又曾无数次地证明过这一真理:敌人的残暴镇压压不倒顽强的革命意志。相反,革命力量在斗争中日益壮大,终于汇合在全国革命队伍中,推翻了凶恶的反动统治。

武力镇压压不倒,经济困难难道就压得倒么?大家都记得1950年的美蒋“二六”轰炸和封锁禁运。敌人疯狂的经济破坏,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自力更生,克勤克俭,不是顺利地渡过了敌人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困难,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毒辣阴谋而大大发展了经济吗?

近年来,我们国家连续遭受了自然灾害,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到了一些暂时困难,黔驴技穷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们又想趁机蠢动了。他们窃窃私议,妄想借自然灾害之手来压倒中国人民,来达到他们久所达不到的目的。这真是可笑!就拿上海人民来说,当敌人的枪口对着胸膛、飞行堡垒满街横行、炸弹在头顶呼啸、发电厂被破坏、电力中断、工厂原料设备被封锁禁运、人民和平生活被威胁等等的困难面前,我们尚且无所畏惧,始终英勇屹立,毫不动摇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勇前进的意志,难道,已经和正在克服中的一些暂时困难,却反而能压倒我们吗?帝国主义者真是做梦!

帝国主义反动派们,如果不是太愚蠢无知,就是太健忘了。他们如能记住像4月12日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许不是无益的吧!我们上海人民在今天,要再一次提醒他们:上海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是任何力量与困难都压不倒的!

(1962年4月12日)

“红楼”冤

“红楼”冤,说的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一次遭遇,请勿作其他遐想。

事情得从我朋友的朋友说起。那是一位好学的青年工人,前些日子他要求我朋友介绍些长篇小说读读。我那朋友原是个小说迷,拿起笔来《红岩》、《创业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写了一大张,最后建议说也可读读我国五大古典名著。不料,这一建议却惹出事来了。一家区图书馆的管理员看了《红楼梦》、《西游记》这些书名,又端详了那位青年工人一阵,眉头皱得紧紧地说:“不借!”还补了个问题:“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看这些古书?”

这一问,吓坏了青年工人,气坏了我那朋友,也使我纳闷了好半天。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呢?难道他是一位“不准青年看闲书”的现代“卫道者”吗?看来还不至于如此“冬烘”。难道他竟不知道那些书的内容,误以为荒唐邪说,生怕贻害青年吗?这不可能,如果连祖国名著都一无所知,他怎能接受图书管理员这一职务呢?难道……

忽然,我想起另外一些事来。在生活中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正确地反

对洋迷信,有的人连外语书也卖了,正确地反对脱离实际,有的人连图书馆都不进了,正确地主张古为今用,有的人便否定一切古书了——这是一种“框框病”。患这种病的人心肠倒是好好的,可惜头脑里充满了一种叫做框框的病菌。去了那一框框,来了这一框框,从此绝对,到彼绝对。

也许,那位区图书馆管理员,也害了这种“框框病”了吧?

“框框病”害人害己,必须根除。除也不难,坚持去掉框框就是。去掉各种有害的框框吧!

(1962年4月20日)

欢 送

今年参加新疆建设的上海社会青年,今天开始出发了。北站送别的盛况,使我们想起十五年来无数次类似的情景!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我们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欢送上海青年南下,激励他们跟着解放大军,彻底打倒反动派,把红旗插遍全中国——他们没有辜负这一期望。

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席卷全国,我们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欢送参加志愿军和参加军事干校的上海青年,委托他们带着上海人民的满腔义愤,坚决打垮侵略者——他们又没有辜负这一期望。

以后,我们又欢送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上海青年,欢送服兵役保卫祖国的上海青年,欢送下乡上山建设新农村的上海青年……每一次,青年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上海告别,每一次青年们都意志坚强、满怀热情地出色完成党和人民所交给的任务。上海青年志在四方,已成了革命的传统。这是上海青年的骄傲,是上海父母的光荣,也是上海人民的责任。

今天,我们又来欢送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了。这批青年,在上海解放时还是幼儿。十五年来,党对他们精心哺育、培养,我们眼看他们成长,眼看他们长上翅膀,可以高飞远翔了。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他们向上海告别的声音,充满欢乐,充满信心,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听着这些声音,我们可以坚信,这批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姑娘们,也一定不会辜负国家、人民和父母的深切期望,一定不会辜负党的谆谆教导,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上海青年的

革命传统,一定会和老同志们一起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1964年5月21日)

从“一”出发

我们大家熟悉的“一”这个数,是个有趣的东西。在小学生眼睛里,它是一个最简单的整数,到了数学家头脑里,一加一里面有深奥的学问,而在工人、农民那里,它常常是现实的、亲切的劳动计数:一炉钢,一担粮,一度电,一尺布……

这个“一”,一旦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相结合,会显出巨大的力量。上海纺织行业就是从“一”出发,开展了“每人每天增产节约一元钱”活动,上棉九厂工人到三月中旬提前实现了一季度每人为国家增加盈利一百元的目标。上海第一印染厂工人开展爱厂如家、“十个一”增产节约活动,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斤烧碱等等,在短短的时间里也收到了可喜的成果。整装车间工人提出“向剪刀口要布”,苦练基本功,节约一寸布,一个月就减少零布一万五千多米。

这说明,从“一”出发,大有可为。一个厂、一个行业如此,推而广之,更见威力。记得六十年代有一段弹词开篇,叫做《一粒米》,评弹演员热情地唱给大家听:一两米有一千八百三十七粒半,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年就有一千二百九十六万斤,五千人的工厂可吃七年多,一个生产队要吃一百六十年,从爷爷一直吃到孙子也吃不完。

可不要以为这是艺术的夸张,这倒是道道地地的数学答案。不信,你也可以算算看。不过,可不要忘了把群众的自觉行动算在里面。“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伙儿行动起来,这个“一”一定会为四个现代化作出令人振奋的贡献。

(1979年4月5日广播)

打篮球的比喻

说起打篮球,学问可不少,那是裁判员、指导和球员等专门家研究的课

题。但是,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却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赛球要在有四条界线的场子上进行,一个球打出左右前后任何一条界线,裁判员就要吹哨子,指出“打球出界”,让对方发球。

陈毅同志曾把打篮球的这一基本规则,用来比喻我们的政治生活,例如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既不能右边出界,也不能左边出界,应该在两条界线的中间正确执行。

这个比喻是很发人深思的。我们当前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有人说:“要讲民主,就不能有什么限制。”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自从有民主的一天起,就伴随而来限制民主的界线。资本主义社会讲民主,绝不允许侵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一条界线。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界线是不允许损害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经过“四害”横行的十年动乱之后,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安定团结,大干四化,这是一个大局,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离开这个大局,损害这个大局,去谈什么“民主”,那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出了界,变成无政府主义,或者民主个人主义了。

我们一些天真的青年,千万要懂得,民主绝不是抽象的。我们讲民主,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为界线,切不可“打球出界”,走到邪路上去。而上海公安局“三六”通告,正是一条帮助我们更好发扬民主的醒目的界线。越出这条界线,就会破坏安定团结,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不能允许的。

(1979年4月9日广播)

韩山河的启发

正在上演的话剧《陈毅出山》里面,有一位卧虎岭游击队司令员,名叫韩山河。他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环境里,长期坚持革命游击战争,日夜盼望党的领导。可是,当陈毅同志向他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他却不肯接受,甚至怀疑陈老总,竟要把他杀掉。

韩山河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抱着老的思想不放,不理解党的政策为什么转变。好比行军途中掉了队,他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落伍了。

为什么这位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勇敢坚决的好同志，会跟不上形势呢？客观的原因，是由于他和党长期失去了联系，不了解当时的形势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党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陈毅同志的耐心说服下，其他同志逐步理解了党的政策，而韩山河却仍旧固执己见，这就要从他自己身上找主观原因了。我们觉得他至少有这样两点教训：第一，他缺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平时埋头打仗，不问“天下大事”。遇到困难，只要女宣传员翻本本，看书上怎么说，既不调查山外形势的变化，更不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弄得闭目塞听，蹲在山里称大王。第二，他思想不解放。死抱着“打国民党才是革命”的老观念，因此一听说在抗日新形势下要和国民党合作，就认为是投降、叛变，无法接受。他习惯于向后看，不会朝前看，因而迈不出转变的一步。

分析韩山河思想落伍的原因，对于当前在党的工作大转移中心存犹豫、疑虑的人，是很有启发的。同样，韩山河经过陈毅同志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同志们的帮助，终于猛醒过来，快步赶上队伍，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列的坚决行动，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1979年5月7日广播）

听孩子的歌声想到

阳光灿烂、春风送暖的街头，来了一群鲜艳夺目的幼儿。他们在老师带领下，手拉手，排着队，健壮、活泼、可爱。过路人止不住内心欢喜，纷纷停步观看。一会儿，孩子们唱起歌来：“阿拍拉普，阿拍拉普……”噢，这是什么歌？噢，原来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看着孩子们摇摇摆摆地唱他们并不理解的歌，觉得好笑。

一笑之余，又联想起前些时候一位家长的反映，说她的孩子一回到家里，就喊着相公、小姐，吵着要看古装戏。看来，孩子们唱什么歌，看什么戏，这已经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涉及幼儿教育的重要问题了。

也许有人会说，拉兹之歌，相公小姐，不都是你们银幕上，戏院里，广播电视里放出来的么，既然你们放得，我们也就唱得，难道还能说只许放，不许唱么？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上映一些外国影片 ,开放一些传统剧目 ,播送一些外国歌曲 ,这是贯彻“百花齐放”的政策。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相反 ,我们主张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的文艺之花都应开放 ,但是 ,我们要善于学习其中积极的东西 ,识别其中消极的东西 ,拿电影《流浪者》来说 ,它辛辣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怎样使青少年堕落 ,犯罪 ,使人变成鬼的腐朽性 ,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少年 ,怀着流浪者的思想感情去唱拉兹之歌 ,岂不有点不健康吗 ?至于向幼小的孩子教唱“阿拍拉普” ,就简直是滑稽了 !

由此我想到 ,在开放外国的和传统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同时 ,需要正确的指导 ,报纸上、广播电视里应当这样做 ,当教师和家长的也有这种责任 ,这对青少年和幼儿 ,尤其有必要。

关心下一代 ,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啊 !

(1980年5月广播)

一杯清茶见深情

听了刚才广播的这条新闻 ,我们为驻沪空军领导机关用清茶迎送两位首长的新风拍手叫好 !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很重情谊的民族。送往迎来 ,正是表达人们情谊的好时机。各种人有各种表达情谊的方法。艺术家们爱吟诗作画寄托情怀 ,青年们爱摄影留念 ,妇女们喜欢送点纪念品 ,老人们喜欢请酒吃饭等等。做为个人的活动 ,无须作统一的规定 ,但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组织 ,特别是领导干部彼此之间的迎送礼仪是需有个标准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就明文规定了一条 :“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

驻沪空军领导机关在这次新老队长调动之际 ,改变做法 ,不备酒 ,不敬烟 ,而代之以一杯清茶 ,相互亲切见面叙谈。这确实是学《准则》 ,见行动 ,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的一个榜样。

也许有人会说 ,一杯清茶未免情谊冷淡了些 ,总不及一桌酒菜热烈。其实 ,情谊的冷淡、热烈决不在于清茶还是喝酒上。曹操对关羽三天一小宴 ,

五天一大宴 ,清酒可谓请得多矣 ,却并不说明他们情深谊厚 ,而诗人笔底下 “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句 ,反而使人们感受到了友情的亲密。同样 ,用清茶迎送首长 ,让我们看到了老战友之间的深厚革命情谊 ,看到了艰苦朴素的延安作风 ,更看到了老干部对党的一片赤心。

(1980 年 2 月广播)

华 佗 再 生

听了我国第一个“中医智能计算机应用系统”诞生的消息 ,人们喜气盈盈 ,不禁欢呼 :华佗可以再生了 !

“华佗再生”这句话通常用来称赞大夫的高超医术 ,华佗是我国汉朝末年的名医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他更是一位精通百科、药到病除、起死回生的“神医”。人们乐于传颂他为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 ,而对他被曹操一刀杀掉这一史实 ,世代惋惜不止。所以“华佗再生” ,也反映了人们渴望名医的心愿。

电子计算机能看病 ,在于对人的智能模拟。如果华佗的医学经验没有失传 ,把它储存在电子计算机里 ,那么电子计算机真的可以像华佗那样给人治病。中医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从古到今 ,宝贵的医学遗产十分丰富 ,利用精密的中医智能计算机 ,博采众家之长 ,把古今中医的学识与经验在电子的作用下 ,发挥其作用 ,这实在也是一种对中医医学的继承和发扬。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医智能计算机” ,在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断改进下 ,将日益完善 ,到那时 ,我国人民对“华佗再生”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1980 年 6 月 11 日广播)

火车进站的学问

有人对我们当前的四化进程不满意 ,说 :“真像火车进站 ,叫得响 ,动得慢 !”乍一听 ,人们为这一生动的比喻不禁失笑。仔细一想 ,打这比喻的人 ,出发点是可理解的 ,他希望四化快点实现 ,并且对某种说得做得少的作风提出批评。我们确实要提倡实干精神 ,少说空话 ,多干实事。至于干事的

速度和效率,也要从实际出发。

就拿火车运行打比方,火车在铁轨上行进的时候,风驰电掣,日行几千里,确实令人鼓舞。然而火车无论是慢车还是快车,总是需要进站的。进站后让旅客上下,卸货装货,检修机件、线路,补充燃料、供应,有时候还要交车等等。大家从生活经验中知道:没有不进站的火车,进站的火车运行情况和在线路上行驶的情况也有不同。比如火车经过中间站,除了完成区间运输任务,还要继续前进;火车到终点站,不但要安全准点,还将承担新的运输任务。从交通运输学来说,火车进站,也可以讲是一种调整吧!对它的运行要求需要从实际出发。

同样,我们奔向四化的这趟时代列车,也需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顾前后左右,不检查机件、线路,不补充能源、供应,只凭一股热情猛跑。从这一点来看,把贯彻党的八字方针比喻为列车进站,倒也未始不可。而我们这趟列车,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如今刚刚修复,就要求它日行万里,全速前进,恐怕是不行的。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欲速则不达,过去我们有过了教训,只有列车进站,对四化建设进行积极的、科学的、复杂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把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才能沿着路轨,继续更好地出站前进,安全、准时地到达四化的宏伟目标。

(1980年11月19日广播)

赞为科技人员当后勤

洁而精是一家小小的川菜馆,洁而精精神,顾名思义,是不是说他们的菜肴整洁而精美呢?这个很抱歉,因为烹调是一门学问,而我是外行。对他们烹调技术的评价,还是由顾客们来作吧。我这里要赞扬的是他们为科技人员当后勤,为科技现代化服务的精神。

说来也很有趣,古今中外,许多文化、科学新闻常常发生在菜馆茶楼上。《水浒传》里宋江在浔阳楼上酒后题下反诗,弄得险些送命,最后在众豪侠相救下逼上梁山的故事,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号称歌曲之王的德国著名音乐家舒伯特却爱在咖啡馆里写曲子,相传他那首著名的《小夜曲》,就是在一家啤酒店里写在菜单背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那著名的原子反应堆

能量计算公式,也是在餐桌上完成的。而滑稽戏《满园春色》里的不少笑料,正是发生在一位在饭桌上忘我地查技术革新资料的工人身上。

这些例子看起来有偶然性,可也反映了一种必然性,就是科学家、艺术家、工人,无论是从事精神生产或体力劳动的人都要吃饭。饭吃得对胃口,称心满意,他们精神愉快,就会才思敏捷,成效显著;反之,如果人们老为买菜、余米、油盐酱醋而烦恼,那就必然分散精力影响劳动的成果。可见搞四化就要搞好后勤!邓小平同志说他愿意为科技人员做后勤部长,语重心长,不正是教育我们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吗?

所以,洁而精川菜馆职工想方设法,为科技人员服务的心意多么好啊,人们称之为“洁而精精神”。这种精神值得饮食业的同志们学习,也值得其他商业、服务行业的同志们学习,同样值得各个文教、科技、机关、工厂企业等单位的搞后勤工作的同志们学习。

(1980年12月广播)

明镜高悬

《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总理1943年制订的“我的修养要则”时,加了一段编者的话,称颂周总理是一面明亮的镜子。这个比喻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封建时代的清官,往往在大堂上挂一块“明镜高悬”的匾额,以示为官清正。其实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包括包公、海瑞在内,清正是极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称得上一面明亮的镜子。斯大林在评论列宁和彼得大帝的时候,曾说列宁好比大海,彼得大帝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拿古代清官和我们的无产阶级领袖相比,也正是这样。真正明亮的镜子只能是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总理深知人民的疾苦,从青年时代起就追寻为人民翻身解放谋福利的真理。他一生忠于共产主义理想,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思想、感情、作风、道德品质,和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周总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他这面明亮的镜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是在革命烈火中凝炼而成的,也是他严于律己,不断磨砺,刻苦自我修养的结果。我们怀念人民的好总理,也要学习他刻苦自我修养的精神。

周总理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我们的心里永远明镜高悬!

(1981年1月8日广播)

盖得广厦千万间

春节将临,一批大学教师和职工们正在欢欢喜喜忙着乔迁。许多新落成的高楼宿舍,敞怀迎接新主人。

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古已有之。孔夫子的弟子颜回,住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饮”;文学家刘禹锡,不得不在陋室里以文会友;而号称诗圣的杜甫,也住过草房。一次大风,掀去了屋顶茅草,老诗人吟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名句。

然而,诗人推己及人的良好愿望,在上下几千年的旧中国,始终没有实现过。直到蒋家王朝垮台,神州大地上的“天下寒士”衣食不周,住亭子间已非容易,哪里敢奢望广厦呢。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厦千万间”的愿望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可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十年破坏,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一起蒙受浩劫。

真正盖得广厦千万间的是今天。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首都去年竣工住宅三百多万平方米。一年工夫,在一个城市里就盖楼房几十万间,其中,知识分子分享的又何止诗里的那个虚数?诗人的千年夙愿实现了!不过,从杜甫写诗至今,“天下寒士”随着全国解放和人口猛增而猛增,“千万间广厦”已远远不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了。因此,诗人的愿望又还没有完全实现。幸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生活,即便在调整国民经济的时候,对住宅却尽可能多盖快盖。照这样发展,我们深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必定能够陆续实现。而目前,让我们先祝贺已经分到新房的人们乔迁之喜吧!

(1981年1月23日广播)

年夜饭和金饭碗

今天是阴历除夕,中午一过,上海居民老老少少都忙起了年夜饭。由于落实了农业政策,农村形势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城市人民也直接受惠。请看看今天晚上各家各户的年夜饭吧,不是比往年格外丰盛吗?

在忙年夜饭,吃年夜饭的时候,人们常常浮想联翩,想过去,想现在,也想未来。我想的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饭碗问题。大家不妨算一算,此时此刻,我们祖国的大江南北,城乡各地,有多少桌家庭宴席?这些宴席上总共要使用多少个饭碗?这些大大小小的酒席如果并成一桌,有多大?这些形形色色的饭碗,如果合成一个,又有多大?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宴席,最大的饭碗!不错,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伟大的母亲,就是年年月月用这可供九亿多人口吃饱的、世界上最大的饭碗养育着我们,过年过节就用可供九亿多人口入座的、世界上最大的宴席招待我们。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记得孙中山先生曾给旧中国打过一个比喻,叫做“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好比一只金铸的饭碗,可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苦难的人民只能捧着这金饭碗挨饿、饿死。这是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志士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前赴后继,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使这金饭碗放出异彩,显出神威,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饭碗,喂饱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现在,党中央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四化,这就是要使金饭碗发出更大的神奇力量。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只要四化节节胜利,我们的年夜饭也必将一年比一年丰盛!

(1981年2月15日广播)

争当巧媳妇

今年“三八”是第七十届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大庆的日子。妇女姊妹们纷纷举行座谈会,茶话会,庆祝会,相互祝贺,共同勉励。我也向姊妹们致祝辞,祝愿大家当个巧媳妇!

巧媳妇的可贵在于巧。在我们老祖奶奶讲的故事里,最巧的媳妇要数织女,就是嫁给牛郎的那个天孙织女。相传她在天上当姑娘的时候,就以心灵手巧闻名于世。她担负的天职是织云。唧唧复唧唧,天孙当空织。红光艳艳的朝霞,彩色缤纷的晚霞,千姿百态的云山之海,都是织女精心织造出来的。这个美丽的神话,反映着古代妇女依靠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的理想,和对科学艺术的追求,所以每当农历七月初七晚上,姑娘媳妇们便虔诚地向这位天上的巧媳妇“乞巧”。但是我们的老祖奶奶是不幸的,她们生活在旧社会,乞巧不过是幻想,科学和艺术靠乞求是得不到的。她们即使有灵巧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当了巧媳妇,仍然不能实现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理想,在旧制度下,妇女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埋没了多少人才!而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新社会,比我们的老祖奶奶要幸福多了,我们不用靠乞求,而是靠自己的勤奋学习掌握到现代科学和艺术,有可能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建设我们的新生活。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当巧媳妇,天地宽广,尽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我们预祝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更多的女劳模、女闯将、女冠军,培养出更多的女教师、女医生、女专家、女工程师、女记者、女作家,使我们妇女这半月天上也出现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姊妹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胜利,鼓舞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上新长征的大道,美好的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让我们信心百倍、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

(1981年3月8日广播)

发扬“人梯”精神

人们使用梯子登高,由来已久,从我国鲁班师傅制造云梯算起,也有两千三四百年历史了。在多样梯子之中,有一种梯子与众不同:我们从电影里常常可以看见,人民解放军在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一个战士踏着另一个战士的肩膀,第三个战士又踏着前两个战士的肩膀,靠集体的努力,登上城头、江岸或者悬崖。这是什么梯子?这是人梯。去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和其他老科学家提出,甘愿当“人梯”,让年轻一代踏着他们的肩膀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从这以后,“人梯”精神受到了大家的赞扬,并

且在实现四化的进军路上逐渐传播开来。

“人梯”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呢？人们公认，这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一种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继往开来的革命精神，是工人阶级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关于老一辈甘当人梯的事例，大家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再说。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踏着“人梯”登高的年轻人，也要发扬“人梯”精神，要对得起脚下的“人梯”，使自己不愧为“人梯”的一个组成部分。

听众们，“人梯”精神既然是一种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那么，对登“人梯”的青年来说，首要的一条是往哪里登攀的问题。方向对头，才能大干快上。由于我们脚下踏着的是老一辈的肩膀，这肩膀是使集体事业上升到理想高峰的支撑点，是长征途中的接力站。它给予我们信心、勇气和力量，帮助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地往新的高度攀登。上海保温瓶四厂二十一岁的青年女工周萍，七六年底进厂以后，正是在老师傅们的精心教导下，自己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立志接班，攀登高产优质的高峰，去年创造了保温瓶胆镀银上夹一百万只无损耗的优异成绩。像这样不断为实现四化做出贡献的青年，在我们周围是不少的，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梯”精神的光辉，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当然，我们也要留神这样一种人，他把别人的肩膀当作个人向上爬的垫脚石，好像也在“忙忙碌碌”，可是并不愿意为四化献身，只不过想从名人学者或者集体的成果那里沾点光，来铺垫一下自己，甚至用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手段，以爬上个人名利的高坡。这种把别人的肩膀当作垫脚石的思想，是十分可耻的，是和“人梯”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他不及时纠正，即使爬上了他“理想”的高坡，也总有一天要滚落下去。

听众们，“人梯”精神既然是前赴后继、继往开来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登“人梯”的青年来说，当我们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登攀的时候，也要准备好自己的肩膀，让后来的人踏着继续前进。这是发扬“人梯”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发展，好比一架长长的多级“人梯”。每一个梯阶上的胜利，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离开了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创造。英

国科学家牛顿,很懂得这一平凡的真理,他说过:“假若我能比别人了望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长梯,正是由无数巨人的肩膀组成的。还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为了改造黑暗的旧中国,曾发出“铁肩担道义”的誓言,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共产主义者鲁迅先生,也是把“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作为终生的战斗任务。拿我们现在拥有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里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事业,这一切珍贵东西来说,也都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巨人肩膀给我们当“人梯”得来的。同样,四个现代化的高楼,共产主义的大厦,这些珍贵的东西,需要继续架设巨大的多级“人梯”,由亿万人的共同努力,才能盖成。由此可见,我们青年肩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啊!

我们明确了当前为四化登“人梯”的方向,有了既登“人梯”、又架“人梯”的思想准备以后,还要解决如何掌握登“人梯”的具体方法问题。大家都有爬梯子的经验,这就是每步都要把脚站稳。如果觉得脚下欠稳,就要及时调整一下,再一步一步,顺序朝目标攀登。我们要加快登高速度,但一步登天只是空话,三步并两步也不行,弄不好欲速则不达,会从梯子上掉下去。这些爬梯子的经验,倒是同样适用于攀登通向四化的“人梯”。生产和科学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只要我们大伙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去,一代接一代地攀登,就一定能够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峰。

听众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我们一起发扬“人梯”精神,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吧!

(5月4日广播)

赞赞居民的贴心人

市委、市政府一起盛大表彰优秀里弄工作者和先进居委会,在上海还是第一回。这件事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里弄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另一方面也说明,广大里弄积极分子在长年辛苦中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里弄是生产建设的后方,我们大家生活的基地。只有后方稳固,生活方便,人们才能睡足歇好,精神饱满地投入生产工作和学习,从而取得一个又

一个胜利。而建立一个安定团结、环境整洁的文明里弄,就离不开里弄里的宣传员、调解员、纠察员、治保员、卫生员、服务员……他们在里弄党支部带领下,有的从小辫子忙到头发白,有的退休第一天就向居委会报到,无论男女老青,都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试想一下,在里弄里,从领粮票、油票、布票、副食品计划供应,到订报纸、交付房租、水电费,从宣传移风易俗,文明礼貌,组织植树绿化,打扫卫生,到婚姻介绍,登记结婚家具,计划生育,直到孩子进幼儿园、上学、招工等等,哪一件事里面,没有里弄积极分子的心血和汗水?正是他们不怕累、不怕烦、不怕脏、不怕难的可贵精神,为我们大家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在这全市表彰先进的时刻,我们广大居民要对自己推选出来的贴心人表一表心意!

那么,我们拿什么来表心意呢?掌声、赞扬是衷心的祝贺,但是对于里弄工作者来说,更为鼓舞的是得到广大居民的热诚合作,尤其是希望在职工大助一臂之力。里弄并非光是里弄干部的里弄,而是大家聚居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一起来搞好里弄工作。我想,我们大家送给优秀里弄工作者和先进居委会的礼物,莫好于每人为建设文明里弄做一件好事!

(1982年3月24日)

历史的镜子

《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指出:近二、三年来,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比“三反”、“五反”时期严重得多。读了这段话,人们如闻警钟,猛然清醒,意识到斗争不可避免,必须奋起击退经济领域中的这股逆流。然而,也有人以为不然,说什么没那么严重吧,至少上海不至于。那么,请看本市已公布的事实。

上海初步查出经济违法犯罪二千三百多起,其中非法所得万元以上的就有三十起,千元以上的五百多起。人们记得,在“三反”、“五反”时,非法所得千元以上的就叫“小老虎”,万元以上的则是震动全市的“大老虎”了。现在仅在初步检查揭露中即发现大小“老虎”成群,这还不够惊心动魄吗?

还有,三十年前干部中经济犯罪的,科级以上居多,而现在查出被糖衣

炮弹击中的干部 ,厂级以上领导就有一百几十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入到中高级干部队伍 ,这不是危害更大 ,更具危险性吗 ?

仅此二端 ,也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确乎超过三十年前。三十年前党领导我们开展“三反、五反”斗争 ,巩固了人民政权 ,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振奋了全国人民 ,教育了千万干部 ,也挽救了那些违法犯罪者。这场斗争以光辉的胜利 ,巨大的贡献 ,载入了史册。虽然三十年前后社会条件不尽相同 ,然而对照这一面历史的镜子 ,温故知新 ,也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当前反对资本主义腐蚀斗争的必要性 ,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不搞这场斗争 ,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将会劳而无功 ,精神文明建设就要落空。

山深林密 ,“猛虎”噬人。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已经发出号令 ,我们可千万不能醉卧岗下高枕无忧呵 !

(1982年3月31日)

请“冤家”们三思

住在现代化新村房子里的两户居民 ,却过着“挑水做饭”、“拎水登楼”的古老生活 ,初一听 ,不能不令人诧异万分。读了今天本报发表报道才明白 ,原来一不是没装自来水 ,二不是水管坏了 ,三不是五层楼上水压不够 ,只不过是两户人家近年来为了用水问题不断闹矛盾 ,变成了“水冤家”。

论是非 ,“冤家”双方谁也没独占理儿。他们先头是谁也不爱惜国家水源 ,彼此让自来水“哗哗”地浪费 ;继而为交水费钱计较 ,恶语相向 ;最后竟然拒付水费 ,甚至大打出手。邻里之间的关系闹成这样 ,也真够乏味了。虽然新工房清洁明亮 ,阳光充足 ,水电俱全 ,煤气灶方便 ,卫生设施齐备 ,但我们相信那“冤家”双方一家老少的身心 ,是不会愉快的。

这件事告诉人们 ,光有漂亮的房子 ,哪怕再大再好 ,如果没有清醒的脑子 ,遇事冷静思考 ,也是过不上幸福生活的。甚至像“水冤家”那样 ,眼看着现成的自来水不能享用 ,只得到五层楼下去拎水挑水 ,空摆着抽水马桶却无水可抽 ,弄得臭气熏天。这是何等的愚蠢 !这也说明光有物质文明 ,没有精神文明 ,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好比行路人缺了一条腿 ,走不成 ,更

是走不快。

我们愿意向“水冤家”(兼及一切“电冤家”、“土冤家”们)进一忠告:你们既有挑水、拎水的毅力,相骂打架的功夫,何不用来学学五讲四美,尽些安定团结的义务呢?在人民内部,冤家宜解不宜结,请三思。

(1982年5月15日)

“随遇而乐”好

上海去年出生人口中,一胎率达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居全国首位。这是上海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计划生育号召作出的成绩,同时也说明,还有百分之十一点一的多胎率。这里面存在着复杂的情况,有的家庭确有实际问题,按政策生了第二胎;而普遍的则是由于想碰运气生个儿子。

手边有份材料:静安区一街道去年有九个妇女生了第二胎,其中七个由于第一胎生了女儿;长宁区一街道则是八个生第二胎的父母中有七个因为没有儿子。这两个并非偶然的数字,反映了人们盼子心切。本来,有人喜男有人爱女,并不算什么问题。由于生男生女在人类史上至今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人们如能“随遇而乐”,就可少却许多烦恼。无奈,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了“儿子传宗接代”、“女儿外姓人”等封建观念,“重男轻女”思想变得根深蒂固。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白居易的名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也从反面证实了“天下父母重生男”的普遍现象。这种影响久远的“重生男”思想,相沿数千年,不幸直到现在还流毒很深。

八十年代的今天,有的妇女生了女儿还在挨公婆咒骂、丈夫殴打。更可叹的是,重男轻女这种思想也侵蚀着妇女自身,觉得不生个儿子不光彩,不争气,不可靠,因而宁可受舆论谴责,挨罚,也想生第二胎,甚至第三胎、第四胎……

这种重男轻女的意识,作为个人思想,即使在家里也是错误的,而现今成为抵制、破坏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大问题了。今天是全市计划生育宣传日,我认为要使宣传有效,除了反复讲清它利国利民利自己的好处

以外,还必须拆除障碍,大家一起来揭露、批判、清除“重男轻女”这一封建残余思想。
(1982年5月16日)

伟大的社会调查

经过充分准备的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在7月1日正式开始了。这是一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大事,因而也引起了国际上普遍瞩目。

西方有人断言这次人口普查是“伟大的冒险”。这句话只能算说对了一半。

我国有十亿人口,几亿个家庭,要让几亿个申报人回答清楚有关人口基本情况的十九个项目,那可真正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艰巨工作,因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内国外、东方西方一致公认的伟大行动。

然而,由于立足点不同,如果以某些国家人口普查的失败来推测我国的这次人口普查,并得出“冒险”的结论,那就未免陷于武断了。

我们这次人口普查,是查清我国国情、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准确地掌握我国人口分布和构成情况,摸清十亿人口的“家底”,对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安排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意义十分巨大。广大城乡人民在懂得这重大意义后,就会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认真、如实、准确地申报好自己家里的人口情况,尽到一份公民的义务。昨天,领导同志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带头进行了人口登记,向全国全市人民做出了榜样,这将鼓舞亿万申报人履行自己的光荣职责。同时,有人怀疑我们的力量,担心我们“冒险”,也会激起我们更大的为四化作出贡献的自信心。

总之,我们将以几亿人民的实践作出回答:这决不是一次“伟大的冒险”,而是地地道道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调查!

我们充分相信,每个申报人接受全家的重托,面对党、政府和人民的深切期望,一定会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共同完成这一伟大的社会调查!我们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1982年7月2日)

同 心 同 德

隆重举行党的十二大将要闭幕了。这是一次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犹如七大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那样重要。

党的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到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观七大会址的人,在瞻仰高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标语的主席台时,总是为会场后方蓝色帷幕上那“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所吸引。同心同德,这不仅作为七大本身团结奋斗的标志而载入史册,而且,在以后始终鼓舞全党同志和革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贯彻七大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直到推翻了三座大山。

同心同德的精神,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宝贵的革命传统。在今天,同心同德,就是要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这次十二大,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基础上召开的,党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各条战线实际工作中已经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显著成绩,实现了伟大的转折。是非分清,党内外信心倍增。在这一派有利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学习前辈遵照七大精神,排除万难,同心同德地建立新中国的英雄业绩,在十二大确定的新时期总任务指引下,同心同德,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力量!

(1982年9月11日)

国庆——家庆

这两天,我国人民家家既过国庆,又过家庆。国庆和家庆一起过,有两层意思:从大处说,国庆是我们全体公民的节日,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型家庭,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誕生日,自然成了各民族亿家万户的喜庆佳节;从具体说,建国三十多年来,确实有数不清的小家庭是选在10月1日这天组成的,这些新家庭的成员年年既庆国又庆家,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双喜临门。

今年又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欢度国庆、家庆,再加巧逢民族传统中秋节,那就使人感到格外的喜气洋洋。

“国家”这个词的出现,最早大概可以上溯到二千多年前。孟轲不仅用过它,还说:国之本在家。虽然孟老夫子讲的“国家”,跟现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讲的“国家”内容大不一样,但这个词沿用至今,却也说明“国”和“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每个家庭都是国家的一个细胞。国家机体强健壮实,经济建设速度快、成效好,社会安定团结,那末,家庭细胞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养料自然也就丰富、充裕,这叫做一荣俱荣,或者通常所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道理是极为浅显明白的。反过来,有无数团结和健康的家庭,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茁壮的,生气勃勃的,家庭成员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那末,国家必定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一定能更快实现!

国和家既如此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愿我们大家在欢庆新中国诞生日的同时,努力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团结、文明的新家庭!

(1982年10月2日)

靠海吃海

浩渺的海洋里有万千生物,介于海洋与大陆之间的滩涂上,也繁衍着数不清的小生命,它们中有许多营养丰富的水产品。人们熟知的银蚶、圆蛤、蛏子、牡蛎、淡菜等,莫不是饭桌上鲜美可口的佳肴。

我们上海地处东海之滨,从长江口到杭州湾,有着宽阔的滩涂,无异是一个巨大的副食品储藏库。然而,在这储藏库里究竟有多少种高蛋白,几千年来却不甚了了。现在,上海水产学院师生受国家委托,经过深入调查,开展科学研究,摸清了家底,给我们带来了资源丰富的好消息,也告诉有关部门:开发滩涂,大有可为。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人们常说的谚语,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大自然打交道得出的经验,包含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道理。山里人擅长打猎,采药,种果树,卖山货;海边人精通捕鱼,晒

盐,捞海藻,赶“小海”。谁只要肯花力气,动脑筋,吃山吃海不用愁。而如果有合理的政策,认真组织生产,采用土洋结合的科学方法,其经济效果当更为可观了。

靠海吃海,开发滩涂,丰富城市副食品,增加渔民收入,利国利民,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科研已经提供了翔实的情报,人们盼望早日变科研为生产,让滩涂为人民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更多的财富。

(1982年11月20日)

“金钥匙”妙法无穷

今天本报表扬了两家人们陌生的工厂。他们一家是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出色;一家是婚事新办办得好。双双重视移风易俗,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请看上海橡胶制品二厂创造的“五个必访”好经验。一个几百人的工厂,领导和计划生育积极分子一起,一年之中光家访就访了一百二十多人次。这是一百二十多次关心!一百二十多次谈心!一百二十多次交心!正是在一股股友谊暖流浇灌之下,结出了计划生育三项指标百分之百的硕果。

再看勤业伞厂婚事简办“五个不”的好倡议。他们也不是一般号召完事,而是副厂长积极带头做出榜样,党政工团组织主动关心,循循善诱,从而取得三年来一百零三位青年全部婚事新办、家庭和睦的大面积丰收!

一个厂出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出了“百分之百”件好事,难的是坚持下去,数年如一日。

从两家工厂的优异成绩中,反映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人们早就赞扬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像把“金钥匙”,两家工厂的生动事例又一次证明:“金钥匙”妙法无穷,只有人们掌握得法,它就没有打不开的思想之锁,它就没有创造不了的人间奇迹!

(1982年12月27日)

从女排想到中华妇女

三八节前夕,全国千万人在荧光屏前喜看国家女排新阵容。人们在赞赏郎平、张蓉芳这些老队员百尺竿头又进一步的同时,特别注意新队员们的一招一式,探索她们的精神面貌和球艺特色。大家拿国家女排新阵容与原来的排球队作了比较,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经过千锤百炼的我国女排是世界冠军队。她们思想解放,技术过硬,团结一致,善拼敢搏,为社会主义祖国一再赢得荣誉,成了全国妇女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特别关心她们的队伍更新。新队员陆续来接班,接得好,就能把好传统传下去,不仅保持荣誉,而且有希望发扬光大,更趋完美。

从国家女排想到我们整个中华妇女,在多少年的民主革命和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华妇女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可现在也到了交接班的关口。老一辈女革命家,妇女运动领袖,女科技工作者,女文艺工作者,女教师,女医生,女工农师傅等等,正在陆续离休、退休,中青年妇女正在各条战线上纷纷接班。妇女半爿天,她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能不能把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承下来,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生活。所以这是妇女姊妹们和广大人民人人关心的大事。

像国家女排决心攀登世界体育高峰那样立雄心壮志,像国家女排打好每场球、发挥每个球员的主动性那样踏实工作,像国家女排每一个新、老队员那样搞好交接班,那么,我们的祖国兴旺发达必将一年比一年更有成绩。这就是节前看球的一点感想,愿给广大姊妹们作为节日的礼物。

(1983年3月8日)

“吃产品”析

益民食品一厂贯彻整党要边整边改的精神,制订了切实措施,决心刹住“吃产品”之风。这无疑是件好事,希望他们认真执行,取得胜利。

“吃产品”这个词,就其本义来说,可算是食品厂的特定用语,因为他们

的产品有冰砖饼干巧克力、糖果罐头紫雪糕，都是可口美味的食品。人们用这些产品请客，称之为“吃产品”。

然而，“吃产品”的“风气”，却绝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相反倒是花色品种相当繁多。比如服装厂用服装请客，便是“穿产品”；百货行业用百货请客，则成了“用产品”，还有“看产品”，“借产品”等等。总之，产品前面的那个动词，是随产品功能而异的，有的还冠以助动词，或者经过精心修饰，变成“试用”、“品评”、“提意见”等等，也有的则干脆叫做“买便宜货”。

不管使用什么名目，归根结底，“吃产品”的实质便是慷国家之慨，拿国家物资随便送人，或者半送半卖，用以结交上级领导和外单位的关系户。“吃产品”不仅损坏国家经济，腐蚀人们思想，而且蔓延开来败坏社会风气，于国于民于社会只有害，没有利，故而编入歪风之列。

“吃产品”之举，招待一方，不管是自愿的，抑或被强迫的，总是操有主动权。所以刹歪风首先要他们下决心。同时，被招待一方，不管是伸手的，还是“却之不恭”的，都要自觉拒绝，不为小利而害大义。只要双方一致努力，认真对待，“吃产品”的歪风也就不难克服！（1984年1月5日）

愿吴越春光长驻

读者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本报从今年春节第一天开始，新设了一个反映江浙两省长江三角洲风物的专栏，叫做《吴越春光》。

春节中谈春光，可谓应时应景。但是，我们这个专栏却并不是应景之作，本意是想和广大读者一起，增加点对上海两厢地区的亲密感，学习兄弟省市的好思想好经验。

江浙两省，古属吴越，从来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是我国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富饶地区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名闻世界。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同全国各地一样，长江三角洲地区面貌更加日新月异，春光明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亲朋。上海和江浙两省，从来相依相傍，关系密切，近年来国家决定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这两省一市兄弟仨，更是欢乐相连，同步前进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为建设好这个经济区贡献一份力量！

为此,本报设专栏以经常介绍这个地区的新人新事新风貌。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们特别希望得到兄弟省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提供情况、稿件,和我们一起办好这个专栏。

愿吴越春光长驻!愿《吴越春光》烂漫!(1984年2月6日)

心心相印

这个星期,广播里的每周一歌节目一天两次播放《我的中国心》。这是一支他乡游子歌唱祖国的歌:“……祖国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吸引了许多男女老少。中青年们边听边唱,有的干脆把它录了音,上点年纪的人也听了一遍又一遍,轻轻哼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究竟是什么打动了这么多人的心呢?一首歌里面,乐曲像翅膀,歌词是灵魂。悦耳的旋律,演员动听的歌喉,当然是人们被吸引的重要因素,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还在于这支歌所包含的热爱祖国之情。中国心就是爱国心,歌曲的作者和歌唱的演员都真挚地表达了他们的这一深切感情,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心底共鸣,于是出现了一人唱歌百人唱的动人情景。

如同歌中唱的:“我们的祖先早就把我的一切烙上了中国印。”中国印,古已有之,于今随着祖国的强盛壮大更为鲜明了。中国心,你有,我有,他也有,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有。正是这亿万颗共有的中国心,中国印,使我们大家对祖国母亲心心相印。

(1984年3月16日)

余热生辉

今天本市正在召开退休职工代表大会。人皆有老,因此这个代表大会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的关注。

从与会代表的许多感人事迹中,我们看到老人们人老志不衰,正在发挥余热。

余热,实为余能,原是一种物质现象。余热利用,小到煮饭烧菜后的柴

火余烬倒在火缸里煨黄豆 ;大到收集工厂高温锅炉的蒸气加热生活用水。这是人们熟知的常识。这些余能任它随风散去十分可惜 ;一旦运用 ,就能造福人民 ,有益社会。

用“发挥余热”来比喻老人们人退心不退 ,继续为四化出力的行为 ,实在是很贴切的。

但是 ,燃料的余热需要加以科学处理 ,才能收到社会效果 ,同样 ,老人们身上的“余热”也需要引发 ,才能发光生辉。引发的方法 ,一是老人们自己的内因激励 ,一是社会各方面的帮助 ,为老人们提供发挥余热的条件。这后者正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

祝退休职工代表会开得好 ! 祝它以热引热 ,在广大老人中显现“夕阳无限好”的余热生辉美景。

(1985 年 1 月 25 日)

踢足球的启示

足球场上龙腾虎跃 ,热火朝天。双方运动员长传短吊 ,脚踢头顶 ,你争我夺 ,截球射门 ,活跃极了。然而 ,裁判员的锐利眼睛 ,不放过每一个犯规、违例动作 ,不断吹哨子 ,指出手球、界外、越位等等 ,来加以限制 ,有时还出示黄牌 ,警告危险动作 ,甚至用红牌把不守规矩的球员罚出场去。

没有运动员的拼搏 ,便没有精彩的球赛 ;而没有裁判员执法如山 ,便根本组不成球赛。裁判员貌似严厉 ,却全是为球赛顺利进行服务。

最近 ,一位负责同志用球场上的这一辩证法 ,来比喻加强法制与搞活经济的关系 ,很为形象。我们现在改革经济体制 ,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正在逐步出现一派兴旺景象。但是随着经济活跃 ,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也会有各种违例犯规行为 ,比如乱涨价 ,乱发奖金 ,倒卖紧俏商品等不正之风就是。因而也需要有人经常吹哨子 ,认真执法 ,以便及时纠正、限制、警告、处罚。这就是各种执法人员的责任 ,也是他们为搞活经济为四化服务的具体行动。

运动员要精通球赛的规则 ,才能得心应手 ,赛出好成绩。同样 ,只有让广大群众懂得各种法规 ,才能使经济活跃得更好更兴旺更有实效 !

活跃经济需要加强法制宣传。

(1985 年 3 月 24 日)

文明人有新事

本报第四版新增加了一个新闻小故事专栏,叫做“文明人新事”。今天介绍的是一段张老伯说服老伴归还别人失表的故事。事情虽小,却可以从窥见一位普通市民在创文明新风中的一点精神。

自从本市市民文明公约公布以来,街谈巷议中日益有积极的反映。最近听一位居民说,这个公约是做文明人最起码的标准了,如果我们连这些要求也做不到,又怎能对得起光荣的上海城,怎能提前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呢?

这番话说得很中肯,表达了一个普通市民的责任感。我们不妨引申一下:如果我们大家都能遵照文明公约去做,那么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一定可以提前实现!光荣的上海城将增加新的光荣!

“文明人新事”就是要记录广大市民在争取做文明市民过程中的生动故事,起到一个相互鼓励、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作用。像退休工人张老伯那样,拿自己懂得的道理讲给老伴听,帮助她提高认识,知过即改,就是很动人的。我们衷心希望涌现出更多赵老伯、王老太、李大哥、马大嫂们的生动故事,并由有心人写下来寄给本报,刊登在“文明人新事”上!

(1985年8月6日)

小事情 大潮流

在人们的交往中,使用“您好、请、对不起、谢谢、再见”这十个字,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创举,有人说是小事一桩。确实,在有文化教养的人们中,这些最基本的礼貌用语,就像洗脸刷牙一样,早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

然而,就这么普普通通的十个字,要进入千家万户,人人上口,形成全社会的礼貌交往风气,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经过十年动乱,现在社会风气还有许多问题要扭转,有的人拿脏话当标点符号,有的人开口粗俗,有的人举止野蛮,已经成了习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势力,要革除这种坏习惯,需要广大群众的不懈努力。而涉及广大群众的事情就决不是

小事情了。

事实上,礼貌用语属于五讲四美三热爱中的语言美范围,也是建设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的最起码条件。当前,全市人民正在兴起一个追求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争做社会主义新人的潮流。我想,礼貌用语只有汇集到这股潮流之中,才能深入到各个方面,持久下去;同时,也相信,普及礼貌用语,将会对这股潮流起到推进的作用。

从小处抓起,从自己做起,说话文明、大方、亲切、和蔼有礼貌,这是普及礼貌用语活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1985年4月11日)

杨怀远借海风

人们常说诸葛亮借东风,我这里讲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杨怀远借海风。新鲜事出在长柳轮五等舱里。

说也惭愧,二十多年来学习、宣传杨怀远,却从未乘过杨师傅服务的船。

日前到长柳轮上作客,才亲眼看到了杨怀远和旅客水乳交融的情景。借海风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个小镜头。

五等舱铺位一个挨一个,虽然冷气开放,但舱角落的旅客还是闷热,盼望海风。无奈窗小又高,海风轻易不肯进来。老杨便用废旧料,精心设计做成招风耳朵似的“招风兜”,“耳轮”在外,套在窗洞上,便把凉快的海风,源源不断地招了进来。这天天热,现成的“招风兜”不够用,他便拿自己用的草席,卷成一头大一头小,从窗洞中伸出去,果然也借来了海风。

杨怀远以一根小扁担闻名天下,其实,他为旅客服务的招数可多了!“百宝箱”里应有尽有,贮藏室内可变“古彩戏法”,更可贵的是他那充满热情和智慧的心灵,时时给予旅客温暖、周到、贴心的精神服务。怪不得一批又一批男女老中青旅客出自肺腑地用笔和嘴把杨师傅赞个不够!他们说:“五等舱位,一等服务!”“耳闻不如目睹,要继续推选他为全国劳模。”“乘杨师傅的船舱是一种幸福!”“杨师傅的服务将使我终生难忘,增添工作的力量!”……

我们说发扬杨师傅的小扁担精神,便是发扬这种全心全意为旅客着想,人民交通为人民的精神,而决不局限于挑行李。相反,杨师傅毕竟不是青壮

年了,身体也不顶好,我们衷心希望他不必再坚持挑沉重的行李,而更多创造服务新鲜经验,带出更多的杨怀远式好服务员! (1986年8月22日)

吴佩芳风格

在教师节的光荣榜上,人们又看见了吴佩芳的名字。她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的三个名誉校长之一。

这位在五十年代全心全意致力于民办小学的知名老校长,热爱学生,有许多感人至深的先进事迹。沪剧《鸡毛飞上天》便是一份描绘她办学的艺术记录,至今留给家长们历久不忘的印象。

吴佩芳原来是个家庭妇女,后来当了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她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而对小学生有一股强烈的母爱,使人想起幼儿们爱唱的一支歌:“好老师,好老师,老师像妈妈……”

母爱是伟大的,母爱和培育千百万儿童的人民教育事业相结合,其社会意义就更加充实了。人民教师是可敬的,在人民教师特别是小学、幼儿园的教师中能激发出一份母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就格外可敬又可亲了,必能收到加倍的教育效果。

我认为,这正是吴佩芳教育风格的一个特征,也正是家长们欢迎她、尊敬她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6年9月11日)

荣福村的联想

闸北区有个荣福村,近年来以千家万户普及科学常识、破除迷信而出了名。

科学与迷信,是人所共知的一对矛盾,相互对立,不可调和。

可是人们对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往往也会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出发,作出解释,而其目的却常常有惊人的近似。

比如,科学的观点主张抵抗力差的产妇与婴儿不宜与外界交往接触,以防感染疾病,目的在于保护妇女儿童健康。而迷信的人很久以来说:产妇是“红人”,产房是“红房”,外人进去不得,谁进去大家倒霉。这一迷信观

点,其实源于人们长期从初产母婴往往无端死亡的惨痛教训中,表面上对外人警告,实际上曲折地保护着产妇婴儿,目的和用心还是善良的。但是由于人们以前手中还没有掌握科学卫生知识这一武器,因此唯心的迷信观点钻了空子,作出了错误的总结。

生活中这类例子还不少,从中反映出,社会上还有许多迷信观点待破除。而破除迷信的最好办法便是普及科学常识。科学地、深入浅出地解释人们还不理解的生活现象,实际上正是广大居民的切身要求。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工程中,科学普及工作发挥着有效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对闸北区荣福村老老少少欢迎科普讲座的一点联想。

(1986年11月4日)

三十三年前后

本报四版昨天和今天报道了退休医务人员沈玉珍在里弄里为人民好事的生动事迹,并追溯到三十三年前本报的一则头条新闻,那新闻详尽地记述了助产士沈玉珍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在棚户区大火烧近门口的危急情况下,安全接下新生儿,并抢救母子脱险的感人一幕。

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沈玉珍老妈妈可称得上是一位已做了大半辈子好事的共产党员。她没有辜负当年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期望。

生老病死,释迦牟尼曾列为人生四大苦难。事实上,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走完人生全程,确实会碰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妇女在生育育儿阶段,工作既繁杂,又细致,十分艰苦,迫切需要医务人员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哪一位医生只要不拒绝这种咨询,就会受到居民的感谢。沈玉珍不分日夜地关心、爱护母婴,无数事例证明了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好医生。

沈玉珍老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动人事迹,也使人联想到在里弄中还有许多这样的先进人物,把他们一一介绍出来,是读者所欢迎的,因而是值得我们记者、通讯员热情去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1986年12月18日)

名中医董庭瑶治病

友人家的小外孙女儿得了婴儿腹泻症,四处求医,吃了各种药水药丸,总是无效,腹泻竟延续了一个半月。一家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一家中药店求中医治疗。

那是位著名老中医董庭瑶,他听完病史,先查妈妈,再查婴儿,然后给婴儿开了一角九分钱一帖的药,嘱咐给孩子吃几天米汤,妈妈暂停喂奶,去作些必要的治疗。说也奇怪,孩子吃了三天米汤,四帖中药服完,腹泻便霍然而愈了。于是一家子逢人便夸那位老中医“神”!

“神”在哪儿呢?我想,这是一个中医“辨证论治”的代表作。腹泻原因多,其中一条与饮食有关,孩子的饮食便是母乳,所以不仅治婴儿,还要治婴儿的妈妈。说来简单,其实这正是祖国医学的精髓所在。当然,再加上董老医生几十年的经验,便能药到病除了。

这样的看病方法,不仅值得西医学习,也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启示:“辨证论治”有辨证法!

(1987年1月17日)

“红牌牌”的名与实

布告栏里贴出有关“五好家庭”的通知,街道里弄评先进的活动又要开始了。

评“五好”,从个人到集体,又深入到里弄、家庭,这原是思想工作中的一种创造,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一个好办法。上海多年来就涌现过许多喜闻乐见的“五好”故事,为人们广泛传颂。

然而,一件好事情,需要不断认真对待,否则,也会逐步走向反面。比如评“五好”,在不少地方近年来慢慢冷落,滥竽充数的现象时有所闻。曾有读者反映,他们那座院子里“五好户”真多,有的一层楼里有一半以上人家是“五好”,被评上的都贴上红条条,或者钉上红牌牌,有的还整幢大楼一片红。可是,大红榜还未褪色,一户红牌牌家养的鸡飞出窗口,从半空降落满院跑,鸡粪把邻居家晒的衣服弄得一塌糊涂,还有一户钉红牌牌的,把大扫

除清理出来的破烂家具 ,往公共场所堆 ,成年累月 ,置之不管。

这些情况当然是少数 ,却也并非个别。人们看了、听了总是不舒服 ,听多了便对“五好家庭”大面积丰收之说产生了疑问。有些“五好家庭”呢 ,在群众侧目之下也感不到怎么光荣了。

其实 ,在有人群的地方 ,虽有先进、中间、后进之分 ,但两头小中间大还是客观存在。即便人们的精神文明普遍提高了 ,那么“水涨船高” ,在新的起点上 ,先进还会仍是少数。何况 ,“损公利私”的现象发生在贴红条子、钉红牌牌人家还并不鲜见呢。

冷冷清清而又“一片红” ,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值得引起主管部门重视。人们希望能真正评出响当当的“五好家庭” ,使红牌牌名实相符。

(1988年11月3日)

姑妄言之

今年是喜庆年。在建国四十年大庆这个总题目下 ,工、青、妇、少儿各组织都面临与祖国的同龄庆 ,加上逢十的厂庆、社庆、校庆、院庆、店庆等等 ,够热闹一整年的了 ,君不见 ,春节一过 ,有的地方筹备庆祝的锣鼓已经陆陆续续轻敲慢打起来 ,喜庆的微风也正在飘飘忽忽地起于青苹之末。

喜庆当然是好事。四十、五十、六十年的光阴 ,二代三代人的努力奋斗 ,取得了光辉成就 ,培育了济济人才 ,通过回顾与展望 ,好好庆贺一番无疑有利于继续前进。但是 ,对于如何庆贺 ,人们却往往忧喜参半。忧的是想起了社会上曾流传过的顺口溜 :厂长忙应付(赞助) ,愁煞 ;科长忙操办(活动) ,怨煞 ;头头儿忙应酬(赴宴、收礼) ,撑煞 ;大伙儿忙“龙套” ,笑煞。人们还忧虑 :当这样的喜庆锣鼓紧敲劲打之时 ,青苹之末的风丝丝聚成风块、风团 ,汇集成“一窝蜂”以后 ,社会上又将增加一股“公费过节”的奢侈浪费之风……

当然 ,把大小庆祝活动搞得既隆重热烈 ,又俭朴隽永。是人们所希望的 ,也是有过不少成功经验的。关键在于有关领导能不能坚决地顶住大操大办的压力 ,摆脱陈规陋习 ,不落俗套 ,想出一些新鲜的办法来。

但愿这些话到年终时被讥为“杞人忧天”。然而在今天 ,笔者还是姑妄

言之,也许不是多余的。

(1989年2月20日)

爱你的母亲

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总要开展不少活动。在鲜花、红旗的欢庆声中,有表彰先进:妇女们一心奉献,为国为民为家立功,事迹感人,大家称赞。也有呼吁和要求:呼吁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要求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些活动都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可惜事后往往随风飘散,落不到实处。今年“三八”节前,市妇联和市家庭教育研究促进会推出“热爱母亲,尊重母亲”主题活动,使人眼前一亮,感到触手可及,实在。

人人都有母亲。母亲生我、养我、教我、爱我,母爱是无私的、永恒的、伟大的美好感情。世界上千千万万丰功伟绩,往往凝结有母亲的心血;而普通人的心中,差不多都有一座铭刻母亲之爱的丰碑。诗人吟咏,音乐家歌唱,而且一唱百和,人们念念不忘“慈母手中线”的诗句,牢牢记住各种唱母亲的歌。记得自己念小学时,老师每当教唱《母亲的光辉》总是哽咽难忍,当时我还不大理解,直到长大后才渐渐体会到老师的感愧心情。

这说明,母爱伟大,而爱母也是人的本性。即便是暴戾之徒,只要他尚未彻底泯灭人性,就有可能唤起那一股美好的感情。人们痛惜现在世风不佳,都在寻求治理良方。如也能从爱母亲这一人人有关的教化入手,也许对促进社会风气有所裨益。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从爱母亲,到爱家、爱国、爱人民,潜力是无穷的。

纪念“三八”节,爱你的母亲,关心她,体谅她,帮助她,保护她!

当然,母亲也要自尊自爱,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1989年3月8日)

“眼睛盯着他们”

一位人民代表在“考评”他参与提名并已当选的一位副市长时说:“我眼睛盯着他一年,一句话,满意!”这句话既反映了那位副市长干得不错,也反映了人民代表议政参政意识的加强,而特别传神的是“眼睛盯着他……”

“眼睛盯着他”,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关切之情,其中有爱护、希望,也有

期待,期待他不负众望。

“眼睛盯着他”,也反映了人们的另一种关切,包含着考察、监督,还准备随时提醒、批评他的失误和失职。

“眼睛盯着他”,这眼睛放出的是正视的、炽热的光,是积极的自觉的主人翁目光,是热眼、青眼。

由此联想到当今社会上有一句流行相当广泛的口头禅,叫“弄勿好了”,在北方则称作“没治了”。这句话的后面,我们也看到一对眼睛,但那眼睛里散出的光却是惘然的、凉凉的,有时几乎是消极的、愤世嫉俗的冷眼、白眼。其实爱说这口头禅的人,心倒还是热的,正因为还热,才有焦虑,才还要讲话。但是他们缺少一个唯物的、辩证的态度和思想方法,因而看不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提不起自己的信心,因而常会泄气,只好重复人云亦云的口头禅。唉,何其自苦乃尔!

每人都有一对精致透顶的眼睛。正确运用这对眼睛,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对人对己、于国于民都会得益匪浅。我们赞赏“眼睛盯着他们”的热情。

(1989年5月2日)

“闯世界去,好!”

新闻记者传播了上海“两会”部分人士的一条真知灼见:“上海人应当闯世界去!上海过去支内走了一百万人,上海滩没有坍,如果今天拓外也走一百万人,上海滩更加不会坍,而且恰恰标志着上海外向了,起飞了!”

这是代表们为了上海新的崛起所开的新方子之一。某些上海人正在为此拿出极大热情,当然,离一百万的“目标”还差十万八千里。

支内一百万,上海人民还记忆犹新。从五十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精英带头去建设祖国东南西北,他们大多斗志昂扬,无私奉献。讲句公道话,如今上海人足迹遍中华,从各方面的反馈看,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为建设第二故乡奋斗几十年,从而也从实际上支援了上海。这差不多已经有了历史定评,然而提到拓外一百万的构想,上上下下却还在议论纷纷。嘉许的有,支持的有,侧目的有,红眼的也有,而在角角落落里总还有那么一种“不光彩”的腹非,似乎远不及支内理直气壮,爱国爱民。

其实,中国青年从来志在四方。半个世纪以前闯世界回来的老一辈青年,不是很多已成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骨干和带头人了吗?如今且不说拓外与上海起飞的大道理,光从青年们自找门路,自筹资金,发奋学外语,积极学谋生本领的热情,又不要花费国家一分钱,又不要增大伙一分麻烦,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挡他们,非议他们呢? (1989年5月9日)

赞美杨浦绿

登高四望,杨浦区是块色彩丰富的土地。除了东南沿江一带老工业区“黑烟虽消逝,尚留灰蒙蒙”之外,中部生活区,北边文化区和新开发地区一大片,红橙黄绿白,赏心悦目。

我喜欢杨浦区的色彩,尤其爱那杨浦绿。

初冬时节,悬铃木之类老行道树早已落叶飘飘,而杨浦区好些马路边、新村里依然苍翠,冬青、香樟、雪松、塔柏等傲霜挺立。那些花园单位里更是绿树掩映,绿草茵茵,间或万绿丛中红点点,俨然是冬天里的小春天。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景象在上海不少地方也可看到,并非杨浦独有。此话也有道理。但是,杨浦区之成为全国绿化先进,还出过全国绿化先进人物,毕竟有她独特的可赞美之处。比如,最近听说,区有关部门早已做了不少准备,区人大常委会年内就要专门讨论进一步绿化的规划。更可贵的是,这个区里有一支支热心绿化的“专业队伍”。新村绿化归房管部门,路旁绿化归园林部门,大单位自己负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想,这种领导重视,层层落实的负责精神,不就是冬季里杨浦绿的由来吗?

当然,真要绿化好,保护少不了。爱护绿化,人人有责。不摧残幼树,不在树干上拉绳晒衣被,不把绿化地当垃圾坑等等,这就是大伙儿的事了。希望全市数量最多的杨浦人为发展上海绿带个好头。(1989年12月19日)

江那边呀好地方

江那边呀好地方,上海浦东美名扬。

浦东这块夹于万里长江近海喇叭口和百里黄浦江下游的地区,从来都

是上海人的骄傲。在人民革命历史上,那里有过英勇的浦东抗日游击队,有过为解放上海浴血奋战的高桥战场和烈士陵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那里为上海市区提供过多少棉花、稻麦、蔬菜、家畜、家禽!远近闻名的浦东鸡九斤黄、我国最早试种成功的严桥花椰菜,是上海人民餐桌上的佳肴美味。高桥松饼使你一饼难忘,浦东说书令人回味无穷,还有浦东风情,浦东人说浦东话,和畅、亲切、热情,那么有特色,有上海乡土味……

江那边呀好地方。这块宝地如今将要大展宏图了。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她要加快开发、开放,逐步建成一个设施配套比较齐全,现代化的和向外型的工业基地,为上海加速外向型经济发展,走出振兴路子立新功!如今,开发浦东的宏图已经绘就,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序幕已经揭开。交通是先行官,道路、隧道、大桥、各项越江工程已经和正在建造,现代化港区、国际航空港正在规划,新的通讯、市政设施、新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也在研究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上海人民群策群力、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黄浦江边的那块好地方,必将焕发出新的精神,展现出新的面貌,更有特色,更有上海味,成为上海自己的金三角,新的骄傲!

(1990年5月4日)

唱《团结就是力量》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倡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这首歌的歌词富有时代特征。最早是青年们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上传唱开来的,五十年代遍及城乡。每当回想起那热血沸腾的斗争年代,回想起那充满阳刚之气、激奋人心的歌声,便感到浑身有力量,产生一股渴望投入改革,甩手前进的强劲儿。

一首好歌,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推动社会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马赛曲》如此,《国际歌》如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如此。《团结就是力量》虽然不及那三首歌著名,但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我国伟大革命事业中能发挥一定作用,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今天提倡唱这首歌,除了怀念革命传统之外,更需要当前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

义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新进军中,坚定“团结就是力量”的信念,传播歌曲中洋溢着鼓舞、激励、召唤人们热爱祖国、奋勇向前的精神。

至于歌词的某些内容,有人认为已经不合时宜。我想,这无关紧要,因为它本来是历史歌曲嘛!我们唱的是它的革命真理、革命精神。当然,在这个前提下,如有高手能修改出更好的歌词,人们大概也不会反对吧!

(1990年7月30日)

赞大学生献血

日前,在一所大学红十字会看到青年师生踊跃献血的场面。医务人员热情照料,男女青年们排着队捋袖伸臂,消毒的消毒,抽血的抽血,献完血到休息室喝营养饮料,吃点心,领营养品、营养费,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谈笑自若。他们怎样看待献血?几位理科学生认为,这是应尽的义务,体检合格就该献血。一位文科教师说:“做学生时因为体重不够,没能献上血,如今体检合格了,自愿报名补献!”

大家知道,对于不少病人来说,鲜血就是最珍贵的药物,就是健康,就是生命。把自己身上的鲜血献给他人,献给社会,是一种最具体的人道主义,实实在在的奉献行为。透过青年们朴实的自白,窥见了他们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责任感。这也正是人们颂扬“献血光荣”的含义所在。

然而,我们也曾听说,医务部门为救死扶伤,依然存在着需血多,集血难的矛盾,有的健康公民,生活越好越舍不得献血,千方百计找借口推掉这一义务;有的人轮到义务献血,想尽办法花钱找人替代;有的单位,职工生病、开刀用血不少,却以种种原因不能完成献血计划,弄得欠下累累“血债”。对于这些个人和单位,还得学学大学生的精神风貌,认真想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单道理,让更多的人投入自觉献血的行列。

(1990年12月12日)

“平平安安回家”

每当看到“安全在我心中”这句口号,便联想起一副对联:高高兴兴上

班,平平安安回家。

最早看到这副对联,是在“十年动乱”的后期。坐在公共汽车上,习惯于观赏窗外街景。一家工厂大门两旁,贴了这十二个红底白字,一闪而过,却使人眼前一亮,心底叫好。谁知,没过多久,狠批“唯生产力论”的时候,听说那副对联被扣上罪名:“埋头生产”、“活命哲学”。那年头,人们早已从“大字报”上领教过荒唐的逻辑。斗斗斗,乱乱乱,叫做“抓革命”,而“高高兴兴上班”便是埋头生产,“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平平安安回家”则成了追求个人幸福,“修正主义活命哲学”的标本。荒唐的逻辑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消失以后,最初报春的那副对联,重又出现,在“丛中笑”了。

安全生产,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中的永恒主题,于公于私,于厂于家于个人,都是一个牵涉到生命财产的大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主人公,党和国家从来都十分重视。每年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平日里落实一系列具体措施,都是很好的明证。我以为,在领导部门三令五申的同时,不仅各级主管部门要有切实的安全措施,劳动者本人也应把安全牢记心中。据悉本市上月因工死亡事故频频发生,很令人担忧。希望大家都来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广泛开展“不伤害自己,不被他人伤害,不伤害他人”的活动,每天都高高兴兴地上班,平平安安地回家!

(1991年5月8日)

在“护绿队”面前

在本市控江路桥那一带,人们对路旁的绿化区留下了良好印象。那里一片郁郁葱葱,树木茂盛,四周整洁,许多乔木灌木上还挂了小牌子,标明花木名称。过路人边走边认识了白玉兰、罗汉松、蚊母、丝兰、八角金盘等等,真像一个微型植物园。

谁在默默无闻地干着这桩好事情?一打听,原来是附近中小學生组织起了“护绿队”!

在绿化祖国的群众性活动中,“种树容易养树难”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么?有人年年费力种植,有人却漫不经心损坏,折的折,踩的踩,还

有架竹竿的 ,拉绳子的 ,刻字的 ,倒垃圾的 ,无奇不有 ,毫不爱惜花木和别人的劳动。你对他大声疾呼 ,他却充耳不闻 ,我行我素 ,这种人不讲公德 ,实在叫人难以容忍。

“护绿队”的少年儿童心地纯洁、办事认真 ,在师长的指导和帮助下 ,又管理又宣传 ,既保护了绿化成果 ,也以实际行动教育了不自爱的人 ,自己则从中增长了知识 ,一举数得 ,不失是个好行动。如能坚持不懈 ,并且推广开去 ,成为一个班级、一所学校、一个地区共同的行动 ,意义就更大了。

在“护绿队”朝气蓬勃的孩子们面前 ,我们该思考些什么 ,又该做些什么呢 ?
(1991 年 5 月 27 日)

喜看上海人食有鱼

上海人曾像孟尝君的食客冯驩那样感叹“食无鱼” ,那是好些年以前的事了。

改革开放后 ,先是听说广东人有活鱼吃 ,而且鱼价有所下降 ,上海人不胜羡慕。曾几何时 ,上海市场上的鱼也多起来了 ,而且品种不少 ,青、鳊、鲮、鲫、鲢、鳙等 ,活蹦乱跳 ,价格也有浮动。

“马大嫂”们在餐桌上听到家人赞美声 ,心里比吃鱼翅、鱼唇还高兴。

然而 ,吃馋了嘴的上海人 ,有了淡水鱼又想海水鱼 ,于是又有了另一番议论 :“淡水鱼可以养殖 ,不稀奇 ;海水鱼要靠捕捞 ,就难咧” ,“带鱼越来越苗条了” ,“小黄鱼跳龙门去了 ,身价百倍” ,“小孩子不认识大黄鱼了”……

令许多人意外的是 ,去冬今春以来 ,银光闪耀的大带鱼进厨房了 ;小黄鱼也慢慢地上了餐桌 ,鱼体也悄悄地变大了 ,鲳鱼、鲑鱼、比目、乌贼不时露面 ,“虾兵蟹将”更是经常光顾。“靠海吃海”的话又行时了。

怎么回事 ?人们惊奇之余相互打听原因。终于 ,日前本报的一篇报道作了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五年来 ,水产资源出现可喜变化。近海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得到控制 ,小黄鱼资源有所回升 ,带鱼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势头。渔业生产已处于依法治渔、依法兴渔的新时期……

好 !上海人食有鱼。有人说 :“这是改革开放鱼 ,执行正确政策鱼。”此话说得十分有理。
(1991 年 6 月 18 日)

“不老松”与“支柱”

前不久,在一次老同志们的聚会上,听到一位鹤发童颜、德高望重的长者吐露心曲。这位老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蹲了五年监狱。他回忆当时的艰难处境,说是陈老总的《梅岭三章》给了他勇气信心。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同志1936年冬在梅岭被围剿,写诗三首留衣底。当时他伤病多日,处境十分危险,“取义成仁今日事”,万一牺牲,《梅岭三章》便是他革命到底、死不罢休的遗言了。正是他的顽强革命精神,终于使他摆脱绝境,走向胜利,以后又为新中国作出了伟大贡献。

那位老同志从《梅岭三章》汲取力量,文革后于七十岁起开始体育锻炼,如今八十高龄,已十年不进医院。他说,人老了,对共产主义信念要老而弥坚,对人民要继续奉献,对党的事业要起“支柱”的作用,活一天作一天“支柱”。

人们常以“不老松”比喻老人。而老同志相勉作“支柱”,正好发挥了“不老松”青春长驻、坚强挺直的特长。现在我国老年人已占相当比例。社会固然要努力为老年人创造安度晚年的条件,而老人们也要加强自我锻炼,炼得像“不老松”,林林总总,苍翠一片,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扶正社会风气,是很好的榜样力量。

(1991年7月18日)

“高抛”——请住手

开放之风劲吹,新事物、新观念、新风尚不断出现,新名词也层出不穷。“海味”蛮浓的“高抛垃圾”便是其中之一。乍一见街头横幅上的这个新词儿,还以为是什么新产品的广告呢,对照上下文才明白,原来这是对一种生活恶习的讽刺。

上海人多,垃圾也多,这没有什么不光彩,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它。垃圾的品种也不少:生活垃圾、工业垃圾、陈年垃圾、时令垃圾(比如西瓜皮),而“高抛垃圾”则是在幢幢高层住宅拔地而起以后,某些高层居民中的一种不

良习惯。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小学生们就知道劝阻路人“不乱抛纸屑果皮”;解放后这样的宣传教育更是人人都熟知了。制造“高抛垃圾”的男女们也不会不清楚。可是他们往往只图自己方便,而不愿多付出一点举手之劳。乱抛垃圾,在垃圾桶前不肯再跨半步之类便是一种。及至他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果实,住进高楼大厦以后,文明、道德水准并未随之升高,却反而制造起“高抛垃圾”来了。“高抛垃圾”的恶果,谁都可以随口数出十条八条,它不仅污染环境,制造纠纷,而且会污染社会风气。

对这些“高抛”者们,仅仅说服教育是不够的,据说,他们往往喜欢听宝宝的话。那么,我们介绍一首高楼儿歌送给孩子们,让子女唱给长辈们听听吧:“我家住在八楼西,楼下就有绿草地,路上汽车像蚂蚁,爸爸往下丢烟蒂,妈妈往下抛垃圾,垃圾挂在树枝上,宝宝看了真惹气……。”

(1992年7月31日)

“承诺”之后

黄河路美食街的廿四家业主最近在报上刊登一条广告,向消费者庄严承诺,表示要努力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承诺遵守国家法纪,价格公道合理,讲究卫生,提高菜肴和服务质量等。

这样的广告很新鲜。虽未提及承诺的背景,明眼人却马上联想到春节期间的“鞭炮大战”。仔细研究那广告内容,人们不禁要点头称赞这些店主的精明、聪明。

说实话,对于前不久黄河路上那幕炮声震耳、硝烟冲天、纸屑铺地的闹剧,传媒虽然作过批评,人们心里的结子其实至今未解开。有的憎厌那套野蛮低级的“迎庆”活动,生怕什么时候又来扰乱生活安静。有的心里算开一笔帐:类似这种一夜间抛掷数万金的豪举,还不是得从顾客身上一一收回?谁乐意撞上去挨斩!真是事与愿违,鞭炮烟火原想迎来“财神”,想不到真正的“财神爷”——消费者却被吓得敬而远之了。如此这般的反应,当事人心里自然透亮。

店主们的聪明,就因为他们在一时冲动过后,作了冷静反思,联合作出

“庄严承诺”。人孰无过？改了就好。虽也有人评说：这个承诺并未承认过错，有点王顾左右的味道。然而笔者以为，能正面承诺还是应该欢迎的。当然，人们在听其言之后，还得观其行。愿黄河路美食街说到做到，拿出实际行动并坚持不懈，毋负“庄严承诺”。（1996年3月24日）

手莫伸

前不久，荧屏上出现贪污犯石圣钰眼泪鼻涕的丑态；日前传媒又报道“湘中受贿第一案”告破，廖升阳从农村“草帽书记”堕落为“红包市长”，收受巨额贿赂，落入法网后悔莫及。

石、廖两犯虽然都是早年参加工作，曾为工、农大众服务，并非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腐化分子，但是，在后期他们见钱忘义，贼胆包天，把自己的誓言、党性和道德、法律一概抛到脑后，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的气味？这样的贪污犯，不是偶然失足，更不是法盲，他们知法犯法，知罪犯罪，影响更坏，危害更大，岂能任其逍遥法外？所以人们热烈拥护执法部门的严明果断。

两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不改造世界观，任私欲恶性膨胀，无视党纪国法。在此种反面教员面前，人们重温陈毅同志的告诫是很有益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1996年4月23日）

国兴旺 家小康

今年国庆正逢第九个五年计划行将圆满结束。人们在回顾五年生活时，“小康”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日渐增加。

老人们爱从亭子间、老工房谈到儿女们搬进新房，托国家福建立小康家庭，孩子们津津乐道玩电脑，把爸爸妈妈哪一年买电脑，作为家里小康的标志，前卫的妇女交流学开汽车的甘苦，说是好不容易考出驾驶执照，再买一辆车，过上小康生活。大伙共同关心那位“下岗爷叔”，眼看他一只凳子愁眉苦脸摆起香烟摊，几年工夫下来，如今几排啤酒箱堆得老高，乐滋滋准备

开方便店 ,看来离奔小康也不远了……

也有人以为不然 ,说是什么鸡毛蒜皮都算小康 ,岂非庸俗化 ?

不错 ,小康 ,列为我国在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它的含义自有物质、精神各方面的科学规范 ,不能任意乱套。但是 ,老百姓通过身边发生的变化 ,把国家宏伟计划、政府实项目 ,联系到家家户户的得益之中 ,畅谈体会 ,也许不全面、不够确切 ,却无可厚非 ,相反可以说是一种动人的自我教育。轻易摇头讥为“庸俗化” ,未免不智 ,起码是对老百姓渴望小康的心声无动于衷吧。

其实 ,进一步思索人们的话题 ,其中还包含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 :小康生活哪里来 ?老百姓常用“锅里有 ,碗里有” ,“大河涨水小河满”的比喻来回答。朴实而生动的顺口溜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国兴旺 ,家小康。国是整体 ,家像细胞。国家兴旺发达 ,才有家庭小康生活 ;而每个家庭的成员们努力生产、工作、学习 ,又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源泉。这正是人民国家和人民家庭的辩证关系。

(2000 年 10 月 3 日)

社会小言论

台风来时

有读者向报社建议,值此台风季节,请商店检查一下悬挂的招牌,以免发生危险。

这是一个积极的好建议。我们很多人有这种体会,每逢台风过境时上街,看见那些庞大的铁块木牌在头顶上摇摇晃晃,真有点提心吊胆。特别是一些年久失管的店招,发生下堕伤人的悲剧,据说也不是绝无仅有的。

这几天,经过强台风袭击,亡羊补牢,为行人安全计,请店员同志们注意一下各自的招牌好吗?

举一反三,也希望市民们在此时期中,都能消除诸如打破窗玻璃、露台上的花盆不翼而飞等等的危险因素。

(1962年8月2日)

树倒大家扶

台风吹倒了无数行道树,许多人都急于希望把它们扶起来,重新种好。然而该由谁来负责这一虽不复杂、却是很多街道都有的工作呢?

说起来,负有专责的园林工人,应该来做这一工作。事实上大批园林工人已经首先积极地投入抢救。但是,人少树多,光靠园林工人,即使全体日夜出动,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倒了的树都救起来啊!

通讯员同志及时告诉我们,海宁路一家理发店的同志,联合附近店员,扶起了马路上倒下的大树。

这个例子又使我们想起众人抬柴火焰高的老话来了。真的,如果来个“各人自扶门前树”,各马路、街道的店员们、居民们,都来齐心合力抢救倒树,那末,所花精力、时间不多,却能收到巨大效果!

树倒大家扶,请以大搞绿化运动的热情,来救护受灾的行道树吧!

(1962年8月3日)

爱护人民币

有些人喜欢“综合利用”人民币。

记上朋友姓名、地址、电话——暂作临时通讯录。

随意涂几个脸谱，抹几笔山水——用来学画打草稿。

有时当作便条，写着：“××，托你的事不要忘了！”

忽然变成试印纸，看，空白处盖了无数个图章。

读者问，这种人为什么这样不爱护人民币？

我想，故意去糊弄人民币的人，恐怕是极少的；多的是随便拈来，暂作他用。这些人的毛病看来是生活马虎、不爱整洁、做事无计划。平常生活中不过不修边幅，无伤大雅，可是随便到“不爱护人民币”却要受到群众的指责了。其实，从他们自己的修养、进步着想，倒也值得他们自己检点一番。

(1962年8月6日)

撒茄子的汽车

如果想吃茄子怎么办？“到小菜场买呗！”通常，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的答复；或者对方有块屋旁零星土地，那就可能自豪地回答：“到我的试验地里去采！”

可是，有位读者竟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到沪闵路上去拾！而且，他们在上月廿四日夜里，亲自拾到过从运输汽车上掉下的茄子，共有二百多斤！

是开玩笑吗？不，不是的。写信的工人同志对这种不爱惜国家财产的现象感到很痛心哩。

有人说，如果农民推辆小车进城，保证连一只茄子也舍不得掉。也有人说，如果这汽车是用来为那些当事人搬家，那准会装得妥妥帖帖。

据说汽车掉茄子并不是偶然事件，沪闵路上夜晚经常可以拾到蔬菜。那可真值得蔬菜运输部门注意了。

(1962年8月14日)

别忘了西瓜皮

吃了西瓜骂瓜皮,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可是近一时期来,读者几乎天天来揭露西瓜皮的罪状。犯了众怒,就需要认真对待了。

罗列起来,不下几大罪状:

第一状,影响卫生。水果店、西瓜摊、各垃圾桶附近,酸臭气冲鼻,招引苍蝇。危险。

第二状,妨碍交通。马路边、里弄口,行人一不小心,仰天一跤。有的市民竟至跌断骨头,送医院动手术救治。不幸。

第三状,扰乱秩序。孩子们玩游击战找到了“新武器”。墙角落、树后头,冷不防飞来一块西瓜皮,“敌人”倒没有击中,碰巧弄脏了阿姨的新裙子,扔疼了叔叔的背脊骨。讨厌。

第四状……

今年西瓜丰产丰收,上海人吃得好不畅快。按理说除了感谢农民兄弟,还该给西瓜记上一功。现在吃了瓜肉,却把瓜皮四处“示众”,害它惹人厌恶,岂不有点对不起西瓜吗?

瓜市正旺。卫生运动又临高潮。请别忘了好好处理西瓜皮!

(1962年8月16日)

农民要看电影

市郊某镇的居民前不久呼吁:有四十多天没看到电影了。邻县某公社社员也反映:

好久没听见有线广播了。

农民向社会公开要求文化生活,这当然是我们新社会里的新事情。可是且慢,难道这个县的电影放映队发生了故障吗?是不是那个县的广播线路也有了什么毛病?——读者说,都不是的。

据说,某镇所属的县电影放映队常固定在一些大地方放映,可就是不大下乡。而有线广播呢,据说有的地方就是不放了。

究竟为什么“不大下乡”，又究竟为什么“不放了”？似乎不宜再在这里追问到底。但是这两件看来不算顶偶然的事情，使人怀念起文化界“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深入工农兵”的决心和诺言来了。（1962年9月18日）

无 独 有 偶

“沪闵路上找蔬菜 五角场边拾糕饼”，这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却是说了无独有偶的两件“慷慨”事。

“沪闵路上找蔬菜”，前文早已表过。只是不知近况如何，不胜思念——倒并不是我们爱翻旧帐，巧的是读者又送来了这条下联。

原来，江湾五角场有家糕点工场，那里的糕饼司务，不知是特别喜爱球赛呢还是怎么的，忙里偷闲，就拿起待烘的面饼来相互抛掷，竟像练习篮球“传递”似的。然而，篮球落地会跳起来，可怜那些糕饼胚胎却因没有弹性，糕饼司务一失手，它们就一蹶不振，掉在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场边看热闹的孩子及时前来“打扫战场”，拾起受伤糕饼，回家处理去了。

我们不知道这家工场是如何计算产品数量和劳动定额的？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勤俭办厂和爱护粮食的？（1962年9月23日）

说 “客”

售票员热心借钱给乘客买车票，营业员想法让顾客及时买走心爱的商品，公园管理员主动借雨伞给游客……这些事情，在新上海几乎天天都有，因此我们大家就觉屡见不鲜了。然而对刚刚亲身经历的那些“客”们来说，却总是感到温暖之至。

内蒙一读者路远迢迢向报社写了一封信，就是为的感谢南京西路邮局的一位同志。那位同志为了使旅客能及时拍发电报，曾借给他一角钱。内蒙读者认为光就这件事情，也已经使他感到“客乡的温暖”了。

由此种种，使人想到“客”真是绝妙称呼。

客是对主而说的。中国人民传统好客，喜欢热情接待各种各样的客人。主客关系原也是人民群众相互友好关系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人民真正变

了国家主人以后,这种热情好客的天性,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顾客、乘客、游客、旅客……大家相互做主人相互做客人,处处有“客至如归”,处处有“客乡的温暖”,和旧社会那种作客他乡、世态炎凉的感叹,甚至孤苦无依,客死异乡的悲哀比起来,就如同隔世了。

因此,我想向所有的“客”们提个建议:如果你尝到了作客温暖的滋味,十分感谢主人的盛情时,那末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你自己也多做做“盛情的主人”!

(1962年9月24日)

指责得好

电车里上来了一个拎着两个瓶的乘客,售票员请问他:“瓶里装的什么?”回说:“不知道!”车子开了,另一位细心的乘客忽然发现那瓶上有“易燃药液”四个红字。携带危险品趁车是违反公共交通章程的,售票员劝他下车,可是违章者却硬着脖子,大不以为然。于是其他乘客群起指责,这才迫使那位不自觉的公民悻悻下车。读者把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是很有意思的。在我们国家里,许多公共场合的规章,无一不是保障群众利益的。因此,不仅主管部门应该认真执行那些规章,我们大家也都有遵守的义务。这大概是“众所周知”的起码道理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偏偏还有像那位不自觉的乘客那样的人。对于那样的人,如果主管人员给以解说、劝告无效,群众的指责倒是一种有力的监督。

群众对违纪者的指责,正是群众自觉性的表现。电车上的那阵指责,指责得好!

(1962年10月18日)

马路仓库

“马路仓库”这个名称不算陌生,由于它浪费国家财产、妨碍城市交通、影响街道整洁等等缘故,曾为上海各区领导和居民合力清除过。但是近来,它们又在偷偷露头了。前不久,海防路的居民痛切地感到它的可恶,甚至非向报刊揭发不可了。

那一天,海防路发生火警。附近消防队得到警报后,立刻风驰电掣般开出了

救火车。眼看就到火场 ,哎呀 ,救火车开不上啦 !你看路两旁这堆积如山的带钢 ,活活地把消防车拖住了——原来 ,这里正是一家工厂的“马路仓库”呢。

尽管“马路仓库”的主人也会有不少苦衷和理由 :生产发展 ,厂房不够用了嘛 ,这些原料、成品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呀 ,拿马路做仓库也是不得已啊 ,等等。但是 ,当他们的仓库已经妨碍了群众、集体和国家的利益 ,已经妨碍了社会秩序的时候 ,他们能无动于衷吗 ?还能安于光考虑本单位的方便和“利益”吗 ?

(1963 年 2 月 22 日)

收信人诉苦

有位读者诉苦说 :他辗转收到的信 ,邮票常常被人撕去了 ,有时索性连信封以及信封里附寄的东西都损坏了。

这真是大煞风景的事 !

人们总是把收到亲朋来信作为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信里有亲切的思想交流 ,有真挚的感情问候 ,有新鲜的消息报道 ,而欣赏一下信封的式样品种 ,欣赏一下邮票的画面色彩 ,也可算是读信后的一个小小余兴节目。

收信 ,虽然是一件个人的小事情 ,但它作为人们相互亲密关系的一种联系 ,倒也为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生活加上了美好的一笔。

我们同情“被撕邮票”者的心情 ,因而要向类似撕别人信上邮票的那些行为的人进一言。你大概并不是有意作弄人家的吧 ?你或许认为 ,这顶多不过是不拘小节罢了。但是 ,当你迫切想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 ,是否也应该想到 ,由于你的“不拘小节” ,会带来别人的不愉快 ?凡事三思而后行 ,可不要像俗话所说那样“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才好呐。

(1963 年 3 月 4 日)

傻哉 ,赌吃

读者看见两个青年在赌吃粢饭糕 ,直到吃得无法下咽 ,才认了输。

据说 ,有些成年人在当年也曾有过各项“惊人”纪录 ,比如排骨面撑得直翻白眼啦 ,春卷塞得胃里像装石头啦 ,冰淇淋吃得舌头失去知觉啦等等。

当时在“好胜心”支配下,很为这种“壮举自豪”,而现在想想却觉得可怜、可笑极了。

这些过去傻子们的自悔,很可以给现在傻子们听听。首先,赌吃只不过把好好的人当作酒囊饭袋,别人看来就像填鸭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壮举”。其次,好胜心不去放在比劳动、比学习、比健康上,却花在毫无意义的赌吃上,又有什么值得“自豪”呢?再说,拿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如此糟蹋,于心可安吗?还有,万一因为突然过量饮食而引起严重事故,岂不呜呼哀哉!

傻哉,赌吃的人!傻哉,赌吃的行为!于国于民于己于人,都有害而不利,为什么竟会去干呢?
(1963年3月23日)

看看什么风俗

套一句名人语录:风俗,风俗,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耶!何所指而云然?请看:——

外语学院一位读者到川沙给外祖母吊丧,只见穿白戴红,披黄挂绿,大做道场,大摆筵席,大鱼大肉一顿吃了三十桌。他很不以为然,向舅舅提了个意见,舅舅苦笑着回答:“风俗如此呀!”

什么风俗呢?第一,做道场,搞迷信,美其名曰风俗习惯,为死人做“功德”;第二,送礼请客,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美其名曰风俗人情,宾主之礼;第三,花光积蓄,甚或借债度日,美其名曰风俗尽孝,为死者风光;第四,劳民伤财,影响生产,美其名曰……

一般说对已故父母、亲人的哀悼、纪念是应该的。我国劳动人民自古至今始终有这种纯真感情。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旧风俗,也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推陈出新的必要!
(1963年10月24日)

别杜造怪词

你道“人毛”是什么东西?

“一结”又是什么玩意?

“常办”可是什么机关呢？

读者告诉我们，有些人为了“节约”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生造许多怪字以后，又杜造了种种怪词，随手白纸黑字写来，真使人煞费猜详。不但浪费了别人的精力，还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意外。

事实确也如此。比如“人毛”，如果大家猜不中这里省了一个“造”字，谁还敢去问津这种优良的纺织品呢？信封上只写了“一结”，邮递员就是骑破自行车，也难及时把信送到第一结核病医院呀。而“常办”，谁又会想得到这是一个县驻上海的办事处呢？

说得重一点，这是那些聪明人的群众观点欠缺，就事论事的分析，这种简称，也会害人害己。文字语言原是为了表达和交流意见的，必要的字、词千万省略不得！

（1963年10月26日）

熬熬烧烧须小心

西藏南路某居民烧肉，因无人看管，烧得砂锅裂开，油水四溅，顿时浓烟弥漫，幸亏邻居及时发觉，没有造成火灾。

国棉廿一厂一工人叫小孩子熬蹄膀，结果孩子去玩了，蹄膀烧焦了，满屋烟雾，差点火烧。

读者告诉我们的这两件事，据说还并非无独有偶。

本来，烧肉、熬蹄膀都是解放后家家户户经常要做的普通事情，也没有什么大学问。但是烧肉、熬蹄膀而至险些引起火灾，那就值得十分重视了。要知烧焦事小，不过少吃一顿肥肉；可如果弄成火灾，那就是关系到自己和邻居安危，关系到国家财产的大事情了。

西风起，空气干燥，正是火烛小心的季节，也请居民们注意熬烧小心！

（1963年11月9日）

冒险不是勇敢

读者告诉我们：一天，山东路宁海路口来了一辆黄鱼车，五六个孩子一见，顿时蜂拥而上，腿快的一个箭步，攀上车去，腿慢的叫嚷着在后追赶。踏

车的同志和路人都急忙劝止 ,说时迟 ,那时快 ,一个孩子突然哭喊起来 ,黄鱼车连忙停下 ,只见那孩子的脚伸进了车轮 ,腿上鲜血直流 ,脚趾折断了……

这真是一场不幸的灾祸 ,也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祸。

类似的事情 ,我们在一些较小的马路街道上常看到 ,一辆三轮车或黄鱼车经过 ,顽皮的孩子老爱去学“飞车” ,自以为勇敢、大胆 ,幼稚的小脑瓜里并不懂得危险。

有意义的斗争才是勇敢 ,无意义的顽皮只是冒险。教师和家长们在劝止孩子做危险动作时 ,讲清这点恐怕很重要。 (1963 年 11 月 11 日)

$$40 = 76 = 26$$

如果我说四十、七六、二六这三组数字是相等的 ,大家一定会笑话我连小学一年级生的水平也不如。但是 ,事实上 ,生活里确有这么回事。

有位读者的朋友为自己买了三双鞋子 ,一看尺寸 :球鞋四十 ,皮鞋七六 ,布鞋二六。看 ,同是一双脚 ,这三组数字之间不是划等号了么 ?

于是有人解释说 :你弄错了 ,这是各种鞋子尺码的标准不同嘛 !

对了 ,问题正在这里 ,读者就是这样提出意见的 :同一双脚穿的鞋子 ,为什么要用好几种不同计算标准 ?

于是又有人说 :我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原是过去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解放后 ,不是已有很多商品逐步统一了标准了吗 ?比如毛线 ,过去用英美制“磅”计算 ,呢绒过去用“码”、“呎”计算 ,现在早都统一使用“斤”和“米”、“尺”了。鞋子之类的商品的计算 ,是不是也应该统一标准呢 ?

这不仅是便利群众问题 ,也是一个彻底改变面貌问题。

(1963 年 11 月 16 日)

请“舍鸡为人”

日晖二村一位读者来信 ,要求邻居“舍鸡为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些居民家里养了大公鸡，每到丑末寅初时刻，便“喔喔啼——”、“喔喔啼——”，此呼彼应，大合唱起来。“夜半啼声”，闹得邻居们不能安眠。

对于大城市里居民养鸡问题，常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养鸡除虫，又可下蛋、供肉，不失为家庭副业，养鸡是好事。一种则认为，现在市上鸡、蛋多的是，城市里养鸡，既影响环境卫生，又妨碍交通、安静等等，不养为好。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想，上海这么大，居民居住条件很不相同，笼统说该养鸡或不该养鸡，恐难以服人。但是，如果因养鸡而影响环境卫生、妨碍交通，或像日晖二村读者说的闹得邻居们不能安眠那样，那么，我也同意请养鸡之家“舍鸡为人”！

（1963年11月24日）

别让死老鼠害人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全市大打老鼠的时候，两位读者不约而同地提醒大家一件事：死老鼠也要害人！

活老鼠要偷吃粮食，咬坏衣物家具，传染疾病，妨碍环境卫生，甚至于还会造成一些诸如断电、失窃等意外事件……对于活老鼠的为害，大家经过几年来的灭鼠斗争，可说是了如指掌了。但是对于死老鼠的恶行，人们好像还有点忽略。

其实，说穿了很是简单，死老鼠虽然不会再犯偷罪、破坏罪，可是传染疾病、妨碍环境卫生的罪行，却是至死不改的。我们既灭鼠就要灭得彻底：要叫老鼠死无存身之地，要把老鼠毁尸灭迹才罢。

因此，读者奉劝居民们，不要把死老鼠随便扔在垃圾堆边和阴沟旁，还建议各里委会能集中处理死鼠！

（1963年12月3日）

“雾”迷报栏

上海有很多读者是从贴报栏上读报的。我们每当看到报栏下人头济济，不论晴雨、早晚，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总不由得不钦佩那些读者关心国

内外大事的劲头 和强烈的求知欲。

但是在报栏下这个小小的社会场合里 ,也有些小小的人民内部矛盾呢。

一位读者给我们作了一番形象的描写 :正当大家看得高兴时 ,有一位读者从口袋中摸出香烟和火柴来 ,“擦”的一声 ,“呼”的一口 ,顿时一阵烟雾迷漫 ,笼罩了报纸 ,呛得好几位读者连连咳嗽起来。别人提意见 ,他却不理睬……

另一位读者要求读报栏下保持清洁 ,维护公共卫生、请勿吸烟 ,勿随地吐痰。

这个内部矛盾怎么解决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们也代报栏前的大多数读者 ,向个别吸烟、吐痰的读者呼吁 :请维护这个临时性小社会里的公共秩序 ,一样爱清洁、讲卫生 ;一样发扬方便别人、多为别人着想的新风格。

(1963 年 12 月 5 日)

“小袖珍”提意见

袖珍半导体收音机 ,这是今年工业部门送给大家的小礼物 ,也是广泛受欢迎的新产品。有了它 ,从高山到海洋 ,从农村到边疆 ,人们只要一拨小开关 ,戴上小耳机 ,便可听到国家大事和优美乐曲。怪不得大家亲热地呼它为“小袖珍”。

“小袖珍”热心为人民服务 ,但是它也有意见 :有人竟然带着它骑上自行车 ,边收听边飞驰。旁人捏汗一把 ,自行车驾驶员却洋洋自得。

可是 ,祸事终于发生了。一位读者在淮海中路见一青年 ,脚踏自行车 ,耳塞小听筒 ,一手扶车 ,一手拎了“小袖珍”。正当转弯 ,“咔嚓”一声 ,撞在路边一辆三轮车上 ,顿时人流血 ,车撞歪 ,“小袖珍”也遭了殃。

值此要求重视安全行车声中 ,发生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车祸 ,真是令人遗憾。人们如果真正喜爱“小袖珍” ,那就不应该把它如此“招摇过市”。

(1963 年 12 月 13 日)

“大而化之”先生

“废纸里掏金”这是比喻呢？还是实有其事？

是实有其事。勤工造纸厂同志来信，他们在拣选整理回收的废纸时，常从旧书报杂志里发现人民币、公债、邮票等物，有时还发现一些珍贵的书籍。

这些东西无疑地大多属于“大而化之”先生们。

“大而化之”先生，字“漫不经心”，雅号“不拘小节”。他们的轶事，不是丢了物品自己还不知道，就是随手放东西，用时找不到……

要说他们真个不稀罕金钱财物，这倒不见得；要说他们存心如此，那也冤枉。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工人同志的一番好心转告他们：请平时安放东西有个固定地方，请清理旧书报时稍为检查一番。（1963年12月20日）

看戏请脱帽！

请看电影、看戏的同志，自动脱帽！

这是新光内衣厂职工的建议。

可是也有戴帽者反对说：“入室脱帽，这是旧的礼貌和规矩，我们不讲这一套！”

不错，旧的礼貌和规矩，我们应该批判、扬弃。但是，“看戏脱帽”并不能列入旧礼貌，而且建议的目的并不在此。职工同志说得好：戏院内不脱帽，既妨碍别人看戏，对自己调节冷暖、保证健康也是不利的。

同样一件事情，有人从表面的、消极的方面去看；有人从实质的、积极的方面去看。不同的看法，得出的结论便会截然不同。

应该说，“看戏脱帽”的建议，积极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一个既有利于公众，又有利于戴帽者本人的好建议。（1964年1月9日）

忙 春 节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春节是我国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不少人按旧历还把它看作是过年。因为是过年，人们就显得特别忙碌，这叫做忙春节。

在一片忙碌景象中，有位里弄妇女来信说起她的两种忙法。过去忙，忙

的是挑拣年货 ,准备斋供 ,排列请客、祭神日期 ,准备红封压岁钱 ,准备香烛纸锭……一句话 ,既忙在钱上 ,又忙在“鬼神”上。现在也忙 ,忙的是访问军烈属 ,打扫室内室外 ,排练文娱节目 ,筹备家庭聚会附带会餐……一句话 ,忙得既对人有益 ,也对己有利。

这位读者说 ,前一种忙 ,忙得昏头昏脑 ,越忙越觉无聊 ;后一种忙 ,忙得心情振奋 ,越忙越觉有意义。

这位读者的两种忙法 ,说明她的思想进步。她摆脱了钱和“鬼神”的纠缠 ,摆脱了低级趣味和迷信落后 ,成为关心别人关心集体的人。

两种忙法 ,的确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想一想。 (1964年2月7日)

倡议节日卫生

不断有读者来信 ,倡议春节前后注意卫生 ,加以归纳 ,共计有五 ,提供广大读者注意 :——

一、环境卫生 :继承和发展“掸尘”好风俗 ,室内室外 ,门窗地板 ,桌椅橱柜 ,打扫得干干净净过春节。

二、个人卫生 :理发沐浴 ,拆洗被褥 ,指甲剪剪 ,棉衣刷刷 ,收拾得整整洁洁迎节日。

三、饮食卫生 :春节习俗不免会餐加菜 ,应该吃得多少适量 ,荤素适宜 ,总要欢乐、营养、有滋味 ;暴食暴饮 ,大煞风景。

四、文娱卫生 :看戏何必连赶两场 ,玩棋玩“扑克” ,不该通宵达旦 ,开玩笑开到“括鼻子”太无聊。文娱活动目的在有益身心健康 ,需要提醒。

五、公共卫生 :果壳、香蕉皮千万丢进垃圾箱 ;楼上娱乐 ,糖纸、烟蒂不要往下抛 ;大商店地上不该让孩子当体育场 ,吐痰入盂还要经常督促……

(1964年2月10日)

从扫雪想起

连日群众街头扫雪 ,便利车辆行人的热烈场面 ,使人感动得在冰雪天里都觉暖烘烘的。这时候 ,想起读者前些日子的几封来信。

一位职工的信批评有些街旁人家 ,常把脏水往街上倒 ,妨碍公共卫生不算 ,大冷天冻结成冰 ,早上行人路过 ,一个不小心便滑了大跤。

一位交通民警的信建议某些商店职工 ,是否改变在冰冻天用自来水冲洗人行道的办法 ,而代之以细扫勤扫来保洁地面。因为人行道结了冰 ,行人怕跌跤便走到马路上去 ,影响交通安全。

这条批评批评得对 ,这条建议建议得好。

不讲卫生又损害别人 ,这是很不好的行为 ,是应该彻底改掉的旧习惯。因讲卫生而引起不利群众和交通安全的副作用 ,性质虽和乱倒脏水完全不同 ,是做好事中的缺点 ,但群众要求他们好了更好 ,就值得重视。

在全市成千上万人“众人共扫街头雪”的好风格面前 ,我们相信这些商店职工和街旁人家一定会急起直追。

(1964年2月21日)

勿做吸烟接班人

一读者谆谆劝告 :青年人不要吸烟。

他说 ,看见十八九、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嘴上叼支香烟 ,不但浪费 ,也是影响健康的。

我很同意这位读者的意见。为此 ,还专门请教了几位新上瘾的青年同志。据说事情往往是这样的 ,先是人家送来 ,吸吸好玩 ,接着 ,偶然讨了一支“伸手牌”吸吸 ,似乎果然精神陡增 ;最后 ,偷偷买了一包来……还据说 ,初吸烟时 ,第二天早上嘴内发苦 ,心里后悔得不得了 ,决定不再吸 ,可是到时候不由又想拿香烟来往嘴里送了。

从这里发现事情还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怎样对待“好玩” ,比如怎样进行意志锻炼。

吸烟是否好玩 ?好玩的后果如何 ?值得事前认真想想。既有后悔 ,说明有了认识 ,宜乎立即回头 ,才是意志坚强。

青年人本来就是精神振奋的 ,只要适当的饮食和休息 ,加上经常的体育锻炼 ,精力就会用之不尽 ,哪里还需要靠香烟来使“精神陡增”呢。

附带说说 ,请吸烟老前辈们不必向青年热心送烟 ,请勿“培养接班人”。

(1964年2月23日)

要求不被烟熏的自由

在开会或娱乐的场所 ,如果有人怪声吆喝 ,影响别人的听觉 ,大家一定认为他扰乱公共秩序 ,群起而阻之 ,那人也一定会自知理亏 ,安静下来。可是在同样场合 ,有人吸烟喷雾 ,烟臭熏人 ,影响别人的嗅觉时 ,大家却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那人却怡然自得 ,安之若素 ,不以为歉。

人们何重于耳而轻于鼻耶 ? 曰 : 否。因任意吸烟已成习惯势力了也。

习惯势力的确是可怕的势力。现在 ,读者认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移风易俗 ,向这种旧习惯势力开火了。为了大家不呼吸烟雾而开火 ,为了公共秩序而开火 ,为了教育任意吸烟者而开火.....

有人说 ,这样不是连吸烟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 不 ,不。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吸烟。但是我们总也该有不被烟熏的自由呀。请吸烟同志在“吸烟自由”上加上“吸烟群众观点”好不好 ? 比如你是否可以按照“场内请勿吸烟”的告示 ,到场外去自由吸烟呢 ?

请吸烟同志也参加到这个移风易俗的行列中来吧 !

(1964 年 2 月 28 日)

为孕妇“呼吁”的由来

近几个月来 ,不断有读者来信 ,为妈妈们呼吁 :请在公共车辆上照顾孕妇和怀抱婴儿的妇女。

这问题初一听好生奇怪 ,照顾老弱妇孺病残 ,十几年来已在我们的社会上蔚然成风 ,公共汽车里也设过“孕妇与怀抱婴孩者专座” ,怎么现在反而发生了为妈妈们呼吁的问题呢 ?

经过一些了解 ,原来有些人认为 :“照顾孕妇 ,这不是鼓励多生孩子吗 ?”

看来 ,这些人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拥护者。但是 ,我们觉得他们对计划生育的理解有点片面了。

我们知道 ,计划生育确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家的大好事 ,其中很重要的一

个目的就是保护母子健康 ,爱护妇女儿童。计划生育不是不要孩子 ,也不能因此而轻视怀孕的、怀抱婴孩的妇女。

计划生育 ,提倡晚婚 ,是我们社会上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照顾老弱妇孺 ,团结互助 ,也是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方面。真正热心移风易俗的人 ,应该把这并不矛盾的两方面很好统一起来。 (1964 年 3 月 2 日)

再 谈 让 座

月初的时候 ,写过一段随感 ,为孕妇和怀抱婴孩的妈妈们呼吁了一下“请让座”。半个多月来 ,又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 ,提出了另外一些意见。

一个意见是 :有些妈妈抱了婴孩上车 ,对别人让座视为当然 ,不但不谢一声 ,连眼皮也不抬一抬 ;

一个意见是 :很多公共车辆终点站照顾妈妈和孕妇优先上车 ,但有些妇女常常在车已坐满时挤上来 ,叫人让座 ,不肯等下一辆空车 ;

一个意见是 :个别妈妈抱着孩子上车 ,不是向别人商量让座 ,而是向售票员喊道 :“小孩 !”意思应该受到照顾……

我认为以上种种虽然是少数和个别人的行为 ,但也值得提醒注意。车上让座是一种友爱的表示 ,妈妈们和一切老弱乘客 ,不可把自己放在特殊地位 ,非要人家照顾或视照顾为当然 ;至于我们让座的人 ,既然从关心别人困难出发 ,那就不再计较个别人的态度什么了。 (1964 年 3 月 31 日)

药 渣 和 旧 俗

自本报刊登一封劝阻乱倒药渣的读者来信以后 ,读者又陆续来信 ,认为这里面有个移风易俗问题 ,应该进一步议论议论。

中药渣倒在马路中心 ,对自己一无好处 ,却妨害街道清洁卫生 ,是一个不好的旧习。我们要革除这个旧习 ,也可以从旧习来源来研究一下。

据一位读者说 ,过去迷信 ,认为药渣经众人践踏后 ,病人容易康复。另一位读者则说 ,古人把药渣倒在通衢大道当中 ,以便侥幸让身怀绝技的走方郎中看到 ,从药辨病 ,前来治疗疑难病症。

前一种说法纯属迷信 ,我们要从服药治病的科学观点来宣传 ,劝导居民破除迷信。

后一种说法是反映了古代人在卫生事业不发达情况下的无可奈何心情。而我们现在 ,国家医疗事业发展 ,看病上医院 ,疑难病症中西医会诊 ,还有什么必要来“从药辨病”等待名医呢 ? (1964 年 4 月 15 日)

褪去“雅”衣

拾金不昧 ,拾表还主 ,向博物馆捐献传家宝……社会上发生的类似新闻多得数不胜数——这说明人们利他、为公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长。

但是 ,读者也反映了这样一些事情 :到图书馆找书报查资料 ,发现不知哪一个下此毒手 ,竟把书报整页撕去或挖空一大块。读者希望报纸舆论谴责这些不爱护国家财产的不良行为。

我很同意读者的意见 ,同时补充几句 :这些人酷爱文章 ,想必是个用功的读书人。读书所以明理 ,古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之训 ,现有利他、为公的无数活榜样。这些人在动手偷窃的时候 ,可曾想到羞耻两字么 ?

也许他会说 :搜集妙文佳作 ,乃是文人“雅事” ,怎能与偷窃并论 ?这使我想起一位小偷先生的“轶事”来了 :有一次小偷先生在书店偷书 ,到门口被捉住了。他说 :“我没有偷。我只是拿了书 ,但没有付钱 !”

我们希望醉心“雅事”的人 ,褪去“雅”衣 ,仔细想想。

(1964 年 4 月 17 日)

雨天的矛盾

下雨天的公共车厢里 ,有一个常见的矛盾。一位女读者来信提醒我们注意。

带雨伞的乘客 ,上车后收起滴水的伞坐下 ,穿雨衣的乘客上车后 ,有的脱下雨衣 ,有的就一屁股和雨衣而坐。

于是矛盾冲突起来 :“喂 ,请你脱脱雨衣。水淋淋的把人家衣服弄湿

了。”一般人接受意见,脱下雨衣,矛盾就很快解决,大家相安无事。可是也有时候,穿雨衣的只朝对方望望,不想脱。于是矛盾继续发展,“叫你脱下湿雨衣,听见没有?不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呀!”穿雨衣的火,非但不脱,还回敬一句:“这是公共汽车,不是在你家里;要舒服坐出租汽车……”于是,矛盾更进一步发展,左右前后的乘客都加入争论来了,直到那不肯脱雨衣的人自知理亏为止。

女读者评论说,近来大家都在学习解放军,要为人民服务,把方便让给别人,希望穿湿雨衣上车的人能自觉的联系实际。(1964年4月24日)

要走“正路”

有次在市郊,发现一条泥路的一边是茂密的油菜大田,另一边是一块三角形的“油菜岛”,当时觉得奇怪,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到南汇一位读者的来信,才恍然大悟。

那位读者要求行人走“正路”。“正路”是指正式的路,该直走就直走,该绕田就绕田。但是有些人,读者称之为“自私自利”者,就为了懒走几步路,爱开辟斜角路,于是麦子、油菜大田里就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荒垞”。

“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文学名言;直角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斜边,这是几何定理。看来,这些走斜路的人倒是很有文学兼数学头脑的。但是,在这里,他却缺少了重要的文明头脑:爱护集体财产,尊重农民劳动,大力支援农业!

值此广泛宣传交通规则之时,值此市区居民经常下乡之时,读者提醒要走正路,该是很必要的吧?(1964年5月4日)

贴邮票的讲究

一位工人同志住在医院里治病,他从亲友的大量来信中发现了一个邮票贴法不一致的问题,因而认真地写了一封信,向报纸建议,为帮助邮局节省一分一秒时间,要求寄信人按规定贴邮票。

我们很为这位生病的工人的热情所感动,就请教了一下邮局。邮局同

志说：统一贴邮票，的确是他们工作中所希望的。横式信封邮票贴在正面右上角，竖式信封邮票贴在正面左上角。如果大家都能照这样贴法，那么，全市邮局一天所节约的时间将是惊人的。

贴邮票原来也有这么一番研究。把邮票贴在邮局希望的位置上，这对我们大家可以说毫不费力，一无所失；而我们这一举指之劳所得的呢，却是邮政工作的效率提高，更好为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同时，我们收信人就能更快地读到亲友的来信。这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生活里原是有许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自己的潜力可挖的，我们要向那位工人同志学习，事事做个有心人。（1964年5月8日）

推桥头不如灭蝇

每次过桥，看见红领巾们在“推桥头”，心里总是又高兴，又不放心。高兴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有了爱劳动、助人为乐的好品德；不放心的的是看他们推着满载的货车上桥下桥，怕他们力不胜任，怕影响交通安全。

日前，听到一位踏三轮拖车的工人在四川路桥上发议论，劝说帮他推车的小朋友去做别的好事，不要拣这种需要花较大体力的事干。这位工人同志关心孩子的热心肠，引起了路人的赞美。

我也同意那位工人的意见，并且希望这一问题引起少先队辅导员们和有关方面的注意。

孩子的热情是可贵的，谁都不应该泼他们冷水；但是孩子毕竟还是孩子，那种可贵的热情发挥到什么地方，需要成年人来引导。比如目前，可以组织孩子们去宣传爱清洁、讲卫生，去拍苍蝇、打蚊子，帮助消灭孳生地，去督促小朋友们不要随地便溺，维护环境卫生等等。

让孩子们多参加些力能胜任的移风易俗好事，似乎比推桥头要适当。

（1964年6月13日）

要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同是这四个字，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旧上

海人骂人：“你吃饱饭了？多管闲事！”另一个意思是新上海人鼓励人：“你爱管闲事有什么不好？这是主人翁精神，就是要多管闲事！”不过后一句话的闲事两字，需要打上引号。

言归正传。一位读者有一次在闹市帮助民警，劝说两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路人，谁知他话未说完，对方就顶过来了：“你又不是民警，你多管什么闲事？”接着送了他两对白眼，扬长而去了。读者为此气愤难平，要求报纸说句公道话，他这闲事倒底管错了没有？

错的当然不是这位读者。对于那些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我们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帮助或批评，这不正是主人翁精神吗？类此的“闲事”，对集体有利，实际上是正事，越有人多管越好！

我们还想劝劝那两位送白眼的公民，你们那句旧上海骂人的话，可以改了。要知道，在新上海里生活，还讲旧上海的话，是多么不合时宜呀！

（1964年6月18日）

收到“疑难”信后

浦东一位中学生寄给我们一只盖有十四处邮戳、名章，写有六处附注的信封，还写了一封热情赞扬“人民勤务兵”的信。

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中学生的朋友从南京写给他一封信，在信封上既未写明村名，又把门牌号数搞错了。结果邮递员辗转寻觅，直花了一个多星期，才为这封疑难信找到了收信人。

不错，这样不怕麻烦、热心认真的邮递员，值得好好表扬，当得起“人民勤务兵”的光荣称号。因此，几年来，记者们感动之余，曾在报上对邮递员的先进思想和事迹，作了几次三番的报道。

不过，我们每次在表扬邮递员的同时，也不禁每次要引起一些感触：如果写信人能少出点差错，不是更好么？当然，有的信封写错还是情有可原的，比如请人代笔弄错地址，年长日久遗忘地址等等，但是更多的错误则是粗枝大叶的产物。由于粗枝大叶几笔之误，害邮递员浪费光阴，跑累双腿，绞尽脑汁，这是多么不应该呀！

由此想到，当我们收到一封亲友发的“疑难”信时，对邮递员固然要表

扬,而向我们的粗心亲友进一番劝告似更必要。

(1964年6月25日)

不许老鼠上台

一天晚上,有家剧场演话剧演得正紧张,突然幕后窜出一只大老鼠,在舞台上没命地奔逃,全场顿时哗然。读者来信问:这家剧场的除害工作是怎么搞的?

这件小事情,很耐人寻味。

小小舞台,有一只老鼠碰壁,因此竟引起全场哗然,这是不是观众的好奇心理?或是大惊小怪?不是的,从这件事里,我们看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句富有浪漫色彩的成语,已经变成为事实。这是除四害深入人心的一个意外小见证。

社会上展开着热火朝天的除四害运动,这家剧场的舞台上上演着现代好戏,舞台下却容许潜伏着老鼠害人虫。这是不是相称呢?确实不大相称。这就是观众觉得看不入眼,而要提出责问的原故了。

人们希望,这家剧场的同志们能以认真的态度对待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消灭四害,再不许老鼠上台!

(1964年7月9日)

关于“救火龙头”

马路边常常看见一些红色的矮圆柱,上海人都知道,这是“救火龙头”,即专门作消防用的自来水管子。

俗语说有备无患。解放后人民政府普遍增设“救火龙头”,储备大量自来水,这是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预防措施之一。加上其他种种防火、救火设施,人们谈起来总会引起一种特有的安全感。

因此,爱护“救火龙头”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

但是也还有这样一些居民,他们为自己方便,竟打开“救火龙头”的自来水,作生活用水。读者反映,还有个别单位居然也干出过这种事情——群众指出,今年夏天,某单位大礼堂,就以消防用水大量洒在屋顶上取凉。

说起道理来,这些人会说:“懂得,懂得。”然而他们总认为偶然用用没

有关系,不见得碰巧就闹火灾。殊不知备水千日,用在一朝,怎能麻痹大意?再说,为了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而去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这又是一种什么思想呢?

顺便,我们再告诉那些公民一句:有关部门规定不准随便打开“消防龙头”,私自打开取水是违法的。
(1964年9月12日)

我们的愿望

有一年元旦,一位读者给我念了一首儿歌:“新民晚报,夜饭吃饱,一家老少,谈谈笑笑。”儿歌的后两句是他加的。他认为,晚饭后全家欢聚一室,读晚报,话家常,彼此畅谈见解,相互交流心得,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集思广益,真是其乐融融!不幸,十年动乱一开始,《新民晚报》遭劫停刊,家庭中的这种气氛也给打掉了。

现在,恶梦早已过去,大地早已春回,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新民晚报》也在今天重新和广大读者见面。《谈家常》愿经常跟随晚报穿大街,过小巷,进里弄,到家庭,和新老朋友一起叙谈,传递一些见闻,发表一些看法。如能给大家一点启发,引起一番议论,听到一点赞同或批评的意见,那就是我们的愿望!
(1982年1月1日)

可敬的新娘

在一家大饭店门口,看到一对男女青年,反复商量,徘徊了好久。最后,女青年拉着男青年,毅然走进大饭店,原来,他们去退掉原订的十几桌结婚筵席。

现在,人们把结婚讲排场叫做公害。它一害新郎新娘耗费时间、精神,二害双方家长受到经济压力,三害诸亲好友忙于应付送礼,四害社会风气受到污染。有此四端,称之为“公害”,并不冤枉,而各方舆论谴责,实在也是应该。

然而,事情往往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老百姓生活还不宽裕,大摆宴席,大办嫁妆,明明有害无益,但有些新郎新娘却被虚荣心束缚住了,硬

是挣脱不出来。所以,那位毅然拉了新郎去退酒席的新娘,显得特别可敬可爱。她的行为值得新郎新娘们学习。(1982年1月2日)

不冷静的一铲

有位居民分到一套新房子,老邻居去祝贺他乔迁之喜。进门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只见他满头大汗,在搬空了家具的屋子里,用铁锹乱铲乱刮。天蓝色墙壁,红漆地板,已经面目全非。他说:“宁可铲掉,也不让他们享现成。”

原来,这位居民要求有关方面补还他旧房装修费,没成功,便铲墙壁和地板出气。

对这件事,有人批评那位居民有了新房铲旧房,太不冷静,损人不利己,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有人认为铲坏装潢当然是错的,但是如果自己分到这间旧房,倒愿意补贴些装修费,来享那份现成。

我认为第一种意见批评得有理,第二种意见补充得有情。有情有理,可以减少许多矛盾。(1982年1月3日)

请给宝宝挑生日

有位年轻妈妈生孩子,正碰上妇产科接生“旺季”,小宝宝接踵而来,于是她只好和另一位产妇合睡一张床,心里不大愉快。

生孩子又不是收水果,怎么也有旺季、淡季呢?仔细一打听,原来,冬季生孩子“旺季”,是春节前后结婚“旺季”的结果。

由此想到,本市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比较好,独生子女证的夫妇越来越多,那末,对独生子女的出生季节,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一下呢?比如春暖花开之日,或者金风送爽之时,不都是迎接小宝宝的好季节吗?何必都挤在同一段时间里,弄得医院紧张,产妇也不舒坦。

当然,最好是结婚也不要形成“旺季”,一年之中,月月都有吉日良辰嘛!(1982年1月4日)

罚款要当真

南京东路人行道上聚着一群人,原来是两位挂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在处罚随地吐痰的一个中年人。他们收下两毛钱罚款,撕下一张收据,又教育中年人:“下次要讲卫生、讲文明,改掉随地吐痰坏习惯。”中年人红着脸,接过收据,钻到人丛里走了。

一旁看热闹的人群顿时议论开来:“瞧,真要罚钱,可不能乱吐痰啦。”“两毛钱事小,当着这么多人,真丢脸!”“这两位老工人好,又罚钱,又劝说。”……

显然,人民政府有关随地吐痰要罚款的规定,是受到群众拥护的,效果是好的。不过,有了好的立法,还必须要有执法的切实措施。现在,像上述罚款教育的情景只是偶一见之,因此,痰迹未能迅速减少。这是值得引起有关方面注意的。既要罚款,就得当真。

(1982年1月6日)

代母鸡看病

虽然里弄里一直宣传城市居民不要养鸡,可读者晓章的邻居家总是悄悄养着一只生蛋鸡。一次母鸡生病,不爱吃也不下蛋,这可急坏了女主人。她左思右想,忽然有了主意,急匆匆跑到工厂医务室,如此这般看了病,药配到手就回家,抓住母鸡又塞药片又喂药水。过不几天,母鸡的病倒真给治好了,又“咕打,咕打”叫着生起蛋来。

女主人得意地向人介绍她给鸡治病的经验,不过略去了“代母鸡看病”的重要情节。这是不是说明,女主人自己也明白,让鸡分享劳保医疗,毕竟是不光彩的行为。人们为她担心的是,母鸡的病虽然治好了,而她自己头脑里的病却加重了。

(1982年1月19日)

新春写春联

新春佳节,里弄里的小青年们忙着写春联。写春联原是我们民族的一

个古老习俗,解放后人们移风易俗,推陈出新,在每年春节期间,用春联形式抒发真挚的感情,表达美好的祝愿。像“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这样的春联,很多劳动人民家庭几乎长年张挂。

今年的新春联,同样内容丰富,百花齐放。我看到小青年们热情感人,也随手写了几对,不计工拙,给大家凑个热闹:

(一)经济建设处处结硕果,精神文明人人育新花。

(二)家事公事全国事事向上,老年中年小青年年年前进。

(三)独生子女养好还需教好,两老父母媳亲更比儿亲。

(四)里弄评六好,喜报传千家。(1982年1月25日)

吉庆有余

李家嫂嫂早已办妥了年菜年货,可她知道公公的愿望:年夜饭桌上要有一条鱼,而且最好是活杀的。所以她一清早又上菜场,拎回来一条活蹦乱跳的胖头鱼。老公公一见,乐得呵呵笑:“有了大黄鱼,又来活花鲤,真是锦上添花,吉庆有余!”

老婆婆听了也笑起来说:“你年年唠叨有鱼有鱼,可我们年轻时候过年连条鱼尾巴也买不起!这两年你可满意了吧!”

李家嫂嫂高兴地接嘴:“前几年,我年三十买不到活鱼,心里真急。我知道公公讲究讨口采,现在国家经济形势好了,你的口采也就灵了。”

“说得好!这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政府关心老百姓,我们要和政府上下一条心,泥土变黄金!”老公公更高兴了。(1982年1月24日)

礼品交换站

张家姆妈亲友多,春节来来往往,都拎着一盒盒、一篓篓礼品。张家姆妈总是自己买了礼物送给甲,然后把甲送来的礼物转送给乙,乙送来的又转送给丙,循环往复,像个礼品交换站。

如果说张家姆妈愿意这样忙碌,那可冤枉。她也有她的一番苦衷。因为如今社会上亲友来往送礼成风,她要是不送、不收,怕惹人议论,如果把客人

送来的点心、水果全享用了,那么家里还得花更多的钱去买还送人的礼物,经济上负担不起。她是不得已才出此礼品交换的妙策。

我想,亲友间为表达感情,送些实用的或纪念性的礼品,是合乎情理、无可非议的,然而像现在那种非送重礼不可的浮华风气,不是勤俭持家之道,实在要不得。

(1982年1月27日)

三早抵一工

小余是个好学生,学习用功,工作积极。可最近他却感到很苦恼:寒假过去一半了,计划要读的书,还没有读完一半,承担早上买菜的家务,也总是完不成,惹得妈妈下班回来生气,而自己又觉得忙得很,怎么办?

“你改掉早上睡懒觉的毛病就好了!”妹妹笑着批评他。

这话不假。老百姓不是说“三早抵一工”吗?这正是千万人生活经验的总结。一个人如果每天早起二小时,三天就有六小时,加上早起精神饱满,效率高,确实能抵上一天的功效。有些青年让美好的晨光从枕边流走,实在很可惜。“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正在度寒假的同学们,愿你们珍惜早春之晨。

(1982年2月2日)

毛脚女婿上门

有位读者告诉说,现在某些时髦的毛脚女婿上门,几乎全副“武装”:一挺“轻机枪”,两个“炸药包”,四个“手榴弹”,外加二百发“子弹”……。人们可能会吓一跳:这么些武器带到女朋友家去干什么?

原来,这些只是“文学语言”,是比喻,描写的是毛脚女婿上门送的礼单:火腿,奶油蛋糕,瓶酒,香烟等等。

这样的重礼上门,未来丈人一家可能会高兴一阵:“看,这位毛脚女婿多有气派!”然而冷静下来想想,这一批厚礼,得花去一个青年几分之几的工资?如果还要按一年“四大节、两寿辰”排场来送礼,那毛脚女婿就会未曾成亲先背债了。请未来丈人、丈母娘主动阻止、教育毛脚女婿,勿再干这些时髦的傻事,要准备勤俭成家治家。

(1982年2月6日)

老校长的楼房

老校长住的是幢二层楼房。房子的屋顶、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室外春绿秋红,室内冬暖夏凉,又好看,又实用。可是多年来,这些却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最近,报纸、广播宣传绿化的季节已经到来,每个十一岁以上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都有种树绿化的义务。怎样完成这份义务呢?大家纷纷动开了脑筋。这就发现了老校长立体式绿化的好经验。栽培爬山虎,占地很少,却可以绿化整幢房子。于是大家都想前去讨教。

这使我想到,我们如能做绿化的有心人,就会发现群众中因地制宜搞绿化的好办法。这比光喊“城市里没有地方种树”,要实际得多。

(1982年2月15日)

路边的“臭虫”

新修的柏油公路两旁人行道上,铺满方方正正的水泥板。说来奇怪,那些水泥板常常不翼而飞。飞到哪里去了?有心人很快发现,就在新路面东缺一角、西缺一块而不得不由国家重新补上之时,那些沿路的私人住宅面前,却陆续出现了水泥板铺的小天井、小甬道。

挖取公共大道上的水泥板,铺设自己的小天地,这是什么行为呢?恰当的名称是“偷”,还得加上“明目张胆”这个词。偷公济私,不仅不光彩,而且是违法的。

也许有人要说,当前要打的是经济领域中的大老虎,区区水泥板算得什么!算什么呢?就算苍蝇、臭虫吧。苍蝇、臭虫位居“四害”之列,不也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消灭的吗?

(1982年3月1日)

学雷锋插曲

早晨下雨,公共汽车更挤。两位乘客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先是争论,

继而对骂 ,声音越来越响 ,惊动了几乎整节车厢。大家听不下去了 ,纷纷议论起来。

“好了 ,不要忘了现在是文明礼貌月。”

“你们的孩子说不定今天都去宣传学雷锋了 ,你们不也得学学吗?”

“骂得还像话吗?单位里和车子上可别两副面孔!”

说也奇怪 ,这些议论还真灵。双方顿时偃旗息鼓 ,车厢秩序恢复了正常。

这段插曲很给人启发。它既说明了精神文明、学雷锋口号的威信 ,又说明了舆论的威力。而两位当事人的终于自觉 ,也属难能可贵。

(1982 年 3 月 5 日)

橡皮鱼公案

火车里 ,人们相互让着吃珍珠鱼干 ,啧啧称赞它洁白如珠 ,味道鲜美。

“这鱼干是什么鱼做的?”

“听说是橡皮鱼。”

“啊 ,橡皮鱼!”一位上海妇女皱起眉头惊叫一声。人们以为她要把鱼干吐掉了 ,没有 ,她依然津津有味地嚼着 ,“想不到橡皮鱼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鱼干来!”

前几年上海人对橡皮鱼印象不好 ,嫌它长相丑陋 ,肉色可疑 ,名字粗俗 ,说是上不了台盘。弄得小菜场里卖不掉 ,成为一桩不大不小的公案。现在经过科研人员开发 ,食品工人精心加工 ,外观美了 ,味道好了 ,消费者欢迎了 ,橡皮鱼公案也就了了。

社会生活里也有“橡皮鱼” ,如果大家像食品工人那样对他们精心加工一番 ,那么 ,受人欢迎的“珍珠鱼干”必然会多起来。 (1982 年 4 月 21 日)

现代“世外桃源”

朋友家来了亲戚 ,三十几岁的夫妻俩 ,竟带了四个孩子。我朋友吃了一惊 ,问他们 :“你们怎么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呢?”

“我们在船上 ,到处跑来跑去 ,没人管的!”孩子的妈妈回答。听她的口

气,倒并不是反对计划生育,她也觉得孩子多,自己又要帮丈夫撑船运货,又要带孩子,忙得实在不行。可是没人管,她也没办法。

我朋友把这段故事告诉我,而且评论说:“某些个体户船上,倒像现代世外桃源了!”

这件事也使我很有感触。环境卫生有“死角”,计划生育也同样有。而像这种没人宣传,没人计划,没人检查的地方,存在的问题又何止是计划生育呢?这些现代“世外桃源”,是不是值得有关方面关心一下呢?

(1982年5月3日)

可笑的是谁

有一年冬天,我在广州街头碰到一位老太。她一把拉住我,指着我衣襟上的几只琵琶钮又笑又问。我猜想她是问我衣服在哪里买的,便告诉她是在上海做的。她惊喜地伸出大拇指,“上海、上海”地讲个不停,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我正发窘,幸好有人给翻译,才知老太把“上海”当成了“小孩”,她正在夸奖我“小孩”的好手艺哩。

这件旧事历久没忘,因为它使我对提倡普通话的意义有了切身感受。是呀,我们国家这么大,方言这么多,没有共用的语言可怎么出门呢?

不过懂得普通话重要的人也不一定都肯学,主要是怕讲得不好惹人笑。其实,谁又天生就会讲话了呢?小孩子还不是从“牙牙学语”开始的!

所以,可笑的倒不是学普通话的人,而是笑人的人。

(1982年6月12日)

抢桌子的喜剧

一位同事谈起晚上家里抢桌子的情景:“一张书桌被当爸爸的长年占了;一张饭桌老人要读报纸,孩子要做功课;弄得我只好像在五七干校时那样,靠两只膝盖读书写字!”

不料,这番话引起了在场几位同志的共鸣。于是,有的介绍怎样使用茶几写稿子,有的介绍如何等老人、孩子睡了以后再动笔……

这真是一番又酸又甜的聊天。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房子不大、书桌不多,总是个“吃酸”的问题。不过,物质条件虽然还差,心情却和当年在干校大不同了。看到家庭里学习空气浓,大人孩子晚上没有浪费时间的,谁心里不是甜滋滋的呢!当然,大家希望的是日益酸少甜多。

至于目前,尽管“抢”字不大文明,大伙却还是愿意演这出抢桌子的喜剧。
(1982年6月13日)

蚕豆风波

汪家餐桌上有一碗浅绿色的蚕豆,热腾腾香味诱人。却不料因这碗蚕豆引起了一场风波。先是媳妇听说豆从集市上买来,嫌太贵;接下来婆婆讲孙女儿:“这么嫩的蚕豆还吐壳?小姑娘真娇。”媳妇一听,认为是针对自己,就回说:“我有胃病,从来只吃豆肉不吃豆壳!”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争吵起来。做丈夫的左右为难,小女儿吓得不知怎么好。一顿饭不欢而散。

像蚕豆风波这样的家庭小矛盾,在里弄里常有听到。分析起来并没有什么原则的争论,多半倒是因为相互了解、体谅不够所致。虽然有的人家吵一回又和好了,但是也不乏吵得多了从量变到质变,弄得婆媳、夫妻、姑嫂、丈人女婿之间关系恶化,从此家庭不和。

所以,在家庭关系上防微杜渐,值得注意。
(1982年5月18日)

小孙孙含烟斗

一位奶奶带孙儿上街买玩具回家,只见小孙子戴了一副眼镜,嘴里含只烟斗,一副老气横秋模样,奶奶在旁看得咯咯直笑:“多像他爷爷!”

奶奶爱爷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奇怪,可怪的是奶奶竟喜欢把孙子打扮成爷爷。

当然,更怪的是卖玩具、做玩具的人。在这全社会宣传戒烟的年代里,他们竟设计让孩子们玩烟斗。难道要从小启发他们抽烟吗?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小孩子可爱在于天真活泼,生气勃勃。孩子的玩具也以能使他们身心

愉快,启迪智慧为佳。孩子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未来主人翁。让花朵般的小孩子含上烟斗,预演烟民姿态,我们可不赞成!

(1982年7月5日)

哗哗水与滴滴水

莫家原在公共龙头用水,每次哗哗冲洗,用得好不畅快。邻居劝他们注意节约,男主人振振有词:“我家可没有少付一分钱呀!”

最近,他家装了小水表,再也听不到“哗哗”的水声了,可邻居却发现他们整天开着“滴滴水”,女主人津津乐道:“这样放水水表不会走动,是节约的好办法。”

“哗哗水”反映了男主人“花钱能买浪费权”的错误思想,他不懂得,节约自来水是爱护公物的美德,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分钱”的境界;何况,他“没有少付”的那“一分钱”,实际上是沾了众人的便宜,而女主人的“滴滴水经验”,貌似节约,人们却一眼看穿了她揩国家之油的目的,这行为说得直率一点,就叫做偷。

从哗哗水到滴滴水,人们不禁为这对夫妻捏把汗。

(1982年7月30日)

春节——文明节

春节,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定的节日,它从旧历过年推陈出新而来。

旧历过年,从腊月下旬开始,到正月中旬止,花样繁多。夹杂其间的祭灶、谢年、拜财神等迷信活动,还有聚赌、酗酒、铺张浪费之类陋习,都是毒化人们思想的,不足为训。它们的残余,还是我们治脏乱差的一个方面。

然而,过年活动中,也有许多好传统,比如掸尘、衣冠整洁、不讲臭话、相互祝贺、文娱活动等,则是中华文明古国的遗风。经过我们注入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它们已经发展为讲卫生、讲礼貌、环境美、语言美、勤俭朴实、开展健康的群众性文娱活动等等新风,开出了五讲四美的花朵。

发扬文明,淘汰粗陋,经过大家坚持移风易俗的努力,使春节成为光辉

灿烂的文明节！

(1983年2月13日)

婆媳让房

小竞姑娘前一阵为结婚用房问题闷闷不乐，原来她对象家住的是三层阁，做新房一间朝北，才七个平方米。经几天思想斗争，她开朗了：只要小两口真心相爱，住房嘛，随着国家建设发展，总是会改善的。

谁知正在这个时候，她对象告诉她说：父母亲坚持要把朝南一间较大的阁楼让给儿子媳妇结婚。小竞姑娘一听连连摆手说：“这可使得不得，怎可让老人调房？我们住了怎会心安？”

这下难煞了新郎官。

婆媳让房的新闻，像股春风，直吹进人们的心底。不管他们最后如何住法，都能预料到会出现一个团结和睦的新家庭。而在某些人为房子闹得你抢我夺、丢情弃义的时候，这两代人的风格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1983年5月10日)

秋光照眼明

读者的来信来电来访，可说是社会的“温度计”；对报纸编辑部来说，又好比是一个人的眼睛、耳朵。每天传来社会上丰富多彩的“生活录像”，提出形形色色的实际问题。这是报社和读者所共同注意的。关心人民苦乐的人，从中可以触摸到群众的脉搏；有志于研究社会的人，可以找到日新月异的课题。

从今天起，个人想经常和读者交流点从群众生活中获得的一些信息和由此引起的感受，且称之为“生活琐谈”。

今天是国庆节，应该先报个喜讯。近来本报群众工作部门提供信息：因为相骂、相打来报社要求公断的相对减少了，而对五届全运会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有时为了一场比赛，来电来访就达到几百人次。这不是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会秩序正在好转，而青年朋友的兴趣原是很广泛的吗？

近来社会秩序好转，秋光照眼明，使我们大家能更愉快地欢度国庆。这

是和有关方面加强治安法制工作分不开的。但是 ,要保持长治久安 ,促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则需要综合治理 ,特别是建设精神文明。而这 ,就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了。

(1983 年 10 月 1 日)

“ 橡皮筋蛋糕 ”

昨天 ,一位读者寄给报社一根粘乎乎的东西 ,随附一信说 :国庆节他拿南京路某大饭店买来的奶油蛋糕请客 ,不料吃出一根橡皮筋 ,真是大煞风景。

我看着那根橡皮筋 ,摇头之余暗暗庆幸我家那个节日奶油蛋糕已吃了一大半 ,平安无事 ,毕竟是淮海路名牌商店产品 ,质量有保证。下午回家 ,不料家里人立即拿出一段也是粘乎乎的东西来抗议 :剩余的奶油蛋糕里咬出半根橡皮筋 !

真是无独有偶。橡皮筋是怎样钻到奶油蛋糕里面去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思前想后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 ,“橡皮筋蛋糕”只是前阵子“螺丝钉月饼”等等“特色月饼”的变种。孙悟空虽然有七十二变 ,但变来变去它的本相还是个猴子。“橡皮筋蛋糕”和“螺丝钉月饼”的根子都是不重视食品卫生法。

虽然在节日数以万计的时令糕饼中 ,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但是食品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 ,应当是万无一失 ,出不得任何毛病。这是国家和消费者对食品行业的起码要求。

(1983 年 10 月 3 日)

晚娘与佳话

在家庭的各种矛盾中 ,后母与前妻生子女的关系 ,可算是最复杂、最难处理的了。这里不但有母爱这一真诚的、有时也是狭隘的感情起作用 ,还有年深月久的老观念作怪。古老的谚语就留给人们不少成见 ,什么“云里日头 ,晚娘拳头” ,“不是亲生 ,不如畜牲”等等 ,都描绘了后母的阴狠和前妻生子女的不肖。这种社会舆论使为子女的从小谈晚娘色变 ,而待嫁的姑娘大多不愿当续弦。

其实,生活中的事实并没有这样糟,继母与前妻生子女和睦相处,长爱幼,幼尊长的故事并不少,本报以前介绍过,今天通讯员同志又为我们报道了章家的佳话。有人说他们一家儿、媳、孙儿女都好,也反映了继母好,真是四好合一好,归根结蒂是婚姻法好!

这番话说得有理。确实,章家的佳话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婚姻法,是这朵鲜花的育花人。现在是到了变换社会舆论的时候了,愿我们大家为这样的五好家庭而大喊大叫。

(1983年10月9日)

姑娘,请加餐!

常常听到一些妈妈们抱怨女儿:“吃得太少了,看你瘦成这样!”

也常常听到一些师傅们叮嘱女徒弟:“多吃一点,把身子弄得壮实一些!”

而女儿、女徒弟们呢,常常忸怩一笑,不置可否。到了饭桌上还是只肯吃一两。

是姑娘们胃口不好吗?多数并不。是饭菜不中意吗?大半也不是。据姑娘们中传出的消息,不肯吃饱的真正原因是爱美,怕肥。

这可是个有趣的问题了。姑娘们爱一点美当然无可非议。然而美的标准可就各种人不同了。这段短文里当然不可能探讨美学这门复杂的学问,我只是想对姑娘们提醒一句:新中国妇女的美,是百花齐放的,但是总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健美,健美,有健才有美。身体是这样,精神也是这样。

所以,诚心诚意奉劝主张减食防肥的姑娘:请加餐!吃饱了肚子,精力充足,工作学习之余多参加体育活动,这才能真正得到健美的效果。否则,饿得瘦弱不堪,虽然肥胖不起来,但还有什么美可言呢?

(1983年11月11日)

尊老与文明

三位老人按规定日子,冒大雨到指定的银行领退休金。一个年轻的银

行职员回答还没接到区办通知,随口打发老人们下午再来。老人诉说年近有病,天雨难行,请他打个电话查问一下。谁知他断然拒绝,反而顶撞老人,说他们“卖老”。

一位读者实在看不过去,不禁担忧“文明危机”。

尊老,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肯定这一字眼,并给它注入为人民服务的新涵义。一个人,如果对曾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现在需要社会帮助的老人也不尊敬,甚至不肯为他们打个电话,那么,还谈得上什么为人民群众服务呢?

不过,尊老之所以能成为传统美德,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提倡、督促、身体力行分不开的。对于那种缺乏知识,不讲文明之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陷入“危机”,而是要认真对待,教育、批评、帮助,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悔愧、转化,精神文明之光终究会照亮他们的身心。(1983年10月21日)

“补偿”与损失

据说有种心理学研究“补偿心理”。某甲不当心,一头撞在门上,痛得金星直冒,他的“补偿心理”促使他举起拳头,对着门狠狠捶几拳,算是得到了补偿。

其实呢,门本来无过,挨了几拳也不会觉得疼,倒是某甲自己,撞得头疼不算,又加上捶得拳疼。名为“补偿”,实在却是“加倍损失”。

可惜这一简单的道理,有些人硬是不愿意弄清楚。据一位读者报告,宝山有户人家婆媳不和。一天,婆婆为了媳妇没有端馄饨给她吃,气得一夜没好睡。第二天一早,她冲进儿媳房间,捧起一台崭新电视机,“哗啦”一声扔到楼下;又“哗啦”一声,把一架收音机攒得粉身碎骨。这一“补偿”,损失足有五、六百元,而婆媳的矛盾加深,更无法以金钱来计算了。

听起来这是一个可笑的故事,主人公是个愚蠢的人。可是在某些家庭里,因为夫妻吵架、兄弟相打而累及锅碗杯碟遭殃的,每天不知有多少呢。

(1983年10月26日)

在废品中闪光

读了前面这封中学生写的短信(《店员宁可推迟吃饭废纸堆里找出存折》),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对废品回收站职工的敬意。

废品回收工作,琐碎繁杂,又脏又累,而利润微薄,这是那些“向钱看”、“图安逸”的人所不屑干的。然而废品回收行业的广大职工,却深深懂得,社会上三百六十行中,少不得这一行。他们长年累月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为方便人民生活,为废物利用,为支援国家四化建设而辛勤劳动。特别像中学生信中表扬的那几位营业员,从几百斤废纸中“大海捞针”,为顾客找到了一张小小的存折,这种乐于助人的品格,在废品中间闪光,确实值得称道!

比起某些职业高雅、衣冠楚楚却热衷于搞精神污染的人来,这些整天与破烂打交道而精神洁净、风格高尚的人,更显得可贵了。

(1983年10月31日)

苹果和蜜梨

毛主席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辽西战役的时候,解放军某部住在锦州老百姓家里。那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战士们白天黑夜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毛主席称赞他们自觉认识到: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有人说,这个故事只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而且主角是解放军。言下之意,似乎在当代的普通青年中不可能产生这种故事了。

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也有他的理由,因为经过十年动乱,社会风气确是大不如前了。但是读了蒲西路小学的蜜梨故事,不知有何感想?

徐汇区修房一队一分队的青工们在老师傅带领下,不仅高质量地修好了蒲西路小学校舍,而且在蜜梨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采摘过一个!这不正是一种和“锦州苹果”同样高尚的品德吗?这说明,时代确实不同了,然而由“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熏陶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完全可

以治愈创伤,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革命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

(1983年10月5日)

余师傅应该说

热心里弄公益的余师傅近来有了苦闷。

有的人家老爱往小树上拉绳子晒被头,有的人家倒垃圾总是不愿意倒进垃圾箱,有的人家收音机常常开得响彻四邻……这些看起来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老生常谈”。可又确实影响到绿化、公共卫生和环境安静,属精神文明之列。开头,余师傅总是热心地进行劝告,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可是有的人家非但听不进,反倒怪她多管闲事。因此余师傅觉得左右为难:不说吧,于心不安;说吧,影响关系。

我设身处地为余师傅想了想,认为她还是应该说。因为她指出的是只顾自己不顾集体的不良习气,而对不良习气,我们不能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说了有利于集体是会受到广大居民支持的。至于有些当事人说怪话,那是他们错上加错,正说明需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一旦当他们觉悟到自己错了时,就会感谢余师傅的批评并加改正了。

对余师傅来说,热心里弄公益,明辨是非,只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做,持之以恒,是一定会收到好效果的!

(1983年11月21日)

老蒋升了“三级”

同事老蒋今年升了一级工资,可他总是笑咪咪地宣称:“我加了三‘级’!”

原来,老蒋是摇笔杆子的,往常写起稿子来,大前门香烟一支接一支,一个月竟要烧掉三分之一工资。因此而影响家庭经济生活,自不待言。春天的时候,老蒋下决心,把烟戒了。说也奇怪,此后他的文章反而写得又多又流畅了,人也胖了,口袋里也不再羞涩了。到月底那个星期天,他还能自豪地对他夫人说:“今天改善生活,买个鸡,钱我有!”

于是,一家老少高兴,其乐也融融。

老蒋戒烟取得的实效很有说服力。它首先破除了“文章成篇,必须抽烟”的迷信,也戳穿了“吸烟不穷,戒烟不富”的欺人之谈。每月省下那么二三十元,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确是相当于加了两级工资,这个数字对家庭可不是个很小的数目。而更重要的是,戒烟增进了自己健康,增加了全家欢乐,那价值可就不是用物质所能计算出来的了。

还是戒烟好!

(1983年12月12日)

幸福不忘毛主席

早些年我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到城乡居民家里串门子,常常看到一副大红对联,贴在大门上或者堂屋正面墙上,写的是:“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我不知道这对联是什么人创作的,但是它的确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是一副充满感情又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好对联!

今天是毛主席的九十诞辰,阳光灿烂,放眼城乡,粮食丰收农民富,经济兴旺职工欢,生活安定居民乐,知识界心情舒畅,喜为四化出力量。虽然还有困难,但是人民信心百倍。

这一切,都是我们党中央邓小平同志运用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党中央里有不少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主席作了最主要的贡献。因此,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以及今后越来越幸福的生活,饮水思源,都离不开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

有位居民对我说:“‘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副对联我们要贴在心上,并且世代代传下去!”我完全赞成这个建议。

(1983年12月26日)

冬雪宝

昨天下午起本市雨雪交加,到今天上午已下了一场不小的冬雪,激起了

人们心头各不相同的反应。

城里人一般不喜欢下雪天,寒冷自不必说,买小菜、上学、上班、送孩子上幼儿园都增加麻烦,如果地上积雪冰冻的话,就会影响交通,副食品、日用品运输困难多,公共车辆又挤又慢,弄不好乘客就会埋怨……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然而农民却有区别地对待下雪,他们的谚语叫做“冬雪宝,春雪草”。冬雪会冻死害虫,积雪像是给越冬作物盖上被子,在冬旱地区还可以保墒等等。

长期的生活经验使他们认识到:下雪虽增加不便,但冬雪有利于农作物,丰收有望,远比春雪要宝贵。到了读书人的笔下,便叫做“瑞雪兆丰年”。

我是想说明,同一场雪,有人喜欢有人愁,这是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从不同切身利益出发去看它的原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我们如能权衡主次轻重,那么,城里人也会看到,对农业生产有利也包括了对我们大家有利。那么,也就会怀着赞赏冬雪的喜悦心情,而克服自己的局部困难了。

(1984年1月18日)

八旬翁表衷情

收到一位老读者——八十多岁老爷爷的来信,述说他前几天上街,突然病倒,幸亏淮海路常熟路口健美药房的职工热情照料。一位青工跑到他家里通知,又踏黄鱼车送他上医院,使他及时得到治疗,恢复了健康。

老爷爷希望晚报刊登他的信,以表彰社会上的好风气,并表达他的衷心感激之情。

这可使编辑部为难了。说真的,现在每天收到的大量来信中,反映这类好人好事的实在不少,而报纸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刊登,只好挂一漏万了。

读者来信像一面面镜子,照出社会各个角落读者的喜怒哀乐。比如老爷爷老奶奶来的信,有的表达自己幸福晚年的欢乐,有的诉说自己受到下辈冷淡、虐待的苦恼。最近却接连看到老人们赞扬青年的信,并说衷心感谢党春风化雨。

照顾一下老人 ,这对青年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可给老爷爷老奶奶们带来的愉快却不小。我们希望有更多青年乐于“为长者折枝”。

(1984 年 1 月 25 日)

笑 送 猪 年

今天除夕 ,癸亥年将在爆竹声中结束。老猪去也 ,热烈欢送 ,十二年后再见 !

记得今年年初 ,人们纷纷话猪 ,颂猪 ,迎猪……对猪年寄予了很大希望。现在到了岁尾 ,“年终盘点” ,人们不禁喜上眉梢 ,猪年里果然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 ,工业增产 ,生活改善 ,风气好转 ,城乡一派好形势。

当然 ,我们不是唯心论者。

希望猪年里“猪多肥多 ,肥多粮多” ,生产发展 ,多种经营蒸蒸日上 ,这原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美好愿望的实现 ,靠的是党和政府正确领导 ,靠的是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辛勤劳动和创造。这就是说 ,猪年也好 ,牛年也好 ,即将来临的鼠年也好 ,都是同样的 ,真正的主人是人民 ! 有的人担心甲子年碰上老鼠难办事 ,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也是可笑的 ,恐怕是迷信思想的残余反映吧 !

所以 ,我们送别猪年 ,为的是吸取逝去一年中的有益经验 ,扬弃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以利再战 ,以开创四化的新局面 !

(1984 年 2 月 1 日)

可 怜 的 新 娘

《本报值班室纪事》昨天报道 ,闸北区一位新娘被爆竹炸伤头部 ,生命垂危。今晨听广播获悉 ,这位女青年已经因伤重 ,抢救无效 ,不幸死去了。

听到这一噩耗 ,人们不禁同声感叹 :唉 ,可怜的新娘 !

想当天 ,新郎兴冲冲 ,备轿车 ,迎新人 ,满望举行欢乐的婚宴 ,新娘也喜滋滋 ,盛妆出嫁 ,一心建立幸福的家庭。可谁知平地风波 ,一枚迟爆的炮仗 ,顿时酿成了悲剧。新郎和双方家属悲痛、后悔莫及 ,自不消说。

看起来 ,炮仗是发生这场惨祸的直接因素。但是 ,进一步想想 ,也还有

另一层原因 ,这就是迎新娘要放“高升” ,讨口采 ,辟邪之类。这些充满迷信色彩的旧风陋俗害人不浅 ,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可怜的新娘成了旧风陋俗的牺牲品 ,我们大家同情之余可要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
(1984 年 2 月 14 日)

青 年 的 心

前夜南黄海地震波及本市时 ,许多居民从睡梦中惊起 ,住在高楼上的人们纷纷下楼 ,走向室外 ,需要照顾老弱病残的人家 ,心里不免着急。

在那紧急的时刻 ,里弄里一些青年挺身而出 ,有的挨家去招呼行动迟缓的邻居 ,有的扶病员、端椅子、安排到安全地带……

俗话说 ,日久知人心 ,患难见真情。受到五、六级地震的一些波及 ,虽然还谈不上患难 ,但在夜深天黑、灾情不明的当时当刻 ,这些青年想到他人的行为实在是感人的。

联想到前晚有更多的青年和老师傅们一起 ,坚持生产 ,保证供电、供水 ,保持电讯、交通畅通 ,维护社会秩序等等 ,他们紧张、沉着、镇定 ,心中想着人民 ,更是难能可贵。

这些青年的心充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新一代的主人翁风貌 ! 我们特别觉得欣慰 ,也要认真向他们学习。
(1984 年 5 月 23 日)

保姆也是产业军

虹口区为有困难的职工做了一件大好事 ,组织起一支五千多人的保姆大军。

保姆 ,现在时兴称为家庭服务员 ,是有困难家庭里的重要人物。

我们在一些名人的著作和实践中 ,常常看到、听到他们和保姆的友谊。比如鲁迅有长妈妈 ,宋庆龄有李姐 ,几乎是众所周知了。她们的辛勤劳动 ,对鲁迅和宋副主席的伟大成就无疑是有功绩的。她们是保姆的光荣榜样。

在名人家里如此 ,在普通人家 ,保姆也同样有着大大小小的功劳。她们照看老人、孩子 ,为双职工们解决买汰烧等家务困难。很多人家称呼保姆

为“阿姨”、“阿妈”,说明了人们对保姆的尊重;也说明,现在的家庭服务员和旧社会富贵人眼中的佣仆有着本质的区别。

现在,社会上第三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的范围很广,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姆——家庭服务员,也是一支产业军。

(1985年1月31日)

会说话的破烂

一位读者说,他的邻居得寸进尺,占领公用楼梯,从一只小凳,一只破脚盆,发展到硬塞进去一只带镜子的破扁桌,实在“妨碍交通”;

一位读者反映,大楼的公用场所里摆满旧棕绷,破锅子,瓶瓶罐罐,开起了“破烂展览会”,实在脏乱差得可以。

一位读者解释说,这些破烂都在代表主人说话:“我家住房挤,只好放到外面来”;“公用地方嘛,我家也有份”,“人家占了公用地方,我家不占白不占”……

一位读者评论,里弄中要“整顿交通,改变脏乱差”,首先还要请某些居民清除思想上的“差”字,从心里疏理为集体着想的“交通”。

这些读者的意见、解释、评论有启发性,可以介绍给更多的读者一议。同时,希望趁文明礼貌月的和风,请破烂们再说一句话:“我不愿意被众惹人讨厌,我愿意到我该去的地方——废品回收站,为四化出一分力!”

(1984年3月15日)

把公字写得浓一点

“事有小而不忘”,古人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这一感受,现代人也常有所体会。

很多年前有一出小戏,描写农村一对小夫妻的公私冲突,一方委婉地劝导对方说:“你把公字写得浓一点吧!”

“把公字写得浓一点”,这句话当时被誉为好台词。一出小戏中的一句好台词,当然是小事一件,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它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最近,在议论争做文明市民的话题中,大家又想起了它。

确实,争做文明市民,离不开一个公字。比如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文物等,处处都有个公字。把公字写得浓一点,就是在脑海中印得深一些,在行动中记得牢一点。这样,先公后私是做得到的,一心为公也可以努力做到。相反,谁如果把公字丢在一边,脑子里没有公的观念,行动中不顾公的规范,唯我独尊,唯我独行,那么,他不仅做不了合格的文明市民,而且会处处碰壁,直到受处罚。

我们大家把公字写得浓一点吧!

(1985年6月25日)

“大老粗”请摘帽

开口闭口以“大老粗”为荣的年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大家普遍厌恶愚昧无知和野蛮粗俗这一对难兄难弟,认定它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拦路虎,必须坚决消灭。

怎样消灭呢?对于这种附着在人们头脑里的细菌,不能用刀刮,不能用水冲,也不能用火烧。行之有效的办法有一个,便是“化疗”,即对那些尚未“病入膏肓”的患者,用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细心“喂养”,使之一点一点增加抵抗力,提高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抛弃愚昧,逐步变野蛮粗俗为文明。

但是,思想和文化浩如烟海,喂养工作又从何入手呢?经过“名医”会诊,已经有了一张好方子:开展“人人遵守文明公约,人人争做文明市民”的活动。在活动中学习公约,学习科学文化;在活动中实践公约,去旧布新,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文明新人。摘去“大老粗”帽子,当个“文明市民”,此其时矣!

(1985年7月8日)

新祝愿 新礼物

新年新祝愿。今年人们的祝愿增加了一条: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都生活在上海,外地的读者也会有机会来到上海作客。我们多年来都盼望上海的市政建设旧貌变新颜,希望这一美好的愿望

随着国家四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而逐步实现 ,日新月异。

近来 ,我们大家从实际生活中强烈感受到 ,在今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 ,上海将绘制又新又美的图画。而这一历史长卷 ,需要千千万万人一笔一笔地精心描画 ,需要千千万万人一天一天地艰苦劳动 ,需要千千万万人一处一处地齐心配合。

让我们记者和读者的照相机经常瞄准上海城乡不断涌现的新景 ,并及时地向大家介绍上海人民建设和管理自己城市的风貌 !

我们愿以《上海新貌》这一新的专栏奉献给读者 ,作为新年礼物。

(1986 年 1 月 1 日)

真 聪 明

报载一千多户黄浦区居民 ,正在陆续全家迁往浦东。

看到这条新闻的读者议论不一。有的说 :这批人真傻 ,会答应搬到对江去 ,这有多么不方便 ! 有的说 ,这些人倒聪明 ,听说浦东将来是建设重点 ,便趁早搬了去享福。两种意见看起来截然相反。

说“傻”的人是真以为别人傻 ,大有惋惜他们离开闹市去受“苦”的感慨。而说“聪明”的人 ,也不像有满腔热情 ,语气之中似乎还带点儿讽刺意味 ,潜台词是 :你知道哪年哪月能建起来呀 ?

其实呢 ,被视为“傻”的家庭一点儿也不傻。加快市政建设 ,是我们全上海人民早思夜盼的事情 ,如今它在“七五”计划中已开步走 ,“人民城市人民建”。为此作出点贡献 ,大家都是愿意的 :包括克服生活上暂时的不方便。也是顾大局的表现。何况 ,重点建设浦东不仅列入了振兴改造上海的规划 ,而且已经开始在行动了 ,这可不是什么纸上谈兵。所以 ,说趁早搬去的人家聪明 ,是说对了 ,他们是真聪明 ! 一切配合市政建设而积极动迁的居民都是真聪明 ! 当然 ,有关方面要尽快减少这些居民的不便 ! (1986 年 5 月 3 日)

七 巧 节 乞 巧

农历七月初七 ,俗称七巧节。在我们家乡 ,姑娘妇女们特别喜爱它。

这一天,妇女们用槿树叶榨汁洗头,把头发洗得又清爽又乌黑,揉面粉、白糖做巧果,撒上芝麻,经过油炸,又香又脆;头天晚上,妈妈们把小宝宝手腕上的“健绳”(又名牛绳。是姑姑阿姨们用五彩丝线编成的,在端午节那天送给宝宝们系上,以保幼儿在暑天仍像牛般健壮)解下来,抛在屋顶上供喜鹊及时衔去搭鹊桥,让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七巧当晚,姑娘们供水果、清泉向织女“乞巧”,并蘸泉水洗目,在还不很明亮的月光下引丝线穿绣花针,比比谁的目力好……

一切是那么美,那么有人情味,又那么和神话故事相融合:人们把牛郎作为勤劳健壮的象征,而织女是心灵手巧的女神。

民间的节日,常常蕴藏着人民美好的愿望。去芜存菁,保存它,发扬它,有益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1987年8月29日)

“比 爷 爷”

有人描绘几个小学生聚在一起“比爷爷”:

“我爷爷比处长还大!”

“那有什么,我爷爷是将军!”

“哼,我爷爷好住‘博导楼’啦!”

“我爷爷……嘻嘻。”

“我爷爷……”

“比”的孩子和“听比”的大人都嘻嘻哈哈笑了一阵。

笑过以后品味一下,潜台词各不相同。有的孩子认为自己爷爷了不起,很得意;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爷爷比不上别人爷爷,“苦笑”;而大人们多半只觉得好玩。

比比爷爷也没有什么,但要看比什么。孩子的标准总是由大人灌输影响而来。所以从小树立孩子们的英雄观,是大人的责任,更希望爷爷们关心小孙孙的健康成长。(1990年12月3日)

敬 老 插 曲

敬老宣传周开始 ,家家收到一封告居民书 ,要求大家为年老长辈做些实事 ,如送点礼物 ,做点好吃的 ,以表小辈心意云云。

三楼住着一对老教授夫妇 ,身边没有子女。老师看罢来信打个哈哈 :“我痴长两岁 ,你做点好吃的慰问慰问吧 !”夫人不服 :“我已退休两年 ,还不属老 ?该你孝敬 !”两人调侃一番以后 ,决定敬老日去上小馆子 ,“自我敬老”。老教授意犹未尽 ,提笔在油印信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心是好心 ,奈何应景 ;家无晚辈 ,何来亲情 ?老夫老妻 ,无妨相敬。”

不知那些只爱做应景文章的好心人 ,看了这一幽默的批评 ,有何感想 ?如果能根据不同对象来作宣传 ,不是会有另一种效果吗 ?当然 ,有实际行动更好。

(1990 年 10 月 31 日)

孩子的兴趣

了解孩子的兴趣 ,是大人们经常需要关心的问题。

淘淘和星星 ,平日都在幼儿园 ,星期天一起到外婆家玩。外婆给他们安排了许多节目 ,吃的、玩的、看的、听的……一天下来 ,问他们什么事最开心 ?回答出乎意外 ,一个说 :“帮外婆整理花盆。”一个说 :“跟阿姨到院子里挑马兰头。”现在的独生子女 ,从家里到幼儿园 ,大都生活条件优越 ,应有尽有 ,吃玩玩已不新鲜 ,而让他们参与些模拟劳动 ,却会感到特别高兴。关心孩子的兴趣 ,并因势利导 ,给他们一点爱劳动的启蒙教育 ,是值得重视的。

(1991 年 3 月 17 日)

老李“挖邪”

一天清晨 ,正在散步的老李 ,停在一堵墙下 ,伸出双手 ,在墙上挖呀挖的。挖什么东西 ?走近一看 ,他正在一小块一小块地撕去一张粘得很牢的招贴。“尽是邪门 ,胡说包治肮脏病 ,还冒用军医名义。”老李忿忿地边撕边骂。显然 ,墙上是骗子们的“花招”。

老李离休多年 ,身体差。但他认为自己的“余热”虽不多 ,也还应该尽一点力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撕去这些散布精神污染的东西 ,叫做“挖

邪”。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老人们的“余热”也同样。像老李从自己情况出发,做一点具体事情,不为名不为利,令人感动,也起敬。

(1991年6月16日)

路边“芳草”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内,必有忠信。这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至今仍有价值。只要我们多留点心,便会发现在某些不文明现象之外,时有社会新风在吹拂。

春雪后的那天上午,路经靖宇路九十路终点站,发现不少行人在一行道树旁驻足观望。我也不由被吸引过去,原来树上挂着一只塑料袋,袋里装着一只孩子的皮鞋。从大伙脸上的笑容,我看到了一段小故事:妈妈怀里的小宝宝掉了一只皮鞋,热心的路人拾起后想挂在树上,以便妈妈找到;可是天下雨,怕新皮鞋被淋坏,于是随手拿出一只塑料袋套上……

塑料袋比皮鞋更动人。它们就像路边的芳草,虽然很小,却青翠鲜嫩。

(1991年3月8日)

阿孔打电话

我朋友的朋友阿孔,是出名的“长话局长”。几句话可以讲清的事情。他在电话里非要聊上五分钟;尤其是下班后在单位里打的电话,天南地北,家务儿女,嘻嘻哈哈,刻把钟是常事,据说最高记录达半小时,听得受话人叫苦不迭。久而久之,大伙便送给他这个雅号。

今年春节流行电话拜年。我朋友也接到阿孔一个贺电,意外的是只讲了二分钟就一声“拜拜”结束了。事后问他是否向“长话局”辞职了?他坦率地回答:“那是家里新装的电话机逼的呀!”

我朋友恍然大悟:原来和电灯、自来水一样。电话机也有公私之分。他奉劝阿孔,把这一“逼”出来的打短电话好经验,推广到单位里,于人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1991年3月2日)

看“鸡爪队”表演

5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五角场55路公共汽车新风站上秩序井然,乘客们依次等着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

忽然,候车队伍中来了穿着显得特别的二女三男,每人挎着一个背包,一手托着一张油腻腻的报纸,纸上几只红烧鸡爪,一堆西瓜子。他们不时抓起一只鸡爪塞进各自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啃嚼一阵,然后“噗,噗”连声,把鸡骨头吐在地上。转眼间,新风站的地面上鸡骨累累。人们实在看不下了。

“喂,小师傅,请不要随地吐骨头了。”一位中年女同志好意对他们进行劝导。

“噗!”那个穿一双花皮鞋的男青年,用又一根鸡骨头作为回答,外加一个“白眼”,那意思自然是明白的:“要你多管什么闲事?”

“这是新风站,大家要自觉点!”一位老师傅也发话了,“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噗!”那个穿着时髦的女青年吐完最后一根骨头,作色道:“外地人算啥啦?侬可是上海人!”接着她又专心嗑瓜子,“呸——呸,呸——呸”,顿时瓜子壳满天飞舞。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又进站了,那支“鸡爪队”表演完毕,争先恐后上了车。人们看着他们留下的满地狼籍,不禁连连摇头叹气。

(1985年5月24日)

钻洞失足记

本市有所著名大学的生活区内,有一道透空墙把课堂、小菜场、浴室和庄严的教学大楼隔得泾渭分明,彼此看得见走不通,只能隔墙相望,倒也别

有风味。

前几天,周老师路经生活区,看到一个年轻人为了贪五分钟便宜的捷径,正在钻这透空墙,别看此人高大的身躯,却用跳霹雳舞的身段探头缩肚,像蛇一样“游”了过去。他定睛仔细一看,原来墙上一根水泥柱子已折断,空档大一些,然而钻过去还是很费劲的!

事有凑巧,前天周老师一早买菜,又经过透空墙,猛见一位胖笃笃的半老阿姨也在钻洞,莫说她上了年纪,还真身手不凡,竟然也被她“游”过去了。不过当这位胖阿姨刚进洞去后,别人却不见了她的影子。周老师好奇地走过去往墙洞里张望,哎唷不好,只见那位胖阿姨仰面朝天,躺在墙内坡下泥潭里,两手乱抓,两脚乱蹬,挣扎着爬不起来。

公墙被人损坏,贪捷径者吃了苦头。未知那道透空墙的主管部门何月何日来补上这个大漏洞?
(1990年11月30日)

银蛇狂舞

俞老师喜欢音乐,但她常说音乐形像难以捉摸,比如“金蛇狂舞”这一乐曲,听后却想象不出“金蛇”怎样“狂舞”。可是前几天,她告诉我:亲眼看见了“银蛇狂舞”的情景。我一听不禁追根究底,原来:——

1990年岁末的星期四下午,俞老师到五角场附近某大单位的浴室里买票淋浴。一进更衣室,她听别人告诉说,左面那间浴室很空,只剩一个女同志了。俞老师满心欢喜,便和女儿俩径直走到左面那间去。

一进浴间,只听见满屋水声哗啦啦,满屋热气,定睛打量,只见八根白色大水链正在汹涌奔腾,水珠飞溅,蔚为壮观。俞老师不禁脱口惊叹:“啊,银蛇狂舞!”再看八条“银蛇”间,果真只有一个莲蓬头下有人。

“怎么开了这么多水龙头呀?”

“她们洗完澡管自走了!”女儿边说边一个一个去关上空开的水龙头。

“唉,这有多浪费!”俞老师毛估估框算一下:要是经常如此,该浪费多少自来水和煤呢?她认为这一现象应该批评,可又不知道该批评的是些什么人,只好不满地看了一眼那位不作一声,在满室“银蛇狂舞”中安然独自洗澡的女青年。
(1991年1月5日)

孙悟空的尾巴

星期天,老匡到住在政修路附近的女儿家玩,一进门小外孙就拉着他去看“孙悟空的尾巴”。老匡弄不懂,跟着他穿过小路,来到大道边一幢新修的高级招待所大门旁。小外孙老远就指指点点:“外公,快看,孙悟空的尾巴被打断了,逃到这里来好久了!”

老匡走近一看,不由哑然失笑。原来,招待所新大门旁的污水潭前竖着一根残剩的水泥柱,约二米高,顶端的钢筋已暴露弯下,估计是那家招待所的“胡子工程”,对行人来说倒是个危险因素,黑夜里保不住会撞得头破血流呢!

“你怎么会说它是孙悟空的尾巴呢?”外公奇怪地问。

“爸爸讲故事说,三眼二郎神老和孙悟空作对,孙悟空打不过他,变了一座庙,没地方藏尾巴,只好竖在屋外。我想他现在又变了招待所,尾巴也被二郎神打断了,只好可怜巴巴地竖在马路边了。”

看着那个新建招待所的那根断了一截的“孙悟空的尾巴”,对于小孙子的丰富想象,老匡不禁笑了起来!
(1991年1月)

怪鸡与怪经理

某大学的闵老师是热心肠人,农历小年夜一早,就上菜场帮住在大学宿舍里的一位年老军属买了一只活鸡,又代为杀好。可拔净鸡毛后发现鸡肚皮特别大,光鸡重四斤八两。剖开一看,鸡屁股处多了一只鼓鼓的皮囊,提起来囊破水泻,哗哗流了小半盆。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一称,“流水鸡”剩三斤半了,足见,那袋水竟有一斤二两还多。待到挖净鸡内脏,花近十七元买来的五斤多重大活鸡,竟变成了二斤三两的“丑小鸭”,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闵老师看着实在不像话,便拎着杀好的怪鸡、内脏连那只装水的空皮囊,到杨浦区那家与大学同名的菜场去反映这桩怪事。卖鸡的营业员回答说干脆:“明天退还你一元五角便了。反映没有用,要反映去找经理。”

找到经理 ,忙碌的经理正忙包扎着自己的年货 ,边听边把眉头和脸皮紧紧皱起 ,哼哼地说 :“ 赔你点钱就是解决 ,还想反映什么呀 ?要曝光把鸡拎到报社去好了 !谁让你买到这只鸡 ?老实说 ,只怪你自己触霉头…… ”

闵老师听了这番“ 怪 ”话 ,倒抽一口凉气 ,抬头看到高挂的红横幅 ,赫然是 :优质服务 ,让顾客满意称心……心想 ,刚买了只“ 怪鸡 ” ,现在又碰到一位菜场的“ 怪经理 ” !

(1991 年 3 月 3 日)

天 女 散 “ X ”

几乎每逢休息日 ,邻院某学院宿舍三楼 ,一个装有翠绿“ 华盖 ”的窗口 ,总要演一出多姿多彩的新编“ 天女散花 ”。因有目击者不愿在此称花 ,姑且以“ X ”代之。

天女是位半老娘子 ,每逢假日清晨便“ 演出 ”此剧。第一节名为“ 灰绸舞 ”。但见小窗内伸出一只纤纤玉手 ,抓着灰黑抹布 ,用红绸舞的姿势往下挥舞、抖动 ,随着娴熟的动作 ,那积有一周之久的尘灰 ,飘进邻家的窗内……

第二节是武功戏。一把看来刚扫过地的长柄扫帚 ,拍拍敲在窗外右下方的墙上 ,顿时垃圾碎屑纷飞。久而久之 ,米黄色的外墙面 ,竟被“ 染 ”出一块黑灰色的壁画。

第三节魔术表演更是五花八门 ,一会儿抖衣服 ,一会儿刷小地毯 ,一会儿倒抽屉 ,凡有积“ X ”之物 ,统统散到楼下 ,落到人们身上。

压轴戏也是最惊人的一招 ,只听“ 噗 ”的一声 ,一口浓痰射向楼下花坛里的绿枝上。

目击良久者说 ,有资格住高等学府宿舍的 ,不是为人师表者也当是教工家属吧 ?周周如此 ,也亏她有“ 毅力 ”一直这样散下去。

(1996 年 2 月 23 日)

实践—认识

广播要有自己的评论

(选摘)

今年四五月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办了评论节目,一个叫《广播杂谈》,一个叫《广播漫谈》。这是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广播领域的流毒,拨乱反正的收获之一,也是通过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砸碎精神枷锁的成果。

广播和报纸一样,要做党和人民的舆论工具,就要通过自己的评论来直接地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电台没有新闻不行,没有自己的评论也不行。电台没有评论,广播出去的声音在社会上的影响就不大,就建不起舆论威信。事实上,广大听众对电台过去长期缺乏自己的评论是不满意的。他们反映:“电台老播报纸的大块文章(包括报纸评论),炒冷饭,我们不爱听。”“老是重复报纸的东西,我们不会自己去看报吗”?电台办了评论节目后,有位听众来信说得好:“我认为‘两谈’节目开辟得好,电台对某些事物有了自己的态度了。”这确实代表了广大听众对广播评论的呼声和要求。

听众的鼓励,更使我们坚信电台自己的评论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发挥广播的舆论威力,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问题。

广播应该有自己的评论。但是,在开头台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电台嘛,大家习惯于听听戏曲,放放音乐,不适合搞评论,多搞点文艺节目才是真的;也有人说,报刊上有的是杂谈、评论,电台何必自己搞;还有一些同志

担心搞评论人少不行,谁肯给电台写评论稿?等等。总起来看,大家较为担心的一是听众欢迎不欢迎?二是稿源充裕不充裕。

几个月来,实践对上述提出的各种看法、担心和问题作出了回答,它证明所谓广播不适合搞评论、妄自菲薄和怀疑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现在,评论节目的概况是:《广播杂谈》的风格居于杂文和小言论之间,要求短小精悍,新鲜活泼,亲切有味,可直接配合新闻,也可以配合当前形势。《广播漫谈》是一个固定的思想教育为主的评论性节目,以青年和工人为主要对象,要求与听众尤其是青年听众交知心朋友,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启发引导,不尚板起面孔教训人。

评论节目开办以来,基本上是受欢迎的。电台陆续收到、接到、听到许多听众的来信、来电和口头意见。其中有普通的工农兵群众、大中学生、教师,也有退休职工和高龄的老人,有新闻界、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和行家,还有一些外地的听众,收听面比较广泛。他们对电台新开辟“两谈”节目认为是适时的,选题围绕宣传“四化”、“四个坚持”,抓住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来说理、议论,做到紧跟形势,题材广泛,一事一议,浅显易懂,认为新鲜活泼,有味道,受教育。有些听众还要求重播一些较好的内容,有的索取广播稿,有的热心听众还提供情况和材料,希望写成评论节目来进行宣传教育。同时,作者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几个月中一共收到来稿三百篇,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新闻界人士和评论作者。

事实证明,电台开展评论工作确实大有可为。实践又一次启示我们:广播一定要闯出自己的路子,有自己的特色。各种宣传工具,都有它的长处和局限性,应该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特长,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只有这样,听众才乐意听我们的广播。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初步摸到一些搞广播评论的体会。

我们原订评论节目方针是:坚持体系(马列),实际出发,表扬批评,题材广阔,由小见大,不拘形式,面向群众,生动活泼,亲切谈心,自成风格。在实践之中,有些地方是丰富、充实了原来的方针,也有些做得还很不够。我们的体会是:

一、紧跟形势,实际出发,不断选题,力求新、广、深。

我们的《漫谈》每周要发稿五篇,《杂谈》发稿三、四篇。开始我们信心

不足,认为哪来这么多题目好谈;以后在工作中逐步摸索,选题逐步丰富起来。在第三季度,我们的选题计划有了近百个,在广的基础上求新,求深。我们采取的做法是:

1. 围绕中心,多种角度选题。评论题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思想性强,旗帜鲜明,但是并非每题都要正面发言,围绕一个中心,可以从正面侧面、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多种角度来选取题材。(下略)

2. 大题小作,小题大作。因为《杂谈》、《漫谈》毕竟不同于短评、评论员文章等,切忌大题大作,但又有别于报纸专业性副刊上的杂感、随感等,又忌就事论事、小题小作。我们选取题材角度时,注意由小见大,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下略)

3. 抓新问题,立新见解。在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新情况、新事物不断出现,我们要及时抓住,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下略)

4. 针对思想,切中时弊。听众对针砭时弊这一类的内容,一般是反映较强的。常有读者来信要求重播。(下略)

5. 扩大社会性题材,树立新风。(下略)

二、发扬广播特点,为听众着想,力求有益、有味、有效果。

广播的特点是利用声音,群众面广,迅速及时。广播评论的时候,要发挥这些特点,经常设身处地为广大听众着想,从而收到宣传教育效果。我们摸索的做法是:

1. 短中求精,新鲜活泼。广播评论是给广大听众用耳朵听的,宜短而精。但是光短还不行,还要精炼、新鲜、活泼。就是说,在短短的篇幅中要容纳新鲜丰富的内容,要拧干水分,炼字炼句,使全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行文活泼。

2. 满面春风,亲切谈心。《杂谈》、《漫谈》都是面对群众讲话的,要求站在群众之中,与听众交朋友,亲切谈心,而不是板起面孔说教、训人。我们有些稿件还有这个通病,应该纠正。

3. 精选论据,就事论理。“两谈”节目都注意不尚空谈,反对空对空,同时也反对实就实,而是力求材料与观点的结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借助典型事例来生发、议论,议论之中伴以情节,说理之中插以事实,增加了“谈”味,听来就不觉得枯燥乏味。

4. 提倡“三性”,注意“两化”。三性就是新闻性、趣味性、知识性,两化就是口语化、形象化。广播是新闻工具,它的评论也要具有新闻性,有的直接配合新闻,有的紧密配合形势,因此从立论到作为论据的事例,需要经常注意新鲜,不宜老调多弹。而贴切的比喻、典故,诗歌中比、兴手法的适当运用,能使文章增加趣味,妙趣横生,也能给听众以知识。

三、建立台内外结合、专家与群众结合的评论队伍

评论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有切合实际的方针,还要有一支扎实的评论队伍。如何组织队伍,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领导带头写“两谈”、广播稿和评论、短评、编后。

2. 动员编辑、记者为“两谈”节目写稿。有的自行命题,有的由评论组出题目,分别请有关同志撰写。

3. 做好专门家的工作。采取分别登门拜访、经常联系的办法,约请老新闻工作者、经常写杂文和漫谈的作者等,定期为“两谈”节目撰稿。

4. 发动群众写作。一种办法是走出去、请进来,召开一些群众作者的座谈会,介绍“两谈”性格,给以样本,然后议定一批选题,请他们认题写稿;另外一种是在群众自发来稿中,及时发现人才,个别辅导。

5. 不断提高评论组人员的思想和业务水平。

我们的评论节目只是初步立定了脚跟,开始尝到了一点甜头,摸索了一些体会,为进一步办好节目做了点打基础的工作,从而使大家的工作信心有所增强。当然,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是不少的,需要不断改进提高。

(全文原载北京广播学院院刊 1979 年第二期)

和青年朋友谈谈广播

对于兴趣广泛的青年朋友来说,广播,是很熟悉的,又是相当陌生的。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无论城乡,广播是很普及的了。家用收音机,随身携带的小半导体,有线广播喇叭头……各种收听器让人们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新闻广播,听到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文艺节目。青年们比喻广播是“朝夕相处的不见面的朋友”,可见,是很熟悉的。

然而,人们对广播又确实比较陌生。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外出,常常会遇到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人民广播电台。”

“啊,你是播音员吗?”

“不。我是广播记者”。

“噢,广播电台不是由播音员念念报纸、讲讲节目、放放磁带就行了吗?怎么也有记者?”

“现在广播电台主要靠自己采编、制作节目,除了播音员,还有记者、编辑、录音员等。”这段短短的对话,反映出人们对广播的来龙去脉不大了解,不清楚广播电台有一个比报纸更为复杂的编辑部,也不大知道广播要自己走路,要共性和特性相结合,制作更丰富多彩的广播节目。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谈谈广播的一些情况。

六十年前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

广播在世界新闻事业中是比较年轻的,总共才只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广播的技术基础是无线电。无线电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才发明,先用作通讯工具,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逐步试验发声。从电报到电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新闻工具,就是广播。当时,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轰动世界。人们纷纷利用这一新发明为自己服务。美国人用它来竞选总统,英国人在广播中报告经济行情,德国人利用广播宣扬武力……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列宁 ,用它作为直接面向群众的宣传工具。早在十月革命期间 ,列宁就亲自写了《人民委员会的广播稿》、《对全体士兵的广播稿》,1920 年 2 月 ,他在一封信里 ,为广播写下了“ 不要纸张、‘ 没有距离 ’的报纸 ”这句名言。以后 ,广播被用来放送音乐和诗歌朗诵 ,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对这个创举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激动 ,他专门为广播写颂歌 :

“ 这样的幻想 ,
何曾有过先例 ?
说是要——
把耳朵到处挂起。
让莫斯科朗诵的声音 ,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马上可以听得清晰…… ”

马雅可夫斯基还在《艺术的幸运》这首诗里 ,为“ 可怜的 ”普希金 ,“ 可怜的 ”莫索尔斯基、“ 可怜的 ”赫尔岑感叹 ,他写道 :

“ ……
可怜的 ,
可怜的赫尔岑 !
你那些瑰丽的词句 ,
可总是默默无声。
通过无线电 ,
激情的“ 钟声 ”
就有可能
在全俄罗斯
传遍僻壤穷村 !

……
我幸福 ,
因为我们
生活在
歌声响彻云霄的日子里。”

六十年前问世的这一新型新闻工具——广播 ,是在 1922 年 ,由美国记

者奥斯邦等人传到我国的,第二年初,在上海播音,叫做“空中传音”,广播英文报纸。接着其他国家也来中国办广播,上海的资产阶级也纷纷办起商业性广播电台。“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也看中了这一锐利武器,在南京、上海等地建台,展开反共反人民的叫嚣。

广播问世以后,人们竞相利用的情况说明广播和报纸、通讯社一样,它本身只是一种新闻工具,那个阶级来掌握它,它就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纯粹客观的、超阶级的广播是没有的。这就是中国人民广播诞生前的情形。

人民广播在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

我国人民自己的广播,以前一直说是诞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其实,从它创建试验阶段算起,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现在,人民广播的生日已改正为1940年12月。

1940年春天,抗日战争处在艰苦年代。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有新华社等一些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当时,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病回延安,带来了一部功率很小的广播发射机,建台的任务交给了由老红军战士、革命知识青年和少数无线电技术人员组成的九分队。九分队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旧汽车头改装成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电,于1940年12月30日,开始试验播音。当时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名称,呼号XNCR,发布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文告,报告国内外新闻。一九四一年春,在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广播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对新闻的严密封锁,向国统区人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开始显示出广播不同于报纸、通讯社的威力。1940年底开始的试验广播继续到1943年,终因抗日根据地无线电器材的补充困难,被迫停止播音。直到1945年8月下旬,才在抗日战争的凯歌声中恢复试播,并于9月间正式播音。

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后,密切配合解放战争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解放战争胜利消息和解放区情况,为全国人民讲话。当时,解放区军民十分珍爱人民广播,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号角”;国统区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听延安广播,热情写信说:“这是真正人民的声音”,是“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国民党反动派则惊呼解放区广播是“强大的越顶攻势”,他们

无法抵御。原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就是在延安广播的感召下,于1946年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到延安,投向人民怀抱的。他的正义行为成了广为流传的革命佳话。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广播日益壮大。到1949年秋天,全国已经有了近四十座人民的广播电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广播更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虽然道路有曲折,人民广播在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前进。到1980年,全国广播有了电声(通称无线电广播)、电视、有线广播三大类。其中无线电广播已有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九十九座,发射台和转播台五百多座,调频台(F.M)九十九座。播出的节目,中央台除两套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广播之外,还有对少数民族、对台湾广播和音乐调频广播;各省市、自治区台和省辖市台共办有一百三十套节目。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已办有三十八种外语节目,中国普通话节目和四种方言节目。我国的电视广播,从一九五八年开办起,中央和各地陆续建立了三十八座电视台,播放彩色或黑白电视节目。我国的有线广播,已在全国二千三百多个县、市、旗建立广播站,实际是有线广播电台,使全国八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人有了收听工具(喇叭头)。这一切,说明我国的人民广播,从一部小机器开始,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经过艰苦创业,茁壮成长,现在已经初步建成了全国范围的广播系统,发挥了现代化新闻舆论工具和文化教育工具的作用,成为了广大群众“最迅速的新闻来源”,“空中剧场”,“家庭顾问”,和“政治、文化、学科的课堂”。

坚持自己走路 前程似锦

我国人民的广播事业,在战争年代诞生,随着革命的胜利而逐步成长、壮大。但是,也不可否认,解放前,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也由于广播还处在幼年时期,因而广播宣传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不能不更多仰仗于、受影响于人民新闻事业的老大哥——报纸和通讯社,广播自己固有的特点还未能充分发挥。1949年6月,为了适应广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广播。此后,广播战线逐渐注意了对自身特点的研究。比如1949年8月,中宣部在关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指示

中,除了强调政治上严肃、负责外,还提出广播宣传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应是多样的、活泼的,不是空洞呆板干燥无味的”,“增加本地方言播音”,“增加文艺娱乐节目时间”等等。到了五十年代,针对广播的历史现状,更提出了广播要自己走路的问题。1966年以前,中央和地方各广播台都摸索了一些经验,开始迈出了自己走路步伐,新闻、谈话、教育节目、文艺节目,出现一片富有广播特色的活跃、繁荣景象。

可是,广播要自己走路,道路却很不平坦。建国后十七年,宣传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人民广播也有过偏差和错误。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把人民广播的优良传统和自己走路的成果摧残殆尽。他们把广播作为推行“全面专政的工具”,广播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假话、空话、大话、绝话、套话不绝于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搞乱了人们思想,他们大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禁绝古今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在广播中播放,他们还采用禁錮政策,严加控制,不准广播开展自己的正常业务,更不要说是探索自己走路这个课题了。他们只要广播照抄、照搬,变成报纸、通讯社的“有声版”,“口播社”,形成“广播看两报,两报看两校”的怪现象。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人民广播的声誉,损害了人民广播与人民的亲密联系,无怪乎某些听众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广播是“批判中心”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人心,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广播事业也复苏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自己走路的课题重又提到广播工作者的面前,恢复人民广播优秀传统、发扬广播特点的呼声,逐渐转化为广泛的实践。前不久,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特点,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号召,正在鼓舞广大广播工作者进一步实践、总结、改革、创新,为努力办好人民广播作出新贡献。

那么,从五十年代提出、八十年代重申的这个“自己走路”,究竟包含什么内容呢?我认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党的宣传方针指引下,摆脱依赖其他新闻工具、“吃现成饭”的思想,而要自己动脑筋,自己动手,组织宣传,办好广播;二是从自身实际出发,创造、总结适合广播的经验,而不是照抄、照搬报纸、通讯社的做法。这就是要扔掉懦夫懒汉哲学,振奋精神,研究广播的规律,

广播的个性、特点,扬长避短,更好发挥广播这一舆论工具的作用。

广播是通过无线电传送声音的,这就有了他独特的天赋,独特的个性。

首先是丰富的声音。广播不仅可以运用“生动的人的语言”(列宁语)在各种节目中直接表达喜悦的、愤怒的、热烈的、亲切的、严肃的种种感情,感染听众,而且可以播送实况和音响丰富的广播节目、新颖的广播剧和各种文艺节目,还可以进行必须使用听觉的中外语言教学。所以,研究声音,充分利用声音,是广播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其次是速度快。在当今各种新闻工具中,没有再比广播快速的了。它不要印刷,不要运输,甚至不必借助文字,它路不分远近,可以在几小时、几分钟、直到同时——实况转播,把新闻迅速地告诉大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播,特别着重办好新闻、评论节目,并不是偶然的,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再次是群众广。广播直接用语言对听众讲话,在目前收听工具广泛普及的情况下,它可以远传穷乡僻壤,也可以深入里弄家庭,还可以超越国界和政治区域。广播的听众,不分男女老少,不受文化限制,这是比报纸、通讯社有利的条件,而在我国近期内电视机、调频接收机还不很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比电视拥有更多的群众。

当然,广播也有先天性的弱点。这就是声音无形,一听就过去,抓不住,不留痕迹,还有,收听时间有排他性,没有选择前后的自由,只能按照编辑的安排,依次收听。克服广播的这些短处,要求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录音员们更好研究听众的心理和生活习惯,研究时令气候的变化,研究其他新闻工具的特点,找出广播的黄金时间,合理布局,把稿件写得更加中心突出,明白流畅,准确、鲜明、生动,富有吸引力;把节目制作得更加新鲜、活泼、丰富多样,令人难忘。

综合上述广播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就能发挥广播优势。现在,许多广播台都在努力研究广播规律,研究共性与特点的结合,在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的原则下,把广播新闻节目办得又快、又新、又短、又多、又广、又有共同兴趣,把广播评论节目办得思想性、针对性强,为党和人民讲话,讲得有情有理,亲切有味;把各种教育节目、知识性、服务性节目办得新鲜广博、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吸引人听;把文艺节目办得百花齐放、新颖多姿、悦耳动听。总之,要使人民广播更广泛地为人民所喜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作出贡献。

（原载《新闻大学》1981 年 5 月）

正面为主 丰富多彩

——新民晚报两个“十年”社会新闻浅析

近几年来,报纸上社会新闻很走红。读者爱看,报人爱登,晚报抓,日报抓,党报也抓。全国晚报还举办了大奖赛,大力提倡。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纸新闻改革的收获之一,“百花齐放”园地中的鲜花一枝。这里仅就“文革”前和复刊后二十年间,新民晚报对社会新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谈谈一孔之见,一得之乐。

一、社会新闻的产生、范围、性质、目的

社会新闻是与现代报纸同时诞生,并由报纸的社会性所决定的。社会进化到商品经济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报纸上除了反映政治、经济、科教、文体等专业新闻之外,必然也要反映不属于哪一专业的社会生活面。西方新闻学曾称之为“软新闻”,初期,色情、凶杀等内容较多,后来逐步有所变化。我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已出现反映社会生活的报道,曾名为“里巷中事”、“琐闻”。社会新闻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闻界前辈邵飘萍先生,很重视社会新闻,他在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认为:“社会新闻”是“政治以外”的新闻,“其价值与政治、外交等新闻并重,有时且超越而上之”,社会新闻能反映“一国社会程度之高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发展,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新闻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扩大更明确了。它包括人们的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经济生活、业余生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伦理道德,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公共关系,还有灾害事故、世态万象等等。是覆盖面更广,共同兴趣更大的新闻,因而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社会新闻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和报纸本身一样,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过去有人认为,社会新闻、共同兴趣,都是抹煞阶级性、取消指导性。这是一种误解。客观事实是,不同阶级的报纸报道社会新闻,各有它不同的目的性。解放前,剥削阶级的反动报纸,常用社会新闻散布反动黄色、荒诞怪异

等毒素 刺激、腐蚀读者心灵 转移公众对革命的视线。正当解放战争进入转折点 工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刻 国民党某些报纸、通讯社带头炮制“杨妹不食而活”的社会新闻 传播四方 仅是一例。那时候 一些进步人士主持的民间报 也曾用社会新闻反映正义 揭露黑暗 并对反动统治“戳一枪”。

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报纸 抓社会新闻从来目的鲜明 用来团结教育人民 鞭挞邪恶 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报纸。民主革命时期 解放区、蒋管区的党报是这样 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报纸也是这样。拿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新民晚报来说 从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以后 赵超构同志在1957年便发表了《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新闻业务》第五期) 强调以“反映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为“主要组成部分” 也要批判旧的世态事象 并和犯罪作斗争。这以后 经过前十年、后十年几代人的努力 实践、摸索、总结 指导思想逐步发展 不断提高。我们认为 在现阶段 社会新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 从其内涵来说 无论人或事 大量处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之中 多数可归于政治新闻。但与重大国事、民族、军事、统战、外交等“大政治新闻”相比较 它更贴近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看得见 摸得到 因而曾被称为“小政治新闻” 专门划作社会新闻。报纸通过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社会新闻 破旧立新 移风易俗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广泛深入地反映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道德、新气象 多层次地宣传爱国主义 革命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 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概括地说 颂扬新真善美 批评旧假恶丑 妥善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社会新闻的基本主题。

二、社会新闻的特征、特点

为什么社会新闻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这和它多年来形成的特征、特点密切相关。

社会新闻的特征、特点 显著的有四：

(一) 题材极广阔 内容最丰富。

社会生活 尤其是大城市中的社会生活 蕴藏着社会新闻的大量题材。

从广度说 社会上三百六十行 凡是直接和群众打交道的行业 本身就

具有专业业务和社会性两方面,如商业、交通、教育、卫生、文娱等,是社会新闻的重要发展源。即使是专业性很强,少与一般群众接触的单位,如科技部门,但它的从业人员,专家学者也同样有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面。不是著名工人专家蔡祖泉、著名女科学家谢希德都当过社会新闻的主角吗?

从深度说,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从思想、观念到道德、人格、感情、习惯,都离不开新与旧、公与私的矛盾冲突,从中可以挖掘出深刻动人的社会新闻来。

从时间说,每个人在八小时生产、工作、学习之外,都有“业余的”社会生活天地。家庭、里弄、社会,时时都可能产生社会新闻。

从空间说,凡有人群的公共场合,诸如市场、商店、车站、码头、船舱、车厢、交通岗亭、医院、公园、文化馆、体育场、街道、里弄等等,更是社会新闻的“高发地区”。

广度、深度、空间、时间,我们不断对之作全方位的扫描,便可发现选之不尽的社会新闻线索。所以,比起任何其他专业新闻来,社会新闻无疑占有最优越的采访报道条件。

(二) 包含更普遍的共同兴趣,具备更独特的可读性。

社会新闻为什么具有更普遍的共同兴趣?一方面,它的广泛范围,常常是广大读者(男女老少,从工人到干部,从学生到教授)所共同经历、共同熟悉、共同关心的领域,读起来容易引起共鸣和思索,不存在“隔行如隔山”的陌生感。另一方面,它寻找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追求独特的可读性,符合人们喜爱新鲜、多样的心理,满足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会产生单调、重复、雷同、千篇一律的厌烦。我们曾作过不止一次的报纸读者调查,除了特别重大的政治、经济新闻之外,社会新闻往往占有“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而且,这种阅读完全是出于“我要读”,而不是在理性意志推动下的“我该读”,或者“要我读”。

(三) 和风细雨的格调,潜移默化的作用。

社会新闻是新闻,它特别注意保持让事实说话的特色。报道事件性社会新闻,要求摆出事件的真相,弄清前因后果,注意连续报道,尽量采访现场、细节,提供翔实的具体材料,让读者看后如身临其境,如亲历其事,自己作出判断。这种社会新闻避免讲一般性道理,不作概念综合,少用“应该”、

“必须”等命令性字眼。报道人物故事,则在真实性原则指导下尽量运用形象思维,努力采写人物的思想风貌,矛盾冲突,故事情节,来龙去脉,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与故事主人公直接交流感情。

正因为社会新闻借鉴、吸收一些文艺手法来报道真人真事,作品具有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喜怒哀乐,接受和风细雨般的思想教育。

(四) 把握时代脉搏,紧跟社会步伐。

人们的共同兴趣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新闻总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断创新,而使自己永葆美妙之青春。五十年代,新旧社会交替不久,民主改革正在进行,反对封建婚姻、离散的亲人庆团圆等社会新闻和故事广为传播,很受欢迎。及至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双百”方针,移风易俗,技术革新的口号振奋人心,思想解放,家庭妇女再解放,里弄大变,社会风气大变,一时社会新闻出现热潮,“革新迷”、“半片天”、“亭子间”的故事层出不穷。读者不仅爱读,而且参与报道。有一度“拾金不昧”的小故事每天源源而来,曾出现发表一整版形形色色“拾手表交公”稿件的盛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新闻进入黄金时期。除传统的题材之外,又在改革开放热潮中出现了新颖的题材。“一洋两岸”社会新闻便是一例。里弄里出了“民间外交家”王观珍,她应荷兰皇家博物馆、荷中友协等邀请,去荷兰为“中国文化周”开幕剪采:记者及时采写了《奥姆王这一家子》,报道退休菜场女工王奶奶家新鲜事,开创了“洋”字号社会新闻的先河。接着,反映外国朋友在我国的社会生活报道,如:“洋大嫂赶集”,“洋媳妇嫁农村”,“洋学生过节”等社会新闻,以及“两岸”亲人、朋友、演员、运动员之间的骨肉情、同胞谊,都在振兴中华和爱国一家的主题下大放异彩。其中,《“经纬安定”定何在》一稿,报道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取名的异姓兄弟,台湾蒋纬国所思念的金定国在安徽找到的经过。新民晚报独家发表了这一社会新闻后,迅速引起国内外的轰动效应,纷纷转载、改编或作呼应报道的海内外大众传媒达上百家之多。

另一方面,对于被“十年动乱”严重破坏了的社会风气,以及从西方入侵的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歪风,也须经常“祛风驱邪”。新民晚报从1982年复刊开始,便开辟了社会性议论专栏《谈家常》、《生活琐谈》,和批评性社会小

品专栏《蔷薇花下》。《蔷薇花下》栏名从鲁迅先生“无花的蔷薇”引发,取既有“刺”刺不正之风,也要有“花”姿可供欣赏之意。这个专栏天天刊登有花有刺的小品文,并配以漫画,坚持精编群众来稿,至今已超过三千篇,被誉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第一专栏,先后被评为全市和全国新闻专栏一等奖。

三、社会新闻的采写和组织

由于社会新闻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四面八方,行政机构里并无一个“不管部”可依靠,也没有一部现成的教科书可遵循,因此它的采写、组织也要摸索出适合自己报纸的一套方法。实践中的体会主要有三:

(一) 采访工作“两条腿走路”。

记者采访的“两条腿走路”是上下结合。上跑领导机关不可少,但这是为了了解政策、全局、意向,有线索当然更好。重要的是深入基层,下到社会生活中去,到现场去,观察、询问、思考,眼、嘴、脑并用,细心发现、捕捉和挖掘社会新闻题材,掌握第一手素材。这点虽是老生常谈,但对采访社会新闻来说极其重要。没有这“两条腿”,绝没有好的社会新闻。

记者组织稿件的“两条腿走路”是内外结合,即记者和通讯员(包括读者积极分子)相结合。记者采访“我找它”社会新闻,通讯员(包括读者积极分子)常提供“它找我”的社会新闻线索。尤其在迅速报道突发性社会新闻时,这后“一条腿”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复刊初期,西郊公园一游客掉进老虎山,众游客奋力驱虎救险,这一社会新闻很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晚家家户户饭桌上的话题。此稿却是由一女工在现场拍到“虎人相持”照片后,迅速找来报社,并在经济部记者指导下赶写出“目击记”,当天见报。这“后一条腿”是否得力,靠的是平日认真联系通讯员,报纸密切联系群众,否则,临时抱佛脚是抱不出名堂来的。

再有一个“两条腿走路”,是报社内部各部记者的点面结合。这是整个采访部门组织丰富多彩社会新闻所必不可少的。我们以政法部作为“点”,负责主攻,采写以反映社会生活领域为主的社会新闻,而其他各个采访部和群众工作部是“面”,采写从各专业社会化角度发生的社会新闻。比如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报道,舞台和体育场以外的社会故事,来信、来访中发现的社会新闻等。有了这支“点面结合”的采访大军,加上通讯员的“民兵队伍”,

读者积极分子踊跃“支前”，整个采访部门就有发不完的社会新闻了。不是吗？上述“虎山救人”是经济部发的；《网球击中了爱情》是体育记者的作品；《老父巧断凤凰案》由群工部同志采写；而《大观园非古非今一幕，热煞贾宝玉，气煞游人》则是文化部记者采写的，还有一条“结婚大放爆竹，炸死了新娘子”的社会新闻，由摄影记者提供。

（二）写作、表达方法多样化。

社会新闻内容极为丰富，取材、写作、表达就要掌握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变化。切忌“一窝蜂”，题材雷同，处理老一套、简单化。记者心中有底，编辑心中有数，注意作多种组合、搭配，以求版面变化无穷，而从总体上倾向鲜明，主次恰当。既体现正面宣传为主，又多姿多态。复刊时，采访部门和老编辑一起研究，在第四版上设立多层次社会新闻专栏：《上海佳话》、《社会故事》、《蔷薇花下》、《社会法庭》、《法庭内外》等，并研究各层次的比例。有的专栏一直坚持到现在。

社会新闻的写作表达，“十八般武器”都能使用，较多采用的则是通讯、特写、故事、小品文。写作时力求针对读者阅读心理，吸收大众化、民族化的风格，借鉴某些文艺手法，做到“大处着眼（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小处入手（体现矛盾的特殊性），以小见大（寓矛盾的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稿件不是直白讲道理、发议论，而是“有头有尾有情节，活人活事活道理”，使读者在欣赏“可读性”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即便是社会性的小言论，如《读信随感》、《谈家常》、《生活琐谈》，也要求贴近社会生活，夹叙夹议，平易亲切，如相互谈心，如聊家常，读来“有理有情有味”。

（三）组织领导注意“三抓”。

一抓统一认识。在报社内部要求上下、内外、前后、左右八方协调，经常通气，不断取得共识。领导明确提倡、支持，记者编辑强化社会新闻意识，内外勤及时交换看法，采访各部互助协作，前方和后勤密切配合。一切有利于社会新闻的顺利报道。

二抓记者队伍。记者是采写、组织又多又好社会新闻的关键所在。不断激励记者增强事业心，密切联系群众，要做二十四小时有心人，发扬抓不住精彩稿件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同时重奖那些产生大的社会效应的社会新闻。既奖励第一线记者，也奖励配合各方。事业积极性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不可

偏废。

三抓总结交流。报纸积累的一些经验 ,都是从实践中总结所得。由于环境的变迁 ,人员的更换 ,事物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新闻不断推陈出新的要求 ,因此 ,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通过抓总结交流 ,循序提高理论和业务水平 ,使社会新闻取得继承和创新的新成就。

(原载《中国记者》1991 年七期)

什么是晚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写了一个“晚报条目”,对什么是晚报问题概括为“傍晚前出版的综合性城市报纸”。这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形势,中国晚报迅猛发展,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办报理念,也兴起了各种“晚报分类说”。有的从内容分,有的从属性分,有的从级别分,也有从出版时间分等等,一时传来诸多名称,“纯晚报”、“机关报晚报”、“日报办晚报”、“省级晚报”、“地市级晚报”、“专业性晚报”、“午出晚报”、“早上出晚报”……令人目不暇给。我无意分析论证各类说法,但促使重新审视一下八十年代的那个“晚报条目”中的“概括”来。

这个概括中,包含了晚报的三个要素:

1. 出版时间——“傍晚前”。“傍晚前”是个比较活络的时间概念。通常直指申牌时分的傍晚,也可泛指“中午”以后,“晚上”之前。多年来为新闻界和广大读者认可的晚报,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出版的。而有些地方的晚报,把出版时间放到午前,甚至早上,那就与“晚”的本义相左,而成为其他报纸了。我还是保持条目中的认定。

2. 出版地点——“城市”。晚报是城市的产物。城市中的大都市,最具晚报得以兴旺发达的天时地利人和环境;大中城市也有办好晚报的条件;有的小城市也办了晚报,可以试验。但是,晚报不是农村报纸,在现阶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散、辽阔的农村里产生和发展。当然,办得好的晚报,也能涵盖农村读者。或者深入农村发掘有共同兴趣的新闻;或者把城市新闻写得适应广大读者——包括农村读者都爱看;还可以让晚报成为城乡都需要的文化读物。但是,泛称晚报为“城市报纸”,仍是适当的。

3. 报纸类别——“综合性”。晚报不是专业报、专家报、专题报、专龄报,它是面向广大读者,需要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综合性的报纸。这一点似乎争论并不多,问题在于如何千方百计做到这个综合性,而不能单调化、专业倾向。

除了上述带有规律性的三要素之外,根据一百几十家晚报的现状,除少

数周六、周五刊外,大多数为每天出版的“日刊”,因此,晚报可以明确为“日刊报纸”,列为第四个要素。

按照上述晚报四要素,《中国晚报学》理论篇界定晚报的含义是:傍晚前出版的综合性城市日刊报纸。

(“晚报条目”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362页。)

建立社会主义晚报学

研究“晚报学”的依据

新中国晚报与新中国同年龄、共命运。新千年来临之际,处于兴旺发达,一片“晚报热”之中。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拿现代观点来解释,便是客观规律。有了五十年历史的新中国晚报,确乎到了弄明白自己产生、成长、曲折、发展、兴旺之原因的时候了。几代人办晚报的实践,形成“晚报热”,提供了研究晚报学的客观依据。

晚报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最概括的分析可从两个方面去进行,即晚报存在的外部条件——外因,晚报自身的发展规律——内因。讲清这两个方面,特别是找出当代晚报的内在规律,将促使中国晚报在社会主义晚报理论指导下,更自觉地办好,在新时期中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先说中国晚报热的外部原因。回顾1956年,随着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春云乍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志及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上层建筑活跃起来,人们思想解放,晚报界出现了研究社会主义晚报、兴办社会主义晚报的第一次热潮。这一潮持续十年之久,办成十三家晚报。接着,十年动乱,国家受重创,晚报全部被野火烧尽。然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晚报界又被阵阵春风吹醒了。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洪流滚滚而来,晚报界激流勇进,再次创业;又在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力争上游,应运弄潮,晚报总数增长十倍以上,发行数超过二千万份,出现空前的“晚报热”,与千千万万读者广结晚报缘,被新闻主管部门列为“重要方面军”。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晚报起伏的轨迹。“象喜亦喜,象忧亦忧”,国运与报运休戚相关。国家的兴旺发达,正是晚报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今日中国,正逢盛世,办报环境

不仅与旧中国有天渊之别,与国家受挫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晚报人抓紧机遇,充分运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的成果,打下政治思想、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他们努力争取党的领导,争取上级党委支持并发挥晚报特长;他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建立办报的班子;他们努力协同左邻右舍,团结四面八方,取得社会各界的合作;他们与兄弟晚报交流互访,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共同前进;他们兵马一动,粮草紧跟,纸张源源供应,采、编、印设备日新月异,逐步趋于现代化;办报用房、宿舍、交通等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总而言之,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晚报人,纷纷办成功党和群众两满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多家晚报。从“晚报热”中,人们清楚地看到外因的强大威力。

然而,有一个现象引起人们思考:同样具有优越的外部条件,为什么新闻界、晚报界的成就却参差不齐,甚至大相径庭呢?唯物辩证法给了启示。原来,事物发展,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办报的外部条件再好,如果不去研究和掌握报纸内在规律,那么虽然大加包装,金玉其外,却并不能走上成功之路。虚有名声,取不到实际效果。这在新闻界也不是个别的现象。因此,我们要花大力气,着重从晚报界内部长期艰苦奋斗的实践中,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出晚报热的内因,努力揭示社会主义晚报的内在规律。这就是我们研究晚报学的初衷和主要的目的。

不妨解剖一、两只麻雀,来证明掌握规律对一张晚报取得成功的重要和必要。

我们先解剖现存新中国最早的晚报,也是现存中国最早的晚报——《新民晚报》。它从曲折到成功之路,很值得探讨。

新民晚报原名新民报晚刊,于1946年5月,由陈铭德、邓季惺在上海创刊,是一张倾向爱国进步的民营晚报。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继续出版,直接进入新社会。当时的新民晚报人满腔热情,想把报纸办好。然而,他们一时摸不到新中国晚报有什么规律,也没有认真体会到革命前辈的指点,一会儿想照党委机关报样子办,行不通;一会儿又学苏联莫斯科晚报,也不行;想进里弄觅知音,却只想到去为里弄黑板报供稿,没摸对门路……读者不欢迎,发行量上不去,日发只有六七千份,最少时竟不满三千份;报人工资一减

再减,勒紧裤带办报。后来与上海一家小型报《亦报》合并,1953年公私合营,版面上在多样化、知识性方面有所增强,但是,怎样办一张有自己特色的晚报问题仍未解决。经过前后七年的苦苦挣扎,在偌大一个上海,只发行一二万份,还赢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56年的“双百”方针如一抹朝阳,照得新民人心明眼亮,思想解放。赵超构总编辑带领大家改版,贯彻与日报“求同存异,发扬特点”的方针;一年后又总结出“时间性”、“地方性”、“文娱性”三个特点和“短、广、软”风格。此后三年,尽管政治运动不断,但报社新建立的中共党组和编委会却没有放弃对晚报业务的探索。提倡学习《实践论》、《矛盾论》,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规律,努力办报,不断总结,组有组总结,部门有部门总结,年度有年度总结,形成很好学习与总结的风气。“寓共性于特点之中”,“真实性与时间性统一”,“晚犹未晚,后发制人”,“中心报道多样化,日常报道广又深”,“社会新闻正面为主,移风易俗”,“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小见大”,“从里弄小家到全国大家”,“思想性寓于共同兴趣、文娱性、知识性之中”……,几年间,闪耀着辩证色彩的经验,几乎每个记者编辑都能讲上几条。那时北京《新闻业务》月刊曾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新民经验”。1961年,在党组领导下,报社又系统写出《新民晚报编辑工作的基本经验》(“文革”中被批判为“著名的六万字黑经验”)。

报纸办得活了,读者满意了,发行量就不断上升。仅仅半年功夫,1956年冬突破十万份,1959年春,晚报首次被邀派记者采访全国“两会”,及时发回不少独家新闻,发行突破五十万份。但是,由于纸张紧张,计划供应,报纸发行长期压缩在三十万份,直到“文革”初被封闭。

新民晚报在停刊十五年中,全部人员虽然“斗、批、散”四分五裂,有志于晚报事业者的思想却并未消散,真理越批越明,经过不断反思,如何办新中国晚报的理念反而趋于成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阳光普照,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后进一步自觉掌握晚报的已知规律,赵超构社长概括前十年经验,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方针和“飞入寻常百姓家”宗旨;在报社编委会领导下,“以老带新”,按序上马,重又蓬勃发展。发行量当年冲出百万份大关,五年后首次登上一百八十万份以上高峰。九十年代后又进入市场经济受检验,第三代新民晚报人在新一届党委领导

下,继承办报方针和传统,开拓前进,十年内四次扩版,又创办了美国洛杉矶版,报业发展更加辉煌,物质资产达到十三个亿以上,无形资产无法估计。直到1998年改组为报业集团之时,发行量始终在一百七十万份以上,占据全国报纸第二(仅次于《人民日报》)、全国晚报第一的位置。

这张现存新中国最早晚报的由弱到强,由艰苦摸索到自觉进取,由濒临绝境到久盛不衰,半个世纪的历程,证明研究和掌握到了社会主义晚报规律,就有了基础和力量。

我们再来举一个创办于新时期的晚报例子。

1984年7月,由邓小平同志题写报名的《今晚报》,崛起在华北最大工业城市天津。(下略)

“今晚报”人也是在认识、实践、再认识中,找到了办新中国晚报的规律,走上了成功的康庄大道,获得了两个效益双丰收!被同行目为与“北京”、“羊城”、“新民”四家并列的晚报。

这张在八十年代新创刊晚报的发展、辉煌,同样证明研究办晚报规律之重要。寻求和掌握社会主义晚报的发展规律,就是今晚报成功的秘诀,制胜的法宝。

也许有人会说,介绍一二个晚报成功的例子,似乎缺少说服力,会不会以偏概全?不。当今中国“晚报热”,“晚报缘”,绝对不是由一、两张或几张晚报“撑”出来的,而是十几家、几十家、上百家晚报,各展所长,众木成林形成的。君不见全国现有晚报中,除北京、新民、羊城、哈尔滨、西安、成都、郑州、长沙、南宁、南昌、合肥等“文革”前老牌子晚报之外,八十、九十年代新创办的有今晚、扬子、钱江、武汉、深圳、齐鲁,再加上东西南北中的多家晚报,各呈流派,才令人目不暇给。而凡成功者,虽有大小、深浅不同程度的差异,却都有总结实践经验,研究晚报理论,寻找、掌握晚报发展规律的或多或少经历。解剖一二只麻雀,自可认知其他麻雀的大概了。所以,五十年来办晚报的广泛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晚报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研究“晚报学”的肥沃土壤和客观依据。

晚报学的框架及其理论基础

正确的理论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它科学地指导人们的正

确行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社会主义晚报理论帮助我们在办晚报过程中摆脱和避免盲目性,有效地指导掌握规律,正确办报,并构筑晚报学说,取得双双成功。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多家晚报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问题在晚报界乃至新闻界,多年来尚未取得完全的共识。

人们常常听到关于晚报有没有理论,要不要研究晚报学的种种议论(下略)

也有一种想法,在晚报同行中比较普遍存在。认为晚报学、晚报理论很需要,很重要,但是研究规律什么的,太玄了,太难了。确实,要做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会有难度,有点玄乎。然而,作为新中国晚报人,都责无旁贷,当事人不做谁做?再难,也应该鼓起勇气把晚报规律找出来,把自己工作的规律概括出来,再经过后人的修正、补充,社会主义晚报理论一定能日趋成熟,一张张社会主义晚报一定能编得更加精彩!

从晚报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又经过了普遍的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放诸四海而皆准”,它便是反映了客观的规律,它便上升为晚报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不玄乎,不枯燥乏味,相反,忠诚的晚报人却觉得乐在其中呢!

当然,我们要研究构筑社会主义晚报学,并不像采访一条新闻,编一个版面那么简单。晚报学具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初步的框架是有史、有论、有法、有术。四大版块都有学问,都要理论结合实践研究,言之成理。

晚报有史。晚报学应该研究晚报历史,从国外到国内,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但既不能像“史料派”那样,断章摘句流水账,为史而史;也不是像某些“史观派”那样脱离史实,泛泛而谈。我们研究晚报史,为的是通过对中外晚报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史实的搜集、整理,“扫描”出历史上晚报起伏的轨迹,及其兴衰原因,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找出不同时期的晚报发展规律。以史为鉴,以助我们研究当代晚报的内在规律。

晚报有论。晚报的理论,研究报纸的普遍规律与晚报的特殊规律,研究晚报的共性与特性相结合,并由此产生的晚报特点。这是晚报学的核心、灵魂。而社会主义晚报理论,并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现成带来,且二者并不一样,也不是由哪些学者专家所能闭门编写出来的。社会主义晚报理论是由

中国晚报人在广泛借鉴、长期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编辑新中国晚报开始,不断探索、研究,反复实践总结,逐步认识和形成的。对此,思想界、新闻理论界老一辈革命家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晚报大发展,在再实践过程中,对初步形成的理论进行了普遍检验,才逐步趋于成熟。

晚报有法。此法非“新闻法”。这里指的是办当代晚报的章法,或曰报社编辑部的运筹与谋略。主要是指一张晚报的总体设计,诸如定位、定版、定栏、定人,摆正与党领导和读者群众位置,处理好报社内外关系,经常研究中心报道、主旋律宣传的力度与效果,拓宽加深报道面等等。林林总总的晚报,治报之道多多,有敬业为民法,有孙子掌兵法,有无为而治法,有高酬重奖法,有不断变化法,有高度集中法,有机关公务法等等,百报百法,五花八门,长短利弊不一。要言之,成功的晚报,必有争取党委领导,听取群众意见,定方针,明宗旨,出主意,用干部,抓竞争,严纪律,上下左右,春夏秋冬,物质、精神两文明兼顾,社会、经济双效益并重……

晚报有术。术者,采访、报道、编辑、言论、通联、广告、排印、发行等业务技术也。新闻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晚报学亦然。理论与技术不可割裂,理论指导技术,而技术中也有自己的理论。所以,要努力创造具有晚报特色的新闻业务技术。比如晚报理论指导晚报要搞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而怎样搞社会新闻、文化新闻,其中有技术问题,也有理论问题。举一反三,晚报的各项业务技术,在在打上晚报学说的烙印。因此,晚报之术,也可称之为实际应用晚报学。

有史、有论、有法、有术,组成完整的晚报学说。

研究晚报学,是个总题目。这里着重讨论晚报理论的来龙去脉。

俗话说,植树要扎根,盖楼要打地基。各种理论也有它的根系、基础。社会主义晚报理论的基础确立在何处?它的根扎在哪里?这是个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自从1848年马克思在德国科伦主编《新莱茵报》,列宁于1900年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毛泽东于1919年在长沙办《湘江评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新闻实践中提炼、创立了无产阶级新闻学说;在新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领袖,通过亲自从事报刊工作,又对社会主义的新

闻事业作了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进入城市后,各“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以后又说报纸要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邓小平主张办报要“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结合中心任务”。江泽民强调媒体要抓“正确的舆论导向”。他们的新闻学说,揭示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报纸的基本规律,概括出基本理论。确立党性原则,为生产建设中心服务,群众路线,都是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的共同原则,晚报不仅没有例外,而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反映自己特殊规律的晚报理论。所以研究晚报,首先要认真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说。有人认为晚报只要讲特点,教会青年报人怎么采写怎么编报的新闻业务就行了。这种观点不仅会误导青年,不能造就人民的晚报工作者,编出来的报纸也会缺少主心骨。这样的报纸,不能完成“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甚至在关键时刻方向不明,陷入严重错误。

新中国晚报人在五十年代研究晚报理论之初,就十分重视理论的基础问题。他们热烈探讨延安时代形成的党报“五性”论,并把党性、阶级性、指导性、战斗性、政策性、真实性、群众性——列为新中国报纸的共性。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反复领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反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等原理,懂得了晚报存在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这特点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大力发扬。认识到只要把晚报特点与以党性为主导的共性相结合,寓共性于个性之中,就能办好新中国晚报。他们又积极实践、总结,再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社会主义晚报理论是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

社会主义晚报理论的逐步形成

社会主义晚报在体现社会主义报纸的共性之时,还必须从长期办晚报实践中找出自己的特殊性,寓共性于个性之中。这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是研究晚报理论的根据和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说,从晚报的历史过程来说,社会主义晚报理论得以逐步形成,具体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思想界、新闻界的老一辈革命家,经过长期新闻工作的实践、总结,引申到对新中国晚报的关心、思考、研究和论述。

最早发表办《新民晚报》观点的是1949年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筹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胡乔木。

其次是1950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

1956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广州要出一张有鲜明特色的晚报。《羊城晚报》于1957年10月正式出版,陶铸同志亲自题写报名,又作了许多指示。

1958年3月,《北京日报》主办的《北京晚报》出版。1961年3月开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等,对《北京晚报》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这些革命老前辈总结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从而对各家晚报作出的具体指示和要求,是晚报界的共同财富,也是社会主义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方面,晚报界前辈在新中国办晚报的实践中传承中国晚报合理的经验,并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提出革新的认识。其中公认的代表便是《新民晚报》老总编辑、社长、中国晚报协会首任会长赵超构。赵超构是一位在解放前已长期从事晚报工作的爱国老报人。早在全国解放前,他为避反动派迫害寄居香港时,就思考如何办新中国报纸问题。他在一篇《新国家与新报纸》文章中强调国营的报纸要“最彻底的深入群众,最广泛的反映群众”,要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特色”。这一群众性的办报思想,正是解放后他办新民晚报的一个核心思想。在解放初期,他也和报社同志一起学习胡乔木、夏衍讲话,一起摸索办新中国晚报,在失败中汲取教训。后来,“双百方针”鼓舞他大刀阔斧地改版,并在实践和理论上开始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晚报。1957年春天,他总结了改版一周年的经验,提出晚报方针是“求同存异,发扬特点”。总结中还概括了晚报的风格要求,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当年,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接见部分代表时听说了这“短、广、软”三字,很感兴趣,表示赞成短、广二字,对软字,他说要考虑一下,“不能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

也不太硬,不难看。”后来,邓拓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传达此事时,把毛主席的意思概括为“软中有硬”。

在五十年代中期,“赵超构晚报学说”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反右”以后,他和中共《新民晚报》党组合作共事,与晚报同仁一起进入十年再实践、再认识。又经过“文革”十年中的“反思”,在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前后,赵超构又对晚报学说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阐述,集中体现在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十六字办报方针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宗旨上。后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分别题了词,予以肯定。对于晚报特点,他也深入了一步,提出“晚”字是“绝对性特点”,其他特点由此派生。他说:“总起来说,晚报特点,在内容特点是消息的及时性、社会性和文娱性;风格特点是短些、广些,深入浅出、图文并重、平易近人即可读性。”1982年初,还对加入复刊后《新民晚报》队伍的新同志,系统地作了一次专题报告《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又应《新闻战线》之邀,发表讲话《办晚报要在晚上做文章》。这阶段“赵超构晚报学说”已经趋于成熟,并在《新民晚报》复刊后的成功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了检验。

第三个方面,新中国广大晚报工作者几十年学习、实践、探索、总结,并借鉴中外晚报经验,在扬弃、继承和发展中分头探索社会主义晚报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晚报理论的广泛和多发源泉。

早在1959年5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召开了晚报工作座谈会,总共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四家晚报参加,是为全国性研究晚报理论之始。以后这样的交流会又在广州、上海举行过两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催发了第二次晚报热潮,并恢复了晚报间的双边交流和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1985年,全国晚报协会应运而生,在成都成立;次年在泉州举行第一次年会。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晚报也更迅猛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掀起第三次热潮,总数达到一百五十家以上。为适应业务交流和理论研究需要,八十年代末全国晚协委托《北京晚报》出版《晚报文萃》,1994年又委托《今晚报》承编出版内部刊物《中国晚报界》。以前,兰州晚报也出了《晚报研究》内部刊物。1997年全国晚协为进一步加强晚报学术研究,建立了学术委员会,确定研究晚报学和评选新闻作品等任务。次年春天并决定在《新民晚报》建立编纂组,编撰《中国晚报学》(已于2001年出版)。

（本文原为《社会主义晚报学刍议》，刊于《新闻记者》1999 年第六期。
经充实改写后列入《中国晚报学》理论篇第一章。此文作了选摘。）

新中国晚报的两个字理论

晚报学的形成,有它的客观依据,理论基础,基本框架,和逐步成熟的过程。其中,晚报的理论,是核心所在。

这里研究社会主义晚报理论的内容。

社会主义晚报理论包含哪些内容?千言万语,从繁到简,归根结蒂两个字:一曰“报”,二曰“晚”。晚报,晚报,名晚,姓报。“报”,概括各种社会主义报纸的共同属性,共性;“晚”,是晚报独有的特性,个性。共性与特性结合,坚持共性,发扬特性,寓共性于特性之中,便是反映社会主义晚报规律的法则。从这基本的法则,又形成诸多原理、原则、方针、方案……凡成功晚报的方针,莫不根据这个晚报法则,再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党委交给的任务来制订并实践的。

晚报两字理论的第一个字“报”——共性

社会主义报纸是个大家族。以党委机关报为中心,按不同对象分工,有综合性报,工人报、农民报、解放军报、青年报、妇女报、老年报、少年报等;按不同专业分工有科技报、教师报、财经报、文化报和各种行业报等;按地域分工有全国性报、地方报、都市报、市郊报等;按出版时间分则有日报、晚报、晨报、午报、周报、时报等等……既然称“报”,便具有“报族血统”,必须具有报纸的共同属性,共同法则。晚报也不例外,它姓“报”,不能更改,即必须具有报纸的共同属性,共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报纸的共性有什么特征?内涵是什么?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说明,我们今天研究报纸的共性,就要认真学习作为邓小平

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论述,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以“打好理论路线根基。”

邓小平同志对新闻宣传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把新闻工作者视为“思想战线的战士,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基本原则、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闻学说宝库,增添了新的篇章。

个人在学习研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关于报纸基本原则的论述中,认为最根本的是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这便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所有报纸必须具备的共性。现分别介绍如下:——

关于党性原则。早在四十年代,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党性原则,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性原则仍然始终是新闻界的最高准则。但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党性原则践踏于地,新闻界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殆尽。直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时期到来,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重又提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他反复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还严正指出:新闻界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分析有的人“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

小平同志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论述,使新闻界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晚报界由于在“文革”之初即被全部封闭,也可说“坏事变成好事”,没有“随风倒”,因而在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继续遵循党性原则,顺利发展。

晚报体现党性原则,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下,报纸确立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办报宗旨和方针、任务。其次是着重宣传报道党和国家的“大局”,

或曰“正面宣传”、弘扬“主旋律”，也就是党的“中心工作”。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就是“中心”，就是“大局”。第三，通过记者编辑每天采写的新闻，撰写的各种稿件，制作的标题版面，体现党的当前政策。在政治思想上，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建设上，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灵魂工程师”的作用，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四，严格执行新闻宣传纪律，“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邓小平）。面对“民主与党领导对立”、“西方化”、“自由化”，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以及“一切向钱看”、“思想僵化”等错误思潮，不随风倒，不动摇，坚持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报纸共性原则中的首要原则，也是晚报的首要原则。晚报根据自己的特色，积极地、丰富多彩地加以体现，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时，要以历史为鉴，时时摆正位置，警惕绝不犯向党闹独立性的错误，和防止把党性庸俗化的趋向。

关于实事求是原则。邓小平同志多次反复阐述“实事求是”的意义。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那么，什么是“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又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是指“抄袭”，不诚实；装是指不懂装懂，是一种社会现象，“党内不允许装”，吹是指夸大，讲得“好一点”是“扯谎”。毛主席说要“实报实销”，报实数。邓小平同志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通，1977年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又强调：“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他还特别提到写文章，指出：“无论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革命领袖的论述使我们懂得了：“实事求是”是报纸的共性之一，首先是思想路线上的根本之点，也是新闻业务中的根本原则，我们在过去的新闻实践中，虽然常讲真实性是新闻的最起码要求，指出不仅新闻事实必须真

实,还要本质真实,也常讲让事实说话,用事实说话。无论日报还是晚报工作者,对这一新闻观点铭记在心,也都努力去做了,并视失实为羞耻之事。但是,把实事求是提到思想路线、品质,思想解放,主客观相符,研究客观规律的高度,认识是很不够的。我们晚报人还须进一步认真努力学习,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戒满戒浮,才能不断探究和发现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加以传播发扬;并坚持讲真话,颂歌新真善美智,鞭策陈假恶丑蠢,反对偷装吹贪,靠实事求是吃饭,靠实事求是办好社会主义晚报。

关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也是各个时期党所领导报纸的根本路线。报纸首先要确立群众观点,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每天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循环,发挥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作用,报道群众的创造和智慧,关心群众的要求、生活和疾苦,提倡和提供服务于群众的多样措施,引导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激发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传统的新闻观点,长期来证明是办报的法宝。那么,而今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群众路线还需要吗?请再来看看邓小平理论怎么指导我们。小平同志认为群众路线对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他说:“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请看,群众路线这一报纸的共性,不但不能削弱,没有过时,而且“特别重要”。可是,有的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只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行,似乎可以不需要群众路线了。这种说法不是胡涂,就是蠢话。他们讲的那个“经济规律”,只是“装”的,其实并不懂得什么叫经济规律。哪有离开群众这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而另外有魔术师般的“经济规律”呢?

在新时期,晚报由于读者对象的更广泛性,也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更要坚持群众路线,与广大群众心连心,来办好自己的报纸。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由于晚报强调和群众打成一片,经常行进在各种各样的“群众队伍”之中,这就要认真选定自己的正确位置。就是说,既置身于群众队列之中,又走在队列之前,既不是高歌独进,脱离队列,或者在一旁指手画脚,也不是跟在队列尾巴后面,随大流,更不能离开党的领导,而盲目歌颂甚至误导群众的自发性行为。新闻界有过的这方面教训,我们是必须永远牢牢记取的。

晚报两个字理论的第二个字“晚”——特性

“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各种报纸的共性,也是晚报的共性,或称晚报姓“报”。

但是,晚报如果只姓“报”,只有报纸的共性,那就跟多出一张日报无异,不成其为晚报。读者所以热爱晚报,与晚报缘重情长,就因为她姓“报”名“晚”。“晚”是特性,个性。“晚”对于晚报,就像贾宝玉从娘胎里带来的那块“通灵宝玉”,任何时候不能丢。所以,《新民晚报》的老社长赵超构说“晚”字是晚报的绝对性特点。“晚”,实在是晚报诸多特点之“慧根”。从“晚”的慧根上萌发、培育出多姿多彩的晚报特点之花来。虽然,晚报园丁多年来培育出的不少绚丽花朵,如今已被许多日报或名目不一的报纸采摘去了,“资源共享”了,唯独这个“晚”字慧根,是挖不走、搬不动的。因为它和晚报与生俱来,含有专门的、独有的“基因”。只要有“晚”的基因在,就会不断萌生新的晚报特点之花,而且唯有包含独特“基因”的鲜花,才有晚报独特的色香味,而不是那些仿制的花朵所能替代。

“晚”字的本身具有很多优势。已经开发并为成功晚报所运用的主要有三:时间优势、空间优势、读者读晚报的特点和心态优势。

首先是时间优势。

报纸,又称新闻纸,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刊登新闻、信息为主要特征。新闻是报纸的主体。而新闻,又必须在真实准确前提下迅速及时传播。有了日报还要办晚报,主要就是为了加快新闻发表速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注释晚报,是“傍晚前出版的综合性城市报纸。”中午到傍晚前编印的晚报,在日报截稿后,可以单独采写、收编先声夺人的新闻的时间,约有十个小时左右,加上与日报同步采访中运用晚报风格特点,人有好我,后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或者延伸日报新闻,“晚犹未晚”,“晚转化为早”,再加上地球助晚报,它自转形成的“时间差”,送来大洋彼岸的“隔夜变当天”新闻……请看,“晚”字的时间优势,能为晚报提供多少独家的、首发的新闻!晚报这个首要的、也是最大的时间优势,有哪一张日报或其他花色报能搬得走?如果放着这么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开发、不利用,岂非可惜!有的地方为争当日发行份额,改晚报为早上出版争取到了多半天卖报时间。但是争取

这半天时间去抢新闻,提高新闻价值,增强时效性,充实报纸内容,从而争取得读者的欢迎和信任,发行上争得长期订户的增加,不是更好吗?也许主张晚报早上出的同志会说:话虽然有道理,可是这样做,远水救不了近火啊!其实,办晚报的人都尝过甘苦,好比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暂时的发行下坡并不稀奇,重要的是路子对头。路子对头了,假以时日,发行上去也是很快的。不少晚报都有抓当天新闻、多抓新闻的宝贵经验。运筹帷幄的同志,如果用心寻找机遇,及时抓住突破口,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事实上,成功的晚报人双手紧紧抓住时间优势,充分运用“时效性”晚报规律,大力加强当天新闻、日报后续新闻,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扬子晚报》正因为消息及时、信息量大,而被读者称为“信息超市”,誉为“想看什么消息便很快有什么消息”。办报十年,发行量即突破百万大关,至今稳占全国晚报发行前茅的位置。

当然,抢新闻,抓当天新闻是很辛苦的,还得花许多心血。1999年全国晚报协举办的“昨夜今晨”消息大赛,那些出挑的好新闻,哪一条不是记者编辑起早落夜,腿勤手快,想方设法采编成功的!许多全国性重大事件,为了争得当天发稿,担重任的记者、编辑更是绞尽脑汁,争分夺秒,精心采编,以最快速度见报,获得广大读者齐声叫好!

事实证明,晚报充分发挥时间优势,大力加强时效性,千方百计采发当天新闻,无论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党满意和读者满意来说,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道,大有可为,万万不能丢掉!

“晚”字的第二大优势是活动的广阔空间。

人们为推动社会前进,从事发展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的活动,俗称三百六十行。这是所有报纸共同关注、共同开发的新闻资源所在,也是日报重点把守的阵地。而晚报,除了这块阵地,还有一块人们下班后、八小时以外,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广阔天地:家庭、里弄、社会、体育、文化、娱乐、旅游、思想、道德、学习交流、恋爱婚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天灾人祸,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在在都发生新鲜事情有新闻、信息,处处都需关心、服务。很多晚报记者开拓新闻资源的劲头,决不亚于那个为唐明皇跑腿的四川临邛道士,“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当然,我们靠的不是什么旁门左道之法术,晚报记者靠的是科学技术,群众参与。所以,

读者称晚报为“百科全书”、“不管部”、“不见面的老师”、“业余顾问”等等，并非偶然。他们遇事找晚报，报上得满足，而晚报深入到群众中去，广结“晚报缘”，新闻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良性循环导致的“晚报热”，与八小时内外、三百六十行内外，“广了深，深了广”的不断开拓有直接关系。

现在的态势是，“晚”字提供的广阔空间，晚报虽然占领了许多，却还有不少处女地等待开垦。充分发扬“晚”字的空间优势，广些、广些、再广些，正未有穷期。

“晚”字的第三大优势是读者读晚报的特点和心态需求。

人们曾称晚报为“灯下读物”，《今晚报》就有句口号叫做“愿为读者灯下客”。人们在傍晚、晚阅读报，其环境、心态、需求与早上、午阅读报有明显不同。不管是否看过日报，他们一拿到晚报，第一个反应便是在第一版、新闻版寻找今天有什么大事、新鲜事。有了，就站在那里先读起来，脸上显出满意神情，有时还会笑出声来，如果旁边有人，便兴致勃勃地介绍，如果新闻版没有什么当天的、日报所没有的新鲜新闻，他便匆匆翻了一下，甚至讲一句“炒冷饭”，随后去看“报屁股”，或者他喜欢的体育版什么的，其他版面……再请你经常注意一下，读晚报的人，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职业、职业身份，他们一般经过白天八小时的忙碌，身体和精神都疲劳了，需要休息、调剂；他们完成了白天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需要轻松、娱乐；他们在业余想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需要指点、交流；他们需要安排生活、家务，尊老爱幼、夫妇和谐，需要好榜样、好参谋；除了大量的固定订户，他们也常常在下班途中买报，或从单位里带晚报回家里看，有的边做晚饭边看晚报，边看电视边看晚报，一家老少一起轮版看晚报……

了解晚报读者，广泛深入地研究他们在晚阅读报的特点、心态和需求，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提炼，可以建立一门“晚报读者心理学”。许多成功的晚报，都研究过这门学问。摸透了读者读晚报的特点、心态和需求，便可转化为强大的优势。晚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在晚间时空条件基础上，尤其可以针对性地、努力地、亲切地一一加以满足和引导。就像胡乔木所希望于新民报晚刊的：“解决社会上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满足社会上所没有满足的需要。”同时，晚报进入千家万户，在“灯下交谈”的氛围中，自然不应该长篇大论，或者扳起面孔“说教”，而要版面图文并美，雅俗共赏，朋友

式交谈,满面春风,平等亲切。文章则写得深入浅出,短小生动,轻松活泼,有理有情有味,可信可亲可读。即使是长篇社会新闻报道,也要“有头有尾有情节,活人活事活道理”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办成功这样一批晚报,自然受到群众欢迎,并担当起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方面军作用。

明确了晚报姓“报”名“晚”,又分析了“晚”字的三大优势,晚报人就可以紧紧抓住,充分运用。首先是据以确定自己的读者对象,从需要晚报服务的最广泛共同面上考虑,所以晚报总是直接面向最广大群众,《新民晚报》提出“飞入寻常百姓家”,办给千家万户的男女老少看;其次,为了给读者提供最需要的精神食粮,精心制订指导办报的方针。许多成功晚报的方针,总是注意到共性与特点结合,重视宣传党的主张,努力移风易俗,建设精神文明,广泛传播新闻、信息和其他各种知识,关心和反映群众生活,指导和丰富生活。再其次,据以确定自己报纸的内容特色和风格,创造“潜移默化”,“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小见大”,拓宽、加重、深化、搞活等有效方法,走自己晚报的路,而不跟日报亦步亦趋,挤到一条道上。最后,还要研究,即便同在晚报大家庭中,各兄弟晚报之间也有一个晚报界的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如大都市晚报、机关报晚报、中小城市晚报,应各有特色,而不是一个面孔,提倡各有侧重,各有异同,各有地方色彩,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从“晚”字“慧根”的三大优势,决定了晚报一系列特点。逐步取得公认的已有八条,它们是:多样性、时效性、地方性、社会性、文娱性、知识性、服务性、可读性。每个特点都反映了晚报规律的一个侧面,值得仔细研究。而且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下,还会有新的特点派生,丰富“晚”字大花园。

就目前中国晚报界的实践和研究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晚报理论,概括为共性与特性相结合,寓共性于特性之中。通俗说来,便是晚报姓“报”,名“晚”,“报”字代表共性,“晚”字代表特性、个性。不妨名之为晚报“两个字理论”。

(本文选摘自《中国晚报学》理论篇中之第二章,标题另加。)

新中国晚报八大特点解剖

(标题选摘)

晚报特点剖析之一：与生俱来的——时效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二：传承“晚”“报”基因的——多样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三：爱国爱乡的——地方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四：移风易俗的——社会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五：怡情悦性的——文娱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六：充实人生的——知识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七：贴近生活的——服务性

晚报特点剖析之八：有益有味的——可读性

作者说明：

《新中国晚报八大特点解剖》,为研究新中国晚报“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理论的精华篇章,全文三万余字,联系成功晚报的成熟经验,“注重理论性、可读性和可操作性”,既是一篇独立的学术论文,也是《中国晚报学》理论篇之第三章。由于篇幅关系,此文未能选摘收入本书,而仅列了八个分标题。有兴趣的读者,欢迎翻阅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晚报学》。(2001年9月第一版108页)。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人生回眸

我的家乡慈城镇

几十年自称浙江省慈溪县人的我，前几年回乡安葬双亲，才知原慈溪县城早已改为慈城镇，属宁波市。虽然如此，我心中的家乡还是慈溪——那个山明水秀、文物昌盛的千年古镇慈城。

儿时就熟知慈城有四句顺口溜：“俞家谷，冯家屋，周家重义，X家办学。”用X代替，是因为那个办学的姓氏常有更动。

俞家以谷为特征，是地主大家族。太平天国后已没落，人们幽默地称之为“倒墙缺俞家”。冯家从事工商的人多，辛亥革命后，族内人在外发了迹，回乡便造屋，前新屋，后新屋……很兴旺了多年，后来不幸火灾，烧掉一大片华宅，剩下的也就黯然失色。

周家被目为“书香门第”，曾有状元第周家，桂花厅周家之称，想来祖上很荣耀。然而到我记事时，“不肖子孙”们已成为了平头百姓。说周家讲义，相传有两件事，一是写得一手好字的读书人周璿（字少溪），宁挨穷，不卖字，但若有亲朋偷偷从他字纸篓里捡些废弃字幅换米吃，他也不追究。鸦片战争时，抗英名将朱贵父子率师抵抗英国侵略军，在慈城外西悬岭大胜，歼敌无数，最后因无援军，父子俩与战士们一起壮烈牺牲。少溪公闻讯，掷笔而起，奔走呼吁，与乡亲们一起，在城西建了个“朱将军庙”，并亲书碑文刻石，留传至今，永远缅怀英烈。这段故事在抗战期间激励了多少人的爱国热情！现在，人民政府把朱将军庙定为教育青少年的“德育基地”。周家的另一义举，是指三十年代京剧大师周信芳回家乡，大开周家祠堂门，一连几

天义演麒派名剧,一时全城万人空巷,男女老少大饱眼福,几乎人人会哼上几句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唱词“马来……”。

说到办学,慈城有好传统,历史上早有德润书院、文元书院等著名学府。慈城人特别尊敬办学的先生。当年陈谦夫任慈湖中学校长,顺口溜说“陈家办学”;以后上海商会会长秦润卿要在家乡慈城盖“抹云楼图书馆”,顺口溜又传“秦家办学”。前几年应昌期回家乡,继承父志,为他父亲曾任校长的中城小学盖了漂亮明亮、设备齐全的新校舍;又以慈湖中学校友的情分,为母校重建巍峨的新校舍,配备了现代化的电脑室、实验室、健身房,还有秦润卿没有盖成的抹云楼图书馆;同时,还为孩子们盖了一所班班有钢琴,从小能学电脑、学围棋的幼儿园。如此出资助学的壮举,在目前,顺口溜中称之为“应家办学”,是很自然的了。

上面提到的德润书院,为曾任三国东吴相的阚泽(字德润)所办,院址曾在慈湖畔。而如今的慈湖,又是唐朝宰相房琯在慈溪当县令时疏濬扩大,用来灌溉农田的。阚、房两公据说不是本地人,但他们为慈溪人民做了好事,后人便先后建立了东庙、西庙纪念他们。又运用他俩的官职、姓名的巧合,和庙门均朝南的实景,传下了一副绝对:“东庙阚公,西庙房公,二公门户相当,方敢并坐。”上联如此精妙,令人拍案叫绝,却多少年也没有贴切下联应对。可笑我幼时听父亲讲了这个上联,便一心想对出下联,惭愧得很,半个多世纪过去,依然只有一张白卷。还有一位可笑的“笔者”,不知道慈城有东、西两庙,却发表文章讹传绝对上联,又编造说有一座同祀阚、房二公的奇怪庙堂。现在,慈城的东、西两庙虽然都已分别变为工厂、商店,但有这绝妙上联在,有慈城绝对在,大家会永远纪念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

(1996年5月3日)

追祭父母亲

五古·百联

浙东灵秀地,湖山傍古城,董黯留孝迹,慈溪千载闻。
往事逾七旬,追祭父母亲。清寒店员族,两位小学生。

吾父周兰墀 吾母名俞雯 连续得六女 里巷议纷纷。
 赖有阿娘护，“孙女一样珍。”父母互相慰，个个骨肉亲。
 婚后十八载，三代传单丁。漫长育养路，幼女终关门。
 八儿日夜长，父母苦支撑，年年复月月，不减舐犊情。
 忆昔初记事，娘怀辨五音，弹奏伴教唱，“燕燕”试童声。
 风琴娘妆奁，长兄嫁妹心。琴韵时寄哀，凄凄念逝亲。
 儿稚未识愁，为娘擦泪痕：“妈妈吃糕饼，囡囡捧锡瓶！”
 娘搂儿入怀，破涕又盈盈。持家据勤俭，吾母贤且能。
 白天下厨灶，晚来裁裙裾，教字排“方块”^①，教数摺“纸狮”。
 心智早开启，聪颖传四邻，女儿均进校，个个好学生。
 吾父为生计，省城远故里，吾母留老家，鱼雁传两地。
 儿解爷娘心，家书抵万金。无邮意快快，得信乐琳琳：
 “爸爸来信啰，妈妈多高兴！”阿爸颜楷稳，圆笔任纵横，
 幼小练砖字，少年写联楹。父书掂来重，页页注深情。
 阿母瞧又讲，阿娘笑吟吟。阿母写回信，女儿磨墨勤，
 老少均附笔，聊慰客居心。一月几往返，数载不消停。
 阿爸探亲回，全家喜洋洋，儿童选玩具，婆媳罗酒浆。
 亲友时来集，把盏话沧桑。十三当徒弟，白日学艺忙，
 藏书“寸草室”^②，夜读兴味长。自修十余载，文药双登堂。
 店员工薪低，养家一肩扛。去年遭失业，返乡吞苦涩，
 遍投求职书，八九被回绝，老少待糊口，愁肠月月结。
 贤妻变长物，慈母暗饮泣。幼孩也识灾，糕饼无处觅，
 锡瓶十六只，只只失踪迹。水尽疑无路，花明幸有村：
 书文均录用，沪上两佳音，商务印书馆，校编练习生，
 年纪届而立，羞与后生争。不如就旧业，执笔销燕参。
 一年一回家，天伦乐未央。炎夏晚纳凉，教儿背诗章。

① 为幼儿识字硬纸块，背面有图。

② 父亲早年想建“寸草室”藏书，已刻有书章，但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为憾，此处所指仅为一书箱。

“慈母手中线”，“床前明月光”对仗多习练，黑白对红黄。

猜谜破玄虚，从小学机敏，个个动脑筋，猜中有奖品。

若遇秋空净，携儿识慈城。穿城一长河，跨河驰马桥；

南北一大街，东西两座庙。庙里没有神，分祀两古人：

阡泽兴教育，房琯重农耕。郊外西悬岭，“鸭战”抗英兵，

父子同捐躯，尊称朱将军。吾祖周少溪，刻碑写功臣，

碑在朱贵庙，代代传子孙。今立德育地，长祭爱国魂。

抗战枪声响，慈城救亡忙。婆媳捐铜铁，日夜制冬装。

敌机炸南站，目睹在前窗。妇孺一大群，阿母心发慌，

阿爸急赶回，迁家到山乡。国军节节退，日寇更猖狂。

慈城遭沦陷，母姊避沪上。敌伪苦受尽，爱国永不忘。

一九四六年，全家聚申城。家境稍宽松，如愿高中升。

高中干革命，双亲心明亮。“师生”来“温课”，密议在后房。

我母暗护卫，守望在南窗。月黑离家夜，父授两银洋：

“儿为驱阴霾，爸妈不阻挡，家中少记挂，遇事莫惊惶。”

“午餐姊家吃，早晚勿受凉！”亲情暖我心，战斗到天明。

天明黑夜尽，家家沐阳光，儿女均成才，父母心花放。

儿女反哺少，鬓白尚操劳。我遭诬害日，父母倍感伤。

“四害”乱正烈，病魔呈凶狂。沉痾拒收治，惶惶无主张。

儿女勤侍奉，回天乏力量！相继永别去，儿女痛断肠，

悠悠二十载，哀哀音容茫！泉台愿有知，两老恩爱长！

葬亲归慈城，慰亲故乡情，儿今祭墓前，满目湖山青！

（追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004年4月刊于《海上宁波人》。）

铁蹄下的萌动

——我的初中生活片断

我十三岁的时候，进入家乡慈湖中学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在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年代，很多孩子已经接受了五个年头的爱国反侵略启蒙教育。我也

不例外。最早看祖母、母亲为抗日将士缝制棉背心,帮助她们把家里的旧锅子、漏铁壶送到收集站上,又跟着邻居叔伯到永明寺,去看大天井里熔化捐献来的废铜烂铁,火光烛天,昼夜不熄。还把自己积起来的压岁钱,诚心诚意地送到小学校买“航空奖券”,梦想小学生号飞机上天打日本鬼子。三年级上学期,在上海的父亲抽空回乡,把一家人安排到山区金沙岙去避难。从此我便没有正规的小学生活了。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一起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歌咏队,成为最小的两个队员。大人们唱的那些抗日歌曲,从最早的《游击队歌》(“前进抄小路,山林是兵营……”那首)到《大刀进行曲》、《我们是铁的队伍》等等,全学会了,还演唱过完整的《流亡三部曲》,直到现在唱起来仍然激动不止。……

政治上的“早熟”和对文化学习的饥渴,是我少年时代的大矛盾,乡村祠堂内的初小复式教室,山间柿子树下的露天课堂满足不了求知欲。直到慈城沦陷,我母亲和姐姐去了上海,经济拮据的父亲只好让老祖母带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县城上学。十二岁那年,我到尚志小学插上高小,念了两学期,第二年春季,便由老师安排进了初中,校址在太湖路旧“考棚”,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杨仲未。他的近亲又是我们当时崇敬的陈布雷。因此,虽然要上日本教师教的日语课,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我们一群要好的同学始终以爱国者自居。回忆起来,太湖路“考棚”里的学习生活,也确实有值得纪念的人和事。这里略记二三。

语文老师张圣慧

沦陷区的初中课程,应该说数理化问题不大,关键是语文、史地,看用什么教材,怎么讲课。教过我们语文的有二位老师:一是杨仲未校长兼任,至今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他教白居易的《琵琶行》,强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另一位是张圣慧老师,给我们的影响不小。她原是号称“童姚马金张,银子好打墙”的张家千金小姐。年轻出嫁后,在婢女帮助下离家到宁波、上海求学,在沪江大学毕业后曾风光一时。以后归隐慈城,在小北门购地栽桃李三千株,居处称为“陶园”。

张老师来教我们语文课,不用当时“法定”的教科书,一个学期只教一本《孟子》。从“孟子见梁惠王……”开始,逐段讲解,还常启发我们评论:“苛政猛于虎”是什么意思呀?“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对不对?“为长者折技,曰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你们怎么看?……因为她讲话慢条斯理,行

动也不敏捷，大家顽皮地给她一个外号“张慢慢”。在课余，她邀我们几个女同学到陶园去玩，教我们包馄饨，给我们讲妇女生理卫生，送她自己刊印的诗集给我们……在男同学中，则流传她常常大清早从小北门城缺处出城，到慈湖彩虹桥师古亭放声大哭。有的同学说她疯疯癫癫，到师古亭去“发作”。唉，顽皮的年轻学子们，你们可知道老师当年“国破山河在”的痛苦吗？

当然，对于张老师，我并不能作全面评价，后来她皈依佛门，终老慈城妙音精舍。对于她在敌人铁蹄下，不忘自己教书育人责任，对学生爱护、启示的一番苦心，我历久至今难忘！

“东洋佬”滑冰记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对十几岁的初中学生来说并不理解。我们只感到听“东洋佬”讲“アイウエオ”是奇耻大辱。阳奉阴违，轮流逃课，终难解心头之恨。于是男同学们想出了一个“高招”。那时候，老百姓叫日本侵略军“东洋乌龟”，学生比较文雅，对派来的日本教师称为“东洋佬”。每当那一身侵略军装，打铁钉的皮靴在石板路上敲出可怕的“立—洛，立—洛”怪声，同学们便相互提醒：东洋佬来了。那年冬天奇冷，水缸、水盆里的冰结有几分厚。那天早上，上课钟已打过，又是日语课。男同学那边课桌上空无一人。不一会两个男同学脸冻得通红，手里提着铁丝，吊着一大块又大又圆的厚冰，急匆匆放到教室门口——高门槛的内侧。回头向已经坐在位置上的女同学们做个鬼脸，赶紧跑掉。我们心领神会：有东洋佬的好戏看了！

不一会儿，军靴的怪声响起，那个戴着眼镜，假作斯文的东洋佬走到教室门口了，他的大皮靴一脚跨过门槛，踩到大冰块上。“哇呀——”一声怪叫，东洋佬仰面朝天，滑倒在门口。接着，忘了“师道尊严”，一边臭骂，一边挣扎爬起，扶正眼镜，用教鞭把讲台甩得乱响，用汉语大声追问：“谁干的坏事？作弄老师，大大的坏！——”女同学们心里又解气又好笑，强忍住，谁也不作声。东洋佬发了一通脾气，气冲冲地走了。等到听不见军靴怪声，教室里“哗”地爆发出一阵笑声，你推我搡，拍桌打凳。但是女同学们也不敢随便离开教室，果然，不一会儿，东洋佬和姓冯的校长一起来了。校长把在场同学好一顿训斥，又对日语老师连连道歉，说看来是逃课的男生顽皮，一定要查处……不过，这场东洋佬滑冰风波过去后，好像不了了之。相反，随着战场上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忙于对付新四军三

五支队无暇顾及“教化”，日语课竟无形中取消了。好多年后，我在上海碰到一位当时小名阿章的男同学，问及此事，他笑着说：“当时虽然解气，后来想想未免幼稚。”他到上海后也找到了中共地下党。他说：慈中的一段生活，对他也是一种启蒙。

悼念三、五支队烈士

当年我们慈城周围属于新四军游击区，常有三五支队活动。日伪军有时出城去“清剿”，有时通宵盲目打机关枪。我上小学时家里租住的亲友家平房，靠近小西门，有时候机枪子弹在屋顶上像撒豆子般响；有时候，我半夜里爬上厨房临街一面墙边的火缸沿，踮起脚跟正好够上石栏窗，偷偷往外看到日军列队出城，月光下刺刀在钢盔边闪动。这种时候，我热血沸腾，总是想：三五支队进城来，扔个手榴弹就好了！可以炸得鬼子血肉横飞！

有一次，我上小学的路上，经过日军司令部（设在周仰山新屋，解放后成为工人疗养院）门口，看见一张示众的布告，木桩上绑着一位被捕的三五支队女战士，日寇放狼狗撕咬她，她浑身衣服破碎，鲜血淋漓，脸上冒出白蜡般的液体，直往下滴，闭着眼睛呻吟，顽强不屈，一声不吭。就是从这次开始，我衷心敬佩新四军，敬爱坚贞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总想找点机会，为三五支队做点什么。一次已上初中，同学中传说，有三个三五支队战士被日本强盗在东门外清道观山坡下枪杀了，丢在乱坟岗里。我们和冯家两姊妹等几个女同学一听，热血上冲，秘密商量一定要去看看被杀害的烈士，进行悼念，为他们掩埋遗体。但是，乱坟岗在城外，城门口有鬼子兵把守，怎么出得去？小冯提议找在日本长大的徐瑾湘同学一起去，用日语对付城门口的哨兵，大家称好。小徐平日也痛恨日寇，又出于好奇，一口答应。第二天中午，我们有徐瑾湘、沈云珍、冯家两姊妹、另一位姓周同学和我一共六个女学生，不回家吃饭，便往小东门外走去。徐瑾湘在前跟哨兵交涉，哨兵居然让我们顺利出了城。六个人在强烈的阳光下一路小跑，进入乱坟岗。乱坟岗原是穷苦人死后义埋的地方，许多薄皮棺材胡乱放在那里，却没看到三位烈士遗体。在哪里呢？细心的一位同学发现了山地上的点点血迹，大家循血迹前行，看到了新放在那里的三个用旧木板钉成的薄皮棺材。中午的阳光照在很宽的裂缝上，看得见里面用破棉絮包着的遗体。

“是了，就是这三位烈士！”

“已经有人在我们之前葬了三位烈士？”

我们立正默哀。一位女同学想去打开棺盖，另一位却难受得呕吐了起来。

已经有好心人埋葬了烈士，我们也心安了！反正我们永远纪念他们，我心里发誓：长大了去找新四军，为烈士们报仇，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在回学校的路上，六个人默不作声，心潮起伏。这一个中午，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上了严肃的一课。后来，这六个女学生中，冯家姊妹不幸早逝，另一位也过世了。现在上海的三位，有两个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徐瑾湘同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载 慈湖中学百年校庆纪念文册）

黎明前的战斗 ——我的高中生活片断

上海旧城厢的环城大道，由中华、人民两条半环路组成。从老西门到小西门之间的中华路上，连接着一条以上海文庙命名的丁字路。上海解放前，私立民立女子中学便设在文庙路上，左边紧靠文庙，右边濒临中华路。解放后，每当我经过那里，虽然民立女中早已改为市十中学，后又另迁新址，但我的眼前总会“过电影”，回想起解放战争时期中学里的灼热生活，那一幕幕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那一阵阵朝气蓬勃的青春笑语，那一张张忧愤交织的老师面庞……

我终于找到了党

我于1946年从浙东家乡来到上海，考入民立女中念高中，直到1949年迎来解放，毕业离校。我难忘这三年间老师们给我打下的文化基础，更难忘我们党教育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童稚年代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抗日歌曲是最早的老师。以后是在黑暗的沦陷区，随着年岁的增长，上下求索，寻找光明、自由、胜利，寻找抗日进步力量，逐步归结到寻找中国共产党。可是，党在哪里呢？到上海后，读到进步的报刊多了，使我懂得一条：哪里有工人、学生运动，哪里必定有共产党的领导。

民立女中校长童行白，是国民党的一个骨干，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

会局副局长。他通过训育处和周燮臣把持的体育部,以及一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严密控制学校,迫害进步师生,镇压学生运动。我考进学校的时候,反动校方刚开除了一批参加“六·二三”运动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学校里只剩下个别党员,校园内的学生运动暂显沉寂。但是上海全市的学生运动正一浪高过一浪,抗议美军暴行,“五·二〇”惨案,反饥饿反内战,还是从不同渠道反映到学校里来,同学们愤慨异常。我和周围一些同学悄悄地议论时事形势,但不知道怎样去发动同学跟上时代的洪流,心里很想寻找党组织来领导民立女中的学生运动。

1947年秋季开学,高三班新考进来一批插班同学。校方公布第一次小考分数的時候,我从布告栏看到一行突出的成绩:国文98,数学100,英语100。我钦佩地记牢了这位同学的名字:李淑铮。后来,我又听说,这位比我高一级的戴眼镜同学,是从其他中学转来的,不仅功课好,而且思想进步,可我哪里知道她正是上级党组织充实中共民立女中支部的一批党员之一,还担任了新的支部书记。

党的支部委员会重新建立后,有党员的班级又开展了团结同学的工作。冬天,全市大中学生掀起救饥救寒运动,支部及时领导,民立女中同学也热气腾腾地行动起来了。我兴奋地参加劝募寒衣,直到转为反对奴才外交的斗争,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可是,运动结束后,转学来的一批地下党员又被反动校方无理开除了,学生运动又受到挫折。我也受到了处分,心里渴望找到党。

1948年上半年,支部书记李淑铮在校外继续领导民立女中党的工作。这时候,高二乙班又新转来了一个党员周竞学,她和我同年级,平时和我接触很多,经常商量如何团结同学,给我读上海学联出版的《学生报》,组织春游和红五月活动,发动和参加反美扶日运动。在艰苦的工作和斗争中,我进一步得到锻炼,寻找共产党,要求入党的心情更迫切和更明确了。可是,我还没有想到党组织已在我的身旁,并正在教育和考察我呢。这年暑假一开始,反动校方以“煽动学潮”为理由,用“勒令转学”的名义把我也开除了。正当我愤怒和忧虑交加的时候,党组织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双手。一天,周竞学到我家玩,说要商量一件极重要的事情。我把她请到后房间。

她压低声音、悄悄地说:“有个朋友告诉我,‘山那边’来了人,马上就要回去的,问我们想不想参加最高的……”

“啊,太好了!你答复人家了没有?”我完全听懂了她的话,“山那边呀好地方”是我们最喜爱唱的歌,“山那边”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最高的”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代名词。因此，大喜过望，抢着问她。

“我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你看要不要参加？”

“当然要！我早就想得不得了，就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你快去答复人家，我们俩一起参加！”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地下党时期提到共产党要用英文字母“D”来代替。

“好的！不过那朋友说要写一份自传，还要讲明白为什么要参加。你看什么时候写？”周竞学不急不慢地说。

“我今天晚上就写好，明天交给你。你也今晚就写好吗？”我生怕她写得迟了，错过这宝贵之极的机会。其实，周竞学同志到私立女中之前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她是按地下党的方式在“发展”我，可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想和她一起参加党。

我终于找到了党！高度的兴奋使我把受迫害、面临失学的困境抛至九霄云外。我当夜认真写好申请入党报告，决心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准备别父母，离家庭，到解放区去跟党干革命。第二天，我把报告秘密交给周竞学，便天天等候回音。

这时候，学校里教国文和数学的老师知道了我被开除的消息，他们以我“各门功课成绩好”“品学兼优”为理由，与反动校方据理力争，迫使校方取消了那个决定。我感谢老师们支持正义，但当时我还幼稚地认为“好马不吃回头草”，不愿再在私立念书。党组织知道后又及时教育我，指示我留下来继续上学，开展学生运动占领阵地。我接受了这一任务。新学期刚开始后，我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李淑铮同志代表党组织和我接关系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位我钦佩、怀念的同学，原来就是私立女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党给我们力量和智慧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颁布所谓“清除匪谍”政令，“戡乱建国”乱抓乱杀人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投身到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从此，我干革命有了指路明灯，战斗有了坚强领导，在斗争实践中磨练才智，逐步成长。

1948年11月，李淑铮代表上级党宣布，重新建立私立女中党支部委员会，我任支部书记，周竞学、胡银漫分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支部共有七个党员。这

时候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 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垂死挣扎 白色恐怖更严重 抓人的“飞行堡垒”白天黑夜在街上发出凄厉的呼啸声 路上不时戒严 查抄行人 对工运、学运的镇压更凶残了。我们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 一个秋冬抓了党内的革命气节教育 以防不测 对积极分子进行时事形势教育 对同学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 使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新的基础。寒假里 在女中区委领导下 我们民立女中、上海女中、南洋女中三位支部书记一起 总结支部工作经验 相互交流。会议由刘菱芬同志主持。1949 年春季开学 便按照市委学委的部署 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

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 我们先抓思想武装。李淑铮同志给了我们一篇手抄的毛主席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 秘密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 树立克服困难 坚持革命到底的信念。同时 我们按照上级党的布置 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 一至三月间先后吸收了七名新党员 使中共民立女中地下支部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十四名党员。积极分子队伍也不断扩大 党支部按照上级党指示 还建立起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学联小组”。此外 还加强了教师工作 继续团结进步教师 争取广大教职员。这时候 反动校长童行白已逃往台湾 名义上由新的训育主任代表校方 校务大权实际上由自称受过庐山训练的周燮臣掌握。我们对训育主任讲明形势 要他保持中立 不要参与反动校方镇压学生运动的勾当。他表示愿意考虑。我们的目的是彻底孤立坚持反动的周燮臣。

我们迎接解放工作的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学生队伍 在较长时间深入、分散联系团结群众的基础上 关键时刻抓住时机 争取重点突破 以打开全校群众性迎接解放斗争的局面。

1949 年 4 月 1 日 南京十一所大专院校学生六千多人示威游行 要求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遭到反动当局的武装镇压 两个学生死亡 一百多人受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四·一”惨案。消息传到上海 许多学校群情激愤。5 日 交大、同济等 31 校学生一千五百余人在交大体育馆举行致哀会。民立女中的不少同学对惨案也很关心 要求了解真相。几个党员带领一些同学前往交大参加致哀会 回来后议论纷纷 周围同学听了也很悲愤。

党支部委员会及时开会研究 上级党代表李淑铮传达党的指示 支委们分析了同学们的情绪和校方情况 最后讨论决定：抓住有利时机 放手发动群众 追悼死难同学 控诉当局罪行 反对假和平 要求真和平 在群众发动过程中发挥积极

分子作用 提高他们迎接上海解放的觉悟 并把他们组织到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中去。具体做法：决定普遍发动群众 选择高三甲班重点突破 然后争取合法 推向全校 打开局面。

当时 高三甲班有五位党员 积极分子比较多 群众基础不错 我又是这个班级的老级长。国文老师朱剑心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听说他曾任某大学中文系主任 后因政见不合 愤然辞职 去浙江杭州教中学生。几经周折 他带着两个女儿在敬业中学教书 并在民立女中兼课 维持生计。他国学根底深 还经常讲解鲁迅作品 有时评述时局 常常表露出愤世嫉俗之情 不满社会现状 夹杂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嘲讽。他是一位有爱国心、正义感、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师。高三两个班的党员一直尊敬和团结他 他也很爱护品学优秀的学生。1948 年我被反动校方开除时 便是朱先生带头向董行白抗议交涉的。我想 这次班级的悼念“四·一”烈士活动 如能争取到朱剑心先生的支持 用他的两节作文课开追悼会就好了。可是 这样做弄不好会使他丢饭碗 受牵累 他肯冒这个风险吗？大家要我慎重考虑一下后再行事。

当天夜里 我反复思考这个追悼会方案 比较来比较去 觉得还是找朱先生最合适。我想 他讲述当年鲁迅等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时曾表示出崇敬之意 加上他平时的言行倾向 可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当然 我们也要为他着想 让他对校方有个交代。

第二天一大早 我先到朱先生住所 请教他怎样看待“四·一”惨案？想不到由此引出他一肚子愤慨。他痛心疾首地斥责反动当局：对和谈没有诚意 血腥屠杀青年学生 罪不可恕 又赞赏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谈条件。我看他态度明朗 便开门见山地说：“朱先生 我们想借用您本星期的两节作文课开会 悼念南京牺牲的同学 行不行？”朱先生没有思想准备 脱口说：“那你们的作文怎么办？”我知道校方要查教学情况 便拿昨夜想的办法和他商量：“追悼会开完后要同学们写篇记叙文 好不好？校方追查起来 可说是我们闹的 先生被逼得没有办法……”朱先生放下手头的学生作文簿 陷入了沉思。他经过一番犹豫 正义、爱国的热情占了上风 郑重又关切地回答：“好吧 我同意。校方由我去对付。你们准备得周密些 防止意外！”我一听这话 心里很感动 忙肯定地说：“您放心！同学们起来了 办法多着呢！”

我回到学校 见还没有上课 便马上一一告诉支委和班上党员：“出师顺利！”

大家都高兴得很,忙去安排各自分工的任务。我们班上的党员,先广泛发动同学,然后,接连几天利用课间和放学后,三三两两跟同学们聊天谈心,从学校、家庭谈到社会,又从社会现状谈到“四·一”惨案,谈到真和平如何实现。不少女同学了解惨案真相后,义愤填膺。有人主张开追悼会,大家纷纷赞同。我们便因势利导,发动在课余做小黄花,准备节目和悼词。而对那专门监视进步同学、抄黑名单的三青团员、反动分子周燮臣指派的所谓“体育干事”,则严密封锁消息。

在各项准备工作中,最主要的是一篇悼词。既要贯彻支部决定的精神,又要从同学的觉悟水平出发,激发大多数同学的感情。为此,我们班党员和几个同学在一位积极分子家里一起议论,边写边改,最后由我做级长的定稿。“悼词写得好,念悼词也很重要!”“请谁来念呢?”大家又七嘴八舌起来。有人提议由小万同学来朗读。小万是个中间同学,为人有正义感,这次对“四·一”惨案反映比较强烈,她出生在北方,讲一口标准的国语,也有上台经验。可是,由于她平时表示清高,不太关心政治和集体,因此有的同学提出疑问:她肯承担这个任务吗?大家主张先听听她的意见。事后,一个党员去征求小万意见,出乎意料之外,她一口答应,拿到悼词后又仔细作了准备。

准备工作就绪后,支委会又开会研究。李淑铮同意这个计划,两位支委也打算抓其他班级加以配合。会上,还讨论了下一步向全校推开的做法。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朱老师上作文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同志们怀着临战的激动心情,不露声色地陆续走进四楼的教室,坐到各自的座位。

“嘀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朱剑心先生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两支粉笔,急步走进教室。

“立正——坐下!”随着副级长的口令,全班同学向老师致敬后坐下。我随即走上讲台,对朱先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我们班许多同学请求借用您的两节课时,开级会悼念‘四·一’惨案中遇难的同学,然后再写作文,请先生同意!”朱先生听了,心照不宣,两手一摊,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吧!你们抓紧点时间,可不要误了作文。”“是!”我请朱先生坐下,然后面向全班同学宣布追悼会开始!早已做好准备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迅速拿出小黄花别到自己胸前,还一一发给其他同学。负责司仪的同学也站了

出来……

这时,坐在教室靠窗的那个三青团员仿佛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她一向扮演班级“监督者”的角色,班上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向体育部的周燮臣报告。而今天,她被这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变”弄得措手不及。她坐不安稳,窥视门口想溜出去报信,可门口坐着朱先生,旁座同学又把她紧紧地堵住了。无隙可乘,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

教室里气氛肃穆。小万踏上讲台,用深沉而充满感情的语调朗读悼词,字字句句扣击着同学们的心扉,眼前仿佛浮现出南京游行同学惨遭武装军警毒打、杀害的悲壮场面,大家沉浸在悲痛之中。同学们捏紧拳头,眼含泪花,悲愤难平,沉寂中渐渐响起压制不住的啜泣声。最后,小万挥动手臂,喉咙哽咽,声泪俱下地念:“安息吧,死难的烈士!冬天有凄凉的风,它是春天的摇篮!我们要完成你们的遗愿,为争取真和平,团结一致,奋勇前进!”

教室里,顿时掀起了一阵感情的浪涛,同学们高呼要为死难烈士报仇,紧接着,有几位党员和积极分子轮流上台演讲,他们从“四·一”惨案引发,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憧憬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争民主、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不少原来属于中间的,甚至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同学,也受到感染,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呼喊“要和平,要真和平”会议达到高潮。这是一次真正的群众集会,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第一节下课铃早已响过,但没有人离开,演讲、朗诵在继续。同楼高三乙班,是支委周竞学、胡银漫所在的班级,班上好几位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到我们班教室门口,有人喊道:“快来看呀,甲班在开追悼会啦!”顿时,涌来许多同学,把我们甲班的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一双双火热的眼睛朝教室里张望,无形中为我们增添了一道“安全墙”,也扩大了追悼会会场。

在化悲痛为力量的气氛中,朱剑心先生也被自己的学生感动了,他也发表演说,评论“四·一”惨案,并布置同学们以追悼会为内容,每人写一篇感受,作为今天作文课的作业。

班级追悼会后还有个小插曲。那个充任“体育干事”的三青团员气急败坏地赶去报告自不必说。而一位矮胖的同学却久久沉默不语,突然间,她涨红脸站了起来,对同学们说:“我,我……我参加过三青团,现在我不干了,要和大家在一起!”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三青团团证,“嚓、嚓、嚓”撕了个

粉碎。我们向她表示欢迎。

高三甲班举行追悼会的消息,在全校师生中激起强烈反响。这时,支部按照决定,在重点突破以后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发动广大群众,召开全校追悼“四·一”烈士大会,并争取成立全校性学生合法组织,便于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

我先和级长中的积极分子商量,联合出面去找那位新任训育主任,提出我们要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奉劝他认清时势,顺应民意,别再干涉学生的活动。他不敢贸然答应,又不敢断然拒绝,说让他找其他主任商量商量。后来他们要求我们改个名称,成立“学级联合会”。其实名称是次要的,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成立学级联合会也可以,反正成立后,我们召开全校十几个班级的级长会就有了合法理由,为筹备全校的追悼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全体党员的努力,带动积极分子和群众,全校追悼大会迅速筹备就绪,支部派党员刘文光作为学级联合会代表,主持大会。上级党代表李淑铮到现场帮助支部掌握。这个大会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四·一”惨案真相,追悼死难同学;二是控诉反动军警武装镇压手无寸铁学生的暴行;三是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宣传我党的八项和平条件。会上除致悼词外,许多班级派代表讲话,积极分子还教唱《安息吧,死难的烈士》这首学生运动中的著名悼歌。参加大会的同学悲愤交加。大会主席及时号召同学们化悲痛为力量,为争取实现真和平而奋斗!并提出团结起来,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团结战斗迎来黎明

全校追悼大会开得很成功,打开了民立女中学生运动的新局面。由于“学级联合会”出面召开,有了合法名义,这次大会参加的人数空前,有五、六百人,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面积地教育了中间以至落后群众,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大会后,我们又趁热打铁,及时巩固收获,积蓄力量,通过党员分头联系,把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个别吸收到支部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学联小组”中来,以此为骨干,开展一系列迎接解放的秘密工作。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南京以后不久,解放上海的外围战也打响了。反动派不甘心灭亡,于4月26日对各校学生进行大逮捕,共逮捕学生三百五十二人,其中党员约七十人。民立女中支部在事前按上级党的指示,采取了防范措施,已经撤退了暴露的同志。因此,党支部和学联小组未受损失,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和群众也未动摇。在这段时间里,我撤离学校,也离开家,白天秘密联系各个工作点,视察我们保安大队的阵地,每天晚上到胡银漫家里开支委会,李淑铮也参加每次会议,研究、部署、检查我校迎接上海解放、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宣传、情报、策反、救护、联络、纠察等具体任务。在这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同志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坚强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依靠积极分子,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任务。碰到困难,大家就相互鼓励:“天快亮了,革命要胜利了!”“团结一致,坚持战斗,不怕牺牲,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4日夜枪声阵阵,每个同志枕戈待旦,等候命令。25日清晨,我去联系一个地区工作点,在老西门看见一队人民解放军炊事兵经过。啊,日夜盼望的一天来到了!上海南区解放了!我急忙跑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按照纪律等候上级党的指示。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布告“约法八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急得心如火烧。终于,李淑铮同志来了,她向我简明地传达了上级指示,我便立即回到离开了一个多月的学校,迅速召集支部委员和党员开会,传达任务,部署行动。除周竞学同志带领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留守学校外,我和胡银漫同志及其他党员,立即率领早已集合待命的人民保安队各分队队员上百人,开赴总部指定的报到地点——陆家浜路中华职业学校。由于解放大军在当天早晨迅速解放了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所以我们配合解放军作战的任务取消了,民立女中的“人民保安队”改为“人民宣传队”,总部发给我们蓝底黑字的袖章,立即编成几支宣传小队,由党员分头带领,上街宣传上海解放的伟大意义,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纵情地笑呀,唱呀,跳呀,欢呼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原刊上海南市区《党史资料》)

难忘的新闻馆

——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复旦大学曾经有过一所新闻馆,五十年代毕业的同学,几乎都留有一段难忘的记忆。

· 初进新闻馆 ·

1949年9月,报上公布复旦大学录取新生的名单,我在新闻系栏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很高兴。过了几天,接到通知,先去转党的组织关系。就在向中共复旦党组织交介绍信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新闻馆的故事:她是学生运动年代复旦的一个民主堡垒,人称“小解放区”。馆内可以看到许多进步书刊,可以唱各种革命歌曲,馆前还有个可以自由发表反帝爱国言论的民主广场……又过了几天,我住进了老校区相伯堂北边的女生宿舍,安顿好床铺,和一位新同学小潘兴冲冲地去找新闻馆。经过大屋顶图书馆,再往东南方,有一幢两层的小楼,半新不旧,并不显眼,就是目的地了。

我们从后门进去,见楼下的门关着,想是不开放。正要上楼,楼梯上下来一位中年教授,身材不高,后面跟着两个男同学,亲热地喊着陈先生。我猛然醒悟:这位就是新闻系的系主任陈望道先生了。连忙让在楼梯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陈先生!陈先生看了我们一下,用浙西口音和善地问:“你俩是新同学,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呐?”我们报告,他点了下头,又问:“在哪所中学毕业,为什么来考新闻系呐?”我说:“我在上海民立女中毕业,喜欢做新闻记者。”他笑了:“好,女同学喜欢学新闻。好好学习吧。”

听了他嘉许的语气,心里暖呼呼的,觉得自己专业选对了。

新闻馆楼上,中间一大间,朝南有阳台。右间似为教师休息室,左边一间里有几排书架,墙上挂有报刊,地上堆着旧报旧书。好久没人整理了,同学也不多。

我们先绕书架走一圈,上上下下看一遍,有些失望:并没有想象中的进步书刊,不由嘀咕:这些书都一般嘛。有一位男同学蹲在一架书后面,听到

我这句话笑了一声,忽然变戏法似的,从那里抽出一本旧书来,已经翻得很烂。他翻开来放到我眼前:“不大一般吧!”我一瞥,《大众哲学》,忙问:“艾思奇的书,你哪里找到的?”“秘密!”他狡猾地说,随即又解释:“解放前这里的书常要伪装,外人找不到,老同学却常如探囊取物一般。解放前夕,好些书刊都转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好在新华书店都有了,不必来小图书室掏旧书了。”我边听边东张西望,忽然看到房角落地上有一堆新书,好几十本。拾起一本看,咦,《基度山恩仇记》,蒋学模译。“法国大仲马的小说怎么丢掉啦?”还是那位男同学猜测:“蒋学模不是新闻系的,这些文摘出版社出的书,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新闻馆来了?也许是卖不出去了!”这堆书一直到正式开学后才搬走,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也不知道蒋学模先生知不知道这个小插曲。

看完图书室已近中午,忙到阳台上。秋光照眼明,俯视民主广场,其实也只是一片不怎么漂亮的草地。左前方便是号称“小桥流水”的燕园一角。小楼、小园、小草地,伏在阳台栏杆上,却像看到老同学们在篝火晚上载歌载舞的英姿,听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怒吼,还有时事座谈会上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演讲、辩论……

· 学习厅 歌咏厅 排练厅 ·

现在,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新闻馆也开始了新的生活。有幸的是我们成了这里的新主人。每天每天,朝阳初升的时候,同学们在这里自习,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俄语小组”同学苦练卷舌音“Р_{румин}”;午休时分,理论学习小组同学讨论社会发展史:我们现在是什么社会?斜阳下,上完课的同学都来了,顿时教唱歌呀,讲笑话呀,玩游戏呀,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新闻馆变成了学习厅、歌咏厅、游戏厅、排练厅……青春的生活,真难忘啊!

排练厅的起因,在选举第一届学生会前。各系推选代表,参加校学生会委员竞选。新闻系同学雄心勃勃,要争取选上两个学生委员。在老新同学中推选出两个代表,新同学中代表推选了我,到全校去竞选。学校党组织也同意了。

一天,助选同学在新闻馆排练竞选大会上演出的节目,通知我去参加。原来准备了一个快板剧,由一位女同学当演员,导演是位要转来新闻系的农

学院同学,他有舞台经验,设计快板结束时两位代表上场,发表竞选演说。他要我准备。我一听,窘了,不干。“噢,为什么不干?”“别忘了服从导演啊!”我这人生性木讷,不善辞令,最怕就是上台讲话,何况还要自吹自擂去竞选。不干,坚决不干。我说:“你们都知道我口才不好,又讲不好北京话,要我到全校大会上演说,岂非出洋相。你们不怕系里选不上两个委员吗?”大家七嘴八舌准备说服我,我还是执意不肯,惹得女同学们生了气,导演也泄了气。正在吵得不可开交,忽然门口有人打圆场:“算了,算了,她不肯讲就不要强人所难吧!我来改剧本。”回头一看,原来是快板诗作者。大家便又朝他喊起来:“你倒轻松,你是诗人,那你改呀,现在就改出来!”他胸有成竹地说:“这样好不好,在第一位代表精彩演说结束下场后,演员马上接着再念下去……”“台词呢,我接着念什么呀?”女演员急了。“别急,快板诗已经继续写下去了,听着:嗨,南北山峰一般儿地高,新闻系还有个女代表,呼啦啦的旗来红红的火,女代表名字叫周珂。高中里面当主席,搞学习她年年数第一……”“慢!”导演伸出双掌,做了个暂停手势,他灵感来了:“快板诗念到女代表名字以后,来点锣鼓,女代表上台亮个相,向全场同学鞠躬致意,然后演员再继续表演。你们看行不行?”“好,新鲜!”“比原来两个代表都演说反而好,多样化了!”

“怎么样?这么定了?”导演和作者生怕我又横生枝节,一起问我。我忙向大家鞠躬道歉,不好意思地说:“只要不叫我王婆卖瓜,干什么都行。我就这样鞠躬,可以吗?”同学们笑起来,节目也排练完了。这个节目后来在登辉堂竞选会上大受欢迎,两个代表也都选上委员了。“女演员”从此出了名,离校后她真做了话剧演员,成为终身职业。“导演”如愿以偿转到新闻系,可毕业后却写起小说来,后来被调到宁夏当了文联主席。“诗人”也不再写诗,而是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写杂文,成为著名杂文家。

从新闻馆开步,可是走出去的脚印却并不全在新闻战线上。这是当年所意想不到的。

· 大作家来作客 ·

我到学生会工作后,又当了副主席,课余时间忙极了,新闻馆就不大有时间去了。但是一有机会总忘不了她。一次学生会里来了一位大客人,说

是统战部门的首长。我接到接待通知,上完章靳以先生的语文课就急急忙忙跑到学生会,一看是位中年模样的首长,穿着普通干部装,也没有警卫员、秘书等人。我自报姓名后抱歉地说:“刚下课,来晚了,累您久等了!”那客人并不见怪,随和地自我介绍:“我是周而复。突然袭击了,想请你聊聊文科新同学!”

“喔,您是作家!我读过您的作品,白求恩大夫,还有西流水的孩子们……”

他谦逊地笑笑,岔开话头:“你是新闻系的吧?就讲讲你熟悉的系里同学吧!”打量了一下周围又说:“能不能找个适宜聊天的地方?”

是真的,学生会里人多事繁,进进出出,大声打电话,的确太闹了。我略一思索,便邀请他到新闻馆去。周而复同志很高兴,随我来到小楼上。我当然不忘介绍新闻馆的革命传统,他微笑点头。这时候,同学们大都在上课,馆里清净得很。客人很有兴趣地听我谈我的新同学们。不时插问。特别注意一位爸爸是民族资本家的女同学,问她学习好不好?思想进步不进步?和同学们关系好不好,我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很满意——若干年后,《上海的早晨》出版了,我看完小说,不禁想起和作者在新闻馆里的那次聊天,朦朦胧胧地感到,这里似乎有些什么联系——

谈话已近尾声,楼梯上已响起脚步声。我意识到食堂开饭时间已过,同学们的午后活动快开始了,便邀请作家兼首长去用餐,周而复同志并不推辞。我领着他到后校门外的一个小面馆,请他吃猪肝面。这是当年我们学生会最好的招待了。他边吃边问同学生活状况,伙食如何?我也不掩饰,如实告诉他:七万八千元(相当后来的七元八角)一月伙食费,几乎天天卷心菜,煮黄豆,都吃怕了。他说慢慢会好起来的,我同意,说:“下次来希望能请您尝尝我们食堂的小灶!”

吃完面,周而复同志又让我带他在校区里转了转,便要回机关开会了。当我送他又经过新闻馆时,楼上传来一阵欢快的歌声:“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千万个青年一颗心,唱出一个春天来!”

“好啊,唱出一个春天来!”客人赞许着愉快地走了。送走客人,我连忙回到系里,三步两步跑上楼梯,立刻加入同学们的合唱:我们是民主青年,

我们是时代的先锋！毛泽东教导着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

（原载《我们的脚印》第五辑）

我的第一篇统发新闻

我属于新中国正规培养的第一批记者。复旦大学新闻系49届全班学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规定，提前一年毕业。毕业生几乎由新华社总社包了。我因为被送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留在上海，并分配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当政法记者。那是1952年秋天。

我的第一篇用“新闻处”名义发布的新闻，是驱逐一个利用宗教搞间谍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从跟随破案、旁听审讯，到倾听群众控诉，花了好几天时间采访，用心写了长篇通讯，由科长通过后交到新闻处处长张映吾那里。我以为完成了任务，松了口气，去忙别的事。谁知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处长忽然叫我上楼去他的办公室，原来市里刚开完会，那个帝国主义分子明天就要驱逐出境了。他说：“你快赶去采访宣判，今天晚上就要发布新闻。你那通讯用不着了，写五百字新闻。我看后还要送市委宣传部……”我一下子愣住了，时间紧迫，不容多问，急急赶去采访，回来就写。幸好材料已经熟悉，等同志们吃罢晚饭，我也写好了。忙送给主管科长吴云涛，他一目十行看完，笑着说：“看你能否通过这第一次考试哪！快送给处长去！”我忐忑不安地送稿上楼。已经等在那里的处长立即仔细审阅，字斟句酌。我在一旁等着，不由想到他第一次到新闻系上新闻编辑课：把人民解放军解放广西时的报道标题“红旗插向镇南关”，改为“红旗插上镇南关”。说别看“向”和“上”一字之差，可是政策性极强，“插向”，岂非令人误解要打往邻国去了？……我站在窗口，心里悚然，像个小学生静待严师发落。处长终于审阅完签字了，他不苟言笑、不加褒贬地说：“做新闻记者，定要牢记政策性，还要学会倚马可待的本领。让我的汽车送你去找姚部长审定。”

姚部长就是姚溱，原来是新闻处处长，这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知道他即是解放前赫赫有名写解放战争军事评论的秦上校，但我没见过。姚溱同志看稿又另有一番风度，边看边问：情况弄准确咧？姓名核实了？看

到那个帝国主义分子了？采写政法新闻也很有味道是吗？……我一一回答完，他也看好了。用红笔写上“统发。明天见报、广播。”又签了一个不小的名，还注明日期。临了鼓励一句：“你是新手呀？写得不错！”直到这时候，我才完成了这作为正式记者的第一个任务，一颗心回到胸腔里，也忘了肚子饿，急匆匆回新闻处去发稿。

从采写这第一篇新闻统发稿的过程开始，我受到了一次次新闻事业的革命传统教育。真实性、政策性、群众性，准确、迅速、有味，“三性三要求”开始了从课本知识到实践的体会。

(2000年11月22日)

采访陈毅市长做报告

我最早当记者的时候，跑的是政法新闻。那是刚离开学校不久的五十年代前期。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市新闻处，要负责向各新闻单位发布市府各部门的重大新闻，包括报道市长的重要活动。每天的工作是那么紧张而又有意义。

有一次下午，陈毅市长在市府会上做报告，领导上要我采写新闻。由于有一份书面讲稿，我觉得比较轻松：照讲稿详细摘要，加上点现场气氛，不就成立了。

可谁知道，陈市长报告刚开了个头，就把讲稿扔到一边去了。我不由心里一惊。只见他一手搁在讲台上，像摆龙门阵似地，用一口好听的四川话，“随便”地“谈开了家常”。既没有甲乙丙丁，也没有ABCD，却是理论联系实际，思路开阔，内容丰富，机智风趣，又深刻，又生动，赢得满堂听众阵阵笑声，连连鼓掌，会场里空气活跃极了！

听这样的报告真是一种享受！可是我这个才只有一年“记龄”的记者，急得热汗直冒。我知道上海人民多么爱听陈市长的讲话。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群职工和教师，站在大喇叭下，专注地听讲，那情景真动人！今天这个会议的精神，说什么也要详细报道给群众。可那时候记者可没有什么盒式或者微型录音机。我忙打开笔记本，竖起耳朵，手不停笔，全神贯注地做起记录来，务必不能漏掉一个警句。

那天陈市长精神特别好,他意气风发地讲了四五个钟头,会场里始终反应热烈,没有一个人打瞌睡、开小差。这现场深深感动了我,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会开完了,时针早已越过了七点。我急忙跑到陈市长面前:“您的报告今晚要发新闻,稿子写好后送到哪里请您看?”

陈市长略为沉吟了一下,说:“请阿丕——陈丕显同志看就行了!”阿丕,是陈毅同志对陈丕显同志的亲切称呼。

于是我赶紧回新闻处写稿。说也奇怪,到这时候心里反而不慌了。我努力消化报告,用最快速度写稿,写一张,领导同志阅定一张,刻写同志抄一张(当时新闻处条件差,发稿是刻蜡纸油印的)。流水作业直到夜深,才把一份陈市长的报告摘要弄妥。赶忙跳上门口的汽车,送到陈丕显同志处。我进了院子,只见正屋里电灯通明,办公厅苏同志迎了出来,原来他和陈丕显同志正等着。

“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喝杯茶!”陈丕显同志接过稿子和蔼地说,让我在椅子上坐下。苏同志已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我这才发现,桌子上放了四碟茶点,似乎他们已经猜到我没有吃晚饭。顿时,我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客气地喝茶、吃点心来。边吃边想象明天——不,今天,当广大群众从报纸上、电台里看到、听到陈毅市长的重要而精彩的报告摘要时,将有多么高兴!于是,我连续十个小时的紧张、疲劳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83年6月22日)

地方报记者首次踏进怀仁堂

——忆新民晚报 1959 年受邀采访全国两会

从 1948 年为上海学生报组稿、发报算起,我从事人民新闻工作已半个世纪有余。其间由学习入门,到采写新闻,指导研究,编报纸,办广播,做学问,留下一串串数不清的足迹,多半早已淡去。当然也有几个脚印清晰而难忘,四十年前踩在中南海怀仁堂里的脚印就是其中之一。

1959 年,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请地方报纸派记

者参加采访。仅有的一份通知幸运地落到上海新民晚报,又幸运地落在我的肩上。我当时是晚报编委,兼着政法教卫组(部)头儿的职务。平日采访,不是跑里弄、学校、医院,便是进工厂、商店、农村,再重大的活动也就是市里的党代会、人大、政协会场,加上一些外事活动而已。那时候的新民晚报多数记者堪称“足不出沪”。所以,第一次接到这个唯一的意外任务,心里别说有多高兴。刚过完三十岁生日,我便和跑卫生的女记者胡平同志一起,开始了“生命第一高度”的冲刺。

我们第一次上北京,投宿到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社)招待所。谁知刚进胡同便猛吓了一跳:迎面有个妇女,用大红纱巾没头没脸包上,朝我们急急走来,擦身而过。惊疑之余这才发现,四月的风沙正在胡同里盖天铺地般扑来,不由钦佩首都女同志的“护身法”。可我们自己始终没敢效法,以致老觉嘴里含有沙粒。

安顿好住处,忙喜滋滋地找大会秘书处去报到,领证件、文件……接待人员很和气,但发给的记者证只有写好我名字的一张,还指定只好在会场后半部分活动,不能进到前场1/3的区域,当然更不能上主席台;又特别关照:“重要新闻由新华社发稿,晚报采写的稿件自己负责,没有人审稿。”这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采写的稿件竟可以不必送审,忧的是活动条件太苛刻。我已在上海市新闻处和晚报先后当过五年政治记者,很明白大会前半场和主席台前后,正是大会新闻资源的“金矿”所在,不能进入这个区域,意味着我这个仅有的地方报纸记者不能享有新华社和中央报纸记者的待遇,当然增加了采访难度。还有,卫生记者领不到记者证,岂非不能参加人大采访,难道就这么白跑一趟不成?着急之下老着面皮跟接待同志磨,好说歹说,终于感动上帝,他请示后增发了一张“场外采访证”。“场外”就场外罢,场外采访本来就是计划中的应有之义。那年月,我们刚在里弄整风、向科技进军、市人代会等报道中尝到“中心报道多样化”的甜头,原来就打算这次采访全国两会要打一个“正面与侧面结合,中心报道多角度、多样化”的漂亮仗。争取到了“场外采访证”,两人合作,便有戏可唱。

第二天起,我们每天一大早离开东单,沿长安街往西,先上大栅栏前门饭店代表们住处采访,然后兵分两路,我往大会场抢当天上午新闻,胡平去六部口新电报大楼发我们隔夜写好的稿件,傍晚,我也赶到电报大楼,发上

午新闻传真(那时候刚有了最快的照相传真,可写在专门纸张上传原稿),然后回前门饭店会合胡平。午餐后再分头行动,如遇小组讨论,便在前门饭店分别参加采访侧记或花絮。晚上,我们在招待所进餐后确定次日发的稿件,分别在小桌子两头写稿、定稿到夜深。那段日子里,虽然十分紧张,心情却很好。胡平和我年纪相仿,志趣也比较接近,忙里偷闲还要谈谈心,又共勉为报社里传来发行数字天天上升、突破历史记录的喜讯而加油。我钦佩她有条不紊的生活能力,也欣赏她文章时有才气。时光流逝,回忆起她那对大眼睛,宛然如昨。胡平不幸中年病逝,离开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但我心中的这段友谊不会消失,新民晚报老同事也不会忘记她!

四十年前,首都春光明媚,却时不时风沙袭人的季节里,两个上海女记者,天天沿着长安大街用双腿跑巡回,半个月光景跑出三十多条新闻、特写、通讯、专访、侧记、花边、花絮,实现了场内外、正侧面、多角度、多样化的目标。其中,“看毛主席和人民代表一起投票”的小特写,是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赵超构同志出的题目,他看了晚报上刊登我发回去的大会旁听记(听周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后说:“再写一篇看毛主席投票。投票一结束你就赶去发稿,只要六百字就行,当天见报!”可后来大会日程变化,投票选举排到下午。我分析新华社不会抓这个角度,还是当即在会场里写了一篇小特写给赵超构同志看:“老将,你看还发不发?”他笑着说:“发!这是一条独家新闻,日报不会有。”果然,第二天上午日报上没有。新民晚报以《欢乐的掌声响彻怀仁堂》的标题加框刊出。遗憾的是删去了描写毛主席形态、神情、动作的文字。但是就这样,北京的同行见到后还半开玩笑地说:新民晚报抢新闻果然厉害,胆子好大,都抢到毛主席身上去了!在我们眼鼻子底下抢走了两条独家新闻……他们说的另一条独家新闻是指“梅兰芳入党”。当年,“抢新闻”可不是个好名声,因此我也半开玩笑回答:不敢抢,不敢抢!只是百花齐放稍为放了一点吧!那条“梅兰芳入党”还是捡来的。弄不懂,好好的一条花边新闻,怎么搁在那里没人要!

不过,因为同行的议论,加上编辑部删稿,我也确实不敢“胆子好大”了。大会快闭幕的一天下午,代表、委员们趁会间休息,在怀仁堂外三三两两聊天。我正在拍照抓花絮,忽然人们朝同一个方向欢呼:“毛主席来了!”顿时,不管警卫人员如何劝说、拦挡,代表、委员们还是涌动抢前,有的喊口

号,有的抹眼泪,兄弟民族的代表们还忙着整理服装……我当然也非常想靠近看看毛主席,却又连连告诫自己:退后点,别挤着老人家!我甚至退到一条支甬道上。然而,正如俗话说的好,好运来了躲也躲不掉。万万没想到,毛主席竟转身往这条甬道走来,和我们这边的人一一握手,问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激动中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新民晚报……我是记者……问您好!……”话没说完,警卫人员已护卫着毛主席走过去了。我只见周瘦鹃戴着墨镜,捧着毛主席大手不放,嘀嘀咕咕讲个不停……我回到招待所,兴奋还没过去,胡平高兴得拉住我的手又握又摇,又催我:“快写,快写!”可我想来想去,竟没有动笔。我估计,编辑部不会发。——那年头,如果文章被视为“不严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更不必说到以后十年动乱中,会多加上多少个罪名,增加多少次批斗呢。但是,那年头人们对伟大领袖的尊敬热爱,也确实确实是出于一派至诚,一片挚情。所以当完成报道任务回到上海后,应报社黑板报总编辑的要求,我还是满腔热情地写了一篇唯一没有见报的报道《毛主席和我们握手》。以致多少天后,还有同事要和我补握一下那只和毛主席握过手的右手。(原载《我们的脚印》第三辑)

我的广播缘

——兼忆上海台创办新闻评论二十周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新上海同庚,今年欣逢五十大庆。我作为上海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从上海解放当天开始的半个世纪中,与广播的缘份前前后后,越来越深,大致有三个阶段,占了十四个年头。

1949年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事先通知,我在联络点待命,不断收听广播。上午大约九时,听到电台播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我热血沸腾,抚摸着老式RCA收音机,喜泪湿衣襟,从此,对广播有了特别的感情。

1952年到1954年,我步入结广播缘的第一阶段。当时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当政法文教记者,向上海各媒体提供消息、通讯、照片等新闻作品,在报纸上发表文字多了,习以为常,渐觉平淡,不似初当记者时那样会感

到新鲜激动。1953年宣传《婚姻法》,我到国棉七厂蹲点,采访典型的人和事,连续发回几篇通讯,由新闻处具上记者姓名,发给各新闻单位。一天中午到大食堂进餐,发现领菜的人群边排队边凝神听广播,有几个同志含笑指着广播喇叭向我致意。我莫名其妙忙仔细地听,原来女播音员正在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播送我的一篇通讯,讲述国棉七厂一青工拒绝父母之命,学习《婚姻法》,坚持自找对象的曲折故事。我没有想到,这篇不到两千字、在报纸上并不特别显眼的社会新闻,在广播里听来竟变得如此动人,我自己也被感染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要重视广播这一别具魅力的新闻工具!”以后,我就特别关注给广播电台发稿,经常聆听广播节目。这可算是我从作者和听众角度结上广播缘之初。

第二阶段在1954年到1956年,我的岗位调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广播出版处,组织上正好分配我担任广播科负责工作。于是我经常走进北京东路2号,访问学习,调查研究,列席会议,上下联系……我在大学新闻系学到的有限的广播知识,开始有了感性体会,并与广播人交了朋友。可是,我的广播缘刚有了发展,却又因为调往《新民晚报》而中断。

一晃到了七十年代。从1972年起,进入广播角色整九个头头,这才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的广播缘。是为第三阶段。

九年中的前六年,我因为在《新民晚报》被作为“走资派”而打倒,报社被封闭后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打工佬”,整天运转“看稿机器”,少儿节目、青年节目成了我的主要工场。身在广播心挂晚报,经常感叹“寄人篱下”、“前途茫茫”,谈不上为人民广播事业添砖加瓦。但是在这段逆境苦缘中,患难得知交,却和电台不少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心照,相濡以沫。直到今天,虽然久违无隔阂,宛如昨日才分手,是我记忆中难忘怀的温馨一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我也得到平反,心态大变,很想重新开始,对广播事业有新作为,弥补失去的光阴。正好此时,我被任命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新上任的台长邹凡扬同志也在重振旗鼓,大力开创上海台的新局面。于是,一项在全国广播界有影响的改革目标定下来了:建立新闻评论节目。分工由我负责,进行筹备、设计、策划。

当时,我对广播的性质特点虽然已有所掌握,也于五六十年代在《新民

晚报》接触过面向群众的评论写作,然而,要在广播中播出电台自己的评论,可是第一次吃螃蟹,心里无数,不知从何着手。我告诫自己:事在人为。

新中国的广播和报纸一样,是新闻媒体,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发挥舆论工具作用。然而历史上,人民广播电台包括后来新兴的电视台,都播新华社和报纸的评论,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当此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上海广播推出自己的评论,自然大有意义,也是十分必需的。当然,困难不会少。究竟搞什么样的评论?怎样搞?有没有条件搞?一时议论纷纷,百家争鸣。

我们首先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广播的特点,又吸收晚报言论的长处,提出了四十字方针,即:坚持体系(马克思主义体系),实际出发,表扬批评,题材广阔,由小见大,不拘形式,面向听众,生动活泼,亲切谈心,自成风格。此方针经讨论通过,得到党委批准。

同时,在电台内部挑选和后来补充了有志于开展广播评论的同志六人,建立了评论组,直接由我分管领导,担负选题、组稿、编发等业务工作。

接着,发动台内外力量,撰写广播评论稿。内部要求台长们带头示范,外部发扬“三顾茅庐”的精神,约请新闻、杂文界名家参与、支持。

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1979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仅隔数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节目中打出了《本台评论》栏目,播出由邹凡扬台长撰写的第一篇广播评论。当时上海社会上有人公然诽谤毛泽东同志,出现大幅反革命标语,声言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甚至秘密与特务机构联系,策划破坏活动。本台评论以小平同志讲话为武器,理直气壮、尖锐泼辣地给予回击,提醒广大群众要有警惕性。广播有了自己的声音和态度,当天就引起同行和听众的热烈反映。

播出《本台评论》后的次日,紧接早新闻节目之后,播出五分钟的新闻性评论节目《广播杂谈》,第一篇请复旦大学公今度同志撰写,题为《也是一种未来学》,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巧妙阐述不要做申公豹,要向前看,总结过去,抓紧现在,展望未来。听众反映抓住了思想,题材新,见解新,欢迎这样的《广播杂谈》。此后,明白流畅,合乎广播特点、别具一格、又为听众喜爱的杂文味的千字文,陆续播出了不少,体现了有理、有情、有味的风格。一些名家也乐意为《杂谈》撰稿。一次新闻界前辈林放同志听到电台广播

他的杂谈《多谈些社会问题,宣传好社会主义》后,高兴地说:“为广播写评论,想不到有这么好的效果!”后来他把此文在1981年《新民晚报》复刊试版上又发表一次,还收入杂文集《未晚谈》中。

在播出上述两个新闻评论栏目同时,又先后在不同时间设立10分钟的思想评论《广播漫谈》、《星期文谈》和《家常话》。我用“俞晴”笔名在《广播漫谈》上探路,写了《发扬人梯精神》,和青年人亲切谈心,鼓励他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继往开来,不断攀登。青年学生听后给我写信,表示认同,要和“俞编辑老师”交朋友。《家常话》,顾名思义是与听众谈家常。这档节目发扬“文革”前谈话节目《阿富根谈生产》的特色,用沪语广播,很受里弄妇女、中老年听众欢迎。

1979年春天开办的这些广播评论节目,被同行誉为“一炮打响”,是上海台开创评论工作的“第一批成果”。同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党委责成我总结评论工作。我写成《广播要有自己的评论》论文,准备发言。这次会议前后,广播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思想活跃,强调胡乔木同志在1949年北京解放后提出的“要自己走路”,梅益同志在1964年提出的广播“能有自己的评论和采访力量”,因此对上海电台的这个发言相当注意且给予肯定。会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即来约稿,我便把那篇论文用“上海电台评论组”名义给他们(发表在1979年第二期)。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地方台也办起了自己的评论节目。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同志们一起筹划和建立广播评论,苦心经营三个年头,是我广播缘中的重要一环。1981年秋天,我奉调回《新民晚报》筹备复刊。以后,广播评论有了新的变化。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评论工作始终坚持了下来,有的还办成领导肯定、听众欢迎的栏目,我听到后很是高兴。衷心祝愿上海电台的评论日新月异,长盛不衰!

(原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辉煌的足迹》)

新民晚报复刊前后话中兴

——兼忆设计地方新闻版和《蔷薇花下》

二十年前,我刚“知天命”,进入新闻圈却已有三十年。其中,三分之二光阴与新民晚报共苦同甘。

十年探索 十年反思

从1956年调到晚报当编委,后来任副总编辑,这头十年中,我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党中央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学习研究赵超构晚报学说,“脱鞋下田”,从事第一线采访实践,探索创办社会主义晚报的经验。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地方新闻基础上,着重摸索晚报如何报道党的中心任务(现在叫做主旋律报道)。花了三年工夫,和政法、经济、教卫记者一起,实践成功,总结出一套晚报“中心报道多样化”的经验,解决了作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晚报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老大难问题。市委宣传部要我在上海市新闻界的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不久,我兼任组长的政法教卫组(部)获得了市文教群英会先进集体称号。这十年中,新民晚报在党组和以赵超构总编辑为首的编委会领导下,实践、总结、再实践,于六十年代系统总结出新民晚报的基本经验,办社会主义晚报开始取得成功,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进入全国第一流报纸的行列。

1966年,“文革”开始,新民晚报被封闭。我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彻底批判”。但是,真理越辩越明,坏事转化成了好事。在个人反复学习、反思中,进一步肯定了新民晚报前十年的成功实践,并进而认识到社会主义晚报的规律。要言之便是:共性与特点相结合。寓社会主义党报的共性,于晚报的特性之中。要吃透“晚”字。思想一旦进入了这个阶段,劫后余生的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再办一回晚报,理性地按照晚报规律来办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会后不久,我结束了在电台的“打工生活”,由市委任命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主管评论,以后又兼管新闻采访。于是,我逐步把适合广播用的晚报经验移栽过

去。试办“有声晚报”。正当此时,喜讯传来,封闭达十五年之久的新民晚报,决定复刊了!

1981年夏天,我调回新民晚报,参加筹备复刊。我再办一回晚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复刊——新民晚报的中兴

晚报复刊,是新民晚报的中兴。一块经过两代人几十年耕耘的新闻园地,一个在党关怀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一套已经成型了的新中国晚报学说,一支在继承、创造、挫折中锻炼出来的晚报队伍(加上新增加的第三代人),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重振旗鼓,大展宏图。这当然不会是1966年的简单重复。事物发展从否定到否定,呈螺旋形上升。这是一种提高,一种成熟,一种再创业。在如火激情推动下的晚报中兴,在报纸、报业两方面交叉发展。你我他都听到了吧?多少晚报人多少老读者在评论:从办报纸来说,新民晚报复刊后的头几年报纸,内容、风格、面貌,各方面都在出新,在精办、耐看、有特色,是吸引人的华彩乐章;从报业发展来说,进入市场经济发展后的这些年,如鱼得水,挥洒自如,兴旺发达,鲜花着锦之盛,是一道辉煌的风景区。这些评论,如何听,如何理解,很值得我们思考。

然而在筹备复刊的当时,这些还都是远景。老同志们都有一段珍贵的记忆,物质条件虽然那样差,吃饭、办公用房、交通、取暖、降温全是问题,但是人人心情舒畅,怀着必胜信心,做好自己分担的那份工作。我担负的先是物色和培训新记者新编辑任务。一方面跑大学新闻、中文等文科各系,挑选毕业生,费尽了口舌;一方面对招聘来的人才进行实战出发的业务测试和培训。有趣的是,从此我得了一个新称呼:周老师;而这批当年的新生力量、如今称为“新老晚报”的同志,至今还有人记忆犹新地说:那些培训班太厉害了。不过,晚报因而有了很棒的第三代,值!

设计地方新闻版 建立社会新闻系列

我的另一份筹备工作是设计地方新闻版。赵超老指出这是重点版。请政、经、群三个采访部门和原四版老编辑同志一起畅谈,形成方案后由领导小组拍板。指导思想主要有这几条:第一,明确一、四版分工,四版体现社

会性特色 ;第二 ,保持四版原有“陈派”——陈亮风格 ,恢复原有优秀专栏 ;第三 ,开辟新的小言论专栏。陈亮同志强调要有专人撰写 ,保证质量 ,并在许多栏名中选定“谈家常”这个名字 ;第四 ,着重创造社会新闻系列 ,增加广度、深度和共同兴趣。除多发新鲜及时、群众喜闻乐见或突发事件等社会性消息外 ,每天要刊出体现“有头有尾有情节 ,活人活事活道理”特色的社会故事(通讯)。按照正面为主的报道思想 ,“系列”共分五个层次 ,设立五个新专栏 :即 :颂扬社会生活中先进人和事的《上海佳话》 ;反映人们思想行为从后进转变为先进的《社会故事》 ;针砭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和习俗的《蔷薇花下》 ;坚持正义批判错误行为的《社会法庭》 ;廉正执法 ,惩办犯罪的《法庭内外》、《公安战线》。大家戏称为“社会新闻系列五层楼”。其中 ,《上海佳话》与《蔷薇花下》是重点。

《上海佳话》是社会新闻中的主旋律 ,宣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也就是老将赵社长说的“红色社会新闻”。所以确定这个专栏时 ,我专门去请他取栏名。第二天老将笑嘻嘻来到我们开会的地方 ,谦虚地说 :取名“上海佳话”好不好 ?你们不满意就用别的好了。“好 !”大家一致同意 ,就定下来了。以后这个专栏的社会新闻 ,大家精采精编 ,特别用心。顺便说说 ,我从岗位上退下以后 ,这个专栏不知什么原因消失了 ;再后来 ,出现了一个“申城佳话” ,也不知是如何产生的。其实 ,继续办好“上海佳话” ,有什么不好 ?起码还可以留点对老社长的纪念吧 !

名牌专栏“蔷薇花下”之小传

《蔷薇花下》是当年地方新闻版社会新闻系列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专栏了。至今已连续刊出十八个年头 ,天天见报 ,花了几代专栏编辑多少精神 ,真不容易 !读者调查时几次把它誉为晚报最好专栏、第一专栏 ,可见受欢迎。

《蔷薇花下》前身 ,是“玫瑰小集”。五十年代末我以政法组名义 ,商得唐大郎编委同意 ,在副刊《繁花》上开辟了这个讽刺小品专栏 ,目的是移风易俗 ,由组里几个同志编写 ,美术编辑插漫画。复刊设计时便把它搬到地方新闻版 ,强调群众性和真实性 ,并定“蔷薇花下”名。取意蔷薇处处开 ,繁花可供观赏 ,花下带刺 ,以针砭不良现象和坏习惯 ,促进团结 ,共建精神文明。

“蔷薇花下”,可能比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更适合飞入寻常百姓家。“蔷薇花下”专栏,一开始就确定采用群众来稿,但必须由记者编辑精办。当时主要由政法、经济、群工三个采访部门指定记者选稿、核实、补充、改写,再向四版——地方新闻版供稿;四版设一编辑专门文字处理并组织插图。我在岗位上的那些年,每天负责审阅,签发小样。所以,有同志说“蔷薇花下”是我留在社会新闻版上的“孩子”,倒也不是虚报冒领。从创意、创办,到定方针、定方法,培养性格、风格,直到稿件上版面……实实在在花了许多心血。现在“孩子”在叔叔阿姨们的培育下年满十八,长大成人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当然觉得欣慰。不过有时也曾感慨地说起,“孩子”似乎有点不认“娘”,连得奖、出集子也不告诉一声。一位老同志开玩笑说:“谁叫你当初不申请知识产权的专利?”专利这新玩意儿,复刊当年确实还没听说过,更不会想到去申请,但这番玩笑话倒提示我要多说几句,不妨立此存照,以免将来真的有“产权之争”时,死无对证——但愿此文的编稿、审稿诸公,勿把这段废话斧削掉,幸甚,幸甚!

为做新民晚报人自豪

新民晚报复刊以来十八年,正逢盛世,是办报的黄金时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影响遍及国内外。1987年,我应邀访问美国,在俄亥俄大学传播系讲学,就介绍了新民晚报。当我讲到日发行量已超过一百八十万份时,那些洋大学生们抬起不同发色的头,睁大深浅不一的眼睛,惊讶地纷纷提问。他们对中国晚报,对上海的地方新闻,对“红色社会新闻”,尤其感到兴趣。而在报社内,这些年报业大发展,经过几次扩版,地方新闻版已经从一个版,变成了现在的七八个版面。虽然遵照国家制度,我已离职休养,没有条件再直接为晚报出力,但是,几十年的积习难改,人休心不休,还是要关心晚报,研究晚报。这几年,我被聘为全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每当评选好新闻的时候,每当分析晚报经验的时候,接触到新民晚报的成就和发展,总是为自己属于新民晚报学派,是个新民晚报人而欣慰而自豪。目前,正在策划撰写《中国晚报学》,我想《新民晚报》的成熟经验,理应吸收到这部学术著作中去。(新民晚报《我这二十年》1999年6月28日)

痛悼亲人 追忆战友

——徐震同志生平记略

书桌上摊着一份粗黑字体的讣告：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著名杂文家、教授、中共党员徐震同志（笔名公今度）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6月8日凌晨零时30分在上海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我再一次面对现实，我至爱的亲人、四十余年风雨同舟的战友已经与世长辞，永远不会回来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初夏午夜，医院的心脏监护仪上，徐震同志的心电波从不规则的“颤动”，转为节律整齐、快速的“图形”，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瞬间变成了直线。5秒钟，10秒钟，1分钟，10分钟，屏幕上再也没有出现波形。一颗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痛彻心肺。

我憎恨5月中旬那个黑色的周末。徐震同志几年来养病在家，4月19日因突然昏迷急诊住院，经抢救后苏醒，又经过三个多星期治疗，由昏迷引起的并发症在逐步好转，高烧渐退，应激性溃疡出血也一点点减少，已经能够进食。从来不愿意住医院的他，已经在问我何时回家。5月15日星期六下午，我刚喂他喝完牛奶稀饭，我妹妹来探望，他很高兴，听着我们说话。忽然，我发现他的嘴唇发紫，急查鼻中氧气管，发现墙上供氧装置已停止。急忙找护士长，她向供氧中心紧急联系，约摸七八分钟以后，供氧虽然恢复，但病员的脸色却越来越不好，问他，他连连表示难受。急请医生，给打了一针，他似乎睡着了，叫他不应，是不是又昏迷了？赶紧再找大夫，刚上夜班的女医生来检查，放下听筒便作心脏按摩。忽然，徐震同志呼了一口气，便停止了呼吸。顿时医护人员忙作一团，好几位主任医师赶来紧急抢救。意外的变故吓得我魂飞魄散，我被架出病房，几个小时后才被告知：徐老师心跳已稳定，要继续做人工呼吸。我当时并不清楚事态严重到什么程度，满以为电子呼吸机可帮他恢复呼吸，现代医学可再次让他化险为夷。谁知道，那个氧气事件竟导致他再也没有醒来，那个黑色的周末竟成了他和我永诀的时刻！

5月15日以后,整整二十四个昼夜,我和孩子们守护在他身旁,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动静,盼望他一觉醒来。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跳有力,面色红润,呼吸均匀,不吃不喝,犹如沉睡。然而每当猛想到这些现象全靠机器和药物在维持,猛想到他已经是一个停止了呼吸多天的人,我的心里便如刺入一把钢针,浑身发抖。我的泪流干了。可我总还是苦苦等待,等待万一的希望,等待医学的奇迹。

在那痛苦等待的日日夜夜里,我在他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央求他回来,帮助他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现在的欢乐和忧愁,我希望拿他自己一生的故事和我们的爱情唤醒他!

青春年华——理想与热血

1949年10月,我刚从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新的学习,新的生活,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天,系里几位地下党员聚在登辉堂前的大草坪上,欢迎我这个新同志。刚开始,又来了位一头浓密鬃发、额上显出深深皱纹的男同学。他动作敏捷,无拘无束地坐到我的旁边,笑嘻嘻地自我介绍:“我叫徐震,东海徐,震撼的震。”主持聚会的小组长忙解释:“他是随暨南大学新闻系合并过来的,在昆山家乡参加地下党,解放后当了乡长。组织关系还没有转过来。”哦,是个农民党员,怪不得这么黑。然而,我的判断迅速被否定了,另一位同学补充:“他这个乡长不会种地,只会拿笔,是我们二年级的诗人、才子……”他忙打断:“新同志初次见面,不要开玩笑好吗?”接下来大家作自我介绍。轮到他时,他先讲暨大同学与“暨大之狼”——特务谭家瑞的斗争,又讲昆东游击队剿匪的故事,从昆山到上海,从国内到国外,侃侃而谈,知识广博,充满激情,把大家都吸引住了。我不由心里感叹:大学里真有人才!

以后,在新闻系的时事晚会上,在他们年级出的板报上,在课余文体活动中,在一起复习外语过程中,大伙进一步熟识了这位才华四溢、学识过人的年轻人。一次他为新闻系两位代表竞选学生会委员而写了首快板诗,那夸张的比喻,诙谐的诗句,流畅的韵味,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掀起热潮,至今还有老同学能背诵出几联来。

1950年11月,我被调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临行前一天,他送我

两本精装的俄语书,在扉页上精心抄写了一首伊萨柯夫斯基的长诗,又盖上他自己刻的带有党徽的名章,鼓励我要忠于人民,去为祖国创丰功伟绩。他又约我到新闻系小楼阳台上话别。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们感受到离愁,又有愉悦,我至今记住他那两句话:“我们人虽分离,而心更贴近了!”以后,每当我经过那座小楼,心里总是涌起温馨美好的回忆,而如今,屋角夕阳,小楼依旧,人却永不再见,怎不令我痛断肠!

1953年10月,我们结婚后,各自进入了繁忙的年代。我辗转在上海新闻界,他却一直在复旦大学拼搏。毕业后教书,办校刊,当团委书记,当新闻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后来又担任了校党委宣传部长,其间又不时带学生下厂下乡办学,以大队长身份和教职员们一起下放农村劳动……繁重的任务,紧张的节奏,长期睡眠不足,很少有星期天,从来没有完整的寒暑假,他爱好的体育活动取消了,电影少看了,诗不写了,箫不吹了,收音机不拆了,图章也越刻越少了,唯一坚持的爱好只有见缝插针地读书和写文章。解放前他曾患肺病,解放后生活安定,肺病治愈,人开始发胖,“胖子”的雅号成了同志们对他的爱称。他表面上虽然总是精力旺盛,使不完的劲,但长期超体力支出,毕竟损害了健康。三十岁不到的他已经得了高血压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吐血病倒。不满四十岁,浓密的鬍发就开始稀疏并慢慢变直。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然而作为他的亲属,怎会看不到潜在的隐患呢。有一阵子学校党委晚上经常开会到下半夜。一次我贸然打电话去问,会议主席当作笑话,生了气。可他不明白,当头头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时候,他的部下却仍要早起去贯彻执行会议决定呢!那次“电话笑话”以后,徐震同志对我千叮万嘱,血压再高,会开得再晚也不要去找他。我照办了。可现在想来,人们对干部的爱护不是应该看得远一点吗?而我对他的干预照料实在是太少了,否则,也许他不会一病而不可收拾。

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熟读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讲的是理想,贡献青春。徐震同志以火样的热情身体力行,并且带动一批学生、团员前进。当年的团干部们常告诉我团委书记做报告的热闹,说他讲演内容丰富,从不说教和拿腔使调,语言生动,鼓动性强,听得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不大相信,有一次就偷偷混在同学们中间,听他做爱国主义的报告。我被青年们的阵阵掌声和欢笑感染,心头发热,想不到他讲演的本领提高得这样快,他那并不

昂扬却略带沙哑的嗓音 ,还真有不小的吸引力。然而 ,正因为他能讲会写 ,害得他在“文革”中多了一条罪状 ,叫做“破笔利嘴” ,大会小会批斗不够 ,一家造反战报还专门出了个批判专页 ,广为散布 ,要让他“臭名远扬”。

徐震同志基本上是双肩挑干部 ,他做政治思想工作总是和教学业务结合起来。他信奉和贯彻党的又红又专方针 ,长期言传身教 ,并不时从实践中提炼出新鲜观点 ,总结新鲜经验。他在新闻系、中文系倡导的“两典一笔”便是一例。他认为文科学生在深入生活实际的基础上 ,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 ,掌握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要读些中外古典名著 ,增加文学修养 ,借鉴语言文字和表达技巧 ;他还极力主张文科学生练好一支笔 ,要提得起 ,写得开 ,铺得开 ,收得拢 ,挥洒自如 ,倚马可待。在他的“两典一笔”见解指导下 ,确实培养出不少人才 ,特别在他专注心血蹲点的那些班级里 ,他常为大面积丰收而欣喜万分。我不止一次听他赞扬他那些得意门生 ,并戏称谁是奇才 ,谁是怪才 ,谁善开拓 ,谁较稳健 ,个个都是有用之材。可又谁知 ,这个“两典一笔论”又成了“文革”中的重点批判目标 ,罪名是“修透了的黑货” ,“打着红旗反红旗” ,“白专道路”等等。

风狂雨骤——摧残与生活

说到徐震同志在“文革”这场浩劫中的遭遇 ,当年在复旦的不少师生至今记忆犹新 ,他在学校首当其冲 ,和苏步青、胡曲园等老师一起被“自己人”“抛出来” ,横遭诬害 ,倍受摧残。就在他逝世后的这些天里 ,许多老师还对我说 :“没有‘文革’中的身心严重受摧残 ,他不会这么英年早逝 !”那时候 ,光“宣传部长”和“杂文作者”这两种身份 ,就足够挑起人们的“怒火”了 ,而他讲演多 ,文章多 ,加上“公今度”、“丁艾”这两个笔名的风波 ,“批判”的材料实在被提供不完。于是一个晚上 ,东南西北一齐动作 ,对徐震同志贴出了十七个教室的大字报。几个星期之中 ,家里被抄十多次 ,直到书架上只剩下马克思主义作家们的厚本本和一部鲁迅全集。连我们之间的信件和私人日记也都被当作宝贝抄去展览示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上的污辱 ,深深伤害了他的心灵 ,而惨无人道的武斗和关押 ,则直接摧残他的躯体。他的血压常高达 250/130 ,他的心室已经扩大劳损 ,他在地下隔离室里不停吐血。尤其是“文革”初期那次盛夏的武斗 ,丧尽天良的混蛋竟用铅丝吊了几十斤

重的大阴井铁盖,挂在他的后颈上,害得他满眼一片漆黑,头垂及膝,事后整整一个星期,他头颈不能竖起,进食要用手托住下巴。以后长期颈痛颈无力,头发猛脱。后来,双脚无力,走路不稳,经常跌倒;再以后便发生直立性低血压昏厥,不会走路,不会站立,不会写字,不会出汗,语言障碍,生活不能自理。最后,神经科专家诊断他患的是“多系统神经(损伤到)变性”的恶疾。追踪他最早的病根便在身心受到严重的反复折磨与摧残上。尤其是那次颈部受伤,怎能不损害到通过颈部的多系统神经呢!令人伤心的是,他多年费解,常和我谈及,那些人究竟用什么重铁器几乎折断他的头颈?直到今年5月间他在医院再次昏迷之后,市委一位姓陈的干部追述目击那次对徐震同志残酷武斗的情形,我才知道他多年弄不清的沉重铁器,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大阴井盖。我听说此事后,站在他的病床边,千呼万唤,希望他哪怕再醒来一会儿,让他知道致命的病根子。然而,他什么也听不到了。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都有体会,除了难以忍受的批斗,便是难以忍受的被剥夺工作权利。徐震同志也不例外。复旦大学是十年浩劫中的重灾区,情况错综复杂,他既是最早被抛出打倒的干部,后来又曾被牵连到一个由在押反革命派遣特务荒唐编造的大冤案中。当时的“专案人员”一不懂解放战争时期的蒋管区情况,二不懂地下党的斗争特点,反被真正的反革命特务牵着鼻子摸黑好几年,中了敌人阴谋奸计,害苦了一批坚定忠贞的革命干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徐震同志虽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据理驳斥,决不胡乱承认,但是他久久不得“解放”。

批斗之余,没有工作的他是怎么度过那漫长岁月的呢?除了利用残存的书架重温经典著作外,他反复七遍熟读鲁迅全集,认真研究鲁迅的作品和为人,意外地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是一个鲁迅爱好者成为一个鲁迅研究工作者。粉碎“四人帮”后,他担起了中文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工作,写出了《人的鲁迅》论文,被选为代表上海的作品,送往全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那年代,我先是被关牛棚,早上6点钟出门,晚上10时以后回家,后来又去五七干校,家里的老保姆也被赶走了,四个孩子都还年幼,徐震同志承担起照顾孩子做家务的任务。他特别关心孩子们因父母遭劫而受伤害的心灵,反复教育他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告诉他们爸爸妈妈都热爱毛主席热爱

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好人,不是坏人,让他们放心。他给他们讲满肚子的故事,教他们下棋、画画、长知识,夜晚他常让孩子们围桌而坐,给他们讲读鲁迅的散文、杂文和书信、小说。孩子们最近回忆起那些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时说:“你从来没有耳提面命地逼迫我们学习,然而你博览群书的习惯,在家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使我们兄妹四人得以在心智上健康成长,在‘四人帮’垮台后顺利考入大学深造。”

“文革”前长年忙碌惯了的他,对于赋闲的生活总是觉得浪费光阴。他苦中作乐,什么都想学一点。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本菜谱便学烧菜;买了几样理发工具,拉住儿子做试验;找出些旧印章,刻了磨、磨了刻,乐此不疲;他还搜集旧钟旧表来拆修……我从五七干校月休回家,看到满桌子石头、刻刀、旧钟表,和他开玩笑说:“你变成了真正的杂家,可以去摆刻图章、修钟表和自行车摊了。”他笑着说:“凭这些手艺可以养活老婆儿女呢。”我们也曾认真地谈论过今后生活。遭冤受难只是暂时的,相信党最终会解救干部,不正常的生活终究要结束,但万一境况还要恶化,如果被赶出上海,那就能上能下,到家乡小城中去当小学教员,把小孩们教育成人。后来这些想法又被批判为“修到底”的“三小”。

老树新芽——成熟与焕发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徐震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已被彻底推翻。他经过严格的自我解剖,也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思想上更成熟了。他被禁锢了十几年的精神重又焕发起来,老树发新芽,他又似饥如渴地投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常说想干好多事情,以补偿失去的时光。那时他调到教学部门,担任文科处长、副教务长,一心想重振复旦大学文科雄风。多年来,文科校舍陈旧,极少新建,他努力呼吁奔走,在学校和国家教委的支持下,终于盖起了第一座全新的十二层大楼,为文科各系师生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在广大师生努力下,文科各系、所、室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累累,使人耳目一新。

1983年秋季,徐震同志调任新闻系主任。他团结老中青同志,共同努力,经过几年以建设为主的新闻教育改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更新观念,新闻系由原来一个专业发展到四个专业,评定了一批教授、副教授、讲

师,并由他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新闻系系列教材,共七本。他自己也进教室开杂文课。1988年夏,各种条件具备,水到渠成,筹建成立了新闻学院,徐震同志为首任院长。新建的新闻学院成为我国基础较好的新闻学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徐震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他主持新闻系和新闻学院工作期间,又兼任了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接待过美、英、法、德、日、澳和我国香港等许多国外、海外的专家学者,并逐步开拓师生向国外、海外访问、交流和留学的基地(机会)。他自己也多次应邀出访美、日、澳等国,从事学术交流活动。他还主持重点科研项目《跨文化传播与四化建设》,受到美国东西方中心的重视,一再邀请他去访问,要求合作,由于他工作繁忙和健康原因,始终未能成行。改革开放以来,徐震同志的教学工作、学术活动和论文、创作作品在国际上产生影响,1988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大辞典收入徐震教授条目。

八十年代,徐震同志除担负大学里的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兼任了不少校外学术职务和社会工作。他是全国马恩列斯研究会干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首届理事、全国新闻教育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三S研究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上海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等。

公今度杂文——使命与情结

对于一个“文革”中的幸存者,身上已潜伏有恶疾的人来说,校内外的
工作负荷不算轻了。我常劝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拼搏了。可他总是宽慰说:“身体还可以,多干些事情心里倒舒服。”这样,在一个肩膀上挑着教育科研重担的同时,他硬是在另一个肩膀上又压上文艺创作。他对在“文革”中被抄走遗失的二十多万字小说稿,心疼了多年。他认为写出反映上海学生运动的作品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一直想重新写出那半部小说,并完成它。然而,重写开了头,实在腾不出整块时间,他便改变决心,从实际可能出发,见缝插针,重新写杂文,仍用公今度笔名。“你不怕再挨批?”好些亲友为他担心,他笑笑:“不怕!大风大浪经过了,里里外外都批透了,还是有的小将说得在理;‘公’,毕竟是‘今’日的制‘度’嘛!”

每当星期天,吃罢早饭,他就歉疚地说在我前面:“现在假日都不开会了,让我写篇杂文休息休息,别打扰我好吧!”他动笔前想得多,写到纸上就很快,千字文一两个小时完成。有时候写得意,便兴高采烈,硬要我马上看,说他来动手烧个好菜给大家吃。有时候他不声不响,关起书房门,一上午写两篇,我也对他无可奈何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不倦地写作?1985年他在《公今度杂文选》后记中曾说过,是“不想偷懒”、“如说得冠冕堂皇一点的话,那是因为被杂文作者——社会的哨兵和党的政策的啦啦队的责任所驱使的罢!”去年春天,他在《瞭望周刊》上发表的《追忆林放》一文中,回顾自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写作心情时说:“我为了弥补失去的光阴,以每年发表五十篇杂文速度向前猛赶。”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但据我看来,写作也是他的一生爱好,难解的情结。直到九十年代初,他脑病加剧,恶疾的综合症状已很明显,双手不能握笔,讲话已不清楚,生活不能自理,但他仍凭着大脑尚未受损,思路仍然敏捷、清晰的条件,顽强搏斗,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每月坚持作文两篇。他总是坐在藤椅里,默默想题目,打腹稿,然后请我逐字记录,再经他看后稍作修改定稿。一篇稿子常常要花一天时间,甚至两天。去年获得中国青年报一等奖的《谁怕谁》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在他重病后的几年,除了看报看电视,听广播,阳台眺望,听家人友人谈话,读亲友读者来信之外,活动面已经很小,写文章更成为他最大的乐趣。我不同意他多写,他便悄悄要求孩子们:“再给爸爸记一篇文章好吧!”那一个孩子答应了,他便高兴地笑。在给他记稿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前所不了解的情况,便是他口授的本领。把他讲的一字一句记下来,便是一篇千字杂文作品。我表示佩服,他便谦逊地说:“这没什么,熟能生巧罢了,我先打腹稿。”接下来又向我抱怨:“我肚子里还有好多题目,你怎不肯给我记!”唉,要知道他这么年轻便匆匆离去,我为什么要限制他呢!让他把想到的都写出来,让他多留点杂文给我们有多好!实在是后悔莫及了。

对于公今度的杂文,读者是喜爱的,他经常收到各地读者来信,给他许多鼓励。在杂文界, he 被列为百家、五十家之中;在错综复杂的杂文观中,《人民日报》同志称他为“正宗大道”。

杂文大师林放,在《杂文之味——序公今度杂文选》中说:“公今度的杂文就属于我喜欢读的一类,所以我这里用上‘欣赏’两字,欣赏它的杂文

味。”他认为杂文味首先是指有志针砭世俗,密切接触生活,又在于它文笔上的独特风格。他说:“公今度同志长期从事思想工作,从广泛接触的社会生活中抽取标本素材,有感而发,写作杂文,激浊扬清。而他的独有的婉转从容、轻快锋利的笔触又能胜任愉快地表达他对时代的感应。”

复旦大学的同志在介绍徐震同志生平时,指出他的杂文“题材广泛,言之有物,思路敏捷,见解独特,文笔生动,杂文味浓,引人入胜,催人奋进,深受群众欢迎”。

三中全会以来,徐震同志业余创作,共发表杂文600篇光景,在北京、广州等地多次获奖,并被收入全国、上海和外地的多种杂文选集。个人结集的有《魂兮归来》、《公今度杂文选集》、《冷板凳上的话》、《有花的蔷薇》(此集因经费原因至今未能印刷问世)。《公今度杂文选(续集)》原定去年编印,因他病情逐步沉重,至今尚未编完,所幸《后记》已经写好,我当按照他的遗愿,争取《续集》早日出版。(注:《续集》已于1995年5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衷心感谢 奉献余生

在我沉陷于极度悲痛的时刻,领导同志们,老战友、老同学们,国内外的亲朋们,以及素未谋面的读者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送来花圈、花篮、挽联、挽诗,深切悼念徐震同志。其中李岚清、李淑铮、金冲及、束沛德等同志,在百忙中不忘故旧的一片真情,我们全家深受感动。还有许多同志、同事、邻居,或者打电话,或者来家,或者参加向遗体告别仪式,并都向我诚挚慰问,使我和孩子们极为感激。我谨向所有悼念徐震同志和慰藉家属的同志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深情厚谊减轻了我的哀伤,也激励我要从巨痛中振作起来,努力继续徐震同志的遗志,为我们四十多年来的共同美好理想,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繁荣富强奉献我的余生!我想,徐震同志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赞同我的这个态度。最后,我向亲人、战友敬献挽联一副,也是我这篇文字的结束:

忆君当年为美好理想献青春热血才华四溢

叹风狂雨骤遂致英年罹恶疾

看公今日喜改革开放发老树新芽教文双挑

庆硕果花繁当可含笑赴泉台

(原刊《新闻记者》1993年第八期)

林放与广播

赵超构(即林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可以这样说,凡是喜爱《新民晚报》、喜爱杂文的读者,尤其是和他共事过的同志们,他的朋友们,一天也没有忘记他。我也写过一些纪念文字,赵超构同志那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而有独特风格的晚报学说,我曾称之为新中国晚报中的“赵氏学派”,不仅养育了《新民晚报》三代同人,而且影响广泛深远,具有普遍的意义。

赵超老热爱社会主义晚报事业,堪称一代宗师。他又热爱杂文,无愧为当代杂文大师。夏衍同志赞誉林放是继承鲁迅杂文光荣传统队伍中的宿将。他的“未晚谈”杂文专栏,早在五六十年代就随着《新民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与广大读者结为知心朋友。这在新闻界已是尽人皆知。但是,林放支持人民广播事业,曾和广播听众结下过一段“广播杂谈”缘,似乎还没有人提起过。

七十年代末,《新民晚报》尚未复刊,我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我们根据全会精神,决定在新闻节目里创办广播评论,我被分派主持这件事。和热情很高的评论组等同志一起,设计开办了“本台评论”、“广播杂谈”、“广播漫谈”、“星期文谈”“家常话”等一批广播言论节目和栏目。其中,伴随新闻节目开辟的“广播杂谈”,每天播出一篇六七百字的、有理有情有味的时事杂评。这在当时全国广播界绝无仅有,很引人注目。杂文上广播,为了打响这一炮,大家盼望有名家支持,要我去拉几位杂文家为广播写稿。

那时候,林放还在辞书出版社,给报纸写稿也不多,加之广播言论这玩意儿,他觉得从未写过,不好办。我不得不向他“宣传”广播如何迅速及时,直面听众,听众如何希望听到林放平易通畅的杂文;自办广播言论这一新生事物如何需要前辈支持等等,又软求硬讨加催逼,他终于答应动笔了。从1979年春天起,基本上没有中断,连上北京开会也“没有忘记为广播写杂谈的任务”。这样写了一年多。不少稿件如《有感于勒令》、《尊重人格》等,听

众反映热烈。而《多谈些社会问题,宣传好社会主义》一文,是他自己很喜欢的,在《新民晚报》复刊试版时又拿出来刊登一次,以后收入杂文集《未晚谈》。1981年我离开广播电台回晚报参加筹备复刊,后来电台停办了“广播杂谈”等言论节目,他也就不写了。

去年,我因搬家整理旧篋,发现林放同志那时期写给我的一些信件,其中有谈到广播这一宣传工具特点和写广播稿问题。现摘抄几段,以供有志者研究:

“……试写一篇,可能不合用,也无妨作废。我发现写广播稿比写报纸文章还难。一要开门见山;二要明白易懂,不能讲文言文辞藻。当然更要避免一般杂文中的那些弯弯曲曲的笔法。究竟如何写,看来还须摸索一下。你们将来有什么经验,也可赐寄给我参考……”

“……奉稿两篇,供选用。现在想写的题材确不少,但是写短却困难,一动笔就是千言,对听众总觉得有点歉然。(此两稿如可删节,即请删节,不必商量了。)听说杂谈也要出小本子,很高兴,对作者是个大鼓励。写的人觉得广播是“随风而去”,有点遗憾。有了黑字白纸,积极性要高得多了。当然要选一下,不要太严,也不要太不严……”

林放有个习惯,每寄一稿必附一条,发表一些他的看法。虽然是即兴写来,总是见解精到。我很遗憾,当时没有把他的所有附信都保存起来。否则,加以整理会是一份珍贵的《林放谈广播》。但即便光从上面摘抄的几段看,也能感受到一位新闻界前辈关心广播的热心肠和谦逊态度,他发表了对广播写作的真知灼见,就像一个老广播。他在分析广播这一工具“随风而去”的缺陷并表示遗憾的同时,又提出补救办法,直至具体到把广播稿印成小本子时“选稿不要太严,也不要太不严”,岂不令人感动!1980年,我们曾把那一段时期的各节目言论稿,编印过一本广播言论选《三十而立》,选文尺度就采用了林放同志那个辩证的建议。书名也用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

从林放信中,我们还看到了老作家始终把读者(听众)放在第一位的品格。他认为广播言论要短,对自己有时下笔写了千字文,便感到对听众“有点歉然”,专门附注,关照可删节。这对时下某些下笔空空洞洞数千言,不管

受众受得了受不了的作者来说,未知是否有所启迪?

(原载《新闻记者》1995年10期)

陈仲信烈士和他妈妈

——《火红的青春》读后

友人送我一本《火红的青春》,并嘱写点读后感。这是一本上海解放前中学学生运动史实选编。吴邦国同志在序言中指出:“书中对当时的一代中学生,在党领导和教育下的战斗历程、成长道路和党对中学生工作的经验,作了生动的多角度的记述和总结。”

诚如所言,打开这本厚厚的史书,一串串熟悉的姓名,一张张鲜活的面容,便争相跳入眼睑。我已到了发挥“余热”的年纪,却也属于当年的中学生,也行进在当时的战斗行列之中,因而,对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都是心灵相通,情感相融,要说说读后感,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终于,我的思绪停留在一个光辉的名字上:陈仲信。他是我们的同龄人,是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唯一一个光荣牺牲的上海中学生,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人民保安队队员。岁月流逝,记忆犹新。在我进入新闻界当记者以后,便去采访心灵创伤未愈的烈士妈妈,写了一篇短稿,还准备用笔为这位年轻的中学生战士立一个“纪念碑”。我十分后悔的是,没有及时去采访烈士生前领导和战友,没有及时把烈士事迹全面写出来。“文革”浩劫一开始,我在劫难逃。那多年保存的妈妈回忆儿子的血泪记录,和一张烈士遗像,也被抄走而下落不明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每当去烈士陵园,我总会在陈仲信烈士墓前默默伫立,内疚不已。现在好了,熟识烈士的地下党同志们,在《火红的青春》里,已提到了陈仲信。家庭经济极困难的陈仲信,凭刻苦学习,得到了上海建成中学的奖学金,并以优异成绩念完了初中。在地下党组织教育下,十六岁的他,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斗争需要,他毫不犹豫地考入贵族化的清心男中,去开辟这所沉寂的学校的学生运动,出色地领导了反对学校反动军训教官的斗争和开展“救饥救寒”运动。1948年秋天,他又转学到省吾中学,担任了地下党支部委员、高三年级级

长。并由党组织派到夜校里教书、教歌,发展工人协会会员。

1949年春天,十九岁的陈仲信挑起了人民保安队长宁区第二大队大队长的重担,在党领导下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5月24日,正当胜利已在眼前的时刻,陈仲信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被在苏州河北岸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枪击而牺牲……

当年我没有及时写出的东西,现在同志们已经为陈仲信烈士写下了一份精炼的简历,他的青春似火般燃烧。在我的脑海里,还有一点几十年前的烈士妈妈谈话留下的清晰的记忆:

1949年5月,上海人民心潮起伏,渴望解放。24日这天大清早,陈仲信买了一斤面条,匆匆赶回家,对体弱多病的妈妈说:“妈妈,上海快天亮了,我忙得没法来照顾你,你只好煮阳春面吃了……”妈妈见他累得又黑又瘦,眼睛也凹进去了,心疼地说:“阿信,你还没吃早饭吧,稍为歇一歇,我下点面条给你吃……”“不要了,姆妈,我还有急事要去办!”他边说边往外走,妈妈忙追到门口叫他,阿信,外面很乱,你可要小心啊,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姆妈,你不要担心!等我们的人进城了,我回家和你一起好好吃顿饭!……”陈仲信回头望了望还在倚门而立的妈妈,跨上一辆旧自行车匆匆走了。

他去的那么匆忙,是为了去给那边的人民解放军送一封急信。他骑了车子,刚到河边,对岸“乒”的一声冷枪,打中了阿信。他从车子上跌了下来,还“哈哈”笑了一阵才牺牲的……

读罢《火红的青春》,我仿佛回到了那火红的年代,久久不能平静。同时,我的心里也舒松了一些,这本书可以告慰陈仲信烈士,也可告慰烈士的妈妈了。

(原载《上海老年报》1995年4月21日)

半个世纪的思念

“壮烈未必在疆场——记身患绝症仍不辱使命的大使夫人叶兆烈同志”,《人民日报》转载5月7日《光明日报》的这篇长报道,详尽地记叙了叶兆烈同志忍着巨大的病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和对祖国外交事业的无限热爱,全部倾注到了外交工作和外事活动中

去的事迹。1997年10月30日,叶兆烈完成了江泽民主席访美代表团在华盛顿活动的接待、陪同工作,被癌细胞加剧吞噬的肌体日益衰竭,11月19日回国治疗,已无可挽回,12月2日逝世。面对她微笑的遗照,半个世纪的思念,三十多年的牵挂,三年来的期盼,一起涌上我心头。

叶兆烈同志,是我在上海民立女中的同班同学,也是中共民立女中地下支部里最后吸收的一个地下党员。1949年4月,上海已面临解放,上级党决定停止发展地下党员,叶兆烈就成为了我们十四个地下学生党员中的“小妹妹”。那时候的她,性格活泼,唱歌跳舞,很会联系群众,在群众文艺活动中宣传形势和党的主张。她自己学会了许多民间舞蹈,再教大家学跳,一批小同学总是围着她转。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个年级已面临高中毕业,一部分同学报名参加南下、西南下服务团,一部分同学找机会参加建设新中国,一部分同学响应号召去考大学。我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叶兆烈同志进了沪江大学。这以后,我们各忙各的,竟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她在抗美援朝时参加了军干校,留在了北京。

悠悠岁月,转眼二十年过去。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在“牛棚”里接受过两次难忘的“外调”。两个北方口音的造反派,第一次来,叫我写一份“叶兆烈是假党员”的交代。我坚决否认。写材料证明她是在民立女中参加地下党的。第二次他们又来了,横眉立眼,拍桌打凳,骂我包庇叶兆烈,气势汹汹地说:“已查清她是个假党员,偏你这个支部书记顽固,硬说她不是。你不老实,对你自己没有好处”……

我为她担忧,挂念她的安全。可一年又一年,又久久没有了她的消息。粉碎“四人帮”后,劫后重逢的同志们,互报磨难,互道平安,唯独没有叶兆烈的音讯。她在哪儿?我们还能见到她吗?直到1994年秋天,我到北京看望老同学,又谈起叶兆烈的下落,才由复旦一位男同学帮助打听到了:她在当驻美大使夫人。

我们松了一大口气!兆烈,不久,我请人捎给你一封信。1996年,我在家里接到你一个电话。我急急问你别后情况,你说第二天来看我,一切面谈!谁知,你和大使临时有事,改变了计划。你再挂个电话致歉,相约来年一定见面长谈。一年过去了,又盼了一年,正当我在传媒中得知你

在华盛顿参加历史性的外事活动,为你高兴的时候,万不料,没多久,你竟离开了我们,真的从地球上消失了!噩耗传来,悲怆难忍!近五十年的阔别,终未能畅叙,多么遗憾;三年的期待,终未如约,多么遗憾!我们将永远记住你青春年华的朝气蓬勃,我们永远怀念你!安息吧,我们地下党的“小妹妹”!

(1998年5月27日)

四明公所杂忆

上海南市区小北门外人民路上,耸立着一座红砖门楼,与对马路大境阁遥遥相望。这便是“四明公所”原址,已有二百年历史。五十年代,四明公所董事会请求人民政府接收后,所址先后改建为小学、中学和居民住宅。而这座独特的高大门楼,却由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原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生前建议,保存了下来,留作“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斗争”的见证。这些年来,在沪宁波人和海内外来沪游览的宁波同乡,常来这里观光瞻仰,缅怀先人互助合作、保护公所的精神。最近,上海宁波同乡联谊会和南市政协正在筹备纪念四明公所反帝斗争一百周年,更为这座红砖门楼增添了爱国爱乡的色彩。

我家原来就住在小北门青莲街,解放前常经过四明公所。年年月月,乡亲邻里间的传说,文字资料的叙述,使我对公所有了不一般的印象。且略记一二。

四明公所最早建立于1797年,占地三十亩,后来不断扩建。当时,在沪宁波人发起“一文愿捐”,就是每天积一文铜钱,一年满三百六十文为“一愿”,各人量力捐献一或数愿不限。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建造起供同乡活动、办慈善事业、寄存灵柩的“宁波会馆”。以后还办了施医局,病院,又扩建为四明医院(现曙光医院前身)。解放前一个半世纪里,先后几次维修、重建,都是用这种群策群力、积少成多的办法集资而成,展现了中华同胞重乡谊讲凝聚的好传统。

四明公所虽然只是宁波同乡的一种社会团体,但在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旧中国,不可能不受压迫。值得一提的是,它交出了不止一份反帝反压迫

的答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军进达上海郊区。清政府和地方封建势力向帝国主义屈膝求援,组织“洋枪队”。洋兵趁机进驻四明公所。后来太平军失败,洋兵却赖着不走了。董事会多次交涉,才把他们赶出公所。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法租界当局两次想扩大租界,派水兵登岸强迫四明公所让地,制造流血事件。但遭到宁波同乡和上海人民的合力反抗,未能得逞。尤其是1898年那场反帝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对抗侵略势力的“第一次政治罢工”纪录。当时法国侵略军强行毁坏公所墙垣,驱赶所内职工。劳工组织长生会会员和工人,在洗衣业出身的宁波人沈洪赉率领下,面对敌人枪口,奋起反抗,被杀死杀伤数人,长生会立即联合法租界洋人家里的佣工、厨师、车夫等宁波同乡,罢工、示威、抗议,又被杀数人(先后共被杀17人)。一时四明公所事件震动全市,各界人民和宁波人团结一致,纷纷罢工、罢市声援,四明公所董事严筱舫、叶澄衷等则向官方坚决交涉。上海人民的团结斗争,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屈服,承认四明公所的所有权。

从此,四明公所的名声传遍全上海,传到海内外,成为互助团结、反帝爱国的象征。

(1998年6月9日)

奶奶学电脑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在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寿命越来越长,于是在上海又传开了一段顺口溜,说是六十小弟弟,七十多来兮,八十不希奇。

算来我已进入“多来兮”之列了,不由自我“打油”一首:奶奶今年七十一,离休生活找新意,说来好笑又希奇,新千年成了电脑迷!

今年春天我热心学电脑,共有“三步曲”:第一步,买电脑。请儿子孙子陪同,到淮海路去挑选,买好后,回家连夜装好,左看右看,沾沾自喜;第二步,学开机。在儿子指导下,先上网,给在法国的小女儿发e-mail,并且把操作次序记下来;第三步,学打字。汉语拼音没有学过,英语已经生疏,看来只能学中文打字。先在“WINDOWS98”里找到各种中文输入法,挑中一个

五笔画输入法,反复练习研究。一时兴起,编成五笔画输入法口诀,熟记于心:一横提,二竖钩,三撇不分大和小,四点捺,五折上下左右都有效。

急匆匆三步并作一步跨,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一天里进了门,然后请儿子、孙子、媳妇一起做老师,有问题就问,有难度就请教。每天打练学习笔记,或者练习各种操作,或者上网浏览,还和孩子们一起给在美国的亲友们打网上电话,装上摄像头和小女儿面对面讲话,真正其乐无穷也!

然而在初学期间,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天,独自上网,不知怎么一来,电脑忽然自行玩起弹球游戏来了,这下糟啦,我还不知道怎样关闭这个游戏,眼看弹球一百,一千,一万的打到了五万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想来想去,只有打电话找人求助,偏偏还在网上,电话线被占用(当时还没有“宽带”),不能打。没办法,只好跑到邻居家去敲门。然后四处找儿子和孙子,在他们的电话指导下,才把电脑上的游戏关掉——后来每想到此情景,便忍俊不禁。

以后,碰到没学过的电脑程序,再也不敢瞎摆弄,老老实实,一步一步认真学习,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苦学苦练,年纪再大,也会成功。

(2000年2月10日电脑上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香港“e太网”)

我躺上汤院士的手术台

辛巳年元宵节刚过,我悄然失踪。家里电话,本市的、外地的日夜没人接;平信、挂号信日久没人复。疑惑、猜测自难免。我上哪儿去了?二月底,我在无奈和希望交织下,躺上了中山医院汤钊猷院士的手术台。在汤医生主刀下,由他的老搭档著名的蒋豪教授主持麻醉,和他的高足孙惠川博士等医生共同协作,准确、迅速地铲除了我要害部位的毒瘤,为我打开了希望之门,指明了康复之道。汤医生在手术后查房时,几次平易近人地告诫说:“你们呀,不要只管写呀写的,要多运动!”“你只比我大一岁,多运动,还来得及!”看着他平和的笑容,想起最初有人传说他因为年事已高不再主刀,并不确实。而熟悉他的博士们尊敬地介绍:院士至今仍每周做肝手术,总数已达几千次。他和夫人俩长年游泳,严寒天照常坚持冬泳。

……不错,他的多运动之说,是保持健康体魄的金玉良言,也是他攀登事业高峰的切实体会。

汤院士的高足同样沉稳谦和。三月中旬,为主刀医生担任第一助手的孙惠川博士,给我拆去了最后一批缝线。这说明,外科手术已告一段落,以后是复查和内科治疗了。孙医生跟着汤院士学习已有八年,已积累了一千多例手术经验,却显出年轻专家少有的谦虚。他夹着最后一根缝线说:“不疼吧!这次手术很顺利,没出大差错。”

对这样精湛、成熟的医术,我自是从内心深处感激不尽。然而说来好笑,作为记者,我却感到一丝遗憾:我没能亲眼看到肝外科大师和毒瘤战斗的现场。因为,我在麻醉大师蒋豪医生“复合麻醉”的“催眠”下,甜甜地睡着了。在整个手术前后,我只看到蒋教授和他助手两人。蒋豪是麻醉科老主任,他自谦是中山医院第三代麻醉师。现在虽然已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却仍然活跃在手术台旁。

手术前一天的傍晚,蒋医生照例看望病人。他一进病房就诧异地问:“怎么是女的?不是男病人吗!”原来,病史上把我误写为男性了。他的一句话,立刻使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在轻松的情绪下,我问了一系列冷不冷、疼不疼之类可笑的问题,以及心脏、血压、糖尿病会不会影响手术。他不厌其烦,笑嘻嘻地回答。最后说:“你的这些病,内外科医生都研究过了,能控制的!手术时我一直在场!”其间关于止疼泵,他介绍了三种,说美国货是电子的,最贵。我儿女们认为最贵大概最好,便要求用美国的泵。蒋医生幽默地说:“节约点吧!电子的,病人自己可以调节,机械的,医生会调节好,放心!”

第二天早上进了手术室。蒋医生和他的助手随即来了。他叫我在手术台上朝左侧卧,自己在我背后,用平静亲切的语调似在和我聊天,又似在对他助手示教:

“我现在用很细的针头,在背脊上刺一下。不疼吧?”

“一点儿也不疼!”我回答。

“好!现在改用粗一点的针头,怎么样?”

“也不疼。有点感觉……”

“是了。现在我要装一段管子……”说时迟,那时快,我背部脊椎一阵

酸胀。他不再问我感觉,只肯定地说:“准备好了!”我一看墙上的钟 8 点 20 分。我想,外科医生们要进来了,大概 8 30 分手术吧……

……

“周珂,周珂!”

我从甜睡中醒来,睁开眼睛,看见蒋医生和他的助手已转到我的左边,正在叫唤我。我第一个反应又看钟,11 点 30 分,怎么回事?

“好了?!”我狐疑地问。

“好了,手术很好!现在送你去监护病房休息。你儿女在手术室门口看你!”

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声“谢谢”,已被推往室外。看一眼麻醉大师疲乏的身影,心里升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念头:我好似经历了一场“魔术表演”!这些医技高强,配合、保证外科手术,免除、减少病人痛苦的麻醉师,远远超过演艺高超的魔术师。

上过手术台,我由衷感谢并更尊敬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内科医生和护理、检验等医务人员!

(2001 年 4 月 8 日)

想起了校歌

因病卧床,不能使用眼睛,无聊中搜索起头脑里储存的歌曲来。想不到首先跳出来的竟是一支用风琴伴奏的小歌:“晓风好,朝气清,一日之计在于晨。大家早呀早,日新又日新,读书救国,振作起精神!”

那是我母校正始小学的校歌,每天早上做早操前都要齐唱一遍,唱了不下上千遍,以致几十年后,连每个字每个音符,连同音乐老师“咿咿呀呀”弹风琴的模样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当然不懂得“读书救国论”的复杂性,只是以小学生的水平,理解为要认真读书,长大了好打倒帝国主义。这一简单的启蒙,对日后的生活道路倒也不无影响。

从这首小学校歌,又想起了母校慈湖中学的校歌,也是一字不差,末了几句是:“愿地灵兮人杰,为国是兮着先鞭。努力,努力,誓毋负大好之山川!”虽然是旧民主主义的东西,可又在头脑里留了下来,还常想象它的某些

积极因素。

奇怪的是,高中、大学都没有校歌了。不过我们还是热衷于唱《毕业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等,唱得同学们热血沸腾,为祖国和人民南下北上,奔赴祖国各条战线……

这一番回顾,却使我形成了一个想法:一首好的校歌,是一个难忘的纪念品。人们喜爱它并引以自豪。这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富有感情色彩的思想教育方法。如果我们现在每所中小学都有一首自己独特的校歌,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好,那定将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不仅会激发同学们努力学习的劲头,培养爱老师、爱母校的感情,而且给与他们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因为在我们国家里,爱母校也是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一个具体内容。

谨向老师、校长们,教育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们提个建议,让广大少年儿童和青年们有一首自己的优美校歌吧!

(6月14日)

百岁苏老——邻家爷爷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科学院院士苏步青同志走完了百年长途,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家园,大家追思他!对于一位这样伟大的科学家,我称之为邻家爷爷,似乎太不尊敬。但是,在这些思念的日子里,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总是他那慈祥、和蔼,又不失幽默风趣的形象,活脱脱是一位邻家老爷爷。

我和苏老同院子邻居有三十年光景。上世纪五十年代,复旦大学为他和另一位教授在第九宿舍专门盖了两幢两层小楼,门前有草地花圃。他一直住到重病进医院。早年各忙各的,偶然碰到,我总是以学生之礼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苏先生”,他呢,常笑嘻嘻地关心:“晚报发行又上去了?”

第一次领略到苏老的幽默,是在一次“两会”的餐席上。他招呼我坐在他旁边,对同席人民代表说:“这位晚报女记者是我邻居。”开饭前,苏老谈笑风生。服务员问他要不要把帽子脱了?他说:“不脱,我连理发都不脱帽子!”大家说他开玩笑,他笑嘻嘻地讲起故事来。说有一次去理发,理发师要给他脱帽,他摇摇手:“不必了,你就这样理好了!”见理发师为难,他才同意

脱下帽子,却说:“你看,帽子里不是光光的吗?”他边讲边脱下帽子给代表们看,大家见他那头顶发亮的大脑袋,偷偷地乐,苏老又一本正经的说:“别笑,别笑!这可是教授的标记,我一位德国同行告诉我,他们那里认为不秃顶就没资格做教授。”这下子引得大伙放声笑了起来。

此后,我见到苏老就不那么拘束了。“文革”初期,重灾区复旦有一些混蛋刮起“八七斗鬼风”,副校长苏老也是被抛出的七个人之一。大热天受尽折磨,斗完了带着全身墨汁,独自从国福路回家。我那天正好提早回宿舍,见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疲惫不堪,一步挨着一部,忙赶上前去安慰他“苏先生,保重!”他勉强装作不在意说:“泼了墨才像黑帮嘛!”又关照:“你家徐震也难逃此劫,叫他当心!”我很感激他提醒。第二天,徐震果然也受到了同样“待遇”,而且,也许因为他年轻,又“态度不好”,对方更凶狠,竟使他受了重伤,导致后来英年早逝。“斗鬼风”后不久,出现“造反派”,有的“小将”不时勒令,索要自行车等造反工具,苏老就让他儿子在晚上悄悄到我家来商量,如何应付。

七十年代初期,苏老的日子好过了些,常常一早乘公交车去工厂(好像是江南造船厂)。我几次在车站上碰到他,不由好奇地问:“您一个大数学家,研究高级理论,去工厂干什么?”他似乎有点高兴地说:“革委会要求数学为生产服务呀!比如搞线性规划。”我不懂。他便简明通俗地给我上课:比如从北站运一车货物到外滩,货卸掉后空车回去。如果让那空车从外滩再运其他货物回北站,不是可以省却许多人力物力吗?这就要用数学来规划。我听了似有领悟,说高深数学也有很实际的一面。苏老笑笑问我:“听说你在中学时喜欢几何,还用简化办法修改过教科书上的一个例题,那为什么上大学不考数学系?”我老老实实说:“高等数学太枯燥,我更喜欢学文科。”他不以为然:“理科文科又不是冤家!我也喜欢写诗呢,还想在报上发表呢!”我忙说:“那太好了,有好诗交给我!”

粉碎“四人帮”后,大家又都忙起来了,好几年没见到苏老。直到我退居二线后常闹病,遵医嘱早上体育锻炼,在九舍草地一角做练功十八法。发现苏老也在早锻炼走路。他边走边说:“走路最方便,我每天早上绕九舍三圈,已经坚持好些日子了。”那时候,苏老年事已高,工作仍繁忙,曾小中风住医院,康复后早上又走起路来。一次我问他:“还走三圈吗?不累?”他答

道：“还是三圈，但是半径缩短了。现在只在宿舍里面走，不出大门了……你动员徐震也出来走走。”我说：“徐震那次受伤后，走路已不行，老跌跤，他打太极拳。您怎么只走路，不打拳？”他半开玩笑说：“我不是取名步青吗？与走路有缘！”我点头称是，也开玩笑说：“我还以为您从小立志要平步青云呢！”他笑而不答。可惜我没有再问下去，究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照字面看，也许真与散步有缘。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九十年代，在人生长途上走呀走呀，一直走到超过一百岁！

我于九十年代中期搬离第九宿舍，从此没有再见到苏老。有时回去看看，见苏老种的长春藤已经爬满了他那座小楼。远远望去，仿佛见他仍在屋前花圃里俯身侍弄花卉。走在甬道上，依稀又看到他健步向前的身影！他那邻家老爷爷的印象，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会永远怀念他！

(2003年4月9日)

公今度和老教授们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的丈夫公今度像一本书，十年来我已翻遍每一页。时逢清明，又情不自禁地重温起他在复旦大学和前辈师友交往的点点滴滴。

公今度是他的笔名。他写杂文的时候，还是个青年。老教授们说他是初生之犊。复旦大学老校长、新闻系老主任陈望道先生也这样说他。陈望道先生住在第九宿舍一座独立的洋房里，逢年过节，公今度都要去拜望。我也是望老的学生，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去。那年公今度在农村，用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文，不料引来当年一位杂文界权威和他打起了笔仗。望老知道了这件事。没多久，当我们去看望他时，他含蓄地说：“徐震，你写文章喜欢用笔名，其实你的本名蛮好：徐徐地震。写杂文当然要‘震’，但不必急吼吼。”我觉得老师的话值得思索，里面包含着辩证法。可惜年轻气盛的徐震没听进去，讲话、作文时有得罪人，明里暗里吃了不少苦头。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更是硬被卷入一场关于杂文的风波，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后他才领悟到，老师在这场灾难之初，已经有了深思。那时候，上海的“造

反派”利用电视批斗市委主要领导干部,还要全市大小“走资派”分散收看。当时教师家里哪有电视机,只好在收音机里装个什么零件,可以“收听电视”。徐震和我被“造反派”分派到陈望老家客厅里收听。望老脸无表情,一言不发,却听得很仔细。可是那种批斗会很长,公今度听得不耐烦了,便想溜。望老看出他的心思,摇摇手,轻轻说:“你耐心点,当作一种学习吧!”幸好老校长关心,我们才仔细听下去。在批斗快结束时,学校里的“造反派”果然来检查,总算少挨一次训斥。而老师“当作一种学习”的叮嘱,在日后漫长的挨批斗生涯中,经常启示公今度,得以度过艰难的岁月。

陈望道是我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前辈,但他从未在学生面前表露过一点点自得。相反,望老不止一次自豪地表彰校友们的成就,常说:“我们复旦,学生遍天下。”他一口浙江东阳口音,大家常偷偷学,公今度学得特别传神。这传神的口音,很多年来成为同学们相聚时的欢乐一刻。望老生病住华东医院,公今度常和学校里人去看望他,而我则没有机会。他征得望老同意,特地拍了一张照片回来送我。我保留了很久,后来转送给了一位重庆年代的系友。原以为可以再印几张,谁知公今度离去后,我就再也找不到那照片的底片了。

公今度常拜望的另一位前辈师友是中文系吴文祺教授。他和吴教授的话题常围绕鲁迅。一次他问我:“吴先生今天讲了一段鲁迅逸事,想听吗?”“当然!”他便兴冲冲地转述起来。一次鲁迅谈起帮闲文人,举了一个扬州盐商的例子。当年扬州盐商甲富天下,家里供养食客。这位盐商附庸风雅,自命也爱赋诗。一个杨花飞舞的季节,他在瘦西湖宴请骚人墨客。大家各献诗作后,要求东道主也吟诵佳章。盐商无奈,看到栏外杨花飘来,便胡诌道:“柳絮飞来一片红……”座中有人窃笑,这时一位帮闲食客马上站起来解围:“我和××仁兄原是乡亲。此诗是他早年忆乡之作,我至今还记得全诗呢!”当下他从容不迫地吟诵起来:“廿四桥畔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一片红。”吟罢,座间纷纷叫好。吴教授说,鲁迅认为做帮闲文人要有本领才能发挥作用,不是扯淡……我当时听公今度转述完,很感兴趣,连忙再找鲁迅杂文中关于帮闲文人的那篇来读。时隔多年,居然还记得那首帮闲诗。

公今度在复旦中文系前辈教授中朋友多,常听他讲起的还有郭绍虞、

朱东润、蒋天枢、蒋孔阳等先生。尤其是郭、朱两位，他们都担任过中文系主任，道德文章很受到学生敬重。对朱先生，公今度写过追思文章《朱东润先生两事》。我特别喜欢朱先生的字，几次请公今度去敬求墨宝，可他总说“朱先生年事已高，对事又认真，不好去增加他负担”。为此我遗憾了多年。

郭绍虞教授是位忠厚长者，平日很难看出他是位大学问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曾为郭老出版古典文学、语言文字、杂著三类论集。他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率先出版时，亲自签章送给徐震一套。郭老住在市区，离学校很远，徐震经常去探望。“文革”前有一次邀我同行，郭老的家屋小书多，陈设简朴，郭老待人亲切，谈兴甚浓。特别是他爱才若渴，令人感动。那天讲起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朱剑心，公今度告诉他朱先生曾经是大学中文系教授，爱做学问，曾为商务印书馆的“学生国学丛书”选注过《黄仲则诗》等读本，还研究书法，写得一手好字。郭老听了很感兴趣，问我有没有朱先生的书法作品找给他看看。后来，我在家里找了朱先生送的几幅行草和扇面，送去给郭老看，郭老很欣赏，问我朱先生现在在干什么。我告诉他，解放前朱先生教高中国文，解放后调整中学教师队伍，被分到了电力学校教语文。郭老听了表示惋惜，说：“你的国文老师有真学问，我倒很想见见他。”可我那时忙得要命，竟没有促成此事。后来公今度告诉我，郭老说，这样的人才大学中文系里也不多。他还真向有关方面作了推荐。可惜当年为教育体制所限，郭老的推荐没有成功。（原载《文汇报》2003年5月3日）

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1905—2005)

贺 联 两 副

其 一

百载教泽留传统 八方校友开生面

其 二

从“五四运动”到“迎接解放” 民主战士勇进 热血拯救中华
汇“文史哲经”集“数理化医” 科技精英辈出 才智奉献宇宙

(原刊于《复旦百年校庆专刊》

2004年4月20日)